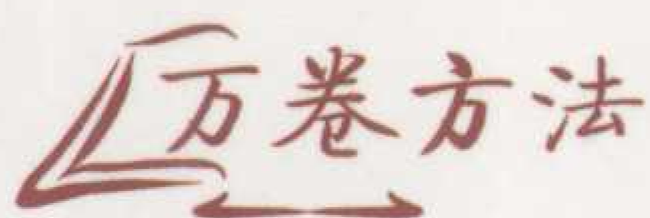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ZHIXING YANJIU FANGFA YICONG

分析社会情境：
质性观察与分析方法

FENXI SHEHUI QINGJING
ZHIXING GUANCHA YU FENXI FANGFA

约翰·洛夫兰德　戴维·A. 斯诺
利昂·安德森　林恩·H. 洛夫兰德　著
林小英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FENXI SHEHUI QINGJING ZHIXING GUANCHA YU FENXI FANGFA

■ 本书按照实地研究的步骤和程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生动鲜明的实例和实践操作方法，帮助初学者掌握搜集、聚焦和分析质性资料的方法。

■ 本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着重描述和分解了实地调查研究相互重叠的三个阶段：资料的搜集、聚焦与分析。

第二，从新近研究著作和研究方法评论的经典中，精挑细选许多新的例证。

第三，广泛而细致地介绍了编码、备忘方法及电脑在资料整理和分析中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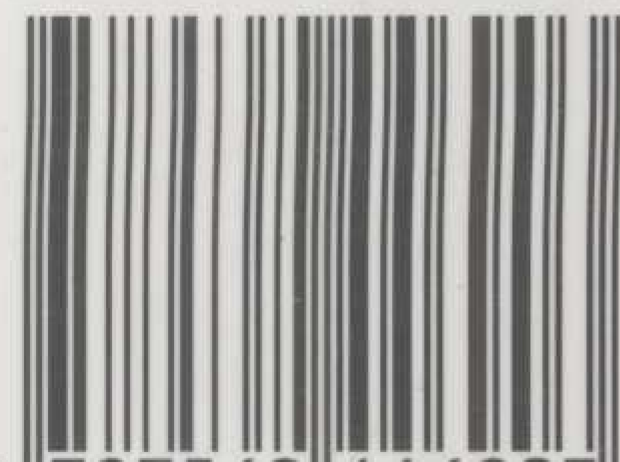
第四，就“后现代主义”等新兴理论及相关观点进行了探讨。

■ 本书适合于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作、教育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学习者使用。

发表及参阅相关讨论，请登录：

万卷方法与学术规范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ISBN 978-7-5624-4690-3



定价：35.00元

万卷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主编 陈向明

分析社会情境：
质性观察与分析方法

FENXI SHEHUI QINGJING
ZHIXING GUANCHA YU FENXI FANGFA

约翰·洛夫兰德 戴维·A. 斯诺 利昂·安德森 林恩·H. 洛夫兰德 著
林小英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与分析方法/(美)洛夫兰德(Lofland,J.)等著;林小英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3
(万卷方法.质性研究方法丛书)
书名原文: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ISBN 978-7-5624-4690-3

Ⅰ.分… Ⅱ.①洛…②林… 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Ⅳ.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169 号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内江市兼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10 字数:258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690-3 定价:35.00 元

第4版前言

第3版的使用者可能认为，概括地了解第4版是如何保持不变或进行改变的，非常有用。除了两位合著者的加盟以外，本书还有以下的连续性和变更之处。

- 尽管保留了先前版本的组织结构、章节顺序以及许多章节的内部结构，但是本书也有大量的修改，包括删除了大量陈旧材料和实例，增加了大量实例和方法论材料，这些都源于最近的质性研究和方法论的讨论。本书的修改还包括整合了新材料和新的合著者的声音。
- 在修改的过程中，对于删除先前的研究，我们是小心谨慎的，不仅仅因为那些研究十分清晰地描述了一些步骤和原则，而且也为了保持先前和随后两代田野研究者之间的连续性。我们认为保留对先前研究的参考是很重要的，因此，尽管倾向于寻求新的东西，但我们仍试图平衡新的和旧的研究。
- 除了用相对平衡的方式删除和增加材料外，较之于以前的版本，我们突出了大量的质性研究的特征。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在许多章节中能提供更直观的连贯性，使读者对新近的质性研究更为了解。基于这种考虑，有四种著作被广泛地应用到许多章节中，包括凯西·布里所著的《在有组织的种族主义内部：仇恨运动中的妇女》(Blee，2002)、詹妮弗·洛伊斯所著的《英雄的努力：搜寻和营救志愿者的情感文化》(Lois，2003)、卡尔文·莫里尔所著的《执行的方法：公司中的冲突管理》(Morrill，1995)以及戴维·斯诺和利昂·安德森合著的《他们遭遇不幸：对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的研究》(Snow and Anerson，1993)。重要的是，其中的两个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深度访谈的资料收集方法，而另外两个研究则采用的是参与观察法。而且，值得重视的是，每一个研究过程都明显地聚焦于由在诸多方面相当不同的人所组成的不同的社会情境。

- 一些其他新材料的增加,是受某些先进技术和组织的/官僚政治的革新或当务之急的指引。电脑和用于质性分析的各种软件以及学院和大学里的制度评审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简称IRBs)的出现和制度化,显得越来越突出。因此,在此版中,我们对这些事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目录

导　言　本书的目标与结构 …… 1
Ⅰ. 三大任务：收集、聚焦和分析资料 …… 1
Ⅱ. 实地研究的特征与观点 …… 2
A. 资料收集：研究者作为目击者与工具 …… 3
B. 聚焦资料：社会科学指南 …… 4
C. 分析资料：浮现 …… 5
Ⅲ. 面向的读者 …… 6
Ⅳ. 实地研究的多种称谓 …… 6

第一编　收集资料

第1章　从你的立足点起步 …… 9
Ⅰ. 个人的经历和个人史 …… 10
Ⅱ. 学术好奇心 …… 13
Ⅲ. 传统与确认 …… 14

第2章　评估资料现场 …… 16
Ⅰ. 整体目标 …… 16
Ⅱ.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 19
Ⅲ. 对资料现场的详细评估 …… 20
A. 评估适切性 …… 20
B. 评估进路 …… 23
C. 评估肉体的和情感的风险 …… 31
D. 评估研究伦理 …… 32
E. 评估个人后果 …… 34

Ⅳ.最后的忠告 …… 37

第3章 进入现场 …… 38
Ⅰ.场景的种类 …… 39
Ⅱ.身份未被知悉的调查者 …… 40
A.开放的和半开放的场景 …… 41
B.私人的和半私人的场景 …… 43
Ⅲ.身份已被知悉的调查者 …… 46
A.“内部”参与研究者的角色 …… 48
B.“外部”参与研究者的角色 …… 48
Ⅳ.政治、法律与官僚体制的障碍 …… 56
Ⅴ.保密的问题 …… 59

第4章 融洽相处 …… 63
Ⅰ.与自我相处:情感的和身体的压力 …… 63
A.信息超载 …… 64
B.欺骗与担心被揭穿 …… 65
C.远离和屈服 …… 66
D.身体的危险 …… 74
E.处理挑战 …… 76
Ⅱ.和成员融洽相处:发展和保持田野关系的问题 …… 78
A.促进发展和保持田野关系的策略 …… 78
B.控制关系亲密度的策略 …… 85
Ⅲ.融洽相处并退出实地 …… 88
Ⅳ.与提出要求者和良知相处:持续存在的伦理事项 …… 91
Ⅴ.附言:实地经验的个人陈述 …… 92

第5章 记录资料 …… 94
Ⅰ.资料:事实抑或虚构 …… 96
Ⅱ.记录工作 …… 98
A.资料来源 …… 99
B.错误与偏差的问题 …… 104
C.资料记录的技巧 …… 110

D. 保护机密性 …… 113
Ⅲ. 深度访谈中的资料记录:提纲和文字稿 …… 114
A. 准备访谈提纲 …… 114
B. 进行访谈 …… 120
C. 誊录访谈 …… 124
Ⅳ. 观察时的资料记录:实地笔记 …… 126
A. 大脑笔记 …… 126
B. 笔记草稿 …… 127
C. 实地笔记定稿 …… 128
Ⅴ. 撰写访谈文字稿和实地笔记的强迫心理 …… 135

第二编 聚焦资料

第 6 章 思考主题 …… 139
Ⅰ. 单元与层面联合成主题 …… 139
Ⅱ. 单 元 …… 141
A. 实 践 …… 141
B. 片 断 …… 142
C. 相 遇 …… 143
D. 角色和社会类型 …… 144
E. 社会的和个人的关系 …… 145
F. 团体和派系 …… 146
G. 组 织 …… 147
H. 群落和居留地 …… 149
I. 亚文化和生活方式 …… 151
Ⅲ. 层面与主题 …… 152
A. 认知层面或意义 …… 152
B. 情绪层面或感觉 …… 156
C. 等级层面或不平等 …… 160
Ⅳ. 作为主题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层面 …… 163
Ⅴ. 单元、层面与主题构成编码的思态 …… 164

第7章 提 问 …… 166
Ⅰ. 主题的类型是什么 …… 167
A. 单一类型 …… 167
B. 多重类型和分类法 …… 168
C. 类型化 …… 170
D. 分类和类型化的资源和规则 …… 171
Ⅱ. 主题的频次是什么 …… 172
Ⅲ. 主题的幅度是什么 …… 173
Ⅳ. 主题的结构是什么 …… 173
Ⅴ. 主题的过程是什么 …… 174
A. 周 期 …… 175
B. 螺 旋 …… 176
C. 顺 序 …… 177
Ⅵ. 主题的原因是什么 …… 180
A. 原因解释的必要条件 …… 180
B. 原因解释所选择的模式 …… 181
C. 阐明质性实地研究和因果解释之间的关系 …… 182
Ⅶ. 主题的结果是什么 …… 187
A. 检测结果的前景议题 …… 187
B. 对结果所做的质性研究示例 …… 189
Ⅷ. 施为者在哪里、是什么 …… 190
A. 消极论者对动因性概念 …… 190
B. 动因性的问题 …… 191

第8章 唤起兴趣 …… 193
Ⅰ. 社会科学框架 …… 194
A. 真 实 …… 194
B. 新 颖 …… 196
C. 重要性 …… 200
Ⅱ. 社会科学的价值承诺 …… 214
A. 祛 魅 …… 215
B. 全面的、冷静的理解 …… 216
Ⅲ. 其他框架 …… 217

A. 技术官僚/社会工程框架 ……………………………… 217
B. 解放框架 ……………………………………………… 218
C. 揭发丑闻框架 ………………………………………… 218
D. 表达声音 ……………………………………………… 219

第三编 分析资料

第 9 章 开展分析……………………………………………… 223
Ⅰ. 策略一:社会科学的框架 ……………………………… 225
A. 八种命题形式 ………………………………………… 226
B. 对比命题式写作与其他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 226
C. 单个实地研究中的命题数量 ………………………… 226
Ⅱ. 策略二:焦虑的正常化和管理 ………………………… 227
Ⅲ. 策略三:编码 ………………………………………… 229
A. 两个实际的编码方法 ………………………………… 232
B. 编码文件的类型 ……………………………………… 234
C. 坚持写按时间编排的记录 …………………………… 239
Ⅳ. 策略四:备忘录 ………………………………………… 240
Ⅴ. 策略五:画图 ………………………………………… 242
A. 分类法 ………………………………………………… 243
B. 矩阵和类型学 ………………………………………… 245
C. 概念图表 ……………………………………………… 246
D. 流程图 ………………………………………………… 247
Ⅵ. 策略六:弹性思考 ……………………………………… 248

第 10 章 撰写报告 ………………………………………… 252
Ⅰ. 初步的考虑 …………………………………………… 253
A. 理解写作过程的社会心理维度 ……………………… 253
B. 计划你的写作时间和地点 …………………………… 255
Ⅱ. 写作实践 ……………………………………………… 256
A. 开始写作 ……………………………………………… 256
B. 就任何研究层面进行写作,但一定要写 …………… 258
C. 承认厌恶,但还是要有规律地写作 ………………… 260

D. 探索中的信任与写作中的惊奇 ………………………… 262
E. 不要追求完美或唯一正确的方法 ……………………… 262
F. 分割和征服 …………………………………………… 264
G. 利用标准的文学组织手段 ……………………………… 265
H. 发现你自己的写作风格 ………………………………… 267
I. 重读与修正 …………………………………………… 268
J. 寻找反馈 ……………………………………………… 269
K. 约束你的自负以及相关的依恋 ………………………… 271
L. 就此罢休 ……………………………………………… 272
Ⅲ. 结论性建议 …………………………………………… 273
A. 实地研究取向是各部分构成的体系 …………………… 274
B. 学术所见的相似性 ……………………………………… 274

参考文献 ……………………………………………………… 275

专有名称汉英对照表 …………………………………… 295
人名汉英对照表 ………………………………………… 295
作品名称汉英对照表 …………………………………… 302

万卷方法总书目 ………………………………………… 305

导言

本书的目标与结构

The Aims and Organization of This Guide

本书的宗旨在于介绍如何从事社会科学实地研究(social science fieldstudy)——此种研究类型通常被称做“民族志(ethnography)”、“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以及/或是“自然主义研究(naturalistic research)”。虽然各门学科对这种研究的称谓可能各不相同,然而在特征上极为相似:对自然情境或场景进行直接的、质性的观察(qualitative observation),主要运用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或深度访谈法(intensive interview)。

Ⅰ.三大任务:收集、聚焦和分析资料

高质量的社会科学实地研究成果取决于三大相互关联任务的成功完成,这三个任务应被看做是这类研究的三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

- 收集资料。
- 依据社会科学的概念、问题、论点聚焦资料。
- 分析资料并撰写研究报告。

我们列出这三项任务的顺序与开展实地研究时这三个任务被执行的顺序是一致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这仅仅只是“概括性”的顺序。虽说先搜集资料才能聚焦并分析资料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在搜集资料的同时,我们也要对资料进行聚焦和分析。基于写作的线性逻辑(1inearlogic)考虑,我们必须使之显得有一

定的顺序,而且不同的任务得在不同的时间点完成。实际上,在实地研究的实际开展过程中,这三项工作是相互重叠、互相缠绕的。

虽然我们知道三大任务是相互联系的,不过仍然会发现,把前两项任务——收集与聚焦资料——视为两大持续进行的主要投入活动,仍然是有帮助的。研究者所收集的资料提供了经验投入(empirical input),聚焦研究问题则提供了社会科学投入(social science input)。而第三项任务——分析资料——则是资料收集与资料聚焦之间的互动所衍生出来的综合体或社会科学产出(social scientific output)。图 1 描述了三者的关系。其中,收集与聚焦资料成为研究初期交互进行的主要活动,其所衍生出的分析,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则成为自然而然的、最终的活动。

在了解收集、聚焦与分析资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图 1 不过是有助于理解的多种图示之一。例如,你也能根据维恩图解(Venn diagram)中交迭的循环预想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个任务都构成一个循环圈,并与其他任务不同程度地交迭(也可参看:Miles and Huberman 1994,pp. 10-12)。

Ⅱ. 实地研究的特征与观点

就收集、聚焦和分析资料这三项任务概略而言,质性实地研究(qualitative fieldstudy)与问卷调查、内容分析以及实验等其他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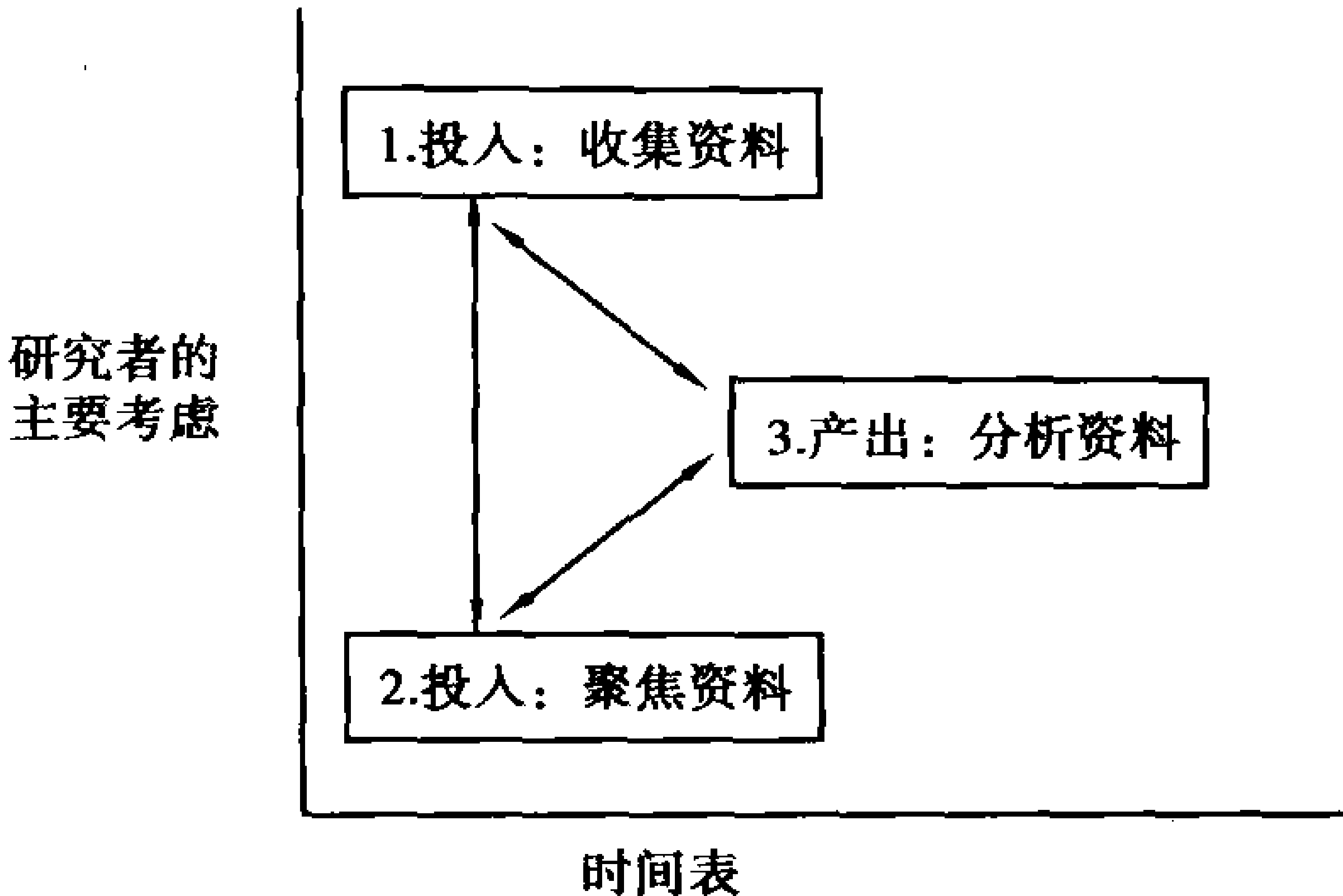


图 1 实地研究中三个任务的流程图

会研究方法并无区别,其差异仅在于它们如何着手处理这三项任务。具体地说,实地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①研究者和其所收集的“资料”之间的关系,②聚焦资料的时间点,以及③分析资料和聚焦资料之间的关系。以下我们就每一个任务加以说明,并概述各章节的主要内容。

A.资料收集:研究者作为目击者与工具

质性实地研究和其他研究方法的差异在于,在被研究者的生活中,研究者本身就是观察者和参与者。研究者使出浑身解数,在他人生活中扮演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角色。这一点和其他各种研究方法有天壤之别,因为在其他研究方法当中,研究者本身并不会在自然发生的情境或场景中持续在场。他们依靠的资料来源是文件、结构化访谈、实验模拟等,通过这些方法所获得的资料与在持续运作的自然情境中进行直接观察及参与所获得的资料相比,有着层次上的区别。

研究者之所以要观察或参与他人的生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唯有借助这种方式,才能目睹、感受、清楚明白地分析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研究者置身于他人生活之中,和他人一同经历、感受着生活,使自己成为研究的工具或媒介。研究者试图观察被研究者如何感知、感受与行为,以便全盘而通透地理解他们的感知、感觉和行为。的确,实地研究的知识论基础即是:唯有通过直接的观察或参与,才能精准地深入理解社会和生活的特性。

第一编第 1 至 5 章提供了一些指导方针,告诉各位如何做好、掌握研究者的角色,及作为目击者和研究工具,做到近距离地、亲密地理解他人的生活。

- 第 1 章:由于研究者的核心角色是资料经验者(data experiencer)与收集者,而能否扮演此种角色,我们提倡研究新手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以他们当前或过去的情境或兴趣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将在第 1 章讨论这种做法的利弊得失以及相关的事项。
- 第 2 章:某些社会场景与其他场景相比,更适于使用特定的研究技巧。因此,依据适合性和可行性原则,评估资料现场的过程是必要的。对这种做法的指导将在第 2 章介绍。

- 第3章:进入一个相关现场时,其成败往往难以定论。研究者必须从社会、政治、法律与伦理等方面考虑,决定进入模式(mode of entry)。
- 第4章:一旦你开始研究,研究及其场景之间的关系会衍生出一连串的问题,你必须一一处理。我们在第4章将会考虑如何在现场相处的问题。
- 第5章:研究者主要的实质性工作即是资料的记录。主要的记录方法有两种,包括访谈逐字稿(interview write-ups)与实地笔记(fieldnote)。第5章会详尽介绍这两种做法。

B. 聚焦资料:社会科学指南

在实地研究中,让自己作为研究者屈从于他人的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这种涉入(immersion)的过程,必须以人类团体生活的社会科学分析的目标及关注事项作为引导。我们在第二编第6、7、8章中将会做出解释。

- 第6章:在这些基本事项中,本章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将人类团体生活视为在组织上有所不同的单元规模(unit scales)以及有所不同的方面(aspects)。在分析阶段中,你将会选择一个或少数几个单元和方面。因此,为了帮助你深思熟虑地做出抉择,我们在第6章着眼于"规模",由小到大逐一描述十种基本社会组织单元,包括诸如社会角色(social roles)、团体、生活方式(life style)等。除此之外,我们也将描述三种经常使用的社会情境或场景的一般方面:意义(meanings)、情绪(emotions)与等级(hierarchy)。将单元及方面一并纳入考虑后,就能得出可行的分析主题。
- 第7章:单元与层面只能提供可能的研究对象或聚焦主题。在社会科学分析中,我们要持续不断地针对主题提出问题。我们在第7章将会概述八大类可能的问题。
- 第8章:主题和问题为社会科学分析提供了形式上的基础,而在进行社会科学分析时针对主题及问题所做的决定,则提供了定锚的作用。然而,社会科学指南或许还有难以捉摸的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你就主题与问题所进行的分析,要能让读者在

阅读你的分析时产生兴趣。在第 8 章,我们将采用对任何知识工作进行评估的一般标准,并提出有关如何让自己的研究真实、新颖、重要并引起读者的兴趣的建议。

实地研究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研究方法,在于研究者要执行几项任务:选择主题,决定要问哪些问题,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引发兴趣。这种做法和众多"理论驱动(theory-driven)"以及"假设检验(hypothesis-testing)"的研究方法,实有天壤之别。因为,后者挑选的观察、分析主题,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结果可能引起的兴趣,在研究者着手收集资料之前,都已经澄清了。

C. 分析资料:浮现(emergence)

由于资料聚焦与资料收集的过程紧密相连,实地研究对于分析这项任务持开放的(open-ended)态度:一方面这是其本来固有的,另一方面这也是设计上的必然。不论是在知性层面还是实务操作层面,分析都是从收集到的资料(任务一)和聚焦决定(任务二)两者的互动中浮现出来的。

这个过程的目的在于让研究能够:①与人类团体生活的各种方面相互调和,②描述这个生活的各个层面,③就此生活提出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获得或提出的观点。

作为一个开放的、逐步浮现的过程,我们本来就很难提出绝不出错的指引方针,来指导研究者如何将所收集到的资料与聚焦点结合起来,从而转化成分析。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找到了一些有所帮助的执行步骤。

- 第 9 章:步骤之一,聚焦在实际处理资料的执行流程上,以协助研究者决定分析主题与问题。其中最基本的、核心的部分是编码(coding)和撰写备忘录(memo)。我们将在第 9 章解释这些及其他相关的开展分析的技术。
- 第 10 章:另外一个步骤关注分析的呈现(representation),特别是报告的特性、内容、顺序以及写作的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我们将在第 10 章介绍这些事项,并提出几项关于写作的经验原则。

Ⅲ. 面向的读者

虽然从训练背景及实务工作层面来看,我们是社会学者,然而,我们在这本指南中,把实地研究视作多学科的活动,而不视为社会科学家的特有领地。的确,我们所描述的研究实务至少被用于十多种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并且成效卓著。除了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之外,实地研究法也应用在多样化的领域中,例如行政、教育、通讯、司法、地理、劳动关系、护理和社会工作。

Ⅳ. 实地研究的多种称谓

我们用"实地研究"一词来表示这本书里所说明的研究方法。但是,如同导言的第一段所言,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用相同的方式,使用相同的称谓或者概念。社会科学无异于术语的迷宫,众多称谓你争我夺,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个术语能够主宰这个特别的领域。研究者往往直截了当地"从事研究",而不曾费心给"它"一个称谓,这种现象特别多地出现在政治学当中,心理学偶尔也有这种情形。人类学家给这种研究工作不同的命名,称之为"田野工作(fieldwork)"或者"民族志(ethnography)"。不过,随着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这两个词语都不能够体现这种研究类型的显著特质。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学范畴里,田野工作一词还算通用,但是,还是涌现了众多其他术语:质性社会研究(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以及自然主义(naturalism)(这个多样化称谓传统的发展史可见:Atkinson et al., 2001, pp. 1-7; Emerson 2001, pp. 1-53; Gubrium and Holstein, 1997; 以及 Vidich and Lyman, 2000)。

在诸多我们得以使用的称谓中,"实地研究(fieldstudy)"是作为一种比较普遍且意义宽泛的概念而被接纳的,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常常使用这个术语。然而,我们有时也使用其他称谓,特别是田野工作、民族志、自然主义研究(naturalistic research)、自然主义方法(naturalistic approach)。但是,我们相信,依据以上的叙述,这些微小的前后不一致之处不至于造成混淆。

第一编 收集资料

实地研究的初期或初步任务，是由收集资料的五个方面所组成的，具体包括：

- 从研究者的立足点出发做准备（第 1 章）。
- 选定信息丰富且能够面对面、密切接触的现场（第 2 章）。
- 进入研究现场需要处理的难题（第 3 章）。
- 处理与研究现场或情境中人们的关系（第 4 章）。
- 记录资料（第 5 章）。

第1章

从你的立足点起步

Starting Where You Are

社会研究者发现他们自己和他们周围的社会世界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中。他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并试图进一步分析性地理解那些想当然的现实和观念,而大部分人在这样的现实和观念里经历和过着他们的生活。与任何其他种类的社会调查不同,实地研究还利用研究者和他们周围世界之间的个人关系,将这些关系看作通往潜在研究的康庄大道。你在日常生活中来回穿梭的社会世界是什么?你发现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思考的问题以及浮现的想法是什么?社会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或实地研究的方法鼓励研究者怀着明确的自发性(willingness)甚至承诺,以调查者的身份来确定个人的关注点。实地研究是耗时费力的,常常伴随心力透支。从你的立足点出发可以让你在进入研究现场以及与知情者(informants)接触时更轻松,也可以增加实地研究所要求的保持参与和承诺的机会。

成功的实地研究要求(至少)两个因素:即对于某个主题的学术好奇心以及从情境和知情者那里获得合适的资料的可行性。从你的立足点起步意味着你从一开始就根据你的个人经历(personal biography)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确定研究的方向。有时候,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机遇提供了进入社会环境的通路,实地研究由此衍生出来。还有一些时候,实地研究由好奇心发展而来,而好奇心则由阅读、课堂以及学术对话所激起。最后,当研究者把两者结合起来,带着学术性的和分析性的计划,参与到研究情境中去,实地工作就开始萌芽了。

当你准备进入实地时,我们强烈建议你仔细思考你的立足点

以及你的个人史(biography)中可能出现的机遇。

I.个人的经历和个人史

一份工作、遭逢恶运、升迁发展、亲人过世或者亲密关系的维持、疾病、让人乐在其中的活动、生活起居的安排,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可能境遇,都有可能提供足够研究的主题。这些偶发事件或当前的日常事务能够在生理或心理上提供给你切入社会场景的进路。这些经历也能够刺激研究者的兴趣或关注度,为其提供动机和好奇心,结合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成为有意义的自然主义调查的切入点。运用你直接的个人经历作为实地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杰弗瑞·里默(Riemer,1977)所谓的"机遇式研究(opportunistic research)"。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案都源于这种方式。表1.1罗列出了一些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实例,我们也试着在其中呈现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形成的各种情境。

你试图通过实地研究而获得检验的旨趣(interests),可能源于你当前的或过去的个人史以及生活环境——族群(ethnicity)、性别(gender)、性取向(sexual preference)、过去的认同(identities)或经验、居住地、家庭习俗、家世(class of origin)、宗教信仰,等等。例如,加里·艾伦·怀恩的研究《天才的语言》(Fine,2001),研究中学生辩论和青少年文化,就与其儿子托德作为一名中学生辩手出色的经历有关。类似的情况还有,约翰·欧文对于《重罪犯》(Irwin,1970)、《混乱的监狱》(Irwin,1980)、《监狱》(Irwin,1985)的兴趣,和他在21岁时被判犯下重罪,随后在加州州立监狱吃了五年牢饭的经历密切相关。而玛丽·若麦若关于佣人劳工的研究《美国女佣》(Romero,1992),据说可能源于她在青少年期担任女佣的经历,她的母亲、姐妹、亲戚与邻居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在每个案例中,都是直到研究者形成了对于某个主题的好奇心,这个主题才成为民族志研究的焦点的。若麦若在她的研究轨迹(trajectory)里记录了她好奇心出现的时刻:

表 1.1　"从你的立足点起步"的例子

这个人	从其立足点起步	完成公开出版的社会分析
Peter 和 Patricia Adler	两个孩子的父母	《同伴的力量:青春期前的文化和身份》(1998)
Elijah Anderson	一位住在费城阶层混合(mixed-class)、种族混合(mixed-race)地区的居民	《城市生存能力:一个都市社区的种族、阶层与变迁》(1990)、《街道的密码:市中心的庄重、暴力和道德生活》(1999)
Judith A. DilOrio 和 Michael R. Nusbaumer	在堕胎诊所担任陪护	《保护我们的心智:堕胎陪护中的愤怒管理》(1993)
Mitchell Duneier	每天从格林威治村的人行道旁的书贩和乞丐身旁经过	《人行道》(1999)
Rick Fantasia	在小型铁厂工作时,发生了盲目的罢工	《团结的文化:自觉、行动与当代美国劳工》(1988)
David A. Karp	精神抑郁患者	《谈悲伤》(1996)、《同情的负担:家庭如何应对精神疾病》(2001)
Diana Kendall	"古老姓氏"的家庭成员和交响乐爱好者	《善行的力量:上流社会的特权妇女和社会再生产》(2002)
Lawrence J. Ouellet	在西北大学上研究生时当卡车司机	《从踏板到金属:卡车司机的工作生活》(1996)
Frank N. Pieke	1989 年天安门广场学潮开始时,在北京做学位论文的实地研究	《平凡与非凡:中国改革与 1989 年北京动乱的人类学研究》(1996)
Clinton Sanders	陪伴两条纽芬兰狗的主人	《善解狗儿们:与犬科伙伴一起生活和工作》(1999)

续表

这个人	从其立足点起步	完成公开出版的社会分析
Christopher L. Stevenson	游泳高手俱乐部成员	“非言语符号对运动谈话含义的影响:来自游泳高手的个案研究”(1999)
Diane Vaughan	结婚二十年后的离婚者	《劳燕分飞:亲密关系的转折点》(1990)

在德克萨斯州大学艾尔帕索(El Paso)校区任教之前,我一边住在同事家,一边找公寓。同事家中有全时女佣协助打扫房子与烹饪。我四下打听了一下,发现在艾尔帕索雇用全时女佣是很普遍的做法。……从墨西哥雇用女佣的做法极其普遍,以至于本地人把周一称做边境巡逻队的休假日,因为官员无视这些妇女在周末假期结束时越过边界,回到雇主家中。在我看来,雇用未经登记注册的墨西哥妇女担任佣人的做法,实在不可思议,尤其她们之中不少人还不足十五岁。是这份怪异的感受,让我想到以佣人服务的主题作为探究点,质疑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Romero,1992,pp. 1-3)

社会学者往往这么说,身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变成研究工作中的“问题点”。我们认为,这个断言不无道理,不过有一个附带条件:即自我与研究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微妙而深奥的,对于外部观察者(outside observer)来说,可能并非清晰可见。事实上,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许多顶尖的作品,很可能扎根于作者的早期际遇和/或当前际遇。在实地调查研究传统及其他研究传统中都是如此。其间的关联并不总是,或许甚至也不常被公开承认,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做学问的规范并不要求研究者诉说衷肠,仅要求其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即可。

但是,近年来,许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工作者在他们的民族志文本中袒露了他们的灵魂和生活(Ellis,1995;Ronai,1992;Rosaldo,1989)。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提倡,研究者要么直接地,要么间接地,不仅要从个人立足点起步,还要驻足在这个立足点上,使个人经历或个人史成为其民族志的焦点。冠

以不同的名称,如"自传式社会学(autobiographical sociology)"(Friedman,1990)、"自我的民族志(autoethnography)"(Reed-Danahay,2001)以及"诉说个人的故事(telling personal stories)"(Ellis and Bochner,1992),这种田野工作的方式对达到许多目的都有用,例如,试图理解某种生活经历及其相关的情感反应之间的关联。内那托·罗萨多只有在经历了丧妻之痛后,才更清楚地理解了情感生活和他研究了多年的菲律宾 Ilongot 蛮人的文化。他用叙述的方式所记录的悲伤,为他最终了解与 Ilongot 的悲伤相关联的愤怒提供了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自己的经历为理解被研究者类似的经历提供了钥匙。这与分析和描述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完全不同,后者的目的仅在于讲述一个故事,阐明并表达个人的经历。这样的故事读来有自我放纵和自我陶醉之嫌,或者读者可能因为其在社会学方面的无趣而放手。由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强烈建议大部分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主要将个人的经历用在研究的出发点上,而避免只停留或局限在起点上。

Ⅱ.学术好奇心

当然,并非所有我们感兴趣的主题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个人经历交织在一起。当你认真地考虑以个人经历和所接触到事情为基础开始研究时,学术兴趣以及学术好奇心可能会为你所从事的实地研究提供推动力。正如我们发现许多实地研究衍生于从经验出发的机遇一样,我们也发现许多田野工作者通过阅读和学术对话阐明他们最初的研究兴趣。例如,詹森·吉莫森(Jimerson,1996,1999)对临时篮球运动员的最高福利标准的研究能得以推进,是源于他对理性选择理论家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埃里克森作品的阅读。类似的情况还有,斯宾塞·卡希尔(Cahill,1990)在描述他(与几个学生研究者)对公共场所中孩子们的社会控制的研究时说:阅读让我注意到了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我的经历的许多方面,一旦那些在日常生活当中看见了但没有被关注的方面进入到我们的视线,我就决定认真观察并报告这些事情(私人交流,2002)。

这里所要说明的是学术好奇心是研究有力的促进因素。正如

许多经验方面的因素一样,我们的学术兴趣和观点也可以使我们进入实地研究。通常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才能逐步发展。

Ⅲ.传统与确认

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参与到他们试图要理解的社会世界中,这种利用调查者的个人史的做法可谓渊源久远。埃弗雷特·休斯在谈到自然主义传统创始者之一罗伯特·帕克及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所做的研究时,是这么说的:

>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具有任何社会学背景。……他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成为社会学者。他们来此只是为了学习,而帕克从他们的经验中,随意拣选出他认为可以进一步发展的部分。……他招募这些人,在他们身上能找到什么,就发挥什么。而他在这些学生身上所启发出来的部分,往往是他们原先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他们可能是对……衣着朴实……不喜欢穿长裙、戴可笑的无沿帽的少女感到有些不悦的门诺派教徒(Mennonites);……或者是不再想蓄胡须的犹太教正统派信徒(Orthodox Jews)的子孙(那时候大家回避蓄须,胡须是家族中俄国血统的象征,大家都想除之而后快)。他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把他们从原本很有意思但却被视为束缚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他转化这种"束手束脚的正统做法",使之变成能引起根本而广泛的人类兴趣的议题。对许多研究生而言,事实就是如此。他们早年的经历经他妙手点化,让他们也感到兴致盎然:其趣味性远比他们之前的感觉要高得多。(L. Loftland,1980,pp. 267-268)

从本质上讲,帕克的天才在于,与这些学生一同工作时激发他们的社会学想象力,并把这些想象力和他们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从个人立足点起步的做法,可能会引起方法论及研究伦理上的难题。然而,我们相信,就自然主义路线深具创意的源泉而言,这些困难只不过是研究者要付出的微小代价。从个人立足点起步的做法,一方面提供了个人和情绪之间意味深远的必要联结,

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严谨的智力操作程序(intellectual operations)。迈克尔·施沃伯的研究《没有上锁的铁笼:人类运动、性别政治和美国文化》(Schwalbe,1996a)受他"用我个人成长主题的方式去研究性别、身份和情感"的愿望的驱使(1996b,p.60)。少了个人情感的基础,其他一切很容易沦为照本宣科而言之无物的道学八股。朱丽叶斯·罗斯(Roth,1966)曾令人心服口服地描述过学术领域中"雇工研究(hired hand research)"的危机以及孤立劳动时黯淡的工作表现的危险性(其对照可参见:Staggenborg,1988)。然而,依照他人计划行事并非是孤立的唯一理由。如果你的计划对你个人而言并无任何意义,那么,你也可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如果你在情绪上没有投入到研究工作中,那么,在严谨治学时不可避免出现的厌烦、困惑与挫败,将会危及整个研究方案的完成,更不要去谈研究的质量了。

第2章 评估资料现场

Evaluating Data Sites

研究者一旦找到个人的兴趣点——团体、情境、场景、问题、主旨等诸如此类的主题，接着就必须决定，怎样才能找到探索这个兴趣点的最佳途径。这就要求评估最合适的或者最切实可行的"地点"、"步骤与策略"以及"时机"。我们并非在暗示，有关研究的一切决定都可以"挑三拣四"，即便在研究初期也是如此。例如，作为一名学生，你可能被要求在一特定时间内，就某一特定场景来写作；也就是说，研究的"地点"和"时机"多半可能事先就被决定了。或者，你的兴趣点可能从逻辑上只涉及了某种"步骤与策略"，而排除了其他的选择。虽然如此，不论研究者所拥有的自由度有多高，评估资料现场的流程仍然至关重要。这个步骤即便在做决定时并不非常重要，它至少在理解已做成决定的涵义上有其重要性。

Ⅰ.整体目标

研究者的整体目标就是收集最为丰富的资料。丰富的资料意味着，在比较漫长的时期中，用持久而系统的方式，收集到广泛而又多样的资料。从观念上讲，这样的资料使你能够透彻理解与你所研究的活动有关联的事物的意义，使你理解那些活动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另外，丰富的资料使你能解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Geertz,1973,p.6)的思想，能区分眼跳(eye twitch)和眨眼(wink)。研究者起初需要在某些社会场合或情境中，通过与参与者持续的面对面的接触，才能达到前述目标。亦即，研究者希望

从激发自己研究兴趣的社会生活区域中，获得“融洽而亲密”的感觉。

自然主义对于直接观察和理解社会世界的偏好反映了某种认识论，也就是知识论。此知识论的核心原则是，为了获取亲密的感觉而参与他人的活动及内心世界，面对面地互动是潜在的最为丰富的状态。无论对于他人的直接知识在效度上有何种障碍（可能多不胜数），但与基于间接观察与感知所衍生的种种困难相比较而言，简直是微不足道（关于此认识论的重要论述，请参看 Blumer，1969，重点是第 1-89 页；Schutz，1967，重点是第 4 章及 C 部分和 D 部分和 Section C 和 D；Berger and Luckman，1967，重点是第 28-34 页；Znaniecki，1934 和 Cooley，1926）。

实地研究新手接受了实验与调查研究关于“避免偏差（bias avoidance）”的训练之后，往往会担心一旦自己进入实地场景中，自己会“污染资料（contaminate the data）”。我们想把这种担心在刚刚萌发时就予以控制，并会讨论为什么这种担心并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麻烦。但是，我们想在这里强调，在前面的段落里，我们对于“客观性（objectivity）”以及“距离（distance）”的重要性，不曾提过只言片语。恰恰相反，我们劝告研究者要：

- 收集最为丰富的、可能的资料。
- 与研究情境达到融洽而亲密的程度。
- 通过从事与情境有关的大量的行为，与参与者进行面对面互动。

也就是说，我们建议的是涉入和交融，而非客观和保持距离——这项建议大致与田野调查工作传统相吻合，至少就社会学所发展出的传统而言是如此。在第 3 章我们将会看到，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的双重任务，的确要求研究者在保持距离和亲近之间，维持一定的内在张力。在第 8 章我们也将会看到，当研究者尝试把个人累积起来的资料转化为深奥微妙且趣味盎然的分析时，冷静的头脑会特别有帮助。但是，研究者若要收集到丰富的资料，这个传统就示意研究者要“靠近（get close）”。所谓的客观性和距离相对于实地场景而言，通常会导致挫败，让研究者无法搜集到任何值得分析的资料。

正如导言中特别提到的,我们在这本书中的主要关注事项是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这是两种相互关联的方法,与自然主义倾向于直接理解行为、倾向以及与组成社会世界的社会情境和脉络有关的情感有关。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许许多多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话题、场景或情境,是无法用这两种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有些事情是研究者无法藉由直接理解而"触及(reach)"的,比方说:历史场景或事件,或者政治、经济体系等超大型机制的行动。就这些研究问题而言,我们得推荐其他教科书给各位(举例参看:Babbie,2003;Banks,2001;Gilbert,2001;Plummer,2001;Ragin,1987;Tashakkori and Teddlie,2003)。还有一些事物在直接理解上所要运用的,既不是在传统上是如此定义的参与观察法,也不是深度访谈法。如果各位对于社会互动的文化产物有兴趣,例如无家可归者的观念、城市生活风貌或者关于情绪的信念等,那么,你也许最该运用艺术作品、电视节目、自传、对话录、听证会记录、信札、杂志广告或调查研究的发现,作为你的研究资料。或者,你也可能想要聚焦于每时每刻的情绪体验的流动上,除了监控个人的主观状态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需处理(不过,请回顾我们在第1章的警惕之言)。对于这些类型的研究而言,以下这几页所探讨的内容(尤其是"进入实地"和"相处")重要性就不高,各位会需要其他的导读书籍来填补资料收集的空白(举例请参看:Bochner and Ellis,2001;Ellis and Flaherty,1992;Riessman,1993;Rodriguez and Ryave,2002;Silverman,2001;Titscher, Meyer, Wodak, and Vetter,2000)。不过,对于人类文化产物的分析者以及人类文化生产的研究者而言,本书所讨论的绝大多数事项应当都一体适用。

因此,带着这些忠告,我们来简要介绍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的质性研究技术。

Ⅱ.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参与观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为了发展对某个人类群体的社会科学的理解,在此群体的自然场景中,与这个人类群体建立并维系多面的、与情境相适应的关系。这种做法也许不是研究者置身此场景中的唯一目的,但它是进行实地研究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深度访谈包括存在于社会交流和半结构化访谈过程中的普通交谈和倾听,此过程运用了囊括开放性问题的访谈指南。开放性问题就是直接的交流,不必强迫被访者(通常被称做"资料提供者(informant)")挑选预先制订的答案。无论是交谈还是倾听,其目的在于从受访者口中引出丰富、详尽、可以用于质性分析中的资料。深度访谈法试图发现资料提供者对于某一特定情境、话题或经历的观点,而"结构化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ing)"(例如民意调查)则相反,后者的目的在于就某一话题或情境,让受访者从预先编制的、与受访者可能无关的问题的各种答案选项中做出选择。另一个区别还在于,结构化访谈尝试判断事物预想的类型的频次,而深度访谈则试图找出是哪些事物先行存在。

传统上,质性研究方法文献对于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往往视前者为卓越的方法。我们相信,按照舍利儿·克雷蒙(Kleinman,1994)以及她的同事们的说法,这样的区别太过夸大。正如许多人类学报告和社会学报告所清楚呈现的,无论是在自己的文化中还是在另一个文化中进行参与观察,都需要大量地与资料提供者进行访谈。

典型的参与观察法总是交织着观看(looking)与倾听、参与与询问,而其中一些聆听与询问的做法和深度访谈法相同。反过来说,深度访谈研究可能包含了研究者与资料提供者之间重复而漫长的接触(举例参看:Charmaz,1991;Klatch,1999;Morrill,1995;Williams,1989),有时候长达数年之久,双方都深度融入到对方的个人生活里——这个特性往往被视为是参与观察法的特点。此外,许多社会情境(例如,因为痛失挚爱的人或珍惜的物品而体验到的悲痛)可能被平日的互动所遮蔽,因而唯有通过深入访谈才

可以得到直接理解。因此,深度访谈法非但不是参与观察法的劣等替代品,反而往往是特别出色的研究方法(Blee,2002;Edin and Lein,1997;Lamont,1992,2000;Williams,1995)。

在这本书中,我们想要强调,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作为自然主义研究的核心技术,具有相互依存(mutuality)的特性。在后面的章节里,大多数讨论同时适用于这两者,我们在需要辨别这两者时将会加以区分(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或两者兼容并蓄的作品为数极多,包括:Atkinson, Coffey, Delamont, Lofland, and Lofland,2001;Berg,2004;Denzin and Lincoln,2000;Emerson,2001;Erlandson,Harris,Skipper,and Allen,1993;Fetterman,1998;Gubrium and Holstein,2002;Seidman,1998)。

Ⅲ. 对资料现场的详细评估

假设你想要采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或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来获得最为丰富的资料,你就需要就适切性、进路、肉体的和精神的风险、伦理和个人后果等方面,评估可能的资料现场。

A. 评估适切性

说到适切性,我们直接关注的就是你的问题或兴趣与情境之间的合适性,以及问题或兴趣与情境之间如何得到最好的研究方法。这不是小事情,因为根据研究的位置和方法的不同,对感兴趣的问题的回答可能有相当大的变化。关键在于你是否运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从某个热点问题、个人兴趣的定位或某种倾向等方面开始你的研究征程,一定要记住每个因素都会将某些参数放入其他的因素中。因此,在情境开始之前,要对问题/兴趣、情境和方法等进行周密的考虑。虽然社会科学的田野传统鼓吹弹性,然而,有些问题、研究场所、主题或研究方法,在逻辑上必然促成其他问题、场所、主题或研究方法的出现,这是事实(Deutscher,Pestello,and Pestello,1993;Zelditch,1962)。例如,假使你已经决定只采用观察法,在公开场合观察民众,那么你就无法收集到众多有关情绪状态与历程的有用资料。或者,假如你对公众互动场合的身体控制策略(body management strategies)感兴趣,那么,深

度访谈法十之八九不是合适的工具，因为你所需要的资料大部分是在个人知觉之外。针对幼儿园的儿童做研究，无法让你就学校行政人员的日常互动获得多少有价值的资料。而在死亡率或其他消耗率偏低的团体里，你无法通过参与观察法对悲伤体验了解很多。

所有这些例子看起来可能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嫌太过简单的话。然而，任何阅读过相当多的未经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著作（包括专家的研究以及学生的作品）的人都可以证明，相当比例的研究著作似乎是在没有深刻理解适切性问题的状况下着手进行的，或者对于此问题缺乏正确的认知。

可能的研究方案所涉及的情境太过包罗万象，我们无法就适切性提出许多具体的“原则”。然而，我们可以提供四项一般性指导原则。首先，当你感兴趣的问题、主题或情境位于某个地理位置（至少暂时如此）时，则单独使用参与观察法可能是最有成效的方法。比方说，假如你想研究街头帮派的运作（Horowitz，1983），研究市中心年轻人暴力相互影响的动力学（Anderson，1999），了解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活（Snow and Anderson，1993），探索孩童间的性别扮演并再创造的过程（Cahill，1989，1986；Thorne，1993），或是详细描述小团体内正在形成中的文化（Fine，1987），那么，观察将以最高的效率产出最丰富的资料。

其次，反过来看，你所感兴趣的，可能是约瑟夫·科塔巴（Kotarba，1980）所说的“杂乱无章的社会经验（amorphous social experiences）”——日常生活的众多层面，它因人而异，而不是因特定的社会环境或者情境而异。在此状况下，深度访谈（有时候与有限度的观察合并运用）可能是最恰当的进行方式，甚且是唯一的研究途径。杂乱无章的社会经验实例包括：伴有慢性疼痛病的生活（Kotarba，1983）、痼疾（Charmaz，1991）、情绪低落（Karp，1996，2001）、结束亲密关系（Vaughan，1990）、婚外情（Richardson，1985）和接受或给予同情（Clark，1987）。

第三，请务必斟酌新兴的或很少使用的标准研究方法的可能性。比方说，齐默曼和维德（Zimmerman and Wiede，1977）曾经报告过被称为日志法（diary method）或日志访谈法（diary-interview method）的实地研究步骤。此研究法以被研究者所写的日记作为

观察记录,再以之作为深入访谈的基础。"当直接观察的问题阻碍问题的解决,或者当更进一步或更为深入的观察导致可获得资源的扭曲时……(也就是说)当研究者无法进行第一手的观察,或者想要把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再加以补充时"(1977,p.481),他们就推荐研究者采用这种方法。另一个例子是,研究者可能考虑用团体或焦点团体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来取代一对一的访谈(one-to-one interview),或者以之作为补充(焦点团体访谈法的讨论,请参看 Bloor, Franklin, Thomas, and Robson, 2001; Greenbaum, 1998; Krueger and Casey, 2000; Morgan, 1997)。对任何适度公开不致于造成尴尬情境的主题而言,团体访谈可能是效益最高的技术。它的优点在于,它允许受访者有更多的时间来反思,并回想起一些经验,特别是能回应其他的团体成员,这样可能导致他们对先前的想法和解释加以修正或引申。除此之外,受访者可能与某些观点意见相左,甚至相互对立的成员就有了交流的机会。威廉·格姆森(Gamson, 1992)在《谈政治》一书中清楚地描述了焦点团体访谈的实效性,它可以让人们交互讨论,而又无需意见一致。不同的政治观点用结构化的、个人访谈的方式则不可能浮现出来。

你可能希望利用当今处于萌芽阶段的电子交流平台。在某些场景中,有一部分参与者无法做面对面的接触,而是通过电子通讯媒体来联系(例如,电子邮件、传真、电话和视频会议)。在这些场景中,研究者若想达到融洽而亲密的程度,也得参与这种脱离实体接触的沟通网络。举例来说,约翰·沃克曼(Workman, Jr., 1992)在研究电脑系统公司时发现,用电子布告栏掌握公司内部持续进行的讨论与辩论,以电子邮件接收会议通知和相关文件,安排访谈时间,直接与许多资料提供者沟通,都是很必要的做法。自沃克曼的研究之后,随着网络游戏和婚配等商业化网站的增生扩大,从宠物主人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等群体讨论的非营利性网站的建立,以及有组织的、信息化网站的建立,电子交流的使用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正如调查研究者正在使他们的方法适应网络一样,质性研究者也正在探索新的方法,通过电子媒体既能在传统的研究现场收集资料(正如沃克曼的研究一样),又能研究新的、虚拟的研究现场,例如柯利尔(Correll, 1995)对女同性恋"网

吧"的研究正是运用了这种方法(L. Kendall,1998,2002)。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果电子交流是你所研究的社会互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你应该计划在资料收集时用某种方式合并使用多种电子交流方法(例如做在线研究,参看 Mann and Stewart,2001)。

第四,不要排除这种做法的适切性:收集或运用一些量化研究资料,并将它们与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所收集到的资料一起运用。混合不同种类的资料——这种做法被称为数据的"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Denzin,1989a)——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参看 Tashakkori and Teddlie,2003)。例如,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在 1980 年代中期对奥斯丁的无家可归者所做的质性研究中,补充了参与观察法,而这些资料源于一个城市或一个州里面六个独立机构所追踪和调查到的近 800 名无家可归的人。在其他的研究中,这些资料较之于单独使用参与观察法所得的资料而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无家可归者的精神状况和犯罪审判经历(Snow, Baker, Martin, and Anderson, 1986; Snow, Anderson and Baker,1989;在实地研究中,收集或运用数量不等的问卷、人口普查或者其他质性资料的例子,可参看 Biggart,1989; GrØnbjerg,1993;Morrill,1995)。当你做"个案研究(case study)"时——全面调查那些深植于时间与空间的现象,如:某个邻居、一个小的社区、一个组织或者某种社会运动,某些类型的量化资料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在以下研究中,能够找到对个案研究的特点、优势以及局限性的讨论:Feagin, Orum, and Sjoberg, 1991; Platt, 1998;Ragin and Becker,1992;Snow and Trom,2002;Yin,2003)。不要忽略了人口普查资料可以提供的丰富详尽的信息(Myers, 1992)。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的焦点是某一大小适中的组织,那么,针对组织成员进行小型问卷调查,可能是掌握"众多角色(cast of characters)"最有效率的方法(也很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B. 评估进路

*对任何被提议研究的必要性的现实评价,都必须意识到:*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者的品质、有待研究的场景或情境的特征、有待研究的民众的特点,都可能成为获取丰富资料的障碍。因此,

研究者评估资料现场的全面任务之一,就是关注这些障碍存在的可能性,评估其严重性,估计这些障碍是否可以克服,如何加以克服。对这些问题的考虑直接关系到进路的问题,而进路在质性方法文献中是被广泛讨论的主题。如果不能成功地解决进路这个问题,研究就要紧急刹车。况且,进路并不仅仅只是一次性的问题,并非一次解决就永无后患了,它需要一次次地被解决,这在整个研究期间要一直进行。因此,我们将会与它再度相逢,尤其是在第3章和第4章里。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无法穷尽这个话题,因为研究者、场景和参与者特性的种种可能组合,衍生出了几乎无穷无尽、枯燥冗长的关于各种“进路情境(access situations)”的陈述(要全面而实际地了解进路以及各种进路情境,可参看:Feldman,Bell,and Berger,2003)。我们在这里以及随后章节里的目标,是有所局限而合乎实际的,重点在于,为身为调查者的各位在考虑个人特定的进路情境时,提供一些“思想食粮(food for thought)”。在资料现场评估的现有脉络中,我们将考虑三个问题范畴:①调查者与场景的关系,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归属类别(ascriptive categories),③高难度场景。

1. 调查者与场景的关系

弗莱德·戴维斯(Davis,1973)在一篇深具洞察力,如今已被奉为经典之作的论文中写道,研究者对于其研究对象可以采取两种对立取向或立场。这两种立场被隐喻式地构思成“火星人(Martian)”和“皈依者(Convert)”,点出了所有研究者所面临的“距离两难困境(dilemma of distance)”。火星人视距离为通往知识的道路,而皈依者则视之为障碍。

> 火星人……渴望用全新的眼神,甚或更妥贴的是用陌生的眼光,在对不可思议事物的一瞥中,掌握人类情境的精髓。为了达到此目的,他想要全盘祛除林林总总不知情的文化假设、经验法则、感觉模式,甚至如若出于某种原因而可行的话,也要排除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构成了我们日常世界和存在的“认知事物(cognitive stuff)”。……火星人渴望脱身而出,完全站在其研究对象的社会本体论结构(social

ontological frame)之外,以便看清楚这个结构是如何建构的。相反,皈依者的首要冲动在于将自己更深地融入这个结构中,以便让独具特色的团体主观思潮能够直接而强有力地向他展现出来。(1973,pp. 336-338)

戴维斯的隐喻角色逼真地刻画出社会科学中关于这些立场的方法论偏好与论辩。而更深奥的是,它们象征着许多研究者内心所感觉到,或者努力去感觉的那股张力。要针对社会生活提出问题,"做出质疑"或者"锁定目标而钻研下去",需要的是距离(火星人)。而要了解社会生活,回答问题,看懂其意涵和道理,需要的是贴近(皈依者)。灵敏的调查者希望不是只做两者中的某一者,而是依据研究的需要,能做任何一个,或者游刃有余,两者皆可。这当然意味着,一方面要经历对比的张力,另一方面要体验距离。经历这些互相抵消的拉力通常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痛苦最好能被看作是"多产的张力",它可能导致更细微的理解,以及更丰富的、更引人注目的实地研究。

让准调查者评估进路的原因非常单纯:如果你已经是(或即将是)这个场景中的成员,你几乎"自然而然地"站在(或将会站在)皈依者的立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理解的途径。因此,你所需要的是寻找保持距离的机制,至少在研究初期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你是这个场景的局外人,是所要调查研究的社会生活里的陌生人,那么,你自然也会有研究的进路。因而,你所需要的是寻找缩减这份距离感的机制。意思就是:不要为了你和场景的关系而垂头丧气,也不要过度自信。不论是什么关系,它总会同时有利有弊(更进一步的探讨请参看 Adler and Adler, 1987; Emerson and Pollner, 2001; Monti, 1992; Poller and Emerson, 1983)。

2.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归属类别

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秩序都界定了归属类别,尽管是以不同的程度——例如性别、年龄与种族,并以之作为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差异点。在做实地研究时,这个持久存在的"社会事实"的寓意就是让我们明白一种可能性,即:"谁"是研究者,"谁"是被研究者,这些问题都可能在取得丰富资料时形成障碍。不久以前,罗

莎莉·瓦克斯以她的几个实地研究为基础做了许多的观察,她是这样描述这个问题的:

> 许多部落或平民社会(folk societies)不仅仅在性别之间和年龄之间维持着严格的劳动分工,而归属到这些不同类型的民众,即便是在同一个住所里进餐、睡觉与生活,也不会毫无拘束或者自发性地相互交谈。比方说,一名年轻的男性人类学者可能住在印第安人的家庭里,甚至和印第安女郎调情,但是,他对于这些女性——无论老少——的思维、话语、行径等了解非常有限。……相反地,我作为一名中年妇女,在 Thrashing Buffalo 族里,就无法和年长或年轻的印第安男性公开或非正式地交谈。年纪较长的男性即便与我相当熟识,在与我谈话时也会很注意;而年纪较轻的男性则与其身份相衬,一直都太腼腆或在外表上太过毕恭毕敬,以致少言寡语。另外,和年长而有威望的已婚妇女在一起时,我就可以谈上几个钟头。(Wax,1971,pp. 141)

瓦克斯描写的是在乡村场景中置身传统团体里进行研究的特殊情境,不过,即便我们置身于同时代的大都市地区,她的一般性观点仍然适用。如果你是男性,试图研究美容院里中年妇女组成的小圈子的话,那么你不太可能达到期望中的女性研究者所能做到的"融洽而亲密"的程度。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众多的实地研究者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并突出了脉络和方法:归属类别在无可计数的脉络与情境里,为取得丰富资料设下了重重障碍(例如,请参看 Baca Zinn,2001;Gold,1986;Olesen,2000;Reinharz,1992,Chapters 2 and 3;Skeggs,2001;Warren,2001;Warren and Hackney,2000)。例如,扎维拉(Zavella,1996)描述其对在美国的墨西哥女人进行实地研究时,概述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这种情形适用于大量的归属类别的研究上:

> ……局内人更有可能对复杂性和内部变化持认知的、接受的态度,能更好地理解语言运用的细微差别,有些被调查者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创造了文化节目,局内人能避免被被调查者所欺骗,也能更轻易地避开他们所研究的人的不信

> 任感。一些人断言,同种族的局内人能更容易地打开与他们相似的社区的进路,他们能更灵敏地用尊重社区敏感性的方式构建问题。(p. 79)

虽然我们承认,不同的意义与研究者的特征有关联,弄清楚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也关注:如果这些灵敏性被放在一起看待的话,它们可能会用某种固定归属类别的方式而使其不可交流。毫无疑问,归属认同类别是事实——尽管这是社会所建构的类别——因而在规划个人研究时需将之纳入考虑,但是它们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大量的实地研究都说明,仅仅因为你与打算研究的对象性格不同,就自动地推论出这项研究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项研究非同寻常地困难,这种推论是很不成立的。举例来说,鲁斯·霍洛维兹即便身为女性和犹太人,也不曾因此身份而无法针对芝加哥帮派分子的世界完成敏锐的分析(Horowitz,1983),也没有阻止舍利儿·克雷蒙接近卫理公会教派联合会的部长级学生(Kleinman,1984)。身为成年人的事实,也不曾阻止帕特丽夏和彼得·阿德勒(Patricia and Adler,1998)、威廉·科萨罗(Corsaro,1985)、加里·阿兰·怀恩(Gary Alan Fine,1987)、南希·曼德尔(Mandell,1986,1988)或巴瑞·索恩(Thorne,1993)融洽地进入孩童的世界。身为年轻人的事实,没有阻止亚伯·古柏利姆(Gubrium,1986)和亚莉·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1973)研究老年人。类似的情况还有,身为白人的事实,不曾阻止埃利奥特·里鲍针对非裔美籍街头混混(streetcorner men)的世界,完成民族志经典之作(Liebow,1967);而中产阶级男性的身份,同样不曾阻止他进入女性无家可归者的主观世界(Liebow,1993)。年纪轻、白人、受过教育的身份,不曾阻碍米切尔·丹尼尔接近芝加哥南区一间自助餐厅里(大致上)年龄较长的(多半为)非裔美籍劳工阶级的常客,也不妨碍他接近工作生活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第六街人行道上的贫穷的黑人(Duneier,1999),这种身份也没有阻止洛伊克·瓦克奎恩特研究非裔美籍拳师(Wacquant,1998a,b)。即便文化人类学来自内部的批判多少有其正当性可言(例如: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Kuklick, 1991; Lal, 1996; Marcus and Fischer, 1986;Rosaldo 1989;Stocking,1989),但其丰富的文献仍然令人信

服地证实了人类超越国界与文化差异的能力。根据这些观察，关于局内人/局外人的两难境地，引用罗伯特·埃莫森（Emerson，2001，p. 22）的结论是很有用的：

> 局内人/局外人的两分突出了种族、性别、年龄的相同和相异带来的相对优势。局内人在实地研究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更容易进入现场、更高的信任度、更容易理解当地的交流和意义的细微差别。局外人做实地研究的优势起初不明显，但之后就会引人注目。首先，局外人可能不会因为被要求维持内部团体的团结，例如种族的忠诚或者受当地身份差别的限制，而使研究受阻。作为"局内人"的研究者对当地的社会可能会遭遇两个问题……其次，局外人的实地研究者能够追踪一系列的调查，并提出一些远离局内人的问题……再次，局外人的实地研究对相关的过程通常产生与众不同的敏感和方法的自觉……相反地，涉及实地研究者的社会特征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亲密搭配的实地研究，使得相关的过程含蓄而又无法检验。（也请参看：Merton，1972）

3. 高难度场景

许多社会情境可以根据被接近和被研究的舒适程度而有所不同。在开放的公共场所里，通过观察收集丰富的资料，只要能找到并保持进路，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Cahill，1990；L. Lofiand，1985b；Morrill，Snow，and White，2005；Nash and Nash，1994；Ortiz，1994；Robbins，Sanders，Cahill，1991）。在许多准公共场所做实地研究也是这样的情况，例如：饭店、咖啡厅、酒吧、俱乐部（Allon，1979；Cavan，1966；Katovich and Reese，1987；Reid，Aman，and Bonham-Crecilius，2005；Snow，Robinson，and McCall，1991）。但是，与简单的一次露面、订购啤酒、闲混等相比较，在有些社会情境和社会行为中要找到并保持进路，就要复杂得多。

根据进路所判断的有问题的场景，在多数情况下会有变化。例如，有些场景在组织上很复杂，既涉及垂直的、水平的结构，也涉及多个切入点。如果被给出的场景是大量的正式组织（例如：公司、工厂、医院、学校），这些场景可以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这些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研究(Buroway,1979;Dalton,1959;Kanter,1977;Kunda,1992;Morrill,1995;Roy,1959/60;如要了解有组织的民族志,可参看:Morrill and Fine,1997),那么你不得不承认研究这些场景比其他的社会场景或环境必定要更困难。很肯定的是,保护这些场景的进路比在其他环境下也要更费力。由于有内部冲突和分裂,或者存在多个派别,通往某些团体和组织的进路也可能很复杂。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与某个派别或团体的结交,不仅仅阻止了通往场景内其他团体或派别的进路,而且甚至可能贴上了敌手的标签。具体的实例就有伯克·洛奇福德(Rochford,1985,1994)关于美国的 the Hare Krishna movement 的民族志的实地研究。因为这个运动分裂了,最后变成了相敌对的两方,一些成员看到洛奇福德过分倚重洛杉矶社区,因此不信任他了。一名成员在评价洛奇福德对这个运动的认识时这样抱怨道:

> 你逐渐形成了与边缘社区等同的观点,从感情上逐步深入到边缘社区。这歪曲了许多工作和分析。我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你所说的是政党的路线,是洛杉矶的边缘的观点。老实说,你深陷他们的观点……我们觉得你看待资料的方法已经严重的歪曲了。(1992,p. 109)

研究更高层的机构或阶级结构,这种向上的研究要困难些,因为"守门人"通常保护高傲的社会阶层的占有者,使其免被侵扰或打扰。因此,这就要求与守门人、通过守门人或者围绕守门人开展工作,正如从事对正式机构的研究一样——举例言之,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Bosk,1979)、上等阶层女性(Kendall,2002;Ostrander,1984)、商业主管人员和社团精英(Morrill,1995;Thomas,1994)、娱乐明星(Gamson,1994)、为社会事业奉献爱心的人(Ostrander,1995)、核武器研究者(Gusterson,1996)以及国防智囊成员(Cohn,1987),很明显,这种研究是可行的,但是与其他环境下的研究相比,通往此种研究的进路却需要更大量的工作和战略上的计划(例如,请参看:Bosk,1996;Cassell,1988;Gamson,1995;Hoffman,1980;Morrill,1995;Ostrander,1993;Thomas,1995)。

此外,许多场景或行为也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是短期存在

的,这样给研究机会只提供了一个狭窄的窗口。这种短暂活动的例子包括许多行为,而这些行为通常要在"集体行为"这一醒目的标题下进行讨论(Lofland,1985;McPhail,1991;Turner and Killian,1987),例如:抗议集会、兴高采烈的人群、所谓的恐慌,等等。这些事情并没有被列入社区活动的日历,当他们存在时,只会有短暂的时间,这使得研究很困难,研究者也很难整理出制度性的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集体行为已经被忽视了,相反,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实地研究(例如:Lofland and Fink,1982;McPhail,1969;Snow,Zurcher,and Peters,1981;Wright,1978)。也就是说,如果首先预料到这些事情,进行周密的计划,并使用研究团队,这种研究是有可能很好地完成的。灾难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Disaster Research)于 1963 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成立,后来于 1985 年搬至特拉华大学,这个机构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原型。当灾难发生时,这个机构迅速组织研究队伍,立即对灾难做出反应(相关内容的例子,请参看:Dynes and Tierney,1994)。

其他的场景难以进入,可能是因为猜疑或存在危险。例如,有些地方被政府划定为"禁区",对于美国的研究者而言,古巴在几十年来都是"禁区"(Fuller,1988)。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在场景内有不信任感存在,进路也成问题,这种不信任源于对政府行为的恐惧,理查德·米切尔(Mitchell,2002)对幸存的雅利安人的研究就是这种情况。这种不信任也可能源于对街头混混的恐惧,正如在"可卡因文化"中所遭遇的竞争对手和团体一样(Bourgois,1995;Morales,1989;Williams,1989;Williams,Dunlap,Johnson,and Hamid,1992)。即使没有被威胁感,有些社会团体,甚至是像 the Mason and Greek 文学社团这样表面上无伤大雅的团体,都把自己隐藏起来,这就妨碍了获得融洽而亲密关系的机会。

虽然我们认为,准调查者对其感兴趣的场景所固有的可能障碍进行评估,是合情合理的做法,然而,我们并不想暗示各位必然要避开困难的场景。仔细查看之后,这个困难可能会被证实只是错觉罢了。正如同前面的引文所清楚证实的,即便这个困难是千真万确的,它也不必然等同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假如此场景或情境意义非凡或极为有趣,那么,即便是局部研究,也会比完全不予研究要好得多。

C. 评估肉体的和情感的风险

除了各种各样"高难度"的场景和情境使得找到进路是一件麻烦事以外,有些场景在另外两方面都是"高难度"的。它们可能使研究者的身体面临直接的风险,或者也许会引起研究者情感方面的悲痛。在第 4 章(I. D 部分)我们将论述与实地研究相关的各种各样对身体所造成的危害。在此我们简要论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关的情感忧伤。

对于研究的随从人员是如何在精神上遭到创伤或打击的,在实地研究者中一直有许多流言蜚语。例如,有人曾听说了一位将自己置身于某个场景(比如说,癌症病房)的人的经历,但是,几周后他就发现自己在精神上太痛苦而不能继续呆在这样的场景中,因此只能撤退。例如,想想拿破仑·查冈首次遭遇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的经历,他叙述到:一到这个村庄,

> 我抬起头,喘喘气,这时我看见了一群魁梧的、裸体的、肮脏的、可怕的男人盯着我们看,并用拔出的箭指着我们。用生烟叶卷起的巨大的烟卷夹在他们粗短的牙齿和嘴唇之间,这使得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更可怕,还有从鼻孔里流出的或挂在鼻孔下面的黑绿色的浓鼻涕……我的下一个发现就是有大约一群凶恶的、没吃饱的狗在我的脚下猛咬,围着我转圈,就好像我是他们的下一顿美餐。我只能站在那里,拿着笔记本,无助而又悲惨。然后腐烂的蔬菜发出的恶臭和污秽向我袭来,我几乎要呕吐。我感到恐怖极了。(Chagnon, 1983, p. 10)

尽管很少有人在进入场景时遭遇像这样骇人听闻,令人精神备受伤害的情况,因为大部分的田野工作者的研究工作是在他们自己社会场景和团体中进行的,然而,在情感范畴中,与民族志田野工作相关的认同和讨论越来越多了。当研究者思考实地研究时,他们所经历的焦虑、怀疑、分裂的忠诚、悲伤、内疚感、愤怒、反感(甚至是恐惧,在像查冈那样的极端环境下),以及对研究失败的恐惧,都是他们曾经讨论过的突出的情感。对处于劣势或者是不幸的团体或个人进行的研究通常会导致情感悲痛。琳达·邓

恩(Dunn,1991)针对憔悴的妇女研究失眠和沮丧时就有此经历;玛莎·寇普(Kleinman and Copp,1993)当把有权阶层与在隐秘的车间内有精神和肉体残疾的被调查者相比较时,她的心里就充满了负疚感。而其他的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中论述了相冲突的目标和忠诚带给研究者的焦虑和悲痛。作为研究者和政治激进分子,巴瑞·索恩(Thorne,1979)在1960年代的拒绝草案运动(the draft resistance movement)中就有此经历。另外,正如詹妮弗·皮尔斯(Pierce,1995a,1995b)在她对一家大型法律公司的实地研究反思中所记录的,研究者的感情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她的情感就由对男性律师知情者(informants)的背叛而产生的内疚感,转化成因公司对女性的剥削而产生的怨恨和愤怒。但是,毋庸置疑,虽然也有这样的研究者,因为被感知的或者真正的情感代价,他们放弃了一些项目,但是,前述的例子已经描述了在面临有挑战性的情感时坚持不懈的价值。对于潜在的身体和情感的危险,我们建议你尽力预计到,并准备好各种各样的应对办法,以保证你身体和情感的健康。我们也要强调,与日常生活相比,身体的和情感的风险在研究脉络中并非是那么普遍的。

D. 评估研究伦理

伦理问题是研究过程的核心部分之一,正如它们是日常生活经历中的一部分一样。在下列章节中,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关注这些伦理议题,因为他们与整个研究过程有关,从研究起初一直贯穿到研究著作的出版。就资料现场评估的脉络而言,两个密切相关的关键性问题,需要由准调查者审慎加以考虑。其一,这个特定的团体、场景、情境、问题及诸如此类的议题,任何一个人(anyone)都可以来加以研究吗?其二,这个特定的团体、场景、情境、问题及诸如此类的议题,应该由我(me)来加以研究吗?在问自己这些问题时,你即是在评估这项研究或其出版物是否可能为各方(包括你自己)带来潜在的负面后果(参看下文),同时也是在评估你对于这些后果的伦理判断。

传统上,这两项问题在社会科学中都并非难题。然而,常理认为,知识总比无知好,因此,每一件足可研究的事物,都应当由任何一位已经或可以找到进路者加以研究。然而,最近四十年,

这个常理已逐步受到挑战。

与任何人做某研究时都要遇到的问题相关的三种挑战已被提出。第一，对于对被压迫者和弱势群体的研究，有些学者已经提出了警告，因为研究结果可能对增加强势群体的利益更合适，而不是对增加被研究者的利益和福祉有益（Sjoberg，1967a；Tunnell，1998）。第二，社会科学中有一派举足轻重的意见认为，由于研究工作涉及观察者蓄意而持续地欺瞒被观察者，因此，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暗地进行的研究都是违反伦理的（Allen，1997；Bulmer，1982；Erikson，1967；Warwick，1975）。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伦理守则或多或少是与此论点相一致的，即：如果不能获准进入以下的研究情境，就不能暗地进行研究，"①对研究的参与者来说，研究只涉及最小限度的风险，并且②必须取得知情同意书，研究才能实际地进行"（1997）。

第三，部分女性主义者主张（有时仅仅是含蓄地点到为止），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如果缺少平等（equality）与深度同情（full sympathy），那么，这样的研究就违反了女性主义伦理信条（例如，参看：McNaron，1985；Oakley，1981；Stacey，1988；Reinharz，1993，pp. 72-75；以及 El-Or，1992，关于和资料提供者之间亲密程度的限度）。自然而然，这个思维模式推荐的是：女性主义研究要竭尽所能地共同研究，并且要为被研究族群的目标和需求服务（Cancian，1992，1993；Taylor and Rupp，2005）。但是，为了实现这些理想的原则，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就女性主义民族志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例如，黛安 · 沃尔夫建议：

> 尽管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在田野中试图通过倾注感情或友好的方式使关系平等，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改变研究者的关系或立场。"平等"是短暂的、虚假的，因为研究者完成了研究就可以回家，这反映了她具有离开现场的特有能力。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更多地建立了平等关系的实地研究应该被抛弃，但是，研究者应该更实际地看到这一点。（Wolf，1996，p. 35）

无论你在哪里，都有可能要面对伦理的挑战，你还要面对如何使研究进行下去的问题。虽然我们希望建议，是否研究某个团

体、场景或情境应该留给你自己来决定和判断,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是玩忽职守。近年来,凡是关于人类主题的研究伦理规范和合法性的研究,都要受到制度上的详细审查。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更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但是在此,我们必须强调,为了从事某个研究项目,你需要用制度化的协议(institutional protocols)(包括合适的公文,如果可能的话还可包括一些培训)证明你对人类主体保护的尽职尽责的关注。虽然所有专业的学术协会现在都有伦理方面的方针,每个成员都应该遵守,但是由联邦政府所委任的制度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提出了制度化草案,以确保在科学研究领域对人类主体的保护。虽然某些实地研究,例如在"正规的教育场景中"以及公共场所进行的研究,可能会得到制度审查委员会评估(根据书面申请)的确认,但是,其他的研究可能需要制度审查委员会全面的评估,包括需要完成"描述研究风险和利益的标准草案、保护研究'主体'的知情同意书的程序和机密性"(Emerson,2001,p. 146)。因此,为了使可能的实地研究的主体和场景得以维系,你得熟悉联邦政府和制度上对伦理的、合法的研究的解释。

E. 评估个人后果

最后,我们还要考虑我们所完成的研究为个人所带来的后果。由于它涉及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比注,此种评估和适切性、进路、研究伦理与风险的评估相比更为困难和难以捉摸。然而,个人后果无法事先十拿九稳地预知,并不意味着这些后果是无法加以斟酌、权衡及仔细思量的。不尽完美的深谋远虑,总比完全不动脑筋去想要好得多。

在绝大多数时候,对绝大多数的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案的成功完成是值得庆贺的。我们向世人展现,我们具备这份能耐,不但可以收集资料,还可以用引人入胜的方式来分析资料(参看第8、9章),并且能够将分析成果传达给他人(参看第10章)。这种能力的展现,绝对值得让我们为自己感到自豪。它也可能为别人——同事、被研究者、较广泛的读者群——提供充分的理由,让他们对我们抱有好感,向我们表达其尊重与敬意。然而,不幸的是,方案完成所带来的个人后果不全是光鲜亮丽的,更不可能局限于正向结果。以

下这三个例子应当足可让各位了解这些话中的深意。

首先，你可能曾经历过被称做"伦理后遗症（ethical hangover）"的现象：对于被研究者来说，你像是一个背叛者，怀有萦绕不去的负疚感或不自在的感觉。你和被研究者的情绪关联越深、越近，你越有可能在退出场景以及将个人理解转化为公开知识时，觉得自己背叛了被研究者。目前并不清楚，是否有任何方法足以抵挡这种经验。事实上，有些人会主张，它是自然主义调查者的"应得赏罚（just desserts）"（Davis，1961，p. 365）。实地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期间，特别是在脱离研究期间，经历负疚感或不安是很普遍的（例如，参看 Heilman，1980；Stacey，1988；Thorne，1979）。戴维·斯诺曾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致力于对一位普通成员皈依的优势进行研究，当他开始从日莲正宗佛教徒运动（the Nichiren Shoshu Buddhist movement）中解脱出来时，就有负疚感和不安：

> 卷入日莲正宗还不超过一年，我就已经有了……这种感觉……另外，也许是进一步卷入，我逐渐知道了许多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国民、回答者、不规则的宗教团体的成员，更是一个个真实的、气宇不凡的人。因此，我……觉得自己有点像骗人的艺术家，为了树立一个"标志（mark）"，去做任何有必要的事情。而在赢得自信后，用"占领（take）"的方式煽动情境（blow the scene）。一方面，我首先假定自己是一个积极的，但受控的、多疑的参与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参与者，是"真实"的成员；其次，从根本上说，我又是一名社会学研究者。另一方面，我以社会学家的角色……迅速写出来，并使用我所知道的知识。因此，我不仅陷入了一种角色冲突的情境中，而且也误入了伦理学的双重盲区，这就是抽离现场时焦虑的源泉……这个过程比开始参与时更困难。（Snow，1993，pp. 20-21）

第二个例子虽然很少见，但是也不是绝无可能：你的报告引起刑事司法部门的兴趣，以至于你可能被传唤前往说明你在正式报告中所隐瞒的资料（例如，参与者的真实姓名），或者你随着研究的进行而取得的，但在斟酌后仍然觉得属于保密承诺范围内的

信息(其讨论请见下文及随后的章节)。以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生里克·斯盖尔斯为例。他在1993年拒绝答复大陪审团关于其著作《生态战士:理解激进的环境运动》(Scarce, 1990)中的研究对象——动物权利运动(animal rights movement)的参与者——的询问(大陪审团正在调查1991年袭击华盛顿研究实验室的卧车事件)。由于他拒绝作答,他被监禁在斯波坎郡监狱达159天之久,直到一位法官裁定,羁押他的做法已经超越了法律"强制(coercion)"的意图,而变成了"惩罚",他才得以释放(Monaghan, 1993b)。请注意,斯盖尔斯"守口如瓶(not to tell)"的决定绝非个人独特气质使然。他为自己辩解是"受到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伦理守则约束,其中一则要求学者'即便在这则信息不受法律保障或未曾享有法律特权,而是在法律效力所及之处',也要保密"(Monaghan,1993a,p. A9),而协会也出面支持他的申辩内容,提出由法官的顾问为他辩护(Levine,1993)。从此以后,斯盖尔斯(Scarce,1994)和他的同伴(Adler and Adler,2002;Leo,1995)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官司,联邦政府要给实地研究者提供权利,以保护民族志学者与被调查的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交流。

绝大多数成就非凡的实地调查报告,似乎能从某些地方获得赞誉,而在其他地方则完全不曾引起回响。然而,我们总是面对着另一种负面后果的可能性。除了赞美和漠不关心之外,你的文字报告还可能引起来自你同事的许多"指责",正如劳德·汉弗莱写《茶室贸易》(Humphrey,1975)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例如,参看:Warwick,1975,1982);还有来自被研究者的指责,正如维迪奇和本斯曼所写的《大众社会里的小镇》(Vidich and Bensman, 1968)所遭遇的一样;或者来自两者的指责兼而有之,正如威廉·F. 怀特所写的《街角社会》在出版几十年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举例请参看阿德勒马[Adler, Adler, and Johnson, 1992]所编辑的特刊《当代民族志杂志》,此书旨在对怀特的名著进行重新评论)。在千百种可能的指责当中,你可能被指为资料提供者的叛徒,使其处于危险的境地,把他们描绘得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对他们的故事理解有误,或者对故事的理解无误但呈现方式失当。

我们敦促各位先行思量你所无法预料的未来后果,这种做法有其风险,可能让我们被视为在危言耸听,或者被认为是在引发

没有必要或徒劳无功的担心。不过,我们是这么觉得的,这个"陈词滥调"似的例子,真的值得被视为"民间智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Ⅳ. 最后的忠告

以上这些忠告,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在暗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场所选择有关的议题以及它们的解决办法,等等,都可以事先加以化解或决定,然后你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将研究计划付诸实施。事实就是事实。自然主义研究首先是自然发生的(emergent)。今天的解决方法可能变成明天的问题;明天的问题可能为往后提供特定的研究机会。研究初始时的"你",未必是研究走入尾声时将会浮现的"你"。进入实地前所做的伦理抉择,可能被证实为毫无实际意义;其他未预见到的甚至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可能会出现。这种自然开展的研究特质使得"置身田野中(being in the field)"具备有利条件,赋予其复杂性,给予其活力,而且给许多人带来激情;这也是迫使调查者具备弹性(flexibility)的必要所在。

因此,身为研究者,你之所以要评估资料现场,不是因为这么做足可让你的生活宛如置身玫瑰花床中,而是因为这么做或许有助于除去一些荆棘。

第3章 进入现场

Getting In

在决定哪些课题值得研究，以及你是否能以符合伦理而适当的进路取得资料的过程中，都涉及与他人的对话或咨询，但是，这些决定本身都是你个人的。当决定转化成为行动时，当你进行研究的意图付诸实践时，你就触及自然主义调查研究第一个真实的社会时刻了：进入实地，得到被研究者的接纳。

为自己就兴趣、适切性、进路与伦理做决定是一回事；让你感兴趣的各方都能配合你的方案则是另一回事。

在某些研究形式中，调查者的权力比研究"对象"大很多。如实验室动物研究或是以战俘、犯人为对象的医学研究，就是最极端的例子。但在自然主义的实地研究中，研究者并不运用这种形式的控制。在这个传统中，研究者之所以能观察和/或聆听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直率地同意你这么做，或者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研究对象。由于几乎没有任何事足以阻止他们拒绝访谈，回绝观察者进入其生活的请求，或者把"身份曝光"的秘密调查者撵走或拒之门外，因此，进入实地自然而然地变成所有潜在研究者的关切事项。

准调查者和研究对象或兴趣所在的场景之间，所发展的或即将发展的特定关系形式，会衍生关于入场过程（process of entrée）的特有问题、伦理议题及解决方法。这种种关系的变异形式已被多方表述。布福德·容克（Junker，1960）广为人知的田野研究角色（fieldwork roles）类型即是例证之一——完全观察者（the complete observer）、参与观察者（the participant observer）、完全参与者（the complete participant）和观察参与者（the observer

participant)。夏兹曼和施特劳斯(Schatzman and Strauss,1973)则区分出从外部观察、被动在场(passive presence)、有限互动、积极控制、观察者兼参与者、隐匿身份参与等类型。阿德勒和阿德勒(Adler and Adler,1987)在类型之间做对比,其中一组是较为"保持距离"的观察者、观察者—互动者(observer-interactant)、观察者—互动者—参与者(observer-interactant-participant)和观察者—互动者—参与者—调查者(observer-interactant-participant-investigator)等角色,另外一组则是"涉入较深"的外围成员(peripheral member)、活跃成员(active member)、完全成员(complete member)、正派成员(good-faith member)。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精心构思出的类型用途不小,但是就我们的目标来看,比较单纯的区分就足够了。

根据经验,我们将把自然主义研究"进入实地"的方面区分为:①身份未被知悉的调查者(unknown investigators)所经历到的进入模式——开放的、半开放的场景(public and open settings)或是封闭的、私密的场景(closed or private settings);②身份已被知悉的调查者(known investigators)所经历到的进入模式,他或是全身投入场景的参与者,或是以研究角色为重的局外人。我们将用本章讨论两个额外的相关问题:其一,法律、政治与官僚障碍(bureaucratic barriers);其二,保密(confidentiality)议题。但是,在讨论这些主题之前,有必要更仔细地思考一些方式,即许多场景可能和实地研究者所假定的调查者角色相关的场景不同。

Ⅰ.场景的种类

进入社会场景相对轻松还是困难,是受到很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影响的。讨论得最多的因素是在前面提到的如何布置开放的/私密的连续统(public/private continuum)。开放的场合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区内空间的开放和物质结构的开放,在这样的场合中,通常有出入的自由,例如:人行道、公园和商业中心。相反,私人的场所包括空间和结构的领域,这些领域对被承认的居住者(例如,居民或雇员)以外的所有人是禁止进入的。这种场所的例子有住宅、公寓、办公室以及许多俱乐部的具体场所。通常,许多

学者没有考虑在这样的场景中其行为规则的可变程度,在连续统的一端错误地聚集出一些社会场景或空间。例如,在有些公园里,行为可以有广泛的自由度,而在另一些公园里,行为可能就要受到约束。因此,进入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行动的自由,也不意味着行动可以不受约束。另外,接近社会场景的难易程度也因个人的性格、参与者的行为品质不同而不同,或者也可以归因于性别、年龄和种族,或者也可以归因于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因此,有些社会场景在感觉上是相容的,进路不因个人的特别个性而具有偶然性,然而,有些场景在感觉上具有相当的排外性,进路因为某人的特殊品质而具有偶然性,正如他们所描述或达成的那样。

将这三种可变的维度加以考虑,社会场景根据可接近程度的限制性进行有用的区分。最不受限制,也是最开放的,是那些入场和持续在场不因特别的活动或个性而具有偶然性的"公共场所"。稍微有些限制但相对来说还是开放的场景属于"半开放场所",在这样的场景中,持续在场由参与活动的限制范围、参与者的身份或更多的个人品质来决定,饭店、酒吧、茶馆、公共休息室就属于这种场所。更有限制性的、不开放的场所称之为"半私人的"场景,在感觉上,通往这种场景的进路与某些信任度或者品质有关,例如你必须是一名雇员或者被认识的成员。最后,最受限制、最封闭的场所就是"私人场所",通往这类场景的进路以真实的或者实际的主人身份、办公室责任人、私人的要求或约会为基础。

以上四种类型的社会场景组成了一种"进路阶梯(access ladder)",在感觉上让你觉得这与获得入场券有关。为了获得进入场景的最初门道,你应该在研究场景的位置选择和你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间十分敏感。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可转换性由你是未被知悉的调查者还是已被知悉的调查者而定。

Ⅱ.身份未被知悉的调查者

假如你身为研究者的身份未被你的研究对象知悉的话,进入实地并不至于构成问题。你是一个新来者,在进路方面,没有行

为和归属的限制，只要在场景中扮演起某一角色，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开始“神不知鬼不觉”地记录资料即可。问题在于暗地里进行研究这件事本身的伦理状态。

在这一节里，我们来斟酌三种与不同情境类型相关的隐藏研究（hidden research）类型。其中最不致引起争议的类型，很可能是在开放的和半开放的场景中进行的研究。若是在封闭场景中进行研究，而你已经是此场景中的成员，疑虑程度就可高可低。最受争议的研究，是在一个私密的或半私密的场景中，为了秘密的目的而扮演某一角色或身份。

我们必须说清楚两项资格限制，才能继续讨论。首先，某些自然主义研究形式无法在秘而不宣的状况下进行，例如，在很多情况下，秘密地进行参与观察要比秘密地进行深入访谈容易得多，因为持续的试探，如果不是做得十分灵巧，很可能激起被调查者对调查者的身份和兴趣的怀疑。虽然研究者进行“非正式”访谈，而未完整地告知对方自己是在进行访谈，这种做法也是可能的（Riecken，1969；Snow，Zurcher，and Sjoberg，1982）。但是，要暗地里进行深度访谈（一如我们在第 5 章对此访谈法的界定），这似乎就不大可能。因此，以下讨论仅适用于参与观察法。

其次，我们以上讨论的场景类型是理想的类型，是我们在思考入场时用特定的方式使之概念化了的理想类型。用这种方式描述场景虽然在分析上是有用的，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并没有必要将场景分为如此分散的类别。例如，所谓的“开放的和半开放的场景”还是“封闭场景”，其间的差别可能并不那么明显，甚至有可能依据你的优势或角色，随着时间而变化。

A. 开放的和半开放的场景

开放的和半开放的场景（public and quasi-public settings）给观察者提供了相对开放的机会。这些类型的研究场景要求观察者的出现和行为是传统的、合适的，但是，在开放的场景中，能被接受的行为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在城市里的某个公园，尽管对服饰的要求限制很小，但是，一个人的穿着必须是可以接受的，其行为要符合公众行为的标准化的期待（例如，对于别人的活动不宜靠得太近），但是，毫无目的地闲逛，对别人不关注也不赞同，这种行

为是可能的。大部分人被允许进入开放场景,没有必要从事特别的活动。但是在半开放的场景中,一个人的行为会因为场景的功能而受到抑制,以至于参与者必须服从于场景特殊的行为要求。除了这种抑制,开放的和半开放的场合给参与观察法设置了相对较少的障碍,这使得研究者假定自己扮演不被知悉的研究者的角色相对轻松。

实地研究者扮演的是开放和半开放场景中的某个角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林恩·洛夫兰德(Lofland,1985b)在观察公共场合(例如公共汽车站候车亭与机场候机室)时,她不过是进入这个场合并且坐下罢了。当斯宾塞·卡希尔和学生一起研究公共厕所时,他们的入场"问题",不过是依据性别之分走进正确的公厕门所需的技巧而已。同样的,以利亚·安德森(Anderson,1990)"进入"阶级或种族混杂的街头互动场景时,他所需要做的,不过就是在不同种族混合居住区的公共区域里现身而已。同样的情况还有,当艾莉森·芒齐(Munch,2005)在西南部的城市里做"观众社区(spectator community)"的研究时,她所要做的不过是坐在后面,跟在业余垒球运动员的球迷附近,不过,当她与这些参与者示好并和他们交谈时,她有时候会简要地说明她的研究兴趣,但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她的主要身份和定位是一名球员的"女朋友",是这个观众社区的一名成员。有些研究是在开放的和半开放的场景中隐秘地进行的,克里斯汀·霍恩、克里斯·麦肯怀恩和克里斯蒂·泰勒(Horne, McIlwaine, and Taylor,2005)在研究公共场景下,如商业街与零售店、饭店、公园、地铁、动物园、机场、公共汽车站等,大人对小孩行为的控制时,就是这种情况。在以上所有的例子以及其他的例子中,身份未被知悉的调查者要接近和研究这些场景,相对来说都不复杂。

虽然这类研究是否确实违反伦理,的确有辩论的空间,毕竟它就算并非真正犯下欺瞒之罪,也涉及忽略所造成的欺瞒行为,然而,严肃的伦理论辩很少着眼于这种研究情境。理由之一可以推断为,去除欺瞒成分的做法即便不显得荒唐滑稽,其可能性亦为零。正如朱丽叶斯·罗斯提到的,"当我们在观察欢迎英雄凯旋的人潮时,如果主张我们应当警告人潮中的每一个人,有位社会学者正在诠释其行为,这无疑是荒诞不经的想法。"(Roth,

1970,p.279)。理由之二在于,我们推测没有任何一位研究对象会因此而受到伤害。理由之三或许是,一般民众在知道自己被视为研究对象时,常常表现出"百无聊赖"的态度,正如芒齐研究"观众社区",被研究者知道了她的研究兴趣时的情形一样。

B. 私人的和半私人的场景

当研究者脱离公众领域而进入私人领域,亦即进入并非"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允许进入其中的封闭场景时,暗地里进行研究的严正伦理议题就产生了。加里·怀恩把这种情境称做"深层掩护(deep cover)":

> 就研究对象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调查的研究类型而言,研究者的角色在结构上等同于地下情报员,虽然两者的动机推测起来是不相同的。在此情境中,研究者可能目击到各式各样的行为,但同时他也发现,要就任何一种行为发问,而又不至于让他人对自己的隐藏身份起疑心,这可能就极为棘手。个人的掩护身份在这种情境中被揭穿,即当研究对象发现,他们的**新成员**其实是一名专业观察者时,牵连可能很广。身份曝光不但让研究名声败坏……(也)让研究者蒙羞,……更可能危及整个科学界。(Fine, 1980,p.124)

在封闭场景中私下研究的"间谍"本质,正是使得其适切性在社会科学中受到质疑的原因。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 2 章所提及的,有些人主张,研究者若是为了对秘密场景进行研究的目的而占有一个身份的话,他就做出了自然主义传统中最不道德的研究行为。当然,女性主义者对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平等、同情所赋予的高度价值,也被拙劣而毫不掩饰地折衷成私下研究所本来具有的知识失衡(knowledge imbalance)现象(Skeggs,2001)。但是,其他的社会学家采取一种更具细微差别的方式,在开放的场景中做秘密的研究没有任何道德困难。当研究开始后,研究者已经融入到了场景中时,对道德问题的担忧相对来说就要小一些。例如,当研究者决定研究工作流程时,他已经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很长时间了,其道德责任似乎就不那么严重,但如果是一个顽固的人为了秘密研究的目的进入现场就不会被允许

(Bulmer,1982;Erikson,1967)。30多年前,朱丽叶斯·罗斯对社会科学家道德方面的吹毛求疵的现象的评论仍是恰当的:

> 一个人变成秘密观察者所采取的态度,会影响到场景的道德色彩吗?一个人在某个工厂谋到一个职位以赚取学费,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完成社会学研究,或者他刻意安排到厂里任职,表明其目的在于观察其工作中的同事,是否前者就是道德的,而后者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两者的结果是相同的,比方说,观察结果的应用方式是相同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这两种情境中看不出道德上有任何差异,但是我发现我的一些同事并不同意这样的立场。(Roth, 1970,p. 279)

关于隐秘研究的道德规范,无论我们持哪种观点,通常都很难达到一个明确的点,从而不用考虑各种各样的重叠的伦理议题。对于每一个议题,不同的研究者和评论员都有不同的权衡,这包括对于谁(隐秘的研究是否会伤害被研究者?)的伤害的可能性如何、对于谁(研究的失败是否使现存的伤害永久存在还是逐渐模糊?)的利益前景如何,以及从未公开研究过的场景在理论上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观点:对纯粹的开放性提出更强硬的要求,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天真的论调。首先,隐秘研究和公开研究的区别在实践中通常是模糊的、隐晦的。例如,理查德·希尔伯特(Hilbert,1980,p. 71)在他的隐秘参与观察法的实践分析中写道,"在隐秘的和开放的观察之间有一种互为决定因素的关系",感觉上"保护隐秘性的技巧,正是那些用来展示公众关系的技巧"。无论是在公园、集会,还是在行政办公室,正常的成员活动,以及其他的参与者都应依据特定场景所规定的行为出场或行动。希尔伯特的观点是:由研究者和伦理学家贴上方法上的可操纵性或隐秘性标签的行为,与由正式成员所维持的场景性活动之间,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的。

部分地源于与隐秘性相关的行为和开放性研究之间的交迭,民族志研究者不顾伦理学者的假设,对被研究者将他们当作"谁"确实没有完全的控制。实地研究者"寻找各种方式出场",正如理查德·米切尔(Mitchell,1993,p. 12)所观察到的:"但是被研究者

能够并通常重新解释、改变或者有时候拒绝这些支持他们自己的研究者的表述。"他们有时候也忘记了这一点。例如,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有时候对这种趋势感到吃惊,无家可归的被调查者宁愿把研究者当做流浪汉而不愿把他们当作研究人员,尽管这些研究人员在现场时尽量直接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目的。以下是戏剧性的描述:一天傍晚,安德森正开车送一位无家可归的妇女去一个废弃的仓库,她打算在那里过夜,这个妇女他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是他的一位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当她走出汽车时,她问道,"你这家伙今晚在哪里过夜呢?"在安德森告诉她他将在他自己的公寓里过夜,斯诺也会在他自己的家里过夜后,她毫不隐瞒地说,"哇,你们这两个家伙过着豪华的生活啊。"

对隐秘研究表示反对的全面争论让我们觉得很天真、很有问题,他们不能弄清楚,其实在许多社会场景中,入场以及与场景中的成员的友善都需要慢慢地、谨慎地进行。在有些情境中,实地研究者在一段时间里能够发展成为可行的、可以接受的角色,但是,如果一进入场景就宣布自己的研究兴趣,反而会导致直接的反对。另外,有时候研究者希望在从事研究前用一种探索的方式接近场景。这种关注的方式在詹妮弗·洛伊斯关于一名志愿者的山林调查和营救组织的实地研究中有所体现。在她的早期研究中,她尝试降低身份参加团体的会议,但是并没有暴露她正在做田野笔记和正在进行主要的研究,因为她担心这样的暴露会阻止他和成员们之间的关系。过后反思,她观察到:

> 秘密进入这样的场景我一点都不舒服,虽然……为了和疑心很重的成员建立信任,这种做法是很有必要的。尽管有人可能反对我采用隐秘的角色,但是我相信,这是一种合适的方法策略,它帮助我获得了入场券。(Lois, 2003,p.42)

我们希望许多实地研究者都从事过类似的短期的隐秘参与观察,他们的研究没有必要很复杂。如果不可行,他们也不要采取这种分段方式(staged approach)来展现他们的研究兴趣。

前述的论点给了隐秘研究的适切性和伦理性以中肯的评价,我们相信伦理敏感的、深思熟虑的和知识渊博的研究者,是对隐秘研究是否合理的最好的评判。然而,你对被研究的场景或团体

所采取的研究姿态或站立的位置,要么仅仅是你自己的决定,要么就是你与你打算研究的情境中的成员要协商的大事。正如第2章所述,你要请教别人,或是取得你的学院或大学研究委员会的同意。因此,我们建议各位在还不熟知私下研究的难题、论辩与两难困境之前,不要进行这种研究(至少不要在私人的或是半私人的场景中)。最起码,你应该熟悉你所隶属学科的伦理信条(如果有的话),你也要知道,你所认同的理论团体或其他子学科群体(subdisciplinary clusters)对于私下研究持何种观点。除此之外,我们推荐下列书籍或其中的章节作为这个主题的实用指南:

Chapter 23 on "The Ethics of Ethnography" by Elizabeth Murphy and Robert Dingwall,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Coffey, Delamont, Lofland, and Lofland (2001).

Chapter 3 on "Ethical Issues" by Bruce L. Ber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Fifth Edition) (2004).

Walking the Tightrope: Ethical Issues for Qualitative Reseachers, edited by Will C. van den Hoonard (2002).

Special Issue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ume 26 (1995).

Secrecy and Fieldwork by Richard G. Mitchell, Jr. (1993).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Fieldwork by Maurice Punch (1986).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especially Chapter 15 on "Intrusiv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y Sissela Bok (1993).

Ⅲ. 身份已被知悉的调查者

实地研究者通常认为,身份已被知悉的研究者进入田野的主要问题在于策略,而非伦理考虑。毕竟,如果研究者的身份是已被知悉的,那么就没有什么要伪装的,也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样的假设暗示着开放研究和隐秘研究之间相当简单的区别。这种区别对于分析的目的可能相当有用,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人为的。大部分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知道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能清晰明白地说明了原因,正如朱丽叶斯·罗斯所强调的:"在某种方式上和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研究都

是隐秘的——我们并未告诉被研究者‘一切’”(Roth ,1970, p.278)。罗斯强调,缺乏公正的一个理由是,一开始研究时“研究者通常并不知道他(她)正在寻找的一切”。当实地研究者不是这个场景或问题团体的成员时,就不熟悉构成成员资格的程序和惯例,那么开始时对有兴趣和值得关注的东西感觉不确定或模糊是很有可能的。另外,由于最初对感兴趣的东西不确定,通常使得实地研究产生偶然的发现或结论。相关的原因是“有些事情是随着研究的开展才发现值得研究的,如果在研究开始时就告诉被研究者,他们可能会反对”。此外,有时“研究者并不想让被研究者的行为受到影响……如观察者感兴趣的知识”(Roth, 1970, p.279)。此外,正如前面所述,完全暴露研究兴趣和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他们有可能被遗忘、被误解或消失。也正如罗斯在这一点上所记录的:

> 即便研究者使出浑身解数,向研究对象精确详尽地说明研究的目的与步骤,研究对象对于所有研究术语的解读,和研究者也不尽相同。其所使用的术语对他们而言有不同的涵义,其经验背景有差异,其对于研究目标的想法很可能也不一样。(Roth,1970,p.279)

最后,即使当研究者通过协商进入到一个团体或一个组织之中,研究身份的宣布和澄清也受到与重要的进路控制者之间的互动的限制,而不是在随后的遭遇中与每一个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反复诉说。

我们牢记,隐秘研究所引发的伦理两难困境,并不因为我们决定做公开身份的研究者就消失无踪,反而在只是变得沉寂无声之后,我们还是专注在进入实地的策略问题上。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取决于,场景落在开放的/私人的连续统的哪个位置。由于前述的原因,获得场景或情境的入场券在接近连续统的私人末端时会发生倾斜,例如在公司的办公室、俱乐部以及高傲的、秘密的团体中,获得入场券就比在没有入场限制的开放性的场合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在于那些在入场方面有更多限制的背景和情境。入场问题也或多或少由场景中的研究者是否已经是一个有充分资格的参与者来决定,即研究者是局内人

还是局外人。

A."内部"参与研究者的角色

正如我们所见,"从你的立足点起步"的原则,引导许多自然主义研究者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研究。假如他们决定公开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私人的以及半私人的场所进行研究,他们的任务是公开个人意图,争取场景内参与者的合作,并且视场景的特征,可能还得寻求正式的许可。然而,已经是一名成员或是一名局内人(insider)的参与研究者(participant researcher),即阿德勒和阿德勒(Adler and Adler,1987)所谓的"完全的成员资格(complete membership)"的优势在于他已经熟知了"演员名单(cast of characters)",或者至少是这个名单的一部分。而外部研究者则必须找出谁可以先询问、对话,正式的许可是否需要,是否需要以信函知会,等等。对参与研究者而言,诸如此类的知识是成员身份标记的一部分,很容易(即便并不总是得心应手地)拿来使用。

B."外部"参与研究者的角色

于是,进入田野的主要策略性问题落在了外部研究者身上:为了观察场景的目的而寻求许可,或者为了访谈的目的而得以与个体接触。研究者要处理的主题、场景与情境范围宽广,可能阻止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民众类型多不胜数,因而,争取对方或者让对方理解的策略也过于繁复,实在无法简明扼要地加以分类。然而,这些年来,许多田野调查工作者的经验告诉我们,各位在进行协商时,如若能以关系(connections)、说辞(accounts)、知识(knowledge)和礼数(courtesy)作为后盾,那么,在找寻进路上更有可能成功。

1. 关 系

俗话说:"关系才算数(It'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that counts)",其所蕴含的智慧非常深远。如果你有人脉的话,那么,进入场景或者获准开展访谈将畅通很多,但是没有关系通常几乎不可能进入。为了获得这种有促进作用的关系,我们推行两种普通的策略:一种策略是利用与场景或团体相关的现存社会关

系;另一种策略是确定关键的进路控制者,发展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卡尔文·莫里尔(Morrill,1995)在对公司精英之间如何处理冲突的实地研究中清晰地描述了第一种策略。莫里尔(1995, p.233)记录了"亲密关系"是如何让"Tag"配合研究者的。Tag"是一个长期管理顾问,是当地生意社区中被尊敬的成员"。"亲密关系"在保护研究者进入研究场景的公司的进路上起了很多关键的作用。第一,他帮助莫里尔确定了5个行政人员的身份,这5个人"因为他们善于接受采访的可能性,而作为最初的有希望的信息提供者"。第二,Tag"通过提到该研究项目而'采取措施'……使5位信息提供者在例会中就其他的事情发表观点"。第三,当有利用进路的必要时,Tag允许莫里尔使用他的名字。

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相当幸运,然而,有时候,进路取决于整个人际关系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步接触可能与所需要的研究场景有一段社会距离,但是仍然可以把准调查者和边缘人士联结起来,而后者则转而把她或他和核心人物连结起来。苏珊·奥斯特朗德在研究上层妇女时就有这样的经历:

> 在我开始研究上层阶级妇女,即我着手进行博士论文的方案的几个月前,我和博士班同学及教授们谈到我的计划。有一天,一位博士班同学告诉我说,她之前曾协助一位女性打选举战,她认为这位女性符合我准备采用的上层阶级妇女的标准。……我跟这位女性接触,告诉她我的兴趣在于"了解有关本镇一些世代久远、深具影响力的家族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初步接触所常常发生的,这位女性只不过勉强够得上她所属的阶级。……不过,她仍然符合上层阶级成员的标准,而更重要的是,她被其他人认识或敬重。……她告诉我,重要的是,"顺序不得弄错。你得从高层着手。"……她提议由她来为我致电其中三位"顶尖的(top)"女性,并取得其同意。她的尝试很成功,我访问到了这三位女士,说明了我的方案,并告诉她们一般人对于类似其家族的名门男性生活方式知之甚深,但对于女性的所作所为所知甚少。在访谈结束时,我请教她们是否能够把我介绍给具备同样身份、同样背景的其他女士,还请问她们我是否可以引用

> 她们的大名。她们同意了,还提议由她们致电给她们所提到的女士,告诉对方她们已经跟我谈过。我就这样打进这个圈子了。(Ostrander,1993,pp.9-10)

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外部研究者通过个人已经建立起的关系,争取进入场景或接触个人,这是很典型的做法。他们在朋友、熟人、同事等对象中想方设法寻找那些握有进路控制权者所敬重、景仰的人士,或者找出可以把自己和这种人连结在一起的某位人士。这当然是访谈研究所谓的"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或"连锁式推荐"抽样(chain-referral sampling)所包含的主要原则。这种方法提出的抽样途径是,通过一开始的联系人,让他们列出一些具有相似特质并有可能同意接受访谈的人的名单,从而形成实地研究的样本(Berg,2004;Biernacki and Waldorf,1981;Schensul, LeCompte, Trotter, Cromley, and Singer,1999)。因此,一如我们在前述引文中看到的,奥斯特朗德通过同事与初步的资料提供者搭上线之后,请这位女性推荐其他有可能接受访谈的女性,从而启动了滚雪球或者连锁式推荐的过程。在类似的情形中,莫里尔(Morrill,1995,p.234)在对初步的行政人员的信息提供者进行采访的过程中,采用了这种滚雪球式的策略,询问了每个人是否认识可能对这个研究感兴趣的其他行政人员。正是用这种方法,他得以扩大自己的行政人员的取样。因为莫里尔和奥斯特朗德不寻常的经历,一条轮廓鲜明的研究路线出来了:只要是在有可能的地方,你就应该试图使用或构建先前存在的信任关系,以克服进入实地的障碍。

问题是人际网络机会并不总是可用到的。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实地研究者与感兴趣的场景或团体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主要的或次要的联系都没有。但这不是绝望的理由,因为实地研究者一直通过发展与守门员(gatekeeper)的联系,或者发展与其他有可能帮助研究者接触其他成员或活动的其他成员的联系,来慢慢适应和转变没有人际关系可资利用的状况。威廉·怀特(Whyte,1993)提供了此策略的最好实例,他得以进入"Cornerville"在于,他偶然与"Doc"和"Chic"建立起了相对过硬的关系,这两个人后来成为了他关键的资料提供者。

2. 说 辞

各位要针对研究提案构思出措词谨慎的解释或说明,其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是非常值得的。不管你使用的是深度访谈法还是参与观察法,你是在请求研究对象准许你进入他们的生命、心灵与情绪。他们有十足的理由来了解,他们为什么应当允许你做这样的打扰。因此,你应该留出一些时间来考虑详细的解释或拟研究的说明。从老练的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来判断,当思考入场的说辞时,有许多因素对思考有益。这包括内容(content)、时间安排(timing)、形式(form)以及合适的人群或目标(audience/targets)。

(1)内 容

你需要告诉你未来的接待者(prospective host)什么?你应该提供多少细节?这里提供大量的、由许多实地研究所建议的、相互关联的"经验方法(rules of thumb)"。首先,使你的说辞尽可能简短(brief)。大多数听众不会对研究者狂热"宠爱的"事物的细枝末节感兴趣。他们要的是就"为什么我应该让你进来"的问题,得到简洁而直接的答复,而不是一份学术论证。如果你被要求提供更多的细节,你当然必须做好准备,但是要允许未来的信息提供者询问详尽的细节和解释。其次,用信息提供者易接近的、可理解的方式,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研究兴趣。这意味着要避免训诫式的行话,以及理论的、方法论的基本原理的讨论,信息提供者不仅可能对这种细节不感兴趣,而且,随着你的研究开展得越来越深入,你最初的预想和理论的基本原理会被证明无关甚至是误导。即使你最初的预想命中了目标,其清晰度也要冒风险,可能产生我们之后将要讨论的回答效应(response effect)。毫不奇怪,许多研究者发现开始时只要说一说"我在写一本关于____方面的书"或者"我对____感兴趣"(Horowitz,1996;Snow,1993;Williams quoted in Williams,Dunlap,Johnson, and Hamid,1992,p. 349)就够了。再次,不要标榜自己相异、可疑的标签或身份,或着重强调地位的区别,如社会学家或犯罪学家,最好是暗示对方你是附近某个大学的学生或老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身份相当普遍,容易让人接受,不大可能因为有受过特别训练的身份而让人觉得

有威胁。而且,随着研究的发展,这样相当含糊的身份会满足要有与情境化更合适的角色出现的需求。第四,如果信息提供者是一些个人、某个团体或者某个正式的组织,那么你应该准备为你的信息提供者说说内容是什么。这包括依据交换关系构建的研究框架,以便双方都可以从研究中获益,这一点我们将在第 4 章(Ⅱ.A.1 部分)中详细谈到。最后,我们建议要确保你的说辞尽可能直率。如果你已经决定在一个私人的或半私人的场景中进行研究,在这样的场景中进路比在开放的场景中更有问题,那么,用借口或彻底的谎言或者用不能实现的承诺(例如,审查机构的权利)开始研究,使一个已经很复杂的情境变得更复杂,这就没有意义了。尽管有最好的意向和计划,开展实地研究仍然会困难重重。开始抬高自己,过后又为当初的欺骗付出代价,仅仅是惹了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必须承认,稍微"捏造"一下说辞,即怀恩(Fine,1980)所称的"浅层隐蔽(shallow cover)",好像一种普遍的做法(社会学承认这是在编译"最近的历史(a recent history)",而不是在做社会调查)。老实说,以上提到的确定普通身份而不是特殊身份的建议可以解释为胡说八道,但是这既不是谎言,也不是误说。最好是在开始时如实概述自己的身份和兴趣,而后根据信息提供者提出的更清楚的要求,或者当/如果这样的要求与场景适切的话,再亮出自己更为详细的身份和兴趣。

(2)时间安排

你应该在研究过程的哪一环节提供你的说辞?答案看似很明白:当你试图进入安全的场景时。但是这个过程比那更复杂。首先,有一个问题,在你最初获得入场许可时,你是暴露所有重要的身份信息——你是谁?你从事什么?还是对被暴露的内容有所控制或是有先后顺序?当然,答案由你所从事的研究的情境决定,以及由你组织说辞的等级范围决定,比如有像秘书那样的守门员,他/她要求你与其行政主管接触前要有得到许可的说辞。在这样的情况下,很明显,没有人说出说辞,但是可以根据谈话对象修改或改编一下说辞。其次,既然大部分实地研究都有不断演化的特点,那么,就都不大有在项目开始时说出具体的兴趣和资料的可能性,尽管之后研究者可能有义务要更充分地解释该项目,包括伦理方面的或个人方面的兴趣。最后,由于我们注意到

信息提供者有时忘了之前我们所说过的话,所以我们可能不得不复述我们的说辞。所以,正如进路,特别是进入私人的或者半私人的场景的进路,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协商、再协商一样,很有可能你不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需要重申你的说辞,而且当研究焦点演变和改变时,你需要根据不同的目标对象修改,甚至是改变或者提炼你的说辞。

(3)形　式

应该怎样说出说辞呢?是口头提供,还是通过电子邮件,或是通过正规的邮件?答案再一次取决于你的研究情境。如果你正在研究一个非正式的、没有指定住址或办公室的团体,如街头帮派、学校小团体或者无家可归的露营者,口头的说辞是最合适的。公共机构的代表,例如研究顾问发出书面签注信件,可能对澄清研究目的很有作用,但是如果未来的资料提供者没有要求出示这样的签注文件,就没有意义要出示这些东西了。这种官方的签注文件不仅增加联系人对研究的怀疑,而且如果最初的进路没有被认可,他们可能就要胡编乱造或歪曲事实。但是,如果你接到的是前述的公共审议委员会的十分严厉的命令,那么你的说辞该怎么陈述就没有什么选择了。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访谈时,伦理委员会要求研究者与信息提供者签署"知情同意"授权书,或者坚持要求研究者应该朗读"口头的同意草案(verbal consent script)",这个草案要提供对研究的总体看法、研究潜在风险和好处、对机密性的担保。除了制度审查委员会提出的这些议题以外,在不仅有地址和办公室,而且有守门员的私人的和半私人的情境中,获得入场券的说辞可能要因参与者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也可能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例如,莫里尔(Morrill,1995,pp. 233-234)与秘书式的守门员之间为获取入门的交流就基本上是通过打电话或者面对面的口头交流,而他与行政人员的接触则是多渠道的,使用介绍信、电话交谈以及办公室会谈。

(4)受众/目标

当表述说辞时,最后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受众或目标。如前所述,说辞对于受众来说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叙述故事的方式(而非

故事本身)应当视受众而量身定做。例如,莫里尔(Morrill,1995)对秘书式的守门员所说的,就比对他希望采访的企业行政人员第一次会面时所说的要更通俗,但却没那么详细。同样的,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告诉无家可归的信息提供者关于他们的研究情况时,就没有对公共机构的代表所说的那么具体和详细,因为他们希望后者允许他们检查代表机构的记录。同样的情况还有,如果你正在研究学校场景中年少的孩子们,你告诉学校负责人的故事,和你告诉孩子们的故事不可能如出一辙。这样做的理由很多,不仅仅局限于年龄不同、语言技巧不同、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同等简单的原因(有关向儿童"提出说辞"的做法,请参见 Fine and Glassner,1979;Fine and Sandstrom,1988;Mandell,1988)。

3. 知　识

一如我们在第4章将看到的,要想在实地相处下来,一个屡试不爽的策略是,采取"学习者",甚至是"难以胜任者"的角色。既然你是在尝试学习,照着此角色来依样画葫芦也是说得通的:自命为万事通或专家的人是不太可能被"教导"的。然而,就像所有的好事一样,这种策略可能会做得过火,当此状况发生时,它就会转盈为亏。研究进入与研究对象相处的阶段时,如果过分强调学习者的角色,可能会带来负面甚至是致命的后果。如果你想避免被他人视为轻佻浅薄或呆头呆脑的,你应当对于想要研究的场景和人群拥有足够的知识,以显得自己有做研究的能力。至于到底拥有多少知识才算足够,各种情境当然不一而足。假如你想要研究"母职(mothering)"的经验,你可能只需要知道你请求访问的人是女性并且是母亲,就足够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曾经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中研究过所谓的"精英分子"的实地研究者指出,做背景研究的重要性与了解"情势(the lay of the land)"的难度是等价的(例如,Morrill,1995;Moyser,1988;Thomas,1995)。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开始实地研究前就了解情势或事态的重要性也会完全扼杀实地研究。预先的知识有多少,是什么种类,对了解情势很有必要。了解情势还因你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你的研究范围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是一个工作团体,还是某个机构的小环

境，或者，是否是整个组织）。你所从事的研究范围要求熟悉更广阔的、你的研究兴趣所植根的脉络。例如，在聚焦于奥斯丁、德克萨斯的流浪汉的适应生存策略时，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意识到，在了解各种各样的影响流浪汉日常事务的机构和组织后，彻底的理解那些策略是可能的。这样，在研究过程的早期，他们从事的被称为"生态图"的工作，即了解流浪汉的住所或生活环境与相关机构位置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大多数实地研究的序曲。

尽管从一种研究进入到下一种研究，会在背景资料的有用性和可理解性的程度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你只有做了一点费力的基础工作（spade work）后才可能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在强力推进研究之前，尽可能地就感兴趣的现象及其脉络进行学习。掌握情势能帮助你避免一些问题，增加你询问一些正确的问题的可能性。

4. 礼　数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协商时懂得讲究礼数，各位获准进入实地的可能性会提高。请记住以下四点有用的做法：

- 在准备做访谈时，通过写信或打电话（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给可能的受访者，请求对方合作，并询问对方方便的时间与地点，而非未经知会就到受访者家中或办公室登门拜访。
- 知会对你的研究感兴趣的关系人，即便你不立即需要他们的合作，或他们也不会是被研究团体的一分子。
- 在取得你希望研究的受扶养人口或从属人口（如儿童或住院的智能不足者）的允许时，要如同你在取得其看管人的许可时一样，须全力以赴。
- 通过人际关系以使他人认识你，针对你想做的事情提供合情合理的说辞，并展现足够的知识，暗示你的能力足以完成任务。

Ⅳ.政治、法律与官僚体制的障碍

在本章前述的几页里,我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与进入理想场景有关的绊脚石,以及各种可能被用于该过程的方法和策略。如果我们比较投入地关注进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超过我们普遍的做法(参看:Feldman,Bell,and Berger,2003),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实地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顽固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引用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成功地解决了进路问题,这表明或许这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个问题。事实上,由于没有成功地解决进路问题,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尝试完成的实地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已经出轨了。这些夭折的实地研究就如灭绝的物种,没有被人听说,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没有相应的记录。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所尝试的研究中未成功的比例,那么我们猜测,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因为他们没能克服进路的挑战。我们猜测许多尝试的实地研究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的、法律的以及官僚体制的阻碍。另外,我们相信,近来世界各国政治、法律上出现的趋势,已经使得"进入实地"原本困难重重的状况更为恶化,使得某些自然主义研究即便不是难如登天,也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于某个或多个脉络情境上的障碍,使许多可能的研究现场被宣布"禁止入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在1960年代,出现了一次由政治活跃分子发起的运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就禁止美国的社会学科学家进行实地研究,因为他们把这些学者视为文化、政治或经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亚瑟王宫方案(Project Camelot)",这是一次由军部发起的镇压叛乱方案,支持社会科学家检查内部叛乱的动机,并判断哪些政府行为有可能减轻、恶化,或者溶解这些动机。因为在智利出现了敌对反应的后果,这个方案没能真正实施,但是这次事件的确引出了许多的问题,比如政府和研究人员之间协作,以及一些国家对外国研究者的真实兴趣的怀疑(欲知该方案详情,请参看:Horowitz,1965 and Sjoberg,1967b)。

最近,围绕在罕见的、小型的、脆弱的前文明社会(preliterate society)中做实地研究的基本原则展开了讨论。最受欢迎的是先

前提到的雅诺马马、亚马逊盆地、印第安部落的石器时代的案例，按照推想，这些地方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是未知的，直到拿破仑·查冈（Chagnon，1983）在 1960 年代历险到了这些地方。从那以后，据称在雅诺马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和以前一样了，现在据报道他们面临着灭绝的威胁，因为外来人员带来了疾病和商业利益的入侵。也有人关注他们是如何被描述的（Monaghan，1994）。因为这样的辩论或者甚至是冲突，在边缘的以及脆弱的群体中，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进行实地研究与先前的研究案例相比，被看作是非常可疑的、备受关注的。

在其他情况下，国家政府禁止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进来研究，把他们视为敌人，甚至禁止本国研究人员进入本国政府的内部进行研究。美国政府现在长时间对古巴敬而远之的姿态，视古巴为“禁地”，就是国家政策能够阻止实地研究入场的明证（Fuller，1988；Warren and Staples，1989）。英国 1911 年制订的公务秘密法案（Official Secrets Act）使得接触公务员无比困难，说明了后者也是常见的情况（请参见 Moyser，1988，pp. 119-120）。

另外一些情况是，有些研究者被其研究对象指控诽谤或毁损名誉，或面对这些罪名指控的威胁（例如：Beckford，1983；Punch，1986，Ch. 3），这些威胁的冷却效应可能已形成另一种障碍，即社会研究者首先就质疑，他们是否可以冒险进入实地。

尽管上述政治和法律的约束限制了在某些场景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但是它们并没有对实地研究形成广泛的、决定性的束缚，并不像制度审查委员会在全美校园中那样具有影响。他们的制度化可以看作是自 1970 年代以来对社会研究增加了越来越多规制的趋势的顶点。在 Tuskegee 案例中，许多黑人梅毒感染者被故意误导而接受治疗，考虑到这种医学研究对人体的欺骗，联邦政府便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来适用于远不止医学的诸多领域，旨在保护人体免于各种各样的由研究所产生的生理以及心理上的“伤害”。制度审查委员会是官方的委员会，负责按照当地的情况执行联邦政府的规章制度，包括大学或学院在内。联邦的规制活动包括评估拟研究的风险与利益、保护“实验对象”的步骤以及要求知情同意书。

我们能猜出许多的实地研究者在原则上同意，有必要让某些

规章制度来保护人们,但是,我们也知道,许多人对一些最初的民族志实地研究方针的适切性有质疑。例如,在开放的场合进行实地研究时,"知情同意书"的重点是什么?由于这些问题以及社会研究团体的来回出入,联邦政府的一些规章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然主义的实地研究的某些方面稍有松弛。

某些联邦政府的规章制度的修改和松弛,并不意味着许多实地研究被最初的制度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所豁免。正如此书的写作一样,以大学为基础的实地研究项目一般提交给当地的制度审查委员会进行初步筛选。即使实地研究者能够要求各种各样的规则豁免,比如知情同意书的必要性,那么也都要服从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如果没有被批准,研究者就被要求提交一份更详细的草案,该草案应详尽地记录风险和利益,并澄清确保知情同意以及为信息提供者保密的步骤。尽管我们知道实地研究者有时在没有得到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和批准时就开展他们的研究项目,但是如果资金的发放是暂时依赖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和批准,并且如果资金是有保障的,这样做的确是难得的选择。

规则对自然主义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多大的障碍呢?这很难知道,因为在执行中,存在着研究者适应这些规则和制度的变更而做出的改变。从单个研究者的角度看,我们知道他们对规则和制度的威慑有许多怨言。但是,我们还应该明白真实地估计制度审查委员会的作用对实地研究项目的影响范围。虽然有些拟研究的项目被淘汰了,但是我们猜想,在大部分情况下,制度审查委员会是一个挑剔的家伙,而非不可克服的障碍。这种猜测的理由之一是,实地研究就像他们所研究的个体一样,是十分有适应能力的,因此,正如罗伯特·埃莫森所观察到的(Emerson,2001,p. 146),"剪裁研究程序的记录,以满足当地制度审查委员会的要求。"从机构的角度看,研究范围是可以有变更的,以符合制度审查委员会规定的范围。在一些大学,所有的研究,甚至是没有经费的大学本科生的研究,都服从于规则和审查;在其他的情况下,只有获得了资助的研究才受到影响。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制度审查委员会干扰知情同意书的措辞,以至于开放场合的"隐秘研究"作为一个选项被排除了;其他的制度审查委员会则因为"不存

在风险"而免除了这种研究的知情同意书机制。面对这种复杂性,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建议就是,在开始研究之前,你应当熟知你们学校的制度审查委员会的政策,以及当地研究人员对这些政策的严肃程度。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我们并没有意思要表示我们赞同所有的制度审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和他们对制度的执行,但是制度审查委员会是实地研究中很重要的因素,与研究的推进有关。因此,忽视当地的制度审查委员会的规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伦理及其在你研究中的应用的范围,都是错误的建议。正如帕特丽夏和彼得・阿德勒(Patricia and Peter Adler,2002,p. 42)所述,"在没有预料到的情境中,会产生研究计划中没有涉及或提议的内容",因此,研究者"将一直不得不对伦理和安全问题做出适合情境的决定和解释"。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赞同阿德勒(Adler,2002,p. 42)所述,他在实地研究者和各种各样的政府专业组织间"提倡联合,相互尊重彼此间的关系","与法律部门更多地协调,预测未来潜在的问题,同时尊重基本的合同义务,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相互信任。"

V. 保密的问题

实地研究者对被研究者需尽的一项义务就是,通过"承诺保密"来保证匿名,研究者保证人名、地名等真实名字不会出现在研究报告中,或者会以假名来替代。早在联邦政府的人类保护规则和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制度出台之前,实地研究者就赞成这个操作原则。的确,这个做法是自然主义实地研究的重要原则,以至于在自然主义研究传统中,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当然,我们知道机密性与密级一样也有程度之分。在深度访谈研究、公众场所观察以及半私人场所,或是不固定的社会群体研究中,个体有可能辨别出对他们的描述或是对他们的谈话的引述,但是他们无法辨别出任何其他人的描述或谈话。然而,在稳定的社区或持续存在的团体的研究中,假名几乎没办法防止任一参与者或有见识的观察者辨别出谁是谁,他们至少都能相当准确地猜测出伪装的社区、团体或者个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实地研究比阿瑟・维迪奇和约瑟夫・本斯曼在他们的作品《大众社会里的小镇:一个

乡村社区里的阶层、权力和宗教信仰》当中体现得更清楚(Vidich and Bensman,1968)。这个小镇被称作“Candor”,纽约在这本书中被称为“Springdale”,但是这个假名骗不了这个镇上的多少人,他们能够辨别出书中“谁是谁”,尽管作者并没有提到任何重要人物的姓名。如果作者不把Springdale(Candor)描绘成一个灌输了大众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由当地像大城市的政治活动家一样的商人所运营的地方,或许镇上的人不会过多的关注这本书,事实上,这地方不过是一个充满毫不妥协的民主和不断变更的小农意识的小岛。由于这种分离以及居民们被维迪奇这位实地研究者欺骗的感觉,根据某种标准,这本书不仅变成了“全面侮辱的源泉”,而且维迪奇也把自己钉在被憎恨、被蔑视的肖像上,并且“村民们在7月4日举行游行,一辆彩车上挂着维迪奇的肖像,他正向撒肥机鞠躬致歉”(Allen 1997,p. 35)。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供两条有用的建议:第一,用来伪装团体或社区的面纱,通常能被那些喜欢这样做的人看穿或识破;第二,当研究者的主张产生了问题,或者与被研究团体或社区中的人相冲突时,有兴趣揭去面纱的人特别有可能是那些人。

尽管保密的斗篷下有出现破绽的可能,保密对于身份已被知悉和未被知悉的研究者而言,都是标准的操作程序。事实上,对于已被知悉的研究者而言,向研究对象承诺保密往往被视为进入实地的核心技巧:一旦进入实地的任务完成后,它还被视为神圣的信任感,即便是蹲监狱或被威胁蹲监狱也不背信弃义。前文中所提到的里克·斯盖尔斯所做的关于动物权利团体的实地研究的例子是很有说明性的:因为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他没有上交被传唤的实地研究笔记,也没有为他上研究生时的大学动物研究实验室的调查“释放”作证,他为此在狱中呆了6个月(Scarce,1994;类似的实例也可以参看:Brajuha and Hallowell,1986;and Levine,1993,美国社会学协会对类似案例的观点)。由于传票以及相关的法律纠缠不仅导致了对信息提供者保密的威胁,也对实地研究者的私人以及专业的日常事务构成了威胁。例如,理查德·列奥(Leo,1995)的实地研究笔记在警察审问时被传唤,这些威胁使得斯盖尔斯参与到这个辩论中:应该准予民族志工作者的证据具有优先权,并且不应该要求他们上交实地笔记或者在法庭

上对他们的所见所闻作证。这种证据优先权在不久的将来的任何时候都是不大可能得到的，但是事实上，对于实地研究事业而言，越来越多的实地研究者强调信息提供者的保密性，这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除了保护被研究者之外，还有另一项考虑，主张以保密作为标准措施。在最佳状态下，社会研究者既非丑闻报导者，也不是调查记者——虽然这都是重要的社会角色。在我们的观点中，研究者的目标应当既不是去做道德判断，也不是进行立即改革，而是去理解。名字的隐匿或是假名的运用（如果名字有必要澄清），是协助分析者或读者聚焦于从资料中涌现的可归纳的模式，并避免偏离正轨，以免沦为仅仅是叙说或倾听“生动有趣的”人情故事。

大体上，许多因素决定了保证信息提供者的机密性成为民族志实地研究最重要的原则。然而，正如任何原则一样，有几个例外对思考是有益的。例如，一些研究者争辩道，当研究公共职责行为或研究大型的、强势的、有金融及政治的必要资金保护的组织时，确保机密性的确是不合适的，或者说是没有必要的（Duster, Matza, and Wellman, 1979；Galliher, 1980；Rainwater and Pittman, 1967）。另一些研究者争辩道，在对公共人物的研究中，这些公共人物已习惯了自己的言语被引用，并且他们更喜欢有人对他们的发言录音，保密性原则可能会阻止容易地获得丰富资料的进路（Spector, 1980, pp. 103-105）。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信，研究者有这样的伦理责任，使表达民主化，让资料提供者表达意见，以便他们可以为自己讲话，为自己提供详细说明，这不仅使得将他们伪装起来不可能，而且就某些状况、某些个人而言，使用真名成为必要之举。这种例子出现在米切尔·丹尼尔（Duneier, 1999）的民族志研究中。丹尼尔的主要信息提供者 Hakim，是其民族志中介绍的 25 名工作和生活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第六大街的人行道上的黑人之一，所使用的就是真名。不仅 Hakim 的声音在整个书中引起了共鸣，而且他的照片也在很多版面有特写，他还为这本书写了“后记”，甚至被邀请与丹尼尔一同出席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大学的研讨会（这种民主表达的其他实例，可参见：Scheper-Hughes, 1992；Rubenstein, 2002）。在这个和其他被称为“合作研

究”的实例中,信息提供者对研究的聚焦和目标的解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以丹尼尔的研究为例,他们可以被认为是研究团队的一部分,这样对清楚地证明身份是有利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陈述和报告的合作者。女性主义参与行动的实地研究正是这样的实例,在这样的研究中,考虑到信息提供者为了具有一些政治影响的体验和感受,不管这个影响是否与政府的政策有关,他们提供了清楚的身份证明,并且希望进行公开录音。丽塔·阿迪梯(Arditti,1999)对祖母的研究也是如此,这些人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是反对阿根廷政府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更具分散性的政客。南希·纳普尔和艾米莉·克拉克(Naples and Clark,1996)对儿童时代性虐待的幸存者的研究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实例表明,要不要明确地鉴定信息提供者的身份,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应该以研究的情境和目标为基础。

在做出任何保密的承诺之前,你可能会想要回顾这些论辩,以及你的学术领域及任何现行国家及地方法规对于隐私权的伦理规范。虽然这些“例外”对所有情境中不可避免的、合理的保密性原则提出了严肃的质问,但是我们相信:证明人名、地名对于社会科学实地报告,或者对于更广泛的科学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说法,这个重担就落在研究调查者身上。当我们心存疑虑时,最佳的忠告依然是:掩饰或模糊(disguise or obscure)。

在你千方百计终于找到取得资料的进路之后,必须致力于维持你的立场:也就是说,你必须处理好“融洽相处”的问题。这个主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

第4章 融洽相处

Getting Along

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观察到: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实地研究也是一样,被研究的情境很少静如止水。新的参与者或新的面孔通常出现在研究过程中。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人的行为可能突然改变,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通常不断出现,有些是平凡的,而有些是相当严肃的。因此,适时调整一直是必要的,许多实地研究成功的部分原因就是研究者能视自己的意愿和能力,适应他们所遇到的改变。至于大部分活动,在进入实地以前,都有一个计划,以增加目标达成的可能性。特别是,对所期待的东西有所了解、从别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预料陷阱的到来并防患于未然,诸如此类的做法,应当有助于把困难减少到足可掌控的程度。

本章叙述的目的就是使得实地研究的经历变得更容易掌控。我们在以下各节把"融洽相处"的讨论细分为四项任务:与自我相处、和成员相处、退出实地时的相处、与提出要求者和良知相处。首先,我们来关心研究者可能遭遇到的情绪压力;其次,我们要处理发展并保持可行的实地关系的问题;再次,我们要处理退出实地时的问题;最后,我们会讨论持续发生且必须勇于面对的伦理两难困境。虽然这四个任务是彼此相关的,但是为了详细阐明,我们会分开讨论这四个任务。

Ⅰ.与自我相处:情感的和身体的压力

身为实地研究者,可能在很多方面有备感压力的经验。就像

威廉·沙弗和罗伯特·斯德宾在《经历实地研究》一书中所描述的:

> 在人类为自身所设计出的、较不令人喜欢的活动中,实地调查工作理所当然名列其中。至少可以这样说,它常常会带来不便,有时让人的身体很不舒服,常常使人尴尬难堪,还多多少少令人情绪紧绷。(Shaffir and Stebbin,1991,p. 1)

沙弗和斯德宾认为,实地研究是例行公事般地不令人喜欢,尽管你可能对这种观点模棱两可,但是毫无疑问,它可能令你感觉不舒服,有时候很令人为难,有时候会产生半信半疑和焦虑的感觉(参看:Georges and Jones, 1980; Howell, 1990; Smith and Kornblum,1996;Wax,1971)。我们无法把实地研究者所遭遇到的所有困难加以分门别类,然而我们区分了四类情绪的和身体的挑战,相信这些事先警告可能有助于你"融洽相处":①信息超载的感觉,②欺骗与担心被揭穿,③克服距离的阻隔和放弃的倾向,④真实的身体危险。

A. 信息超载

一旦最初的进路得到了保障,那么体验信息超载的感觉就很普通了。有如此多的东西要看要听,所有的一切都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很有趣,从概念上或理论上讲也很重要。这是事实,不论在情境是全新的、不熟悉的时候,就像研究外来的宗教运动(Lofland, 1977; Rochford, 1985; Snow, 1993)或无家可归者(Dordick,1997;Rosenthal,1994;Wright,1997)一样,还是在情境是熟悉的时候,就像在研究某人自己先前的或当前的雇佣情况或者业余爱好(Ronai and Ellis,1989;Stevenson,1999)、研究某人的患病经历(Karp,2001;Kotarba,1980)或某人孩子的经历(Adler and Adler,1998;Fine,2001)时,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敏感或信息超载的普遍结果是对你的观察和记录容量产生怀疑,这可能会让你思考:"我不可能得到一切,有太多的事情正在发生。""我恐怕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内容。""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怎么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又不可能同时看清楚和听清楚一切!"

这样的想法表达了非常真实和十分普遍的关注点。然而，大部分的研究者知道，与信息超载的感觉相关的焦虑和怀疑不会一成不变，如果你能考虑两点：

- 对现象的兴趣或理论上的重要性都有可能反复的呈现。这是社会科学家要记住的一部分，他们断言社会生活的很多部分已经模式化了，甚至程序化了。对于实地研究者而言，这种模式化和程序化的实际结果就是，即使你曾经错过了一些内容，你也可能再见到它们。
- 正如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适当地开展实地研究包括长时间的、持续的卷入和持久的、系统的观察（Lincoln and Guba, 1985, pp. 301-305; Weick, 1985, pp. 568-569）。这样从事研究和观察，使你不可能忽视重要的模式，或掩盖你感兴趣的或重要的内容。

B. 欺骗与担心被揭穿

身为研究者的你正在欺骗你的研究受众，以及因这个欺骗的事实可能被揭穿所产生的焦虑，这种知觉似乎是身份未被知悉的研究者最典型的情绪压力情境。然而，从已出版的报告看来，身份已被知悉的研究者也体验到了这个感觉。如前所述，我们的记录对我们的兴趣和程序提供了一份完整而详细的描述。我们已经知道信息提供者经常忘记了最初的关于我们研究的身份和兴趣。因此，甚至对于身份已被知悉的研究者来说，担心直接的、令人不安的挑战就在眼前，这并不罕见。

- 当 X 告诉我那些事的时候，她是否还记得我是位研究者？如果答案为否，当她记起来的时候，她是否会生气或感到不悦？
- 我所访问的这个人似乎开始变得坐立难安，他是不是准备要询问更多有关我的研究目标的问题——多过我真正想现在就告知的部分？
- 我所研究的这个团体的负责人是否会留意到，我的研究旨趣从得到进行研究的许可后，已经有所转变？果真如此，他仍旧会同意吗？

在开放的和半开放的场景里,身份未被知悉的观察者也可能因为萦绕不去的关切,担心“有人会发现”而备受煎熬。即便这些场景里的人们在发现事实真相时往往并未感到不悦,这个消息不见得就可以让研究者安心。林恩·洛夫兰德在公众等候室进行观察时,一直隐隐约约地担心,有人会因为她持续、重复的在场而盘问她。她只有一次被盘问的经历(在机场里),虽然那位官员发现她是在进行研究之后,并不反对她继续逗留该地,她却感到非常不自在,甚至想马上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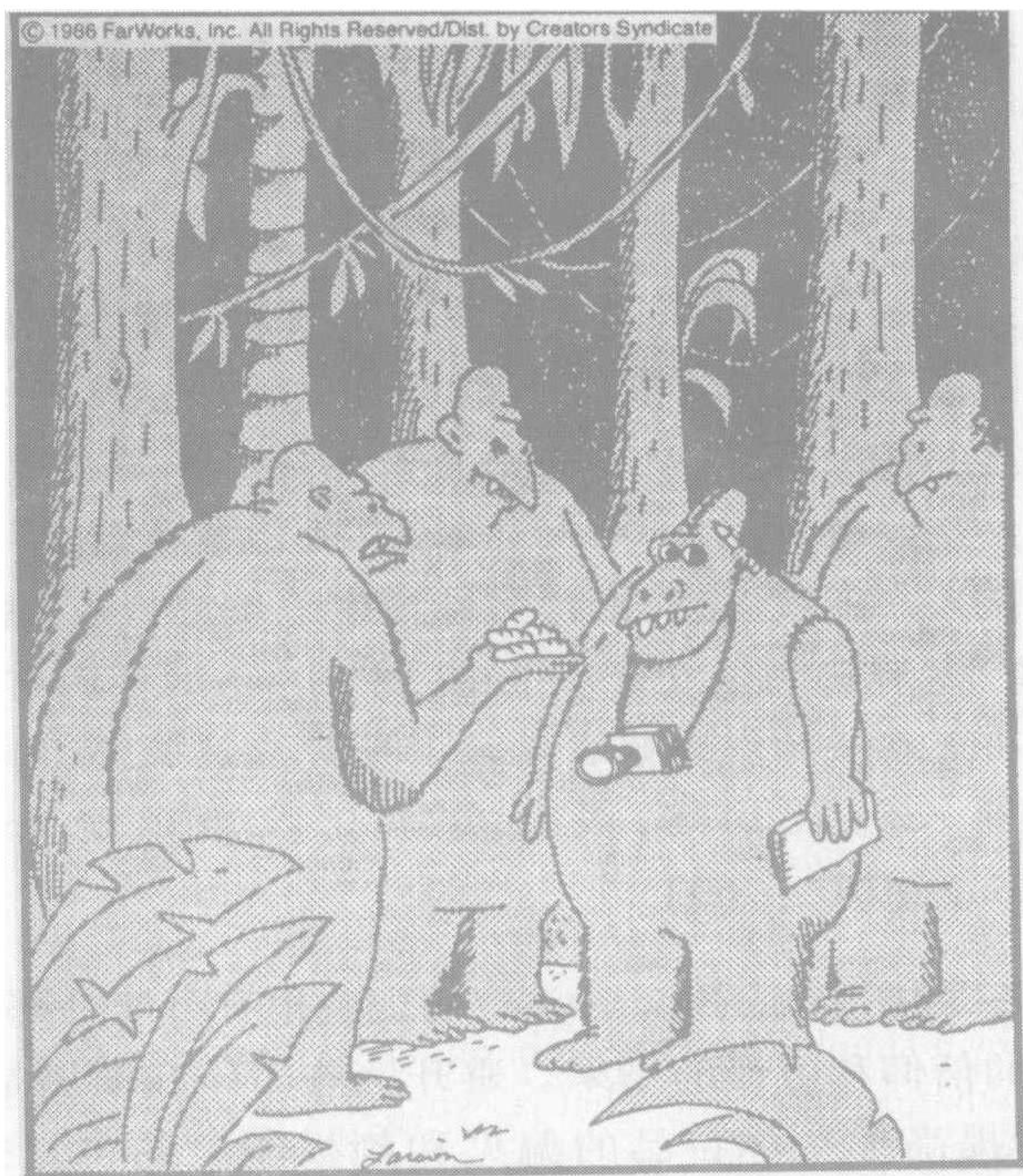
在封闭的和半封闭的场景里,身份未被知悉的观察者很少写到其对于欺骗所感受到的情绪压力以及对于被揭穿的担心。不过,从研究者欺骗情形较轻微的报告(例如 Klatch,1987)以及在“不经意的”非研究情境(间谍、未公开的同性恋者等)中的人们身上所得来的更直接的证据显示,对许多人而言,真面目被揭穿的担心以及对随之而来的羞辱、窘困与直接的挑战等种种可能性的担忧是不断存在的,而这份担心并非无的放矢。正如加里·拉尔森对于被揭穿的幽默描述,可能就是有压力的关系。

C. 远离和屈服

实地研究者对信息提供者及其研究情境的情绪和感情,可以在一个连续统中进行排列,从一端“极度的远离”到另一端“完全的卷入”或“屈服”,他们的情感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变化,有厌恶、排斥、同情以及认同。尽管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最典型的情感可能是倾向于某个方向,也许更精确的看法是,大部分的研究者在两个极端之间犹豫不定,这样就经历了多种情感体验。珀尔纳和埃莫森(Pollner and Emerson,1983,p. 235)在这方面就碰了钉子,他们注意到,“在许多层面上,真实的进行实地研究显示了一种在涉入和撤退、参与和分离的要求之间的慢性的紧张。”在此,我们讨论在这个连续统中不同时期的不同情感。

1. 厌　恶(loathing)

在这个连续统中最极端的情感就是厌恶,并伴随有撤退的愿望。很少有研究者坦承,他们对于其研究或访谈的对象心存厌恶。推测起来,会有这种感受的人相当少。毕竟,如果你对研究



远侧(加里·拉尔森)

“所以，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是吗？嗯，我猜你不会介意把这些甲壳幼虫嚼下去的，对吧？……实际上，我们想看你发出轧轧声，嗯！”

图 4.1　加里·拉尔森关于隐蔽的观察

对象的不适或厌恶如此确定和持续，你将会发现你很难隐藏你的真实感受，也很难有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好资料记录与分析。更糟糕的是，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信息提供者以及他们的同伴，并且这种感觉很坚定，那么我敢打赌，你并没有充分地接近他们，从而共情地理解他们的信念、情感和实践。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你的报告或“诉说”会充满着对他们的否定之词，你的表述是“他们不……”而非“他们是……”。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O. 吉尔林在《福克斯的表情》一书中曾警告过要当心这种危险：

> 从那些可能存在但没有列出姓名者的排列上,福克斯人和他们的邻居"艾奥瓦州人"的取名不属于同一类人。最多,福克斯人未被描述,还是让人难以了解,但是最糟糕的可能是,他们被人冠以否定的术语,是难以让人相信的……对他们的描述添上了他们是难以了解的、难以相信的底色,这种描述的真正价值是……零……当然,麻烦的是这种无以名状的描述如此容易,对观察者的要求不高。但是接近真相的方法是一个经验原则:一个人绝不用"他们不是什么"来描绘一个异域人。也就是说,无论何时描述一个异域人,像"不是"、"没有"这样的词汇或者像"un-"或"-less"这样的前缀和后缀不要出现在头脑中或落在笔端。警钟应该长鸣,因为很有可能这些人未被描述,或许留下让人难以想象的印象。(Hearing,1970,p. 69)

这种不予描述(nondescription)的现象很有可能是鄙视某些团体或人群的信仰和习惯的结果。避开这些团体和惯例是明智的,或者,至少提高你对你自己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自觉来接近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想过分强化这种警告。毕竟,如果将先前存在的厌恶感当作排斥一些团体或情境作为可能对象的理由,那么许多的实地研究,像内杰尔·菲尔丁(Fielding,1993)所命名的"不受爱戴的团体",就都不可能进行研究了。当然,凯思琳·布里(Blee,2002)也不会对美国各种各样的种族仇恨运动中的女性成员进行研究了。

请注意最初对预期的研究对象的厌恶感或诋毁并不必然阻止对该团体或情境进行研究,也不意味着研究者总是能够包容和控制那些情感,或者也不意味着有时候会在真正的研究情境中流露出来。这种情绪波动的范围也很难知道,因为研究者很少写出他们的消极感受。但是,也有例外。最著名、最直截了当承认厌恶心理的告白,可见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私人日记,它是以《一部严格意义的日记》(Malinowski, 1967)为书名出版的。这本日记是他在研究托布伦群岛居民(Trobriand Islanders)及其他群体时写下的,在这位享誉一时的人类学者过世多年后才出版。这本日记透露出评论者帕特里克·盖勒弗所谓的"极度缺乏融洽感"(p. 23):

> 更令人尴尬的是，他也承认藐视研究对象（“年轻女性，肤色黝黑，剃了头，其中一位……有着动物一般粗野的、肉欲的面孔。我一想到和她交媾的景象就会发抖”），不信任他们（“他们说谎，隐匿事实，让我发怒。我在这儿总是置身于谎言的世界”），甚至虐待他们（“我被触怒了，而猛揍他的下巴一两拳”）。（Gallagher，1967，p. 25）

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并不惊讶，马林诺夫斯基也承认想退出研究场景，即便不是完全从实地退出，至少也中断与“土著人（natives）”的接触：“他也再三坦承，自己长期把时间虚掷在阅读‘垃圾’小说上……且频频耽溺于性幻想及‘纵欲’行为中。”（Gallagher，1967，p. 25）

人类学者一直争辩，这些措词是否呈现出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其研究对象较为持久的感受，或者它们忠实而非常人性化地表现出，在极其困难的实地场景中一时的暴怒与厌恶。不论真相怎样，马林诺夫斯基直言不讳地呈现自我，这个做法无异于是对所有自然主义研究者强有力的提醒：进入研究场景的事实并不会把凡夫俗子转化成圣人。因此，你心里要有所准备，你有可能在实地碰到你所厌恶的人，并且要知道这种厌恶感将挫败你的努力，使得你情有可原地放弃你的研究对象。

2. 排　斥（marginalization）

排斥在实地研究的情境中好像表明了两种不同的感觉。首先，或许也是最普遍的，它是一种感觉，使你不能充分接近你的信息提供者以及他们的活动，从有利于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所从事的一切。当你还是一个“局外人”时，即使你希望并努力成为“局内人”，或者即使你想至少确保你获取内部人士观点的进路时，这时，这种感觉就出现了。不论是身份已被知悉还是未被知悉的研究者，他们在与某个研究角色或有利位置（vantage point）进行商议时曾面临困难或最后失败了，而这个研究角色或者这个有利位置能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导致研究者根据他们是什么而非根据他们不是什么来理解信息提供者，研究者在这种过程中都经历过这种排斥感。确定这样一个研究角色或者有利位置的难度最可

能源于没能发展与信息提供者之间和谐而安全的信任关系。社会学家认为和谐与信任是一种关系财富,这种财富在实地情境中是很明显的,当信息提供者充当通往被研究的情境或团体的向导并觉得相当舒服时,就容易暴露他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并且因为实地研究者对信息提供者的信任,他们也会有相应的对研究者的信任,因而也暴露出被他们省略掉的信息。未能与信息提供者发展和谐的关系或建立信任可能应归因于复杂的因素,包括:实地研究者的社会属性(如:年龄、性别、种族、民族)与被研究团体或情境的成员的失谐;与研究现场的有形距离,如:当安格斯·维尔(Vail,2001)研究他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康涅狄格大学上研究生时就认识的纹身艺术家和收藏家时,就遭遇了这种挑战;或者是尽管你已经承认了你是谁,但因为你没能中立地看待你的身份,以至于信息提供者归罪于你,例如奥斯汀的无家可归者所说的,他们最初以为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83)是专心于逮捕他们的"警察的线人",或是试图拯救他们的"宗教狂热分子",而不认为是他们自己所声称的价值中立的实地研究者。

排斥的第二种感觉存在于,当实地研究者不仅是"认识的人",而且是"积极的"或者是"完全的"成员时(参看 Adler and Adler,1987),他没能宽容地对待压力和期望,而从事更重大的委托事项的行动,如作证或者冒被捕的风险。巴瑞·索恩(Thorne,1979)经历了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当时,她所涉及和研究的草案抵制运动的成员被要求为某个行动负责,并可能被捕时,她叙述道:

> M.开始提出邀约时,我内心害怕得很。恐惧、羞愧与罪恶感——一方面想要加入在收到 M.的邀约之后而情绪沸腾的团体,另一方面有一股(更为强烈的)不情愿心理,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可以冒被捕的风险,而且我认识到,强迫我走上前去的压力来自于团体,而非个人彻底考虑后所产生的压力。不过,这样的认识并不能把情绪降到最低限度。群众开始离开他们的座位,走上前去。最后,似乎只有零零星星的人持续坐在位子上。M.通过麦克风做了评论:"似乎走上前来的人比呆在下头的人还要多。"我觉得,所有的视线都落到我身上;我十分确定自己的脸胀得通红;我发现自己摸着皮

> 包，几乎准备好逃离现场。但我没有。……这个团体（考虑到其规模和团结性时，它更像一个社区）聚拢在一起，连教堂前廊及侧廊都挤不下了，明显地与留在座位上的、零零星星的、涣散的我们这些人形成分别。教堂空间上的安排，把献身活动者和置身事外者的分歧戏剧性地呈现出来。（1979，p. 80）

虽然这么戏剧性的时刻突显出作为参与观察者的困难所在，然而，排斥感经常被体验为长期的孤寂、焦虑甚至疏远。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分离感可能持续不断，它往往是难以捉摸的，而且总是令人感到痛苦的。这就好像某人每天都被告知："你人在这里，而且你对我们知之甚详，但是你并非真的是我们的一份子。"

然而，源于前面所述的两难状况的排斥感不应该被解释为自动的或者自然而然产生的。许多成功的实地研究就是由种族、性别或者年龄都和被研究者不相同的研究者完成的，正如第 2 章所述。同理，有形的距离可以通过协商得到解决，如维尔（Vail，2001，p. 710）所为，可以通过安排"许多简要的、深入的田野浸入"（到旧金山和奥克兰去）来达到。如果本地人/内部成员的身份属性与实地研究者的兴趣相反，也可能需要回避，有时候也可以通过提供引起共鸣的反面解释，技巧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当发生的结果没有预料到，从而导致成员重新评估他们先前的属性时，这个问题也可以偶然得到解决。斯诺和安德森在研究中就经历了这样的偶然转折点。当时，安德森被逮捕了，和两个流浪汉被监禁了一个晚上，尽管在那晚以后斯诺保释了他，但是，这次逮捕和监禁使得上文提到的流浪者相信他们两个既不是警察的线人又不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好家伙"，从那以后，这些人变成了他们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和自发的"保护者"，这样，斯诺和安德森先前的那种被排斥感淡化了。从事与某个团体或事业的重大责任行为有关的研究的研究者都经历过社会压力，为了不被团体排斥，他们发现了成功化解压力的方法，正如罗布·本福德（Benford，1987）在和平运动的研究中所做的一样。

尽管上述案例表明，实地研究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潜在的受

排斥的局面,但是,设想这种受排斥的危险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感觉,因此你对其表征保持警惕也许是很明智的,例如作为局外人的感觉,不能得到合适的信息的感觉,甚至是与被研究团体或情境疏远的感觉。这些感觉不仅可能导致对某人的看法心存偏见,而且这些感觉的持续存在甚至可能滑向厌恶的一端,正如这些我们怀疑的情况已经发生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中一样。

3. 同　情(sympathy)

正如从事实地研究可能强化或者产生未曾预料到的对信息提供者的蔑视或排斥的感觉一样,从事实地研究也造成了强烈的对被研究者的同情。每个地方的民众时常经历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或困境,调查者对其研究对象提供某种形式的世俗协助,这是很平常的事,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但有时候,研究者将遭遇到更为棘手的需求情况——被观察者或被访者面对重大困境,需要研究者全时的投入以求缓解。自然主义研究者(不论身份已被知悉或未被知悉)往往得为了个人感到痛苦的问题而挣扎:是在进行研究这件事情上认输,转而全心全意致力于"提供协助";还是继续待在场景中,把种种困境记录下来,正如卡罗琳·艾利斯(Ellis,1995)与她的合作者所做的一样。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引起争议:同情是否得为认同让路。

4. 认　同(identification)

认同你所研究的人,或者至少认同你所感兴趣的情境、组织或社区中的小群体或小派别,使你能更接近于远离/屈服(distance/surrender)连续统中的屈服一端。这样的认同远不止对你的信息提供者抱有同情,因为你以票面价值(at face value)拿走了他们的记录和叙述,或许甚至内化了他们的观点。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你很难退回来并且用冷静的、"客观的"方式评估你所听到的和观察到的一切。质性实地研究的观察者曾长久地、苦苦地警告过被称为"过分和谐(over-rapport)"、"过分认同(over-identifying)"和"皈依(converting)"的认同威胁(Gold,1958;McCall and Simmons,1969;Miller,1952;Schwartz and Schwartz,1955;Vidich,1955)。实际上,实地研究者中就转变皈依的危险的讨论

看似是与实地研究相联系的知识的一部分，然而，很少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有许多或者甚至是任何一个民族志工作者曾经转变皈依。我们猜测对此的关注和趋势有时候是误读了我们的同仁，因为这使得我们不能区分富有同情心的认同和过分的认同。前者涉及对信息提供者的内心生活和实践没有采用他们的观点或者看法就形成了无判断的理解；而后者则采用他们的观点或者将他们的观点内化，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观点。两者的区别在前面提到的凯思琳·布里对种族仇恨团体中女性的实地研究中有很好的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对她所采访的女性获得了同情性理解，“用更复杂、不那么老套的方式看着她们”，但是从来没有接近到采用她们的观点的程度(Blee，2002，p. 15)。

尽管实地研究者例行公事地抵挡了转变皈依的拉力和压力，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从有利于信息提供者的角度单独地呈现他们的研究结果。当然，一些实地研究者提倡这么做，正如在最近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就对被研究者表达了“深深的尊重”、“完全的同情”和“可信的关怀”(参看第 2 章Ⅲ. D 部分)。但是不管你是否赞成这种做法，在你从实地场景退出以后，当你坐下来做简短的记录时，你很有可能倾向于从信息提供者有利的角度来反映事实。正如斯诺在叙述他将实地笔记转换成学术论文最初所付出的努力时所说的：

> 每当我开始将我的笔记从 Nichiren Shoshu 分类转换成社会学类型时，我发现自己对此不断质疑，这么做对他们的意义系统是否公正呢？我的组织方式是否正确呢？等等。(1993，p. 20)

斯诺和其他民族志研究者还发现，时间的流逝通常为评估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从学术的观点来看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内容提供了必要的距离。

这种观察回到了我们在本节开始时所说的内容：像远离和屈服这样的极端情感掩盖了与大部分实地研究相关的情感的复杂性。不仅大部分研究者报告了他们混合的、狡猾的、矛盾的和复杂的情感(这一点在克雷蒙和寇普(Kleinman & Copp，1993)的作品中对实地研究及其情感的评论中描述得很清楚)，而且我们怀

疑大部分研究者也经历了正在进行的处于远离和屈服之间的紧张情绪。事实上,我们相信这样的紧张情绪能够被看作是一个指标,表明你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是“做得正确”的。因为,没有这种情感就表明存在极端的远离或极端的屈服,以及与这两者相关的视角上和分析上的偏见。

D. 身体的危险

在与自己融洽相处的标题下,我们所关注的是与实地研究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压力,这些压力根植于步骤、伦理、政治定位以及社会科学的标准之中。不过,压力还有另一个来源,即重大的身体风险。在许多引人注目的实地研究中,身体伤害的威胁是研究情境中最重要的特征,与不同种类的情境、团体或亚文化这几个因素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有关。你身在充满冲突和暴力的地区,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集体的暴力是每天都持续存在的图景。例如,美国许多城市的某个地方或临近地区,是以高犯罪率以及与“帮派”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而备受瞩目的(参看:Anderson,1999;Horowitz,1983; Sanchez-Jankowski,1991;Vigil,2002)。此外,在世界上有很多地区,团体间的冲突是一种地方病(endemic)。但是,如果你希望理解这种暴力的动力学,“你必须深入暴力发生的地方,进行实地研究”(Nordstrom and Robben,1995,p. 4)(实例研究包括:Scheper-Hughes,1992,2004;Mahmood,1996;Coy,2001;以及诺兹特洛姆和罗本的研究报告《火焰下的实地研究:暴力与生存的当代研究》(Nordstrom & Robben,1995)。

民族志研究的另一个场域就是政治和宗教极端化的团体,在这个场域中,身体伤害的威胁是相当明显的,不仅环绕着对暴力的花言巧语,而且要有所准备甚至有时候要去实践之。先前提到布里(Blee,2002)对仇恨团体中的女性的研究过程,她对所经历的恐惧进行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就阐明了她受到攻击的感觉:

> 在研究的早期,我就体验到了很多恐惧。我所要采访的这些妇女包括被其同志称为“Ms Icepick”的理平头的组织者,她们以暴力而闻名,这使得她们不用做什么就驱散了我

> 们的关注点。当我逐渐了解了这个种族主义的世界以后，我变得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在其他方面，由于我变得不那么幼稚，我变得更害怕了。一方面，我逐渐了解到我白色的皮肤不能给我提供保护，许多种族主义激进分子曾面临罪恶的掌控，他们被其他的白人出卖了……并且……(因为)一些种族主义者将种族视为白人政治所承担的义务而非遗传学因素，因此我不能设想我采访的那些人会视我为白人还是非敌对人员。我不能指望种族豁免权使自己免受暴力。(2002，pp. 14-15；也可参见：Mitchell，2002)

危险存在的第三个场所包括涉及违法活动的情境，很多情况下是贩毒和吸毒。关于与贩毒和毒品走私相关的危险，帕特丽夏·阿德勒在中产阶级社区进行了研究，她写道：

> 由于他们吸毒过量，毒品经销商和毒品走私者对我们(阿德勒和她的伙伴)或者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特别善变、恶毒，而又毫无征兆。由于面临警察和其他毒贩的危险，他们的行为十分古怪。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喜怒无常，他们在信任我们和怀疑我们之间犹豫不定。
>
> 在不同的时候，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研究录音带。我们遭遇了几次威胁，这些威胁来自于同意了我们采访的人对我们收集录音采访资料不放心……当面临威胁的时候，我们非常害怕，不断改变录音带的隐藏地点，我们甚至在一个雨夜冒险前行，将录音带捆扎在一个手提箱里，在一个秘密地点将录音带交给一个与研究毫不相干的人，以便他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好录音带。(1993，pp. 22-23；也可以参看：Agar，1973，Bourgois，1995；Gould，Walker，Crane，and Lidz，1974；Williams，1989)

最后一个以潜在的危险升高为特征的研究现场与私人的、寻求刺激的商业娱乐活动有关。这种活动的普及使得他们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研究焦点，虽然以刺激为导向的商业有时候被夸大了风险，但是运用参与观察法来研究这些活动，像登山(Mitchell，1983)、跳伞(Anderson，2003；Lyng and Snow，1986)、赛车(Lyng，

1998)、激流漂流(Holyfield,1999;Holyfield and Fine,1997;Holyfield and Jonas,2003;Jonas,1999),只有蛮干的民族志研究者才会对这种潜在的风险充耳不闻。与这些寻求刺激的娱乐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志愿者以及此职业的副产品,他们的实践者置于危险之中,正如詹妮弗·洛伊斯(Lois,2003)在对山地搜索和营救组织的实地研究中所描述的一样。

我们能够提及很多的实地研究者,他们能应对危险环境下的挑战,这表明在这样的情境下,民族志依然是鲜活的、适当的。只要潜在的危险持续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些研究者还是很有可能将他们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的。虽然有时候研究某个特别的团体或情境时十分危险,导致研究者从实地退出,但是很明显,一些研究者还是十分乐意将自己置身于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中。

E. 处理挑战

面对种种可能的情绪的、身体的挑战,你该怎么办?正如我们最初所说的,光是知道这些可能性就可以降低其冲击性,况且冲击并非无可避免。你可能转而做出结论,认为自己不值得为了研究而与欺骗被揭穿的担心共舞,因而坦诚以告并退出现场。你可能下定决心,认定继续与你讨厌的人有所关联是无可忍受之事,或者因为你所感觉到的排斥感让你觉得继续呆在实地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你可能感觉到,研究对象的需求比所有其他承诺都重要。你甚至认为,和被研究团体的深交,胜过和其他研究者的同事关系。但是,不论你发现自己正滑向远离/屈服连续统的哪一头,我们都鼓励你:第一,不要退出或被收买;第二,记住,你所经历的压力最终可能是你获得更多的、引人注目的分析洞见的重要起点。

实地研究者多年来程式化地面临着这种压力,有各种各样的途径鼓吹提供减少这些压力或更有意义地解决这些压力的方法。在第2章(第Ⅲ.D部分)简要提到的参与式行动研究,作为"激进的能动主义社会研究(activist social research)类型,其研究对象或预期的研究受益者,可以实质掌控及参与研究"(Cancian,1993,pp.93-94;也可以参看:Stoeker and Bonacich,1992,1993)。在此类

型中，人们辩论的是，研究者对探究和远离的担忧可以被消除，因为调查者和场景参与者携手合作，为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找出答案，研究与提供协助两者因而可以兼得。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女性主义民族志试图通过发扬对被研究者的认同并避免欺骗他们的方法，以减少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权力的不平衡，虽然这样的方法突出了伦理关注点和权力的不平衡，但是许多实践者（Cancian，1993，Hammersley，1992）逐渐觉得在实地研究中压力和紧张还是不可避免的。女性主义社会学者朱迪思·斯泰西是这么写的：

>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共有的观点是，民族志特别适用于女性主义研究。……（然而我的民族志研究）将我置于不真诚、不同和潜在的，甚至无可避免地会有所背叛的情境中，如今我相信，这些情境是实地研究方法里本来固有的。……实地研究资料提供者与研究者分享的悲欢离合，到头来都是资料，是民族志磨坊的谷粉，而这座磨坊确实具有碾磨的力量。（Stacey，1988，pp. 22-23）

我们相信这里所得出的教训并不很多，以至于认为实地研究是一种并不完美的方法，但是，从事实地研究要求面对一系列的紧张情绪，并且要努力找到平衡和处理这些情绪的建设性的方法。关于这一点，民族志研究中记录了一条特别的建议：和研究同伴或一些可以讨论这些问题、掌握来龙去脉、权衡轻重得失的朋友们保持联系。的确，以团队为基础的实地研究的诸多重要优势当中的一个就是，这种研究为单个的实地研究者提供了同伴，而这些同伴不仅可以与研究者分享研究中的情境、个人以及团体的兴趣爱好，而且他们可以积极地参与到研究中去。斯诺和安德森在对无家可归者的研究中发现这样的实地研究团队特别有用，安德森担当无家可归者中参与观察者的角色，斯诺充当更分离的观察者的角色，斯诺偶尔加入到安德森的场景中，但又持续不断地对他的实地活动、观察和笔记进行监测并做出反应。正如他们所写的：

> 很少有一天或一个傍晚不要听取报告，这个报告包括实

地经验的讨论、方法和理论的含义以及接下来的详细外出计划。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设定这两个角色,让我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离,因此使得民族志研究的“远离/屈服”的辩证特色易于掌控。(Snow and Anderson,1987,p. 1344)

那么,团体实地研究的效用之一就是提供了一个平衡的支点,让情感连续统上的远离/屈服这两种极端的情感压力相互抵消。我们的猜测是,如果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屈服于厌恶感的实地研究者也融入到团体实地研究当中,那么,他们不大可能经历那样的鄙弃,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宣传者将他们的安排定期地,或不断地告诉信息提供者。日记清楚地提供了你的感情和思想的出口,但是它不能给你提供平衡的观点和声音。

Ⅱ. 和成员融洽相处:发展和保持田野关系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实地研究的特点受到各种情绪、对研究者身体的压力以及处理研究方式的影响。但是,对于正在进行的实地研究,没有什么比发展与被研究场景或情境中成员的田野关系的数量和类型更为重要的了,这些人既是主人又是你的研究对象。田野关系对实地研究质量的重要性源于至少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能否亲密地进入到由意外发生的事件、活动和日常事务所组成的任何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应视与一个或多个场景中的成员的田野关系而定,这些人充当通往与那些意外发生的事件、活动和日常事务有关的组织或视角的“向导”。第二个因素就是与不同人的不同关系在不同的时间里处于不同的位置,在情境中就很可能产生不同的观点和理解。例如,理解任何一个特定的学校,不论是什么年级,取决于是否从学生、老师、行政部门、家长,有的时候甚至是更广泛的社区等方面接触和探究。

了解了田野关系对所见所闻的重要性之后,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发展和保持这种关系的策略,然后讨论控制亲密度的策略。

A. 促进发展和保持田野关系的策略

正如第2章所言,尽管田野关系的特点受到实地研究者的角

色（例如，身份已被知悉或未被知悉，局内人或局外人）以及研究者的属性和性格的约束，但是它们并不能决定田野关系的发展，否则，就没有必要反复声明田野关系要不断地协商了。这就暗示为了协商可行的田野研究关系，实地研究者可能有自由活动的场所或范围，也就是说，有可能通过学习使关系或联系最优化。但是，实地研究者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从而最有可能找到研究信息呢？更具体地说，实地研究者有哪些策略可供使用呢？一手的实地研究专论和二手著作综合了这些原汁原味的作品，记录了各种各样如何利用相关的进路和促进与信息提供者的和谐或信任关系的策略（参看：Adler and Adler，1987；Douglas，1976；Johnson，1975；Smith and Kornblum，1996；Wax，1971）。大部分作品可以被当作直观的、可替换的策略变种。

在考虑这些策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在研究过程的不同点上，你有可能会面临不同的关系压力。对于这种压力，早期的做法是发展关系，让你全方位地暴露在情境和成员的观点面前，以便你可以获得对那个社会世界的共情的理解。这就意味着你要相对靠近之前所讨论的情绪涉入连续统的屈服一端。但是，如前所述，你也要能随时撤出，以便获得对你所了解的和所做的事情更为宽泛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将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又要不被排斥或充满厌恶感。这样，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在不同的时候，你要面临亲近和远离的挑战。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克服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因为离心力会让你与有助于理解研究情境的事件和信息来源产生太远的距离；而有时候，你可能发现自己不得不遭遇向心力（centripetal tendency），向心力把你拉得太近，遮蔽了你的分析能力，耗尽了你的激情，引发了没有必要的伦理或政治因素。我们在对直观的和可替换的策略的讨论中会考虑这些离心力和向心力。

1. 呈现策略（presentational strategy）

呈现策略包括有意识地试图创造和维持一个适合个人旨趣的特定身份或情境定义（Goffman，1959）。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呈现策略对目标达成有时候是偶然的。在质性研究中，以许多实地研究者累积的经验为基础，有几个明显的自我呈现（self-

presentation)的方法,这些方法被认为是特别有效的,包括不具有威胁性的行为、策略性的能力不足以及选择性的能力。

(1)不具有威胁性的行为(nonthreatening demeanor)

在上一章关于获得进路的论述中,我们认为用谦恭的方式有助于研究者入场。当然,这种平民的智慧也可以延伸到发展和保持可行的实地研究关系之中去。但是,在这里不只是保持谦恭这个问题,还要确保你所使用的方式没有威胁到你所试图了解的人,或者确保你能得到某种形式的帮助。因此,发展可行的实地研究关系,要记住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尽可能地不具有威胁性。我们所谓的威胁主要不是指身体上的威胁,当然,在研究的情境中也没有练习使用这种威胁的道理。相反,我们指的是敏感的威胁,比如通过争辩、奚落、嘲弄、漠不关心等手段,威胁对方的信念、实践、现有的社会安排,甚至自尊。正如布鲁斯·伯格(Berg,2004,p. 103)对他所命名的"看戏似的访谈(a dramaturgical look at interviewing)"中所说的:

> 如果你要人们敞开心扉和你谈论他们的感觉和观点,你必须避免做出否定的判断——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一些可以看得到的暗示。达到此目的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对方的身份和看法;避免对他们的行为、信念或者生活方式做出判断,即使是在心里也不要这样。

或者,正如芭芭拉·舍尔曼·海尔(Heyl,2001,p. 370)简洁的表达:"好好地、谦恭地听着。"在大部分质性研究的场景中,调查者用支持的、热忱的、感兴趣的、不争辩的、有礼貌的、善解人意的甚至是同情的方式,会比用相反的方式获得更多的信息。

然而,这个忠告在执行上可能远比各位想象的要困难。想想看,在日常互动中,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往往更有兴趣诉说而不是倾听,更有兴趣告知而不是学习,更有兴趣说服而不是理解,或者在"不受爱戴的团体"中做研究时,像凯思琳·布里通过女性成员的眼睛、体验以及声音来研究种族主义者仇恨团体那样,要考虑到谦恭和不具威胁的做法的难度。但是凯思琳用谦恭的、不具威胁的态度,在与她们面对面时,开放而坦诚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她

做得相当的成功。她告诉我们,"从一开始":

> 当我问她们我能否访谈她们时,我就申明我并不参与这些团体的种族罪恶活动。我明确地说我的观点和她们的观点相当敌对,她们不要期望把我的观点转换成她们的观点,但是我试图精确地描述这些女种族主义激进分子。我展现了我的批评的立场,但是又申明我不打算把她们描述成疯狂的形象,也不打算把她们提交给法律执行部门或精神病院。(Blee,2002,p.11)

不具威胁性也意谓着,对合适的衣着打扮感觉敏锐而且很在意。当然,所谓合适,取决于研究者作为一个人和场景本身之间的关系。四十岁的研究者在观察青少年时,若是仿照青少年穿着的话,无疑会让双方都觉得滑稽可笑。相反地,牛仔裤加衬衫这样的日常学生打扮,在访谈企业经理人的时候也是不得体的。正如莫里尔(Morrill,1995,p.230)在访谈要露面时,他清楚地知道要"穿上……西装,只带上一个皮革笔记本和一个小型录音机。"但是,这种场合你也需要运用常识,特别是你想要以身份已被知悉的调查者的角色出现时,不要让你的穿着打扮与你所申明的研究者身份相矛盾。外表衣着打扮的主导原则是,显现个人对自己以及主人的尊重,并与自己的身份相吻合。

(2)可接受的能力不足(strategic incompetence)

从定义上来说,自然主义调查者几乎就是一无所知的人。他是"无知的",需要被"教导"。这种观察者及提问者的角色亦即典型的学生角色。如今,无知的学生需要加以教导的想法,已经是共通而普及的观念。几乎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觉得他们知道而且也了解这个角色。因此,采取社会可接受的能力不足这种角色的调查者,多半会被接纳。调查者被视为比较缺乏能力时(虽然在其他方面仍然是诚心诚意且容易相处的),就很容易扮演起需要被教导的角色。这种人必须被告知,他们不会因为被别人指导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或者被"上了一课",而感到被冒犯。也就是说,这种人站在有利的立场,让信息流不绝而来。

在许多其他场景中,可接受的能力不足这样的角色会形成阻

碍或危险(例如:Crist,2001;Gurney,1985;Nordstrom and Robben,1995;William,Dunlap,Johnson,and Hamid,1992)。然而,对于那些置身适当的场景中的人,或者那些能够忍受自然主义研究者的大致样貌的人,即一位不具威胁性的学习者,其在信息获取上所得到的回报相当可观。你应该记住成功运用呈现策略的典范,是著名的侦探阿加莎·克莉丝蒂(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女作家——译注)笔下的赫丘勒·白罗以及由彼得·福尔科所扮演的电视角色"Columbo"。为了获得帮助并消除和他们所审问的人的警戒心理,他们通常假装无知和滑稽。

(3)选择性的能力(selective competence)

虽然实地研究者发现,突出他们的无能或无知很有用,以此作为他们从信息提供者那里获得引导和解释的方式,但是对于特定的研究情境、场景、问题和关系,可接受的能力不足的优势可能受到限制或者无效。在有些情境和场景中,为了争取获得信息提供者更多的时间和关注,以及获得各种资料的渠道,突出被选择的人的信任力或能力反而更有用。正如我们所见,在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中,通常有守门人,他们作为通往个人、情境以及代理机构的门卫,在这样的情境中,突出一个人的专业信任,可以打开本来可能关上的大门。例如,鲁斯·霍洛维兹(Horowitz,1995)接触一个少女母亲福利工作项目时,她的学术身份以及守门员希望她作为这个项目的评估研究人员的愿望,对她获得进路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参看:斯诺等(Snow,Benford,and Anderson,1986)对"信任专家(credentialed expert)"这一角色的讨论)。

在其他的情境和团体中,为了使信息提供者觉得舒服,与你更接近,展现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是很有益的。例如,当托马斯·卡尔豪恩(Anderson and Calhoun,1992)向年轻的街头男妓展示他已经理解了男同性恋亚文化的某些方面时,他与他们之间的友善关系得到了提升,他们也更加愿意回答他的问题。詹森·吉莫森(Jimerson,1996)在研究篮球比赛时,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部分依赖于他作为业余篮球运动员的胜任表现。詹妮弗·洛伊斯(Lois,2003)发现,虽然她缺乏营救的能力,但是当她展现了她有从事这项活动的体力时,还是被她所研究的搜索和营救组织的成员接纳了。在此,大致的观点就是,虽然强烈建议研究者设想自

己是一个研究新手，在实地中扮演缺乏能力的角色，但是有时候在情境中突出特定的个人品质也是很有帮助的。

2. 交换策略(exchange strategy)

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指出的，调查者之所以能够进行研究，只是因为场景中的民众同意接受观察或访谈，或者他们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不知情。因此，交换或交易的议题是自然主义过程中的合理组成部分，不过对于所有情境中的所有研究者来说并不都是同等适当的。封闭场景中的身份未被知悉的研究者，已经通过扮演私人或准私人场景中的角色，而对各自的场景做出贡献；而在公众场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半是不相干的。但是，对于一位身份已被知悉的观察者，场景中的成员和可能的被访者有十足的理由来问：我能得到什么作为回报？交换条件是什么？在实地研究者中，最常见的答复是某一种类型的世俗协助。有时，这种协助是短暂的，例如观察者通过"见证"其活动来"认可某一道德群体(ratify a moral community)"(Bosk，1985)，或者访谈者真心聆听信息提供者谈谈他们想要诉说的事情，凯思琳·布里访谈许多女性时就是这种情况。当布里写到为什么种族主义妇女愿意对她倾诉时，她说：

> (许多)任何人看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对一个白人而且又是外人来讲述她们的种族政策……她们对我感兴趣，因为我不是一个潜在的皈依者，而是一个对她们的生活和思想进行记录的人。她们的愿望是在她们所属的这个小型种族主义团体外，有一个私人的、贤明的福音主义者来倾听和记录她们的话语。(Blee，2002，pp. 10-11)

更普遍的做法是，访谈者和观察者也可能用更具体的条款来作为交换条件：让人搭便车或提供贷款、传递讯息、请喝咖啡、给予建议和意见、保管非法物品、提供身体护卫、说谎话，等等，其做法遍及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中一般的正常"友谊"关系的范畴。举例言之，鲁斯·霍洛维兹(Horowitz，1986，p. 416)告诉我们关于她所观察的青年帮派时说："当雄狮党的一名成员身陷囹圄时，我不但对他的获释略尽了绵薄之力，而且因为只有我超过二十一

岁,是我签字把他保出来的。我被要求开始拿出小额款项给这个帮派作为买酒基金……。”同样地,皮埃雷特·洪达格留-索特罗(Hondagneu-Sotelo,1994)在她为期一年半对旧金山一个墨西哥移民行政区域的研究过程中,提供了她的帮助,只是提供帮助的范围比较广泛:成为一个社区积极分子或一个私人的协助者而提供交通便利;帮助移民收集文书,准备为他们在新立法下的合法移民身份提起诉讼;帮助他们就业;对他们的个人及家庭问题表示同情。凯西·卡麦兹在对慢性病的研究中,用类似的笔调写了自己参加:

> 几次我所访谈过的人的婚礼及追思礼拜……我和年长女性一同喝茶,拜访年长男性,欣赏这些人的配偶、孙辈和男友的照片……而且会见了家庭成员、朋友及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Charmaz, 1991,p.274)。

在前述的每一个研究中,研究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并不奇怪,被研究的民众或者团体,奇卡诺人的帮派成员、墨西哥移民、慢性病患者及他们的家人,所有人都有不言自明的需求。但是对于成员的需要并不如此明显的团体或情境的研究该怎么办呢?比如对上流社会或者职业结构的研究。在此,有进取心的实地研究者依然发现有可供提供的东西和服务。查尔斯·博斯克说,他为外科医生们服务,他们就允许他作为“额外的帮手”或“一名勤杂人员”四处闲逛。他告诉我们,“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对于打开包扎的绷带、找回表格、从储藏室取物件等工作十分精通”(Bosk, 1996,p.137)。但是,对于公司的行政人员,他们可以获得广泛的秘书网络提供的帮助,我们又可以提供什么呢?很明显,没有很多帮助可以提供,但是莫里尔的确想出了两种“服务”可以与预期的信息提供者进行合作:“对他们的组织进行了大致的观察后进行公开的介绍以及……与任何一个被观察的信息提供者进行私下的‘长处和短处’的介绍”(Morrill ,1995,p.238)。尽管很少有组织在莫里尔离开时获得了这些帮助,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帮助会为随后的合作扫除障碍。

尽管不是很普遍,但是帮助仍然可以采用更为秘密的物品和服务的形式。比方说,威廉·怀特在意大利社区做参与式观察

时，曾经在一次单一地区性选举中投票四次（一次用自己的名字，三次用假名）（Whyte，1993，pp. 313-317）。在实际的实地情境中，你必须自己决定，要如何划一道帮助的界限。怀特经过反思，否决了这种帮助行为的适当性。他逐渐意识到，你无需为了被研究对象所接受，而去做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事实上，不同的团体在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标准或者期待，实地研究者最终必须让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道德标准相一致，或者甘愿冒“怀疑自己究竟是哪种人”的风险（1993，pp. 316-317）。

因此，你必须划一道合适的界限，以确保你所说的或者所做的能交换到信息或者机遇。你必须限制交换的种类。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你不能在某些交换种类中优先使用某些策略。这不仅是为了交换到进路，而且是发展和保持可行的实地研究关系的方式。

B. 控制关系亲密度的策略

如前所述，在研究过程的不同点上，你可能面临不同的关系挑战。在研究的初期阶段，你可能专注于建立田野关系和亲近被研究对象。而在其他时候，随着研究的发展，为了对你所了解的和所做的事情有更广泛的视角，你必须后退。此外，田野关系要求有界限，限制相关的权利、义务和期待。太过亲密的关系可能阻止研究，因为这会被（别人或研究者自己）定义为非研究关系和身份。虽然在有些情况下（例如：Lois，2003），民族志研究者既能拥有浪漫的关系，又能进行成功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者会试图避免这种纠缠。同样地，研究者趋向于拒绝成为他们所研究的团体的完全成员，尽管他们很努力地掩饰这种想法。

虽然许多研究者已经写下了他们用来获得和谐和亲密关系的策略，但是，很少有人也同样地关注保持关系的界限。埃莫森和鲍尔纳（Emerson and Pollner，2001）从研究著作中精选了几个相互作用的策略“可供参考”，包括先发制人（preempting）、技巧（finessing）、拒绝（declining）和退出（withdrawing）。

1. 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是指在开始研究前使研究者的意图深入，以挡住不

需要的意图被包含进来。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的,"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当然,预防需要对潜在的问题有某种程度的先见之明,这一点并不总是可能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有三个潜在的普遍问题,需要许多民族志研究者对此开展评论。这些问题是:不必要的浪漫或者性骚扰、被拽入非法的或暴力的行为中、信息提供者对研究者的依赖或物质剥削。

对控制田野关系的亲疏和设定界限来说,最广泛讨论的问题或许是女性所面临的不必要的浪漫关系或性骚扰。许多女性研究者有时候试图在外表上将性别特征降至最小,以避免来自男性的不必要的要求。格温·多迪克(Dordick,1997)正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当时她在曼哈顿的一个大型的流浪者避难所做研究,与霍洛维兹(Horowitz,1986)及其芝加哥同伴一起做研究的情形一样,除了降低在服饰方面的性别特征外,几个单身的女研究者还声称她们已经结婚了,或者根据当时的研究环境进行装饰打扮。例如,在某个流浪者避难所开展实地研究的初期阶段,在遭遇了研究者不欢迎的行为后,丽贝卡·阿拉亚利(Allahyari,2000,p. 17)写道,"为了避开(进一步的)骚扰……当我们进入场景时……我表达了我要长期从事该研究的承诺。"骚扰的强度和坚持程度可以相当地不同,在有些情境中,可能达到不能容忍或折磨的程度。当格温多林·多迪克在曼哈顿最大的男性避难所面临这种性骚扰时,她说她觉得实施了更加极端的先发制人的行为。每次到避难所去访谈无家可归者时,她都不得不绕过避难所门卫的交叉攻击,这些人对性别的谈论变得日益"绘声绘色",他们十分夸张地"声称自己能'使(她)快乐'"。她最后决定"来势汹汹地回来面对他们",对任何进一步的折磨先发制人。

> 当一个门卫建议我"吮吸"他的"阴茎"时,我告诉他似乎自己做会更好。当另外的人告诉我他想要"舔我的阴部"时,我就问他,他的鼻子是否能够到他的阴茎。这种粗俗不堪让我赢得了门卫以及在言语上和我唇枪舌战的流浪者的尊重。我既不会被认为是很天真的,也不会轻易被胁迫。(Dordick,1997,p. 111)

实地研究者有时努力先发制人的第二个问题是,被暴露或者甚

至被拽入违法的或暴力的行为中。虽然能目睹这样的活动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有种种回避这样做的理由，包括不希望变成犯罪活动的同谋，或者不希望因为有一手的资料之后又要被传唤。例如，一些帮派研究者就与被研究的成员划定了界限。桑科兹-简科夫斯基有一次写道，他建立了“相互的理解……我没有必要参与到任何违法的活动（包括吸毒）中去”（Sanchez-Jankowski，1991，p. 13）。

第三个相对频繁的先发制人的努力是，情境对提供帮助的限制程度。例如，在加里·怀恩对孩子的研究中，虽然他有时候给他们买冰淇淋吃，成群地带着他们去看电影，但是，他也预先提示他们不要把他当成小额借款的来源。他很有礼节地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声称自己没有钱，而有时候又提供小额借贷，但是告诉孩子们“只有这一次，（以便我）今后有理由拒绝借钱给同一个人”（Fine and Sandstrom，1988，p. 25）。

2. 技 巧

先发制人包括清楚地协商研究者所受到的限制，而与此相反，研究者有时候要用计谋处理场景，从而应对其所提出的要求。用推托或者模糊的方式回答团体成员的要求通常是很有用的，这至少最小程度地满足了他们的询问或者期望，但是这也阻碍了更完整的融入，使他们感觉不舒服。在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对流浪者的研究中，安德森经常花时间和成群的流浪者呆在街上，这些人聚在一起喝酒，并要他一起参与进来。虽然他并不想这样喝，但是当他们把酒瓶递给他的时候，他还是把酒瓶放在手里抓一阵子，然后再递出去，就好像他已经喝过了一样。而有时候他也要确保喝了一听啤酒，以便他能用空酒瓶宣称自己没有喝团体酒瓶中的酒的理由。

说服别人改变宗教的团体好像倾向于让研究者处于尴尬的、需要采用计谋才能应付的情形中。正如戴维·范·赞特在他对“上帝的孩子（Children of God）”的研究中所描述的策略一样，为了避免他所感觉到的由于出卖他们的文学作品而产生的不舒服感，“我所使用的（一个）技巧就是声称我需要更多的‘措辞时间’或祷告时间，并要求我们休息一下再读”（Van Zandt，1991，p. 14）。

技巧策略主要是自发的，并且是高度情境化的，呈现的是“实

地研究者对当地文化掌握的完美测试”(Emerson and Pollner,2001,p.251)。因此,这种策略在实地研究中的运用是如此地广泛,以至于埃莫森和鲍尔纳(Emerson and Pollner,2001,p.252)认为:“推脱的技巧是参与/观察实地研究的基本技巧之一。”

3. 拒绝和退出

很多的场合都可以拉近田野关系,使其非常亲密,但并非所有的场合都可以先发制人或施以技巧。有时候很有必要或者最好是“说不”,拒绝目睹或者参与让你不舒服的活动。例如,帕特丽夏·阿德勒写到她的贩卖毒品的民族志研究时说,虽然她有时候允许在她家里进行毒品交易,但是“我最终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无法处理自己的焦虑情绪”(Adler,1993,p.24)。正如埃莫森和鲍尔纳(Emerson and Pollner,2001,p.253)所记录的,“因为拒绝可能导致攻击,破坏和谐,民族志研究者通常很小心地采用当地可接受的方式,拒绝参与当地的活动。”这方面的实例有,特里·威廉利用可卡因吸食者经常使用的借口(例如,“我的鼻子不灵了”或者“我发烧得很厉害”),作为拒绝吸食可卡因的理由。当然,这种理想的选择并不是总能获得。

在极端的情况下,研究者面临着更大融入或演变成为被研究者角色的压力,这迫使研究者做出是时候离开实地的决定。鲁斯·霍洛维兹一直在为拒绝与帮派的成员发生性关系而斗争,这事结束后,她得出结论,“我不能以性交身份来协商,以此为条件让我作为一名研究者继续研究。”(Horowitz,1996,p.423)

Ⅲ. 融洽相处并退出实地

在某个时点,实地研究的历程要接近尾声了。实地研究者或者对所观察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很投入,以至于她/他“改旗易帜”了,虽然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她/他从实地脱离出来,继而从事报告的分析和写作工作。但是,什么因素促使研究者退出或者脱离呢?实地研究者应该什么时候离开现场,并且这么做对研究者自己和信息提供者来说暗示着什么呢?尽管质性研究者对此的讨论不及他们关注进路、入场以及

田野关系时所要涉及的内容那么广泛，但是，我们还是要增加对这个主题的关注（Berg，2004，pp. 187-189；Gallmeier，1991；Kaplan，1991；Maines，Shaffir，and Turowetz，1980；Snow，1980；Stebbins，1991；Taylor，1991）。从这些作品出发，在这一节我们论述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影响脱离的一系列因素是什么？第二，当实地研究者退出时，他们应该对谁负有义务，他们该怎样履行这些义务？

表 4.1 提供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的各种因素的小结分类。表 4.1 是按照脱离时这些因素是起加速还是阻碍作用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压力、约束或基本原则而进行分类的。因此，离开田野时引人注目的因素可能是：①理论上的也可能是方法上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情景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再也看不到新的有趣的东西了。②结构上的，基于对制度的或组织的考虑，研究者做出离开的决定，因为其研究资助已经用完了，因为指定研究的项目或论文已到截止日期，或者发起人已经要求他们离开——正如发生在约翰·洛夫兰德（Lofland，1997）身上的情况一样，日渐兴旺的"新兴"宗教的地方领袖断定，洛夫兰德的社会学兴趣（这是他从一开始就公开说明的）比其宗教兴趣来得更真诚，尽管他语焉不详地喃喃自语着恰巧相反的说辞，其实他是永远都不会皈依的。③关系上的或者情感上的，因为厌恶感、被排斥感或仅仅是纯粹的疲倦，实地研究者要求退出田野。④道德的或伦理的，此时研究者有契约规定的义务要上交报告给发起方。另一方面，研究者呆在田野中可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反向压力，这在表 4.1 中被视作对脱离的阻碍。这些因素也可能是：①理论上或者方法上的因素，当研究者对所收集的资料的适切性觉得过度的焦虑（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pp. 73，227-228）所谓的"强迫的科学态度（compulsive scientism）"）。②基于制度的或机构的因素，比如当一些团体看起来不赞成退出成员关系，并动员离群的成员"回到原地，使问题得到解决"时。当斯诺（Snow，1993，pp. 17-21）从他所加入和研究的佛教运动中退出时就有这样的经历。③关系上的或情感上的因素，当研究者已经认同了被研究团体或视许多信息提供者为朋友时。④道德上或伦理上的因素，当研究者经历了道德或法律义务方面的冲突以及相应的负罪感时，正如先前（第 2 章Ⅲ. E 部分）在"伦理后遗症"中所描述的一样。

表 4.1 影响脱离现场的因素总结

	压力、约束和基本原则			
	理论的和方法的	结构的和制度的	关系的和情感的	道德的和伦理的
加速	完成了研究 日程或研究计划 理所当然 理论饱和 高度自信	资金耗尽 截止日期 被撵出 角色冲突	被排斥 厌倦 疲惫 非研究关系	对发起人的义务 专业职责 对公众的职责
阻碍	强迫的科学态度	刚性的政策 背叛 贪婪的组织	同情 认同 快乐和兴奋	与道德和伦理义务相冲突 负罪感

改编自 David A. Snow, "The Disengagement Process: A Neglected Problem In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3: 100-122, 1979.

综上所述,这些各种各样的相互抵消的压力和约束表明,离开实地可能比一般认为的关系、人际以及伦理方面要更为复杂。但是,退出有些研究场景的相关复杂度明显地要低于其他场景。例如,如果(身份已被知悉或未被知悉的)研究者逐渐不喜欢情境中的参与者,或者被撵走了,他可能很高兴,只要走开不回头就可以了。同样地,身份未被知悉的研究者在开放的和半开放的情境中,通常也根本不需要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不太可能形成私人关系,并且即使有,他们的研究现场通常是希望人们随便冲进冲出的那种环境。但是对于那些处在更加稳定的情境中的(身份已被知悉或未被知悉的)研究者,由于他们与研究对象形成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或者由于希望设置未来的研究议程,想要保持联系或者让自己有机会返回,这的确就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了。并且,对于实地研究的许多类似问题,文献中所暗示或提供的建议(参看:Carpenter, Glassner, Johnson, and Loughlin, 1988; Shaffir and Stebbins,1991,Part Ⅳ)是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给出或获得的。一般来说,不要过河拆桥,并且要更加明确地保持离开的礼节:提前通知人们你的计划;说明你将前往的目的地及离开的理由;在可能的情况下亲自一一道别;如果合适的话,承诺会保持联系。

Ⅳ. 与提出要求者和良知相处:持续存在的伦理事项

所有本章讨论过的个人难题和策略问题,都是烦恼的来源,有时候会引起伦理方面的两难局面以及相关的良知问题。这些两难局面及关注事项通常源于两个相互交叠的议题或交叉的问题: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到什么程度才在伦理上符合我们的职业(例如,美国的人类学协会、美国的社会学协会)、我们大学的制度审查委员会以及我们自己的标准所界定的范围?作为实地研究者,我们应该对谁承担义务,并且在这些相互竞争的义务之间我们应该怎样定夺呢?

实地研究者对这些事项及问题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注意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大学及学院的制度审查委员会所表明的一样,在研究情境中越来越多地关注研究伦理和协议,使得研究者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关系感到极度痛苦。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第 2 章(Ⅲ. D 部分)和第 3 章(Ⅲ、Ⅳ部分)已经讨论过所有这些议题的方方面面。而且,先前我们许多关键的论述已经指导你如何根据伦理和质性研究的交叉部分来划定这些议题的范围(第 3 章Ⅲ. B 部分)。这样,当面临和操作以上提及的议题及关注点时,你已经准备好了能够作为指南的一系列著作和讨论。

然而,我们无意诋毁伦理学家的关注事项或者轻视一些研究者真诚表达出来的道德苦闷,但是,我们要提醒你对这些伦理和良知问题不要太过全神贯注,以至于固步自封,或者发现自己除了谈一谈与质性研究相关的伦理泥潭和挑战以外,就不能说点别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看来,就伦理层面而言,实地研究情境并不比日常生活所面对的课题更为困难(虽然也绝不比后者简单)。但是,因为实地研究并没有与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相分离,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就具有和社会生活共有的持续的伦理两难困境。

要做到让实地研究是完全符合纯粹伦理的,这是令人不安的、不可能的要求。许多观察者发现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地研究这项事业应该被禁止。正如心理学家乌列 · 布朗芬布伦

纳在40多年前所做出的评论:"避免破坏专业的(并且,我们应该加上,个人的)伦理原则的唯一安全方法就是制止做社会研究。"(Bronfenbrenner,1952,p. 453)但是,谢天谢地,社会科学领域还没有得出那样的结论,质性研究仍然是充满活力的事业。因此我们建议澄清管理机构的指令,合适地利用它们以及自己的伦理标准,但是,不要放弃从事在当今世界上让你感兴趣的质性研究这个事业。

V. 附言:实地经验的个人陈述

本章详略不等地提到了实地研究体验的大量记录,特别是那些属于与个人以及与情境中的成员相处的经历。有关"融洽相处"的陈述必然是精简扼要的,或许也太过井然有序,无法真正勾勒出实地经验的全貌。因此,我们建议各位阅读以下一则或者多则个人陈述,以下的研究按照一般和具体进行了排列:

一般观点的记录:

Robert A. Georges and Michael O. Jones, *People Studying People: The Human Element in Fieldwork* (1980).

John M. Johnson, *Doing Field Research* (1975).

Hortense Powdermaker, *Stranger and Friend: 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 (1966).

Rosalie H. Wax, *Doing Fieldwork: Warnings and Advice* (1971)

具体的记录:

Kathleen Blee, "Crossing a Boundary," pp. 1-21 in *Inside Organized Racism: Women in the Hate Movement* (2002).

Mitchell Duneier, "A Statement on Method," pp. 333-357 in *Sidewalk* (1999).

Gary Alan Fine, "Ethnography in the Kitchen: Issues and Cases," pp. 233-253 in *Kitchens: The Culture of Restaurant Work*(1996).

Calvin Morrill, "Anatomy of an Ethnography of Business Elites," pp. 229-255 in *The Executive Way: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orporations* (1995).

具体陈述的文集:

Annette Lareau and Jeffrey Shultz (eds.), *Journeys Through Ethnography: Realistic Accounts of Fieldwork*(1996).

William B. Shaffir and Robert A. Stebbins (eds.)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991).

Carolyn D. Smith and William Kornblum (eds.) *In the Field: Readings on the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 (1996).

本章和第 3 章相结合之后,可能会引导各位把实地研究视做"冒险(adventure)"。它当然是冒险,几乎任何一位实地研究老手都可以为这一点作证。但是,它同时也有其他样貌,或者它根本就是艰辛的、被规训的并且有时是单调乏味的工作。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进入实地、融洽相处以及或许是退出实地的历程。这些当然是民族志事业的必要方面,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够不上是成功的实地研究。另外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资料记录(data logging)。省略了这个步骤的话,实地研究就变成不过是个人的探险罢了。下面,我们转向资料记录的过程。

第5章 记录资料

Logging Data

资料记录是质性研究过程重要的、随时显现的特征，包括小心详实地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记录和组织。实地笔记与访谈文字稿是质性资料记录的最基本的形式，不过，也可能包含绘制图示、普查、录音、照相、档案搜集等形式。此外，随着研究的开展，实地研究者必须处理日渐扩张的资料的数量和多样性。在本章，我们讨论资料记录的过程，以及为了分析之便，用推动资料检索的方式管理资料的放置或者记录。

生物学里的自然主义者小心翼翼地记录其对于研究中的动物在行动及声音上的观察所得，这种记录的方式和社会科学实地研究有相似点，可以明确地指出，这是“记录”的典范。正如自然主义的生物学家在研究中必须记录动物的瞬间、平常的状态以及动物常规的细节一样，自然主义的实地研究者也必须小心地参与到研究对象所生活的日常事务和场景中去。与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有在确认了相关变量之后才搜集资料不同，自然主义研究者让自己融入到感兴趣的实地情境中，以便洞悉到研究的重要焦点。当民族志研究者试图记录公开的事情和行为或在他们面前所说的话语时，他们并不那么积极地“获取”具体的资料，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是坐等（以社会学观点或其他观点而言所谓的）“重大”事件发生，或者等待话语被说出来，然后把它们记载下来。相反地，如在前面章节中所强调的，实地研究者试图找到合适的位置，以便能有利地观察到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例如“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怎样完成每天的日常活动的，他们认为什么是有意义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Emerson，Fretz，and

Shaw,1995,p.2)。观察中的场景或者进行中的访谈有大量的信息,可以在表面上显得琐碎平凡的事件或话语中得到理解,这都是记录磨坊里不可或缺的谷物。由于看起来不重要的平凡细节中蕴含着潜在的意义,实地研究者必须小心地关注一致的、细致的文件。因而,可以理解的是,当研究新手抱怨,自己"没留下任何记录,因为并没有重要的事件发生";当专业研究者自吹自擂,自己没做半点田野笔记,因为做笔记会"碍手碍脚。它妨碍到实地研究的目标"(Jackson,1990,p.18)时,自然主义传统把这两种做法视为幼稚或妄自尊大之举。罗莎莉・瓦克斯警告我们:

> 那些自诩为民族志学者的人主张或吹嘘他们很少做笔记,或者完全不做笔记,实地研究者可以三思,是否要仿效他们。事实上,说自己不必记笔记也能过得去的那些人,大多数写不出任何值得一读的作品。(Wax, 1971, p.141)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不严肃地对待记录过程。而且,资料记录不仅仅只是"记忆装置",它允许你回想起连珠炮似地涌向你、极其复杂的种种刺激。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虽然资料记录当然有一部分这样的功能,但是,这样的类比错过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基本点:记录的内容实际上组成了资料。资料并不是研究者的回忆,研究者的回忆是不能隶属于系统的分析的。相反地,资料包括记录的任何内容,这对详细的、系统的检索是有用的。

基于这个理由,记录工作成为自然主义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的关键层面。研究者在此需要严守纪律,相比之下,研究历程中的任一其他方面对于纪律的要求都不这么强烈。"进入实地"与"融洽相处"可能涉及困难的伦理的、个人的与专业的选择,它们也让我们跃跃欲试,特别是对于那些对研究关注点有个人爱好的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相反地,资料记录往往就是这么单调乏味,并且将研究者从实地研究的活动中拉回来。但是如果记住你研究的根本目标,即用你的实地研究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枯燥,而是感觉更有意义。当你聚焦于这个目标,就会很清楚地知道需要尽责地记录资料。如前所述,只有记录了的资料(而非没有记录的记忆)才能被系统地用来为严谨的分析服务。如果没有顽强地从事资料记录,那么整个研究项目就

会很危险。

在这一章里,我们先简要讨论最近关于实地研究资料"真实性"的挑战,然后探讨各种各样的资料类型,对记录工作提出总的看法,特别是其与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的相关性。接着,我们逐一检视各种研究模式所采用的不同记录格式:深度访谈法的访谈指南和文字稿、参与观察法的实地笔记。

Ⅰ.资料:事实抑或虚构

关于研究,虽然社会学家的关注点有史以来总集中在评估量化和质性资料的经验主义的适当性(例如对效度和信度的评估)议题方面,但是近年来,他们对民族志在文学性或者修饰性方面增加了兴趣。由于意识到在小说和民族志的书写中运用文学技巧有相似点,一些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宣称存在"表述危机",断言所有的民族志作品及以之为基础的"事实"都是虚构的。诺曼·邓辛是民族志研究中所谓"后现代取向"的雄辩的代言人,他再三抨击他所认为的"过时的"、知识论的、幼稚的"社会现实主义"观点。

> (社会现实主义)假设,冷酷的社会世界是存在的,而这个世界的事件、意义与活动能够经由技巧熟练的访谈者—参与式观察者精准地记录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令人困扰的选择。民族志学者的文本创造了主题,主题只有在被带入我们的写作文本时才存在……(这)是(社会现实主义)的反理论(countertheory),它证明了把每一份文档视为一个独立故事的做法的正当性。它也使得……关于谁掌握了正确的事实的辩论变得徒劳无功。(Denzin,1992b,pp. 124-125)

邓辛(Denzin,1989b,1992a,2002;Denzin and Lincoln,2000)和其他人(Banks and Banks,1998;Clifford and Marcus,1986;Clough,1992;Ellis and Bochner,1996)在实地研究上对于"社会现实主义"所做的挑战,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整体人类知识所提出的更为广泛的挑战,很可能会挑起持续不断而又复杂的长年论战,正如许多"现实主义者"的回应所反映的情况一样(Best,1994;

Charmaz,1994;Dawson and Prus,1993a,1993b,1994;Sanders,1994;Snow,2002;Snow and Morrill,1993),尽管一些观察者认为对辩论的学术耐心和兴趣正趋式微(例如:Flaherty,2002;Manning,2002)。这样一本教人"如何做"的指南很难适于面对严肃的重量级论战,不过,由于我们所持的观点比较偏向社会现实主义的立场,所以,稍做回应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在第 8 章,我们将会比较详尽地呈现个人在资料分析上的立场(以及它与其他立场的差异所在)。我们在此只想简短地探讨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这个观念进行挑战的两个层面。

首先,资料有时候之所以被宣称为是虚构的,是因为实地笔记过滤了而非映照出了"实际"发生的事件。我们在上文说过,研究者应该记载在他们眼前铺陈开来的事件,我们相信,这是处理资料记录工作合适的心智状态。同时,我们当然也同意人类对世界(不论是社会世界、生物世界还是物质世界)所做的一切观察,必然是经过过滤的。人类的知觉永远是来自于人类的概念构思的;我们所"看见"的事物,不可避免地会被我们拥有的语言所塑造;被我们的空间点、时间点与社会所在地(通过文化、历史与身份地位)所塑造;被我们的职业或其他特质的事物所塑造;而尤其与这个议题相关的是,被我们"凝视"的学科所塑造。不过,这是哲学和社会学初级阶段课程的内容,绝非什么改天换地的资料,足可拿来推翻以社会现实主义色彩为主的研究取向。即便我们同意,研究者从四面八方涌现的原初现象中,仅仅拣选出某些事件,并不意谓着他们是在无中生有。过滤并非是在捏造。经过过滤的事实只是曾经被过滤的事实,除非我们想进入奥维尔(指英国小说家乔治·奥维尔,有《一九八四》、《动物庄园》以及《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等重要著作——译者注)式的"仙境",并且誓死维护我们按照个人意愿来赋予文字意义的权利,否则,经过过滤的事实并非虚构之言。

第二项挑战在于,因为所有的观察都经过了过滤或解释,民族志的主张不能断言其比其他主张更加真实或精确。我们相信,这种相对主义源于后现代主义,从后现代主义的倾向看,认为实地研究是一种纯粹的"解释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直观的或者描述的行为"(Van Maanen,1988,p.93)。从承认解释的维度到民族志

视为绝对的解释,这种飞跃忽视了实地研究其他的实质方面——最为关键的观察和访谈资料的严格收集。的确,如果我们在实地中的观点仅仅基于解释以及我们提出的假设,那么,从事实地研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社会现实主义者很久就意识到人类知识的解释维度,拒绝这种唯我论的观点。如同赫伯特·布鲁默所争辩的:

> 错误之一在于,如果他认为因为经验主义的世界存在对于人类来说,仅仅是根据对它的想象或者概念,那么,必须找出事实而不依靠经验主义的想象或概念……(这个)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经验主义的世界也可以……挑战、反抗或并不屈服于我们的想象或观念而进行"反驳(talk back)"。(Blumer,1969,p.22)

的确,物理学和社会学的历史都论证了经验主义的观察和理论上的概念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必然性。理论为观察经验世界的某个方面提供了视角和术语框(terminological screen),但是经验主义的资料提供了不可改变的事实,使得某些观点和概念得到了验证和提炼,这些事实也以此强加对自己的限制。视资料为预先捏造之事的观点就是公然违抗常识与科学的观察。让自己进入,并融入到实地情境和互动之中,密切关注团体成员赋予他们行动的意义,关键在于要允许这个世界对我们进行反驳。就像真实的对话一样,尽职尽责的实地研究挑战着我们的观念,并帮助我们试图检验和跳出我们当前理解的局限性。资料记录,作为对我们观察的记载,是这种尝试的关键所在。

Ⅱ.记录工作

如同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在纯粹访谈研究和纯粹观察研究中,资料记录形式差异极大。然而,记录工作的许多方面同时适用于这两种模式。另外,实地研究典型地包括了访谈、观察以及其他的资料类型。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典型的资料来源、资料错误和偏差的问题以及资料记录的技巧。

A. 资料来源

在质性研究中，主要的资料来源是你所观察或访谈对象的话语和行动，再加上某种程度的直接体验。这些话语、行动主要通过书面笔记而记录下来，有时（视适当性和资源而定）也会通过照片、影片、录音带或录影带记录下来。你还可以有补充的资料来源（例如，文件和实地跟踪）。在表 5.1 中，我们列出了广泛的资料收集方式及其信息产出，从最丰富、最深厚的技巧到更狭窄或更集中的策略不等。我们所做的区分并不如表格所表明的（例如，深度访谈可以包括各种程度的对社会行为的观察）那么清晰，而表 5.1 作为一个宝贵的启发式策略，描述了在实地研究中所收集到的资料是如何从各种各样的源头出来的，每一个源头都能为所调查的社会世界提供重要的见解。下面简要地介绍这些资料来源。

1. 直接的体验

如果把接近体验的（experience-near）研究和远离体验的（experience-distant）研究排列成一个连续统，那么执行研究则靠近这个连续统接近体验的一端，这就更有可能产出威廉·詹姆斯

表 5.1 质性资料来源、方法和信息收集技巧

	一般的质性方法或资料收集技巧					
质性资料来源	参与式观察	非参与式观察	非正式访谈和倾听	深度访谈	历史分析和内容分析	有形资料的检查
1. 直接体验	X					
2. 社会行为：人们的实际所为	X	X				
3. 交谈：人们的所说	X	X	X	X		
4. 档案记录	X	X	X	X	X	X
5. 社会行为的有形痕迹	X	X	X	X	X	X

来源：David A. Snow & Calvin Morrill's Seminar in Field & Observational Methods.

(James,1932,pp. 11-13)所谓的“相识(acquaintance with)”,而非更疏远的、抽象的“知识(knowledge about)”。但是,并非所有的实地研究资料来源都与直接的体验同等接近。如果我们聚焦于研究者,那么最靠近体验的资料来自于研究者对所研究的社会世界直接而亲身的融入。直接的体验使得研究者更接近研究情境,并能更容易地深刻理解社会行动的背景。虽然直接体验本身有很多不同,从对所研究的主题或社会世界紧密的亲身体验(参看:Henson,1996;Humphreys,1975;Karp,1996,2001;Pattillo-McCoy,1999)到不完全融入的体验(参看:Bourgois,1995;Lichterman,1996;McRoberts,2003;Rochford,1985),所有直接体验的形式都不同程度地让研究者暴露在研究现象面前。这种体验通常也能提供对研究主题某个方面深刻的、有细微差别的理解。对于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世界的某些方面,以及对于成员来说不是特别显著或相关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与经验丰富的成员相比,当研究新手在情境中时,直接体验能使研究者保持警惕或对此很敏感(想要更全面的了解直接体验和实地研究之间的关系,请参看:Douglas,1976,pp. 108-123)。

2. 社会行为

作为人类互动基本的、缠绕的方式,话语和行为是实地研究资料的基本来源。虽然谈话在大量的研究方法中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社会行为的捕获要求在场景中进行观察,尽管没有必要一定通过参与式观察。

尽管社会行为有时是非言语的,但社会行为通常也包括言语的互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捕获场景中的行为和言语都是很重要的。非言语的行为能为你理解研究主题提供宝贵的资料。例如,在梅林达·米莉苷和爱普立尔·布雷菲尔德(Milligan&Brayfield,2004)为博物馆所做的儿童研究中,职员运用非语言的行为,即有孩子吵闹时就用明亮的激光指示器指着他们,让孩子们的椅子隔开至彼此不能碰到的地方,这是职员希望控制孩子行为的做法,也是他们发展出来的策略。通常,对社会行为的观察是对团体成员话语的补充(不管是当前的谈话,还是隔了某些距离观察到的谈话),例如,当詹妮弗·李(Lee,2002)观察韩国人和非裔美洲商

人的“商人—顾客关系”互动中的性别差异时，她通过与商人的访谈得到了确证。但是，行为和言语并不总是彼此一致的，论证二者之间的分歧和一致性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一致性的程度是一个重要的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也是一直在持续分析的主题，这个主题的存在与否都可能产生重要的洞见，并提出分析性的问题(Deuscher，1996；Deuscher，Pestello，and Pestello，1993)。

3. 交　谈

在大部分实地研究中，许多分析都是以信息提供者的谈话为基础的。语言是理解大部分人类互动的钥匙，因为它是建立意义的主要符号系统。有三种交谈对质性研究很重要：在行动中的交谈(也就是说，在情境中的一系列活动中)、非正式的访谈和深度访谈。每一种方式都可以捕捉所研究的社会世界的重要方面。

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最宝贵但又最无需讨论的谈话方式就是在行动中交谈，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在自然情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形成的谈话模式，这些自然发生的场景也是行为系统的一部分，正如当一个流浪者对一个过路人行乞〔正如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所论述的一样〕时的情境一样。研究者越是对活生生的经历和日常事务的管理感兴趣，行动中交谈所形成的文件就越对研究项目至关重要。

深度访谈中的谈话和行动中的谈话截然相反。首先，访谈的谈话，即使是集中在行为上，也基本上是访谈直接背景以外的行为——访谈的主题并不是访谈本身。但是，因为谈话是经过设计来回应受众的，因此，被访者对访谈问题的回答并不很符合团体成员行为的意义，他们倾向于提供访谈者能理解的解释。最后，虽然观察行动中的谈话受到自然发生的事件的引导，但是访谈是按照访谈者的兴趣和交谈的流动而建构的。每一种交谈都能提供宝贵的资料，每一种交谈都有自己的优势。行动中的谈话能在最丰富的情境脉络中捕获信息，并提供勒若伊·高尔德及其同事所谓的“行为中的观点(perspectives in action)”(Gould ，1974，pp. xxiv-xxvi)，但是，这种方法只能捕获实地情境中能见证的信息。另一方面，深度访谈则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即获取超出研究者直接接近的事务的信息，这样就提供了“行为的观点(perspectives of

action)”,并且也能探究团体成员在实地谈话以外的行为意义。而且,因为深度访谈的谈话可以由研究者聚焦,因此从许多的信息提供者那里收集类似的信息是有可能的。

第三种谈话类型是非正式访谈,涉及在自然发生的活动过程中提问。这种提问当然是日常生活的正常特点。自然主义调查者就利用这个事实为研究目的服务,只是或许所提的问题比平常在情境中参与时所提的问题更频繁,这种类型的提问通常被称为“随意访谈(casual interviewing)”,是参与观察的一个关键部分。观察者或访谈者也可以采用更迂回的提问方式,即戴维·斯诺、路易斯·祖尔科和吉迪翁·斯约伯格所称的“评论访谈法(interviewing by comment)”(Snow,Zurcher,and Sjoberg,1982)。这种方式试图通过做评论而非直接的提问引出口头信息。非正式访谈介于深度访谈和行动中的交谈这两者之间。像行动中的交谈一样,随意访谈与直接观察紧密相连,并倾向于与团体成员中十分突出的议题相关。但是与深度访谈法类似(与观察行为中的谈话相反),随意访谈也典型地受研究者所引导。

在寻求与所研究的社会世界建立密切关系中,实地研究者努力收集口头的资料(不管是通过深度访谈、非正式访谈还是观察行动中的谈话),以便能充分地理解团体成员的体验和观点。虽然用一个案例就能记录研究过程中的这三种谈话,但是,必须在实用性和信息产出之间达到理想的平衡,对参与观察中的深度访谈进行周密的考虑有时候是会有帮助的,反之亦然。

4. 补充资料

根据所提问题、场景特色、研究形式等因素,你可能通过其他的资源来积累资料。调查者经常搜集场景所积累下来的文档,或是与问题或兴趣有关的文件。普查可能派得上用场,为适当的有形场景绘制图示也可能有所帮助。与人物、场景、议题等有关的历史层面的素材,有助于将资料前后连贯起来。相关的剪报或杂志剪辑资料,可以扩展你对于现状的了解。近年来,因特网站和聊天群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庞大的、潜在的资料来源,这种资源也应该被开发。简而言之,勤奋的自然主义调查者不只是在直接的资料现场中搜寻话语和行动,也对于林林总总可能出现

在他们面前的补充信息的潜在价值相当敏感。三种特别珍贵的补充资料分别是：档案记录（archival records）、有形痕迹（physical traces）以及照片资料（photographic data）。

(1) 档案记录

档案记录包括大量的书面材料，从私人文件（例如，日记、信件和个人照片）到公共的和商业的记录（例如，法庭的誊本、真实的财产清单以及报纸文章）都在此范畴。私人的和公共的文件组成了一个重要的“非干预措施（unobtrusive measures）”的类型（Webb, Cambell, Schwartz, Sechrest, and Grove, 1981; Plummer, 2001），它们都是丰富的资料的来源。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那涅奇（Thomas and Znaniecki, 1927）在 20 世纪早期分析过移民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上绘制了波兰移民到美国的经历的图表，他们的分析开辟了私人文件在社会学中的应用。最近，许多学者对报纸文章进行了广泛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例如，辛西娅·博嘉德（Bogard, 2003）将流浪者的社会构成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他十分关注从 1970 年代晚期到 1980 年代早期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对流浪者报道的文章。从赈济处到跨国公司等组织都创造了很多卷公共的和私人的记录，这些记录清楚明白地显示出了广泛的相关议题。而且，许多公共档案，例如美国的人口普查报告（www.census.gov）以及统一的犯罪报告（www.fbi.gov/ucr），包括了地方的/地区的以及全国的成批的人口统计学资料，这些资料对相当多的研究目的有用。确实，可能的档案记录范围是巨大的，除了书面文件以外，还包括视频和音频资料。这些文件能丰富实地研究，尽管他们也有相当大的可能存在错误和偏见。我们后面会讨论。

(2) 有形痕迹

正如自然主义的生物学家依靠有形的活动迹象来追踪其他动物的活动一样，自然主义的实地研究者发现观察和记录人的活动的有形踪迹也是很有用的。这种踪迹包含了“非干预措施”（Webb, Campbell, Schwartz, Sechrest, and Grove, 1981）的另一种方式，包括磨损的和增加的措施（erosion and accretion measures）。磨损可以以人们的穿着材料或者人们所踩踏过的东西作为例证，例

如瓦片、地毯、人行道和足迹,或者按照他们所使用的材料作为例证,如椅子和沙发、衣服、书本和车胎等。人类痕迹的增加,例如烟蒂、指纹和口红,都可以提供同样有趣的引人注目的见解。当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在奥斯丁两个主要的计日工交易场的周围发现了一个高度密集的流浪者临时营地时,就是利用了这些资料来源。在实地研究的资料中有形痕迹的文件是相当宝贵的,但是它们的意义和代表性必须通过研究背景中其他的相关观察才能得到估计。

(3)照片资料

自从道格拉斯·哈勃(Harper,1982)1980年代早期沿铁路步行的照片口述史(photographic oral history)问世以来,在实地研究中使用照片就变成了一种日趋普遍的方式,用此方式来记录和分析其他的社会世界和生活。此处要强调的并不是对信息提供者的照片的发现和分析,如家庭和婚礼相册(Walker and Moulton,1989),而是要用相机捕捉被研究者的面部表情、活动以及日常事务。这些相片资料有时可以用作传统的民族志实地研究的补充,例如米切尔·丹尼尔(Duneier,1999)在《人行道》的研究中就利用了照片资料,还有的时候,照片资料作为详细阐述视觉内容的基础,例如,哈勃在其不断演化的研究中,通过一位开垦荒地的机修工的经历,记录了他对技术的使用和误用(Harper,1987),也记录了他在牛奶场容貌的改变和衰老(Harper,2001)。后者的一连串的研究都以相机作为基本的研究工具,这也反映在了《视觉研究》(以前被称为《视觉社会学》)杂志对这种研究的方法论述中(Harper,2000,2003;Margolis,1990;Pink,2001;Schwartz,1989)。这种研究方法使用在实地研究中是很有特色的,本书也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B.错误与偏差的问题

我们在第2章中指出,自然主义研究由于其偏重于对社会世界的直接理解,与依靠间接观察和感知的研究传统相比,较少碰到效度上的问题。尽管如此,自然主义研究者对每一条获得的信息,都必须评估其真实性和意义。也就是说,无论是言语的还是非言语的事件和行为,我们都要把握资料对其提供精确的和事实

性描述的程度。我们意识到，由于民族志的描述比其他的描述更详细、更精确，所以民族志所描述的真相或事实可能有某些变化。也有这种情况，即使是最详细、精确的实地研究也不可能充分地抓住所描述的社会世界。因此，当我们说到真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经验主义世界的"最近似值(close approximations)"(Snow,2002,p. 499;Snow and Morrill,1993,p. 10)，而非描述性的精确(descriptive exactitude)。民族志认为，越接近近似值，也就越真实和越可能。另一方面，意义指的是对"事实"的上下文理解。事实的观察可能是大约精确的，这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是信息提供者之间对事件和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理解有变化。思考各种各样的对信息精确度有威胁的因素，以及可能采取的减少或控制这些威胁的措施，严格地评估你所记录的观察资料的精确度，这是至关重要的。

1. 错误和偏见的种类

你的资料精确度以及你的最终报告所面临的威胁，可以是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偏见。一般来说，有三类有害的错误和偏见，每一种都可以追踪到特别的角色和角色关系、观察者的身份特征以及观察者的解释框架。这三种类型包括：

(1)起反作用的影响(reactive effects)

起反作用的影响是无效的影响，源于观察者的出现或行为对研究现象的影响。它们是观察者的研究角色、个性特征或观点对被观察的事物产生的损害作用，其结果是研究者可能没有观察到他们希望观察的事物，而事实上可能相信他们正在观察的内容。

(2)认知和解释的偏差(perceptual and interpretative distortions)

这些偏差包括源于研究角色或观察者的个性特征以及缺乏被观察信息支持的观点等方面产生的错误。

(3)抽样错误

因为受到观察者的研究角色、个性特征或理论观点的错误影响，对于研究现象中一个合理样本的相关方面或变化，研究者的观察能力受到各种局限。

在这些类型中，每一种类型的交叉分类和它们各种各样的潜

在来源一道,产生了各种各样更具体的错误和偏见类型,每一种类型都能损害你的资料,歪曲你的发现,致使你的最终报告不真实和不令人信服。这些各种各样的具体错误和偏见小结在表5.2中,其中也包括控制这些错误和偏见的措施。

2. 控制错误和偏见的措施

由于你的资料和研究发现面临这些破坏性的威胁,所以引出了如何控制它们的问题。当然,没有一种或多种万能药。但是,通过了解它们的一般来源,可以采取几种措施来压制或限制这些破坏性的/歪曲事实的影响。

(1)抽样策略

与实地研究相关的抽样通常是目的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有时也被叫作判断抽样(judgmental sampling)],而不是随机抽样或概率抽样。当研究目标在数量上呈一般性分布时,虽然随机抽样是最合适的——也就是说,从样本到更广泛的人群来说,参数是预先知晓的。但是,当人口参数是未知的,或当你想要了解挑选出来的案例或不同案例所出现的变化时,目的抽样更合适。

在各种目的抽样中(Erlandson, Harris, Skipper, and Allen, 1993;Patton,1990),有几种方式对减少错误和偏见特别有帮助。例如,最大变异抽样(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这是一种达尔文式的策略,目的是发现感兴趣现象的多样性或范围,克服源于单一研究角色或角色关系的错误和偏见,通过迫使研究者超越最方便的情境或者利用其角色找到的主要研究进路来克服错误和偏见。抽取极端或奇异样本(sampling extreme or deviant cases)——也就是说,与看起来更典型的案例相比是异常的(outlier)或不平常的样本,有助于保护你免于产生与研究者角色或解释性的/理论性的观点相关联的偏见。类似地,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所谓的"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Glaser and Strauss,1967,pp. 45-77)通过鼓励研究者留神其他的场景、团体或者子团体,以弄明白新出现的理解是否有效或者适用,这样就减少了不成熟的理论和结论出现的可能。

表 5.2 实地研究中控制错误和偏见的类型和来源

一般的错误和偏见来源	起反作用的影响	认知的和解释的偏差	主要的抽样错误	控　制
角色和角色关系	• 观察者可能被视为局外人、间谍、私交者等	• 过分认同或不认同 • 远离或屈服 • 太融洽或不够融洽	• 阻碍其他的角色和角色关系	• 最大变异抽样 • 团队方法 • 优先的民族志 • 利用“更知情的”(deep)信息提供者 • 三角互证
观察者的个性特征	•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族、民族特性等	• 对研究主题或研究对象的情绪、成见、信仰	• 避开了某些情境和人们	• 团队方法 • 三角互证
参考的解释框架	• 对信息提供者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感受等	• 结构性的关注——仅仅看到了与一个人的前设和主张相一致的事物	• 避开或忽视了某种场合、人们或地点	• 抽取极端和典型个案 • 团队方法 • 成员核对 • 外部审核

资料来源:David A. Snow & Calvin Morrill's Seminar in Field & Obervational Methods.

(2)团队研究

实地研究的传统方法是“孤独的漫游者”,单个的研究者完成整个研究项目,与此相反,为了增加不同的声音、多个观点以及各种各样的相关场景和进路,团队实地研究包括“三角互证”,或者两个或更多的研究者的协调和综合。因此,团队实地研究有助于保护你免于产生与研究者的单个角色、角色关系的位置、个性特征以及他或她偏爱的解释性观点相关的偏见。与单个的实地研究者从事的研究相比,团队实地研究允许你采用与研究背景相关的多个角色和位置,这样就增加了辨明行为和观点的广泛多样性的可能。

(3)信息提供者的策略选择

减少错误和偏见的可能性的第三种策略,特别是减少那些源于大部分研究者的优势或角色和角色关系限制的错误和偏见的策略,就是选择本身处于团体内或研究情境的不同位置的信息提供者,以及那些因此可能提供不同种类的信息进路的人。莫里斯·泽尔迪奇(Zelditch,1962)区分了三种信息提供者的用处——作为代理调查者(surrogate takers)、观察者的观察者(observer's observers)以及有代表性的回答者(representative respondents)——提醒我们注意信息的效用,即依据未来的信息提供者在感兴趣的情境中所处的位置,使用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充当信息来源。正如代理调查者和观察者的观察者一样,他们可能拥有单个研究者所没有的进入一些事件或场景的进路,其他人就作为通往其他可能的信息提供者的桥梁或渠道,还有的人就作为团体范围内的理想类型(ideal-typical)的或有代表性的成员。尽管在一些团体或场景中有代表性成员,但是深入的调查可能揭示不同的成员类型,例如新手、皈依者、变节者或者异端者,由此可以认识有代表性的类型或案例。

(4)成员核查

成员核查,或者有时候也称之为确认,是指团体或情境的成员对研究者的假设、发现或分析进行评估(Bloor, Frankland, Thomas, and Robson,2001, pp. 387-394; Erlandson, Harris, Skipper, and Allen, 1993, pp. 142-143; Rochford, 1992)。目前这种策略是可行的,它能为观察的和解释性的错误提供额外的检查。但是,基于多种原因,此策略必须小心使用,因为,团体成员不能接近也不能评估激励研究

得以开展的理论关注点和议题所显示的资料。

正如前述讨论所强调的，质疑资料的精确度并采取措施提高其精确度是很关键的，但是，理解"事实"得以发生的背景，即行为发生的场景、记录的场景以及创作文档的场景，也同样重要。社会生活的事实深深地扎根于人造的事物中，研究者对资料的理解要求将资料准确地放置在使它们有意义的主体的及主体间性的背景(the subjective and intersubjective contexts)之中。参与观察法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它使研究者融入被观察的情境中，使他们近距离地目睹信息提供者的经历。然而，敏感的深度访谈虽然有时候和被讨论的社会行为相当疏远，但是，还是能鼓励被访者详细描述场景中感兴趣的事物，这些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构成了他们的经历的意义。实地研究者不断发现，将"事实"置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例如，调查者和精神病学的临床医生都证明了流浪者的临床精神抑郁的症状，这样的症状包括主观易怒的感觉、过度焦虑、失眠、体重减轻以及过度饮酒和吸毒。但是，斯诺、巴克尔、马丁和安德森(Snow, Baker, Martin, and Anderson, 1986)辩论道，虽然这些"症状"在富裕的居民中被合理地看作是精神疾病的指标，但是，对于流浪者来说，这些症状更合理地反映了在物质环境严重被剥夺的情况下的生活问题。流浪者蓬乱的外表和道德败坏的高发现象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将这些人的行为和主观状态置于背景之中，这些事实的意义就十分不同了。

关于口头的陈述和交流，也存在类似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需要。对于实地研究者来说，精确地捕获口头资料十分重要，但是，仅仅根据对表面事实某些方面的精确表现来评估口头陈述，这是需要避免的错误。言语互动(verbal interaction)这种显而易见"事实"——例如，被访者的陈述和谈话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必须在谈话的情境中进行评估。例如，流浪者之间关于身份的谈话，如果考虑到他们过去的行为，通常就会包括想象的修饰或者伪造。然而，这些口头上的身份承认是十分有意义的尝试，能在与街头同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一种个人归属感。

最后，关于这一点，为了将档案资料放进最合适的解释框架中，无论这些资料的来源是什么，实地研究者必须同样地评估这些档案资料。组织机构的记录必须使之处于完成的状态，你对他

们的创作理解得越多,你对“事实”的理解就越深(对这个议题的双重理解,参看:Garfinkel,1969)。

C. 资料记录的技巧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实地研究者致力于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就必须要处理这些资料在数量和多样性上的扩展了。另外,这些资料的储存方式必须便于当前和将来分析时对信息的评估。在本节,我们提供一些关于资料记录技巧的建议和实例,以便帮助研究者有效地处理有时候感觉像是压倒下来的一座座大山一样的信息。

为了方便质性资料的分析,我们首先考虑五个基本的要求,以便进行有效的资料管理:

- 你必须能够迅速地记录资料。
- 资料必须准备副本。
- 资料必须有编码。
- 检查和分析资料时,资料的编码类别必须容易获得,包括各种活动、特征等的表格。
- 虽然编码类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浮现和修订的,但是对于被修订的编码,资料也必须是容易获得的。

并没有统一的系统可供实地研究者用来记录资料。能帮助你完成以上所列要求的任何系统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些系统是必要的。

一种普遍使用的系统就是保存电脑文档,包括相对容易存储在电子文档中的实地笔记的条目、访谈和各种各样的其他文件(例如,数码照片和音频文件),以及那些不容易保存在电子设备中的资料打印稿(例如,组织的时事通讯和杂志)(一定要保证保存了最新的资料的复印件,存储在电脑中的所有资料都要用外部可移动的存储设备或光盘保存。我们无论怎么强调文件备份的重要性都不算过分!)。当你的分析成形时,这些资料的文档可用来编码和记录。为了结构的透明和拿起来方便,打印稿应该尽可能如实反映项目的电子文档的结构。通过保存最新内容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的目录,你进入资料就更容易了。利昂·安德森对跳伞运动的研究可以作为这种系统的样本,请见表5.3。

表 5.3　"蓝天(Blue Skies)"资料记录和归档系统

Ⅰ. 电脑文件和打印稿中的资料结构
- 实地笔记
- 访谈
  - 跳伞者
    - 一般的
      - 一次跳伞者
      - 学生跳伞者
      - 有经验的跳伞者
    - 残疾团体成员
      - 四肢不健全者(做了截肢手术的跳伞者团体)
      - 安静的自由落体者(耳聋的跳伞者团体)
      - 轮椅俱乐部(半身麻痹的、脊髓不完全损伤患者的跳伞者团体)
    - 非传统的团体成员
      - 60 岁以上的跳伞者
      - 粉色女人帮(女子跳伞团体)
  - 跳伞塔拥有者
  - 跳伞教练和组织者
- 网络资料(打印稿)
  - Dropzone. com 资料
    - 安全讨论论坛
    - 个人/社会论坛
    - 女性论坛
    - 伤残者论坛
    - 事件和聚会论坛
  - 残疾者跳伞团体网站资料
    - 四肢不健全者(做了截肢手术的跳伞者团体)
    - 安静的自由落体者(耳聋的跳伞者团体)
  - POPS(Parachutists Over Phorty)网站
  - 跳伞塔网页(基于 50 个美国跳伞塔的资料)
  - 美国跳伞者协会网页
    - 美国和联邦管制措施
    - 受伤和死亡报道

Ⅱ. 纯资料打印稿
  跳伞杂志
    《跳伞者杂志》
    《跳伞杂志》
  DZ 文档
    受伤弃权表
    多种小册子
Ⅲ. DVD 或 VHS 格式资料
  跳伞视频
    教学视频
    娱乐视频
    事件视频

在过去的十年里,自从本书最近一版出版以来,电脑科技不断发展。电脑的视频和音频容量增加了,现在,用电子录音设备进行访谈,直接将声音访谈的副本记录在电脑中,都是可能的。音乐、照片以及录像现在都可以轻易地储存在电脑中并从电脑中导出。大量的资料,从机构的记录到个人文件,都可以在因特网上获得。电脑的增值和改善使得资料的记录和使用在呈现和报告中更加便捷。对于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做研究没有电脑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虽然个人电脑的普遍存在简化了资料的原始记录和副本的制作,但是,电脑及其相关软件也增加了研究过程决策的复杂程度。

有相当多的软件程序对质性资料的处理和分析是有用的,当然,在后面的研究阶段,它们的作用比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更加关系重大。但是,因为用它们为分析的目的服务,要求特别的记录版式,甚至可能要求运用它们来记录资料,所以,在转录一个访谈或者撰写一个实地笔记条目之前,你应该决定是否使用软件,并且,如果使用,使用哪一种。正如第 9 章所讨论的,至今我们还没有可靠的示范,证明运用这些软件对分析的目的有很多益处。在质性研究中,对电脑使用的一般讨论以及对合适的使用软件的总的看法,也是很容易获得的(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1998;

Fielding,2001;Kelle,1995;and Weitzman,2000)。你应该看看这些文献当中的一篇或多篇,以便能自己熟练使用正规的文字处理软件来处理许多信息(例如,字数、条目的多个文档、条目的复制以及文档的建立,等等),也帮助你判断更专门的分析软件是否对你有用。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建议是,考虑超出自己当前的电脑技术,但是也不要太过分。在学习质性研究的早期阶段,你将面临在资料收集、记录以及分析等方面的许多挑战,你不能在这些困难之上,再给自己背上学习更高级的电脑操作能力的负担。正如多翰·桑杰兹-简科夫斯基所强调的,"对资料进行编码这个艰难的工作是智力的,而非技巧的。电脑的帮助,并不能减少民族志研究者在可靠而有效地设计、校订,以及应用索引系统上所花费的大量时间"(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1988,p. 482)。因为智力的/分析的技巧是类似的,如果你时间紧迫(例如,你学习一个方法课程,到学期末要完成一个小型的研究),依靠电脑的文字处理和组织能力,在资料处理和分析过程中运用"复制和粘贴"的办法,这些做法是很明智的,这些我们在第 9 章将会描述。然而,如果你已经熟悉并能舒适地应用许多软件程序,并且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做你的实地研究,那么你可以开放地使用所有的分析程序。

D. 保护机密性

在大多数自然主义研究中,为研究对象提供保密性的问题(在第 3 章Ⅳ部分有所讨论),通常要到撰写阶段(参见第 10 章)才会浮现。也就是说,通常只有在研究资料转化为分析时,你才会开始关心要掩藏身份与地点(如果你打算这么做的话)。然而,某些敏感的研究类型把这种对保密性的关注,在时间点上回溯至资料记录的阶段。例如,假如你所研究的对象是参与非法活动或政治上受到怀疑的人、同伙之间彼此对于所从事活动三缄其口的人或者只有在获得"不发表,不引用"的承诺之后,才愿意公开发表谈话的知名人物,那么,你可能会想要在资料记录工作上,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卡罗尔·沃伦对"隐蔽的"同性恋男子研究记录的处理就是一个示范:

> 录音访谈在收存时未贴上足可指认身份的标签(虽然声音能够被指认),在誊写及使用之后就被消磁。实地笔记置于未上锁的储物柜里;然而,在整个实地笔记的记录过程中都使用假名,而可以和假名配对的原始名册(保存在上锁的储物柜里)在资料详细誊写之后就弃之不用。(Warren,1977,p.96)

沃伦的谨言慎行纯粹出自其对研究对象的一份关心。另一方面,当前的研究者通常会遵守制度审查委员会的要求(在整个资料记录的过程中要求使用假名),并且还额外援引其专业协会的"道德良知"作为引导。比方说,美国的社会学协会的伦理守则陈述道,"社会学家(应该)采取可能的预防措施以保护研究参与者的机密性"(ASA Code of Ethics,1997, 11.01(a))。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伦理守则继续指出,"研究参与者或其他人所提供的机密信息,必须由社会学者视同机密资料来处理,即便这则信息未曾享有法律保障或特权时亦如此"(ASA Code of Ethics,1997, 11.01(b))。根据这样的逻辑,社会学者应当理解,资料记录上的保密措施不但是保护研究对象的策略,也是保护研究者本身的策略。

Ⅲ.深度访谈中的资料记录:提纲和文字稿

正如我们所知,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中,资料记录在很多方式上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因此,我们将分别考虑资料记录的每一种模式。

在深度访谈中,你初步通过所谓的"访谈提纲"的工具来记录资料。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讨论访谈提纲的编制,然后介绍如何借助提纲进行访谈,最后考虑实际记录的制作:访谈文字稿。

A. 准备访谈提纲

和调查研究或民意调查所运用的问卷或访谈程序表(interview schedule)相比较,访谈提纲显然没那么正式,也没那么结构化,然而,研究者在编制访谈提纲上所需的审慎度并不因此而减少。编制访谈提纲需要多费思量。

1. 困惑与快速记录(puzzlements and jottings)

借助访谈提纲进行深度访谈，其记录资料的做法，从你把某些地点、人群、经验、抽象主题等视为疑难杂症，或者视之为困惑的根源时就开始了。如果你严肃地看待这个困惑，决定以之为研究调查的主题，并且如果你判断访谈是最为合适的程序(参见第 2 章)，那么，你可以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问你自己，"这件事到底哪一点令我感到困惑?"不用担心一致性等问题，你只要开始快速记录关于这些令人困惑事项的问题，而且在几天或几周内不同的时间点上继续做这件事。洗澡、聆听对话、开车、打开信件时，问题可能会在这些奇怪的时刻浮现，因此，你应该随时在身边放一个小笔记本。在这个阶段，跟朋友、熟人和同伴提及这个主题也会有所帮助，他们可能会提出额外的问题，或者激发出新的困惑维度，把这些内容全都快速记录下来。

在此阶段中你是在做什么呢? 不管是基于个人体验和传记，还是基于理智上的好奇心，你是从你自己和同伴的理解的脉络中，"梳理"并记录那些被定义为困惑的事项(参看第 1 章)。你是在做准备工夫，要把这些令人困惑的事项作为访谈的出发点。如果你正感到困惑的内容并不是社会学感兴趣的议题或问题，那么你应该花时间就特定而具体的关注事项搜寻并阅读书籍和文章。在阅读时，你能够发现，那些研究过、写过这个主题的作者觉得困惑的是什么内容，提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答案。

2. 总体性分类与排序(global sorting and ordering)

随着这些困惑的积累，有可能你也一直在思考一般性的组别或主题类别，以便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困惑分门别类。你也应当针对这些困惑问题的整体结构与组织，记下一些想法，因为到头来，你必须为这些困惑点或问题做总体性或综合性的设计。如果这些困惑分别被写在了不同的纸张上或存储在电脑中，你就可以开始将之分为单独的几堆或几组。数次的分类和再分类(resorting)可能是必要的，以便建立多种组别——或者更抽象的说法叫做主题——这似乎最适于整理你所累积下来的关注点。不论这些主题为何，你在构思过程中，无需为任何深奥微妙的社会科学意义

而努力。的确,主题单刀直入而诉诸常识是比较可取的,也比较容易与访谈对象进行沟通。

以下总体性组织的实例,取自林恩·洛夫兰德(Lofland,1982,1985a)关于丧失与联系(loss and connection)的研究。请注意,用清楚地、直观地、准时间顺序排列,可能容易被信息提供者所理解。

- 丧失了谁?
- 什么时候?
- 告诉我"丧失"之前的关系:双重经历(dyadic career)。
- 告诉我丧失本身。
- 之前的丧失经验。
- 对于丧失的立即反应:情绪反应、生理反应与行为反应。
- 随着时间流逝,感觉和行动的发展/变化。
- 从当前角度来看待这段关系。

第二个总体性组织实例,取自卡尔文·莫里尔(Morrill,1995,pp. 245-248)关于企业行政人员的冲突管理研究。这本指南从一般的议题,如关于被访者所服务的公司以及他们在公司的位置,转入更直接指向引出信息的问题,如关于冲突和冲突管理。莫里尔早期在和行政人员的访谈中,逐步发展了访谈提纲,并将其进行结构化,以便可以在单次或多次访谈中提问。

- 企业的种类、规模和性质。
- 回答者的义务和日常事务。
- 公司中关于行政行为的哲学。
- 企业中社交和交流的广度和性质。
- 企业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
- 有影响的行政人员的个性和评价。
- 回答者的个人背景和未来目标。
- 企业中的冲突种类。
- 在管理冲突中回答者的经历和策略。
- 企业中的冲突结果。
- (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伦理守则的呈现和实践。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建议的，在建构你的总体性纲要时，试着纳入你即将访谈的对象的观点，思考一下，怎样才能让他们觉得说得通，怎样才最能被他们接纳，这种做法是很有用的。假如某些主题相当敏感，或者可能让你或对方感到尴尬，那么，在访谈尾声才提到这些主题，会是比较好的做法。我们的期望是，研究者首先处理不那么敏感的素材，在访谈的过程中建立信任感和融洽的关系，使得随后处理压力较大的主题时比较得心应手。有时候，明智的做法是，以较为中性的“首页项(facesheet items)”(参见下面第Ⅲ.A.5 部分)为起始点，以之作为进入问答过程时无关痛痒的(innocuous)途径。

3. 段落分类与排序(section sorting and ordering)

一旦你暂时性地对访谈提纲做出了整体设计，假设它并未构成完整的提纲，但你可以转向整体设计中某一堆特定的困惑点，开始就关注的事项和问题，排列出合乎逻辑的顺序。例如，林恩·洛夫兰德关于丧失与联系的访谈提纲的总体性条目六(探讨立即反应)，包含下列问题：

- 你在丧失的头几天或第一周确实做了哪些事情？和平日有何不同？
- 你在丧失的头几天或第一周确实有哪些感受？和平日有何不同？
- 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对他们的做法有何感受？
- 这个丧失看起来恰当吗？时机适当吗？不凑巧吗？毫无意义吗？意义深远吗？
- 这个丧失从某种角度上看来是否让你不受影响？理由何在？
- (假如适合问的话)你参加了葬礼或其他仪式吗？

同样地，在陈述敏感的主题之前，要坚持构建和谐关系的原则，莫里尔决定要么在单个访谈的稍后阶段，要么在随后的访谈中，问一些“更自然地引出棘手的个案的信息”(Morrill，1995，p. 247)的问题。在访谈提纲的后面部分，他安排了一系列直接探索相关议题的问题：

- 你是如何在公司生存这么久的,以至于进入了公司的高层?
- 你敬佩的是哪种行政人员?
- 你是如何使你的决定被执行下去的(例如,被下级执行)?
- 你觉得作决定的范围有多广泛? 你要遵守哪些程序?
- 你经历过某位高层行政人员的下属的表现并不符合你的期望这种情形吗?
- 你所管理的人之间出现了哪些问题?

4. 探　索(probes)

访谈提纲的重点,是取得受访者以个人措辞讲述的故事或说法。研究者希望这些说法的性质、轮廓是由信息提供者所设定的。研究者对于构成叙述的种种事物大致心中有数,但是,他仍然对于信息提供者自己会提出哪些资料,会如何措辞有兴趣。当信息提供者叙说时,你应当留意他提及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是未曾提及但是你觉得可能很重要的。如果有些事情已被提及,而你想要了解更多一些,你可以问,"你曾提及____,你能够针对这件事多告诉我一些吗?"对于那些未曾提及的事,你可以问,"____发生过吗?"或者"____是应该纳入考虑的事情吗?"

这些问题被称做探索。在访谈提纲中,一连串的探索往往与一个特定问题连结在一起,以便提醒访谈者去探索那些可能不会自发提到的事项。洛夫兰德(Lofland,1982)在探索其信息提供者的"关系经历"时,在研究大纲中包含了下列要注意的探索事项:

- 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 在一起做了哪些事情?
- 在一起讨论了哪些事情?
- 典型的一周/一年内聚在一起的时间强度。
-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上发生的变化。
- 情绪基调。
- 情绪基调的变化。
- 你对关系重要性的设定。
- 重要性的变化。

卡尔文·莫里尔在鼓励行政人员对"你经历过某位高层行政人员的下属的表现并不符合你的期望这种情形吗?"这个问题提供详细的回答时,包括了以下这些探索:

- 你是怎样处理那种情形的?
- 你会考虑哪种合适的方法来处理这种情形?
- 应对这些情形你有正式的程序吗?(Morrill,1995,p. 247)

提供这些实例,我们并不是说每个问题都必须配备有一则或多则事先备妥的探索事项。你在某个时点上对于要探索哪些事项缺乏灵感,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许多即兴的探索很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使用,以便引申或澄清一项说法。许多类型的问题可能不需特别加以探索(虽然研究者可以为任何问题设计探索性问句)。

5. 首页与实地笔记

为了身份辨识、簿记以及全面追踪访谈和被访者的社会特征等目的,访谈提纲通常用一页左右的篇幅,罗列有事实根据的资料。这一页往往是访谈提纲的第一页,因此被称做首页(facesheets)。以下是典型首页中所列出的部分项目:受访者的姓名(如果主题敏感的话,改用一组代号,而姓名与代号对照表另行收存在别的地方)、访谈日期和时间、访谈地点、相关的社会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宗教、出生地、职业)以及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维护保密性,并对潜在的风险进行简要陈述(参看下文)。

除了这些类型的信息之外,研究者或许可以依据访谈目的来安排额外的社会项目,因而各项研究在这一点上会大相径庭。虽然一般而言,首页是第一页,然而,首页上的问题不必然是研究者最先提出来的问题。视主题、信任程度等因素而定,在主旨说明之后直接切入访谈,有时候也是比较可取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首页上的问题有时被当做正式的事后反思(afterthought)来处理,也是访谈时研究者必须执行的次要任务。此外,访谈者有时候觉得,在提纲后附加一张访谈后评论单(post-interview comment sheet)也很有用。这并不是拿来与信息提供者分享的资料。反而,这只是在你和信息提供者道别后,针对访谈本身草草写下的

实地笔记。你记下对场景的描述(如果这是陌生的场景)、对信息提供者的描述(首页所提及的内容之外的部分)、访谈的情绪基调、任何遭遇到的特定难题(方法论层面或个人层面),以及你在访谈期间的感受和对此访谈的感觉、洞察与反思,等等。这种评论单上的笔记草稿(jotted notes),稍后(或许在格式上有所扩展延伸)也并入访谈文字稿,变成资料记录的一部分。请记住,深度访谈可能让你卷入到你和信息提供者的关系之中,进而超越到访谈接触之外的层次。假如情势发展至此,那么,把访谈之外的观察与对话加入实地笔记可能也是合适的,你可以把这种笔记并入相关的访谈文字稿中,让它们也变成资料记录的一部分。

最后,制度审查委员会要求当今的学术研究者在访谈前和被访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事实上,许多委员会要求一份知情同意书的复印件外加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同意书。知情同意书一般包括对研究的简单介绍、对潜在的风险和利益的评估以及访谈者是否被保密的陈述。许多委员会提供知情同意书的某些部分的样板文件。在制作这些表格时,尽可能简单,用寻常的、无可争议的方式构建表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在与被访者的交流中,过度地具体和复杂,其收获是很少的,特别是在研究的初级阶段。

B. 进行访谈

我们对于访谈的社会关系层面已着墨甚多(第 4 章)。在这一节里,我们将探讨介绍、格式、首要问题、访谈者在访谈期间的活动以及多份副本的运用等较为技术性的事项。

1. 介　绍

记得在第 3 章(第 Ⅱ. B. 2 部分)曾指出,深度访谈法的“进入实地”阶段需要一个“说辞”——为准信息提供者做介绍。这个说辞指出访谈将要涵盖的主题、可能需要的时间长度以及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承诺保密等事项。在实际坐下来进行访谈时,研究者应该重复大部分上述内容,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提供额外的信息。前后两个阶段的重点在于,诚实而清楚明白地让对方熟悉你即将请求他去做的事情。弗莱德 · 戴维斯(Davis,1960)在 40 多年前为了访谈残障人士而列出的自我指引式名单,如今看来仍然是规

规矩矩地介绍资料之上乘例证：

- 向回答者(respondent)说明研究目的和性质，说明对方是通过何种方式或者通过谁而被选中的。
- 向回答者承诺，在研究所产出的任何书面报告中，回答者会被匿名，其回答内容会被完全保密。
- 指出对方可能会发现，有些问题回答起来是牵强、愚蠢或困难的，理由在于适合某甲的问题不见得适合某乙。由于答案没有对错之分，他不必担心这些状况，只要尽全力回答即可。我们只对他的意见与个人体验有兴趣。
- 他可以自在地打断谈话，要求访谈者澄清、评论某一方向的问题，等等。
- 访谈者会告诉回答者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他的背景、训练以及对于调查领域的兴趣。
- 访谈者要请对方同意对访谈进行录音，说明录音的理由。

另外，如上文所言，许多大学要求访谈者在与个人进行访谈之前，必须获得“知情同意书”。如果你的大学有这样的要求，那么，你应该把你的总体介绍性评论和制度审查委员会所颁布的材料一起融入到访谈中。这样做比分开对待通常可以导致更顺利地进入介绍流程。你也可以根据环境的要求来改变所涉及内容的风格和顺序。

2. 弹性格式

如同你可以从上文所提供的访谈提纲实例的措辞与版面设计看出，提纲并非是一组结构缜密的问题，无需照着文稿一字不差地逐一提问，也不会伴随着一系列预先措好辞的可能答复。不过，提纲是与被访者对话时一定要询问的事项单。因此，访谈工具被称为提纲(guide)，而非程序表(schedule)或问卷(questionnaire)。研究者希望被访者针对其加入到对话里的种种关注点以及任何可能介绍的话题，不受拘束地用自己的话语来述说。因此，访谈可以更精确地被称为导引式对话(guided conversations)。

事实上，人们随心所欲地谈话的程度以及喜爱闲聊的程度，

都因人而异。当你碰到的是不善言辞的被访者时，你可能依照问题流程的次序，逐一询问访谈提纲安排的内容。被访者对于每个问题的回应可能惜字如金，以致于你只能顺次询问下一道问题。

然而，幸运的是，许多人属于十分健谈的类型。他们在回答某一特定问题时，会提及形形色色值得追问下去的线索和困惑点——不论是当下立即追问或者合理地在稍后提出都可以。(理想的做法是，当这个线索也是受访者所关注的事项时，你就应该继续追问。)另外，受访者在谈到一些其所在意的事情时，可能无意间就回答了提纲中其他单元的某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访谈提纲变成了分类检核表，是你想在访谈中要谈论的事项的明细表。只要某些问题完成了，你就可以打勾标记。另外，当你与同一个被访者进行多次访谈时，访谈提纲可以帮助你明了还需要探索的新问题和老问题。

3. 无效问题

在设计和询问问题时，问题有可能带来的要么是(或者两者都有)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回答，要么就是肤浅的回答，警惕这一点很重要。当你设计的问题引出了你所偏好的回应时，或许最有可能出现自我实现的答案。这种问题被称之为引导式问题(leading questions)。因此，你不宜在开始的时候就问“你不认为是……?”，而要以“你对于……的想法是……?”来开头。不要问“……是否可能性不高?”，而要问“你觉得……的可能性有多高?”。另一方面，肤浅的回答可能由封闭的问题所产生，封闭的问题就是不鼓励被访者在回答中提供丰富的答案。正如凯西·卡麦兹所提出的，如果你提前考虑引导式问题和封闭问题可能得出的资料种类，这些问题就很有可能被避免：

> 任何有能力的访谈者都将问题构思成能获取丰富材料，同时又能避免对预想的概念强加影响的形式。保持问题的开放性有很大的帮助……请考虑这些访谈问题之间的区别：
>
> - 告诉我对于你来说“美好的一天”是怎样的。
> - 在“美好的”一天中，你感觉更好吗?

> 第一个问题对参与者的经历和回答的种类保持开放……第二个问题关闭了讨论，让问题变成了是或不是的回答。后一种问题类型假定了存在一个参与者和访谈者共有的确定的框架。(Charmaz,2002,pp.681-682)

有两个基本的原则要遵守：首先，研究你的访谈问题。其次，确保这些问题既不是引导式的，也不是封闭式的。

4.留意、思考、摘记、录音

在我们看来，在可能的范围内，为访谈录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由于问题的提出并无严格的次序可言，而且，探索是访谈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因此你必须对信息提供者的谈话保持警觉。如果你必须同时记下每一句话，你就不太可能适度地专注在对方身上。你的全部注意力必须聚焦在信息提供者身上。你必须针对对方现在所说的话，思考如何探索，好让对方进一步说明或澄清；必须构思探索性问句，把现在的谈话与之前已经说过的话连结起来；必须预先思考，以便提出刚刚浮上心头，但之前并未列入大纲的新问题(还要做摘记，免得把这个问题给忘了)；并且留意信息提供者，以这份专注向对方表示你确实是在聆听。这些事项本身就挺困难的了，更雪上加霜的是，你还得做记录。所以，你可以想见，在访谈中记笔记的过程降低了你的访谈能力。因此，如果想要尽可能让人信服，请将访谈录音，这么一来，你就可以访谈了(在团体访谈或形式有所不同的焦点团体访谈中，用合适的设备来录音更加至关重要，请参看：Krueger and Casey,2000；Morgan,1997。关于确保高质量的录音方面的策略的完美总结，请参看：Poland,2002,p.638)。

不过，录音也有其危险之处。有些研究者发现自己没在聆听被访者的谈话，因为他们假定自己已经把一切内容都录下来了。防范这个倾向的最佳方式，是在访谈过程中做少量的笔记——关键语句、关键字眼、关键姓名等——紧跟已经谈过的话题以及有待谈论的话题。这是最佳的记笔记做法，其目的在于全盘掌控访谈的进展。你记笔记的重点在于记录已经谈过的主题以及刚浮上心头而应当在访谈结束前询问的事项(这么一来，如果天降大

祸——录音竟然失败的话，你还有重建访谈内容的基础）。

5. 多份副本

由于访谈提纲可作为检核表和回忆装置（memory device）（在访谈期间记简短笔记的地方）之用，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每一次访谈都使用一份新的提纲复本。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复制提纲是轻而易举而又花费不多的事情，不至于造成负担。其优势在于，在各次访谈中加上了个人诠释后的提纲，到了誊写访谈文字稿和进行全面分析时，就成为记录与回忆装置。同样地，为了快速记录的目的，你应当注意别把众多问题与探索性问句全部挤在同一页里，而要拉大每一行之间的空间，留下充分的空间来记笔记。

C. 誊录访谈

在完成访谈后，你可以把录音带誊录为逐字稿（transcript）。接着，你可以研究这些逐字稿，开始进行分析。然而，对于这样的逐字稿应当提出三条强烈的警告：

- 你应该尽所有的努力亲自转录访谈录音，而不是雇人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转录过程中，你才能真实地“听见”别人所说的话，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分析的洞察最有可能出现。
- 如果你必须将转录任务交给别人，那么，你要计划一边回顾逐字稿，一边听磁带，以便更正转录人因为不在采访现场所犯的错误（转录时所犯错误的实例和讨论，请参看：Poland，2002，p. 631）。
- 在逐字稿到手之后，不要把它们一份份堆积起来却不去研究。你至少应该用和访谈一样长的时间，立即研究、分析访谈资料。

分析产生的想法应该以备忘的形式记下。你还要斟酌，是否可能就特定主题请同一个人再次接受访谈。正如我们在第 9 章所说明的，你应当随着访谈的推进而进行“编码”与“备忘”，这是开展分析过程的核心，而不是等待所有的访谈结束后才动手（有关这些忠告背后的理由依据以及所涉及的特定程序说明，请参见第 9 章）。

大致说来，你不需要把访谈中出现的每一个字、感叹或停顿，都一字不漏地誊写下来。如果你正在亲自做转录工作，对于某些受访者所做的整体答复或描述，你会觉得只需要视为曾经发生的事实而加以总结或记录就可以了。如果你之后想要为访谈的特定段落做逐字稿，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其所在位置来做誊写工作。然而，对于被访者提供的特别深刻、有见地或详细的回答，以及对于分析的开展特别有价值的观点，你当然就应该完整地记录下来。

因而，访谈的书面记录是以下各种事项的混合体：

- 信息提供者在某个时间点上整体谈话的摘要与札记。
- 在誊写阶段中为看似重要的回应所做的逐字稿。
- 与信息提供者在访谈外的相关接触中留下的实地笔记。
- 个人的情绪体验。
- 方法论上的困难或成功。
- 想法——尝试性的分析片段（在第 9 章做编码和备忘时进行讨论）。

另一个重点是，在誊写访谈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与困惑点很可能会浮现。这些应该记录下来，稍后可以考虑是否要作为问题或探索性问句融入到未来的访谈中。如果存在大量的新问题，你应该考虑重做访谈。

这种类型的访谈往往产出大量丰富的资料。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积累出相当可观的资料记录，从而需要一些方法来加以处理。的确，由于存在这种处理问题，采用质性访谈法的研究者所进行的访谈次数往往不多。虽然少数一些研究可能是以一百多次的访谈为基础而完成的（Edin and Lein，1997；Lamont，2000；Morrill，1995；Vaughan，1990），但我们的印象是，绝大多数研究的访谈次数都少于 100 次（Blee，2002；Hondagneu-Sotelo，2001；Liebow，1993；Smith 1990）。考虑到研究的深度、广度和资料处理上的问题，这些次数看起来是相当合理的。

Ⅳ.观察时的资料记录:实地笔记

正如深度访谈要誊录文字稿一样,参与观察法则要做实地笔记:分析就是从这个关键性的资料记录中浮现而出的。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人类心灵倾向于遗忘许多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遗忘了。因此,在观察结束后就记下所观察到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同的实地研究类型在实地笔记的日常记录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Emerson, Fretz, and Shaw, 1995, pp. 17-19),但是,我们的方法是坚定地采用埃莫森以及其他人所称的“边参与边书写的方式(participating-to-write style)”(Emerson, p. 18)。除了在场景中融洽相处之外,观察者基本的具体任务就是记笔记。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倒不如不进入现场。在许多公众场景中,由于有限的互动责任,观察者往往能够当场记笔记,并且可以在置身实地的整个期间内持续这么做。稍后,他们当然需要把这些潦草的手写稿转化成打字本,但是,对他们而言,记录过程本身相比之下还不至于困难重重。不过,对绝大多数自然主义调查者来说,这个过程涉及较为复杂的序列:包括大脑笔记(mental notes)、笔记草稿(jotted notes)、实地笔记完整稿(full fieldnotes)。有学者对此过程的处理则包括三层序列:草稿笔记(scratch notes)、实地笔记本身(fieldnote proper)、实地笔记记录(fieldnote record)(Sanjek, 1990b, pp. 95-103)(也请参见:Bernard, 1994, Ch. 9; Emerson, Fretz, and Shaw, 1995)。

A. 大脑笔记

让我们假设你正和一些人聚会或参与一桩事件。记实地笔记的第一步,是就构成描述性报告(descriptive report)的要素,唤起个人的新闻从业人员的感觉。通过阅读报章杂志等,你已经熟悉了“纯粹报道(sheer reportage)”的特征。这种报道所关心的事项包括谁在现场,共有多少人,现场的空间特征,谁对谁说了什么话,谁用什么方式行动,事件发生次序的整体特征,等等。

撰写实地笔记的过程的第一步,是把个人意识锁定在记住上述事项的任务上,并随着研究的推进而记住其他事项。这种把心

思导向记住稍后时间点上的事物的行为,可以被称做大脑笔记。你自己在心里做准备,以便能够在稍后把目前所看到的事件写在纸上。

B. 笔记草稿

假如你只在一段观察期的尾声或者(较典型的做法是)在当天结束时,才开始实际写实地笔记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保存这些大脑笔记,比留在脑子里的痕迹更有用。这种脑波痕迹的衰减率很高。暂时保存脑波痕迹的方式之一就是写笔记草稿。你在观察期间以及不惹人注意的时刻中写下的所有短句、引语、关键字等,就构成了笔记草稿。其所具备的功能是,在你书写实地笔记时唤起你的记忆。许多实地研究者随身携带小尺寸的口袋型便笺簿或笔记本,就是为了写笔记草稿之用。不过,任何纸张都可以派上用场:书本封面、餐巾纸、小册子的封底等都可以。

如同上文所提及的,不论你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是否已被知悉,一般性的经验法则是,"不要明目张胆地草草写笔记"。当然,你也可能一边在实地进行访谈,一边进行观察。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记的笔记应当是深度访谈法中所描述的笔记类型。的确,受访者会期待你做些笔记,以展现你是正二八经地在对他们进行访谈!可能在其他场合中,对方也会期待你当场记下一些事情。还有一些场合里,在场景中做笔记不但适合你去做,也是其他所有参与者都适合做的事情(例如:Clark- Miller and Murdock,2005)。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观察中,不把你在做记录的事实张扬出来,似乎才是最为明智的做法。如果你是身份已被知悉的观察者,被观察者已经充分知道其被观察的事实,你犯不着持续而公开地写下你所听到、看到的事情,而让任何已有的焦虑感更加高涨。反而,你要在退出实地或者有所屏障的状况下,才草草写些笔记。

如果你在实地所花的时间是相对短暂的(如,几个小时),那么,在离开实地后再回忆你所观察的内容,你对这种能力还是应该很有自信的,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在对流浪者的短暂的实地研究中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离开实地后草草写下对重要的事件、交谈或者印象的提示是至关

重要的。

无论你草草记笔记的技巧(以及你可能因场景的变更而变化)是什么,实地研究者发现,以下的原则(有几个原则改编自:Emerson, Fretz, and Shaw, 1995, pp. 31-35)是十分有用的。

- 草草记下你所感觉到的细节,这是构成被观察的情境或互动的重要部分。
- 草草记下对行为和谈话的具体感觉方面的细节,特别关注那些你容易忘记的事物。
- 草草记下你的大致印象或感觉,即使你在此刻还不能确定其重要性。
- 当实地观察使你回忆起以前的事件时,那么把这些记忆,如已经被确定的内容草草记在你的草稿笔记中。
- 避免将评价性的断言和描述性的草稿笔记混合在一起。
- 绝对别在任何纸张的正反两面同时书写!

C. 实地笔记定稿

在一天(或者较短暂的观察期间)结束时,你应当找个僻静的地方坐着,以便撰写实地笔记定稿。所有的大脑笔记和笔记草稿,在还未转化为流水账似的观察记录之前,都不算是实地笔记。

1. 技术细节

在讨论典型的实地笔记内容之前,我们需要先行描述某些"技术性"方面的内容。一般的规则是,立即撰写。实地笔记定稿最晚在观察后的第二天早上要写完。如果你只在上午进行观察,那么,当天下午就要写完笔记;如果你只在下午进行观察,那么,当天晚上就要写完笔记。潜在的原则是,从观察到撰写的时间间隔要减到最小程度。正如埃莫森、弗雷兹和肖(Emerson, Fretz, and Shaw, 1995, p. 40)所提到的,"离开情境后马上就写,能激发出更新鲜的、更详细的回忆,这有利于民族志研究者融入当天发生的事物,并感到兴奋。"

心理学家发现,学习经历后的头几个小时内,遗忘的程度非常轻微,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遗忘的程度就会以几何级数向上

递增。如若等待一天或更长的时间,大量的素材就会遗忘。令人高兴的是,心理学家也发现,记忆的衰退在睡眠中非常轻微。也就是说,遗忘和新经验的取得更有关联,和时光流逝本身则不那么相关。因此,带着当天或当天晚上的观察所得入睡,而在隔天早上先把它写下来,这是安全而合理的做法。这么一来,你就不必熬夜到三更。但是,如果你等上几天才来记笔记,你很可能只记得观察期间少之又少的梗概。即便你记住的不只是梗概,非常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从记忆中消失的部分正是那些细微的,但却是在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中构成特定现象的事物,由于其平凡或者转瞬即逝的特质,这些事物很容易被遮蔽(gloss over)。而观察与实地笔记撰写之间的漫长耽搁,使得笔记更可能缺少对你个人稍纵即逝的情绪的记录,更不用说别人所提到的稍纵即逝的情绪了。另一个例子是,你的笔记也不太可能包含许多细微姿势、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的描述,这些重要而稍纵即逝的部分很容易被我们所遗忘。

如同我们先前所强调的,撰写实地笔记讲究的是个人自律(personal discipline)和时间。把它搁上一两天再行处理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因为实际写笔记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观察本身还要长。其实,经验法则是,你应该盘算花在撰写笔记上的时间至少要和观察时间一样长。当然,这并非恒定不变的原则。有些观察者花在笔记撰写上的时间少很多,但却依然能够完成出色的分析。其他许多研究者在实地笔记撰写上所耗去的时间,则远比平均值来得长。另外,你会用掉多少时间也取决于你所观察的场景,以及在你的所有时间中有多少比例会投入到这项研究中去。

但是,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处在场景中所努力激发的能量和热情与把发生的事实经过写在纸上的严谨态度,必须是旗鼓相当的。的确,花费在实地中最理想的时间总量应当由民族志研究者为其观察而撰写完整笔记的能力来决定。正如埃莫森、弗雷兹和肖所观察的:

> 限制在实地中的时间……减少实地研究者忘记所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或者减少因为撰写实地笔记的时间过长而产生厌倦感的可能性。对于民族志研究新手,我们建议只要

有可能,在实地中待了三四个小时后就要离开,以便开始撰写实地笔记。(Emerson,Fretz,and Shaw,1995,p.40)

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对流浪者的研究提供了警戒性的叙述。在冬天的一场暴风骤雨中,安德森连续几天几夜不间断地与无家可归的信息提供者一起待在街头和避难所里,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对极度恶劣的环境的反应。到他离开实地时,他已经积累了十几页草草记下的笔记,这使得他几乎要花费整整一个星期的集中劳动来将其拓展成实地笔记的定稿。

这些经验强调了观察后找到大量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来记录所观察到的内容的重要性。一些研究者所走的捷径就是录音或数码记录,如果你有途径获取这样的设备,这是很有用的策略,但是,这不能被曲解成精心撰写实地笔记的替代品。当然,"对着磁带诉说"有很多的优势: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说话速度都比书写更快,录音设备让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如走路或开车的时候,可以从事对观察的记录工作。不幸的是,每一个优势背后似乎总是有势均力敌的劣势存在。在这个例子中,存在的问题和访谈是一样的——录音带上的记录无法直接用于分析。要能够派上用场,它们必须要转录成文字稿。而且,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誊写是单调乏味、相当耗费时间的过程。和一开始就以文字稿形式把田野笔记记录下来的做法相比,将口述的实地笔记定稿誊写成文字稿所花的时间可能更长。把工作搁在一旁,等"稍后"你"比较想做誊写工作时"再来动手,这种做法的诱惑力非常大。有些研究者表示,一开始他们用口述法做笔记,最后却因为所谓的"稍后"始终不曾到来,而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假如你对于研究工作是严守纪律而十分负责的,你可能会发现录音机是忠实的助手。但是,假如你有极其轻微的拖延倾向,那么,就乖乖地使用键盘吧。

2. 内　容

实地笔记包含哪些内容呢?基本上,它们或多或少是依时间先后顺序记录场景内发生的事件,以及观察者遭遇到的事件和其内心的想法。说得更具体一些,下面描述的资料类型是实地笔记

典型地适合呈现的内容。大致说来，实地笔记是就描述场景、事件、人物、听到的和偶然听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谈话等。每一个接触到的新场景、人物、相互影响的片断以及被观察的事件都值得描写一番。你还应当记录所观察的情况的变化。由于你可能一再碰到相同的场景、人物以及其他的现象，你不需要重复类似的描述，只需要在变化产生时增补一二即可。在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应该将网撒宽一些，以便能捕获广泛的事件和互动。稍后的实地研究的观察可以变得更为精确，因为这时研究者的兴趣逐渐成形，并且更加聚焦。

除了这些暂时的关注点，我们认为实地笔记的撰写及其内容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具　体(be concrete)

不要概述或使用抽象的形容词和副词，而要尝试走向行为主义(behavioristic)和具体化。尝试停留在最低限度的推论层次上。这意味着，要认真地避免用概括性的术语，如漂亮的、丑陋的、滑稽的、抑郁的、凌乱的或穿着考究的，来"遮蔽"你所观察的内容。相反地，你要描述生动的细节，而形容词是以这些细节为基础的。而且，尽可能避免把参与者所使用的描述性或诠释性术语当作自己的术语。如果 A 认为 B 是快乐的、高兴的、沮丧的或任何其他的情绪状态，就把这句话报告成 A 对 B 的描述。尝试捕捉 B 的行为原貌，在那一刻暂且不对 B 的真实心理状况或其行为的"真正含义"做盖棺定论。参与者对于事物、事件和人的"真正含义"的信念，就要如实记载这只是一种"信念"而已。因为笔记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你应该记录不同事件发生的最接近的时间，包括评论和对话。

(2)用符号表示法(notationally)区分成员的评论

小说家兼社会观察者杜鲁门 · 卡波特宣称，他能够一字不差地回想起长达数小时的对话，这种能力极不寻常。比较典型的是，人类对某些事情能分毫不差地回想起，而对于其他许多事情则只能记住整体印象。你应该在实地笔记中标示出来，一段文字是否是逐字摘述自参与者的话语。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采纳一些符号系统，以便根据成员之间的评论被记起的精确方式来区分

这些评论。例如,安塞尔姆·施特劳斯等人在精神病院研究中用引号内记录的口语资料代表准确的回忆内容;撇号内记录的口语资料代表较不确定的回忆内容;未附加标点符号的口语资料表示他们回忆到的主旨内容,而非逐字的口语记录(Strauss, Schatzman, Bucher, Erlich, and Sabshin, 1964, p. 29)。其他人也建议了可供选择的符号系统(Emerson, Fretz, and Shaw, 1995, pp. 74-79),但是,精确的系统不如自己所拥有的系统更有意义。

(3)记录回忆的信息

在观察次数往上攀升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往往在最奇怪的时刻回想起你之前未曾登录到实地笔记里的信息,之前你认为微不足道的事件或者忘得精光的事件,现在以值得记上一笔的姿态浮现出来。尽可能把这些信息回忆起来,在当天的笔记里记载这些事项的日期、内容、背景等信息。

(4)包括分析性的想法与直觉(hunches)

假如你正在汇编你的实地笔记,那么你应该拒绝任何将全面的一致性强加到你的目录和观察中去的主张。你撰写实地笔记的目的就是将对细节的详细描述记录在纸上。实地观察和回忆出现在“真实的时间(real time)”中,反映了有生命的体验具有的插曲式的和杂乱的性质。它们典型地包括“事件的点滴和片断、陈述的开头和结尾、偶然的会面和罕见事件的记录、广泛的不相关的事件细节”(Emerson, Fretz, and Shaw, 2001, p. 353)。部分或所有材料的一致性的构建是研究过程中稍后阶段的任务(将在本书的最后一节讨论)。另外,如前所述,你的实地笔记的描述应该是具体的,行为主义取向的,能捕获行为、特征和背景的,同时将理论化和解释说明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然而,你的实地笔记也应该提供连续的记录,记录你所观察到的早期分析性的思考以及主要概念。如果你在从事实地笔记的撰写,分析性的想法与推论会浮上心头。举例言之,场景中的事物有何模式,当下的事件如何成为某些社会学概念或其他概念的实例,或者事情如何“在这里似乎真的起作用”。乍看之下,这些想法中的一部分可能显得平淡无奇而失之琐碎,一部分可能显得牵强而异想天开,其他许多想法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把所有这

些想法都加入到实地笔记中,唯一的附带条件是,别忘了要标出这是分析性想法或推论。一个好办法是将这些想法置入括号里,或者将这些概念性的和理论性的沉思放到实地笔记的单独一部分之中。

当你最后从场景中退出,专注于分析工作的时候,你所拥有的应当不只是原始的实地素材。如果在实地研究阶段中,你也记录了概念素材,为可能的分析线索与诠释奠定了基础,那么,协调的分析阶段就会因而大受裨益。这种素材从细腻缜密的分析片断,到关于核心主题或研究主题的广泛想法,种类繁多。我们在第 9 章里,会在编码与备忘录的程序中,对这些实地笔记层面讨论得更加详尽。笔记中涉及分析方向的编码与备忘录,很可能会比将要纳入到报告定稿中的编码和备忘录来得多。不过,通过尝试性的为分析方向奠定基础的做法,应该会让你最后的分析工作面临的困难少得多。分析工作将变成从现有的分析主题中做选择并钻研下去的过程。

(5)记录个人的印象和感受

实地笔记除了提供对被观察的场景、人物、事件、交易的记录以及分析性的概念之外,也可用来记录你的印象与感觉。你会对被观察的人们有个人的观点,对于身为观察者以及场景本身都有情绪上的反应。如前所述,你可能会感觉到气馁、高兴、被排斥或受人喜爱,等等。为了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感,你也应该记录任何涉入场景里的个人情绪生活的方面。如果你觉得尴尬,遭到奚落,特别受到偏袒,或者坠入爱河,痛恨某人,与某人有暧昧情愫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这份私密的日记应当详细记录这些事实。这个做法至少提供三项重要的功能:首先,诚实面对个人对于人、事、物的感觉(至少在私底下是如此)时,你可能会发现,某些参与者也有十分相似的感受,而你个人的情绪反应较为普遍,因而为分析提供了线索。举例来说,你感觉到场景中的某些人在事件转折的情况下被不公正地对待,暗地里为此感到愤怒,稍后你可能会发现,许多其他人私底下也有同样的感受。像这样的事实可能导向重要的分析路线。其次,你的情绪体验即便未曾与场景中的其他人分享,仍有可能点出重要的分析线索。比方说,跟资料提供者交谈时一再体验到焦虑或不安的感觉,可能只意味着你正察觉到,身为实地研究者的角色有其困难之处。但是,这也

可能指出,你的研究对象的世界观和你个人在想法上的差距,已经到了远远超出你所能够领会的地步。第三,你会定期审视你的实地笔记,在分析期间你也会频繁地使用到这些笔记。在过去不同的时间点上同步记录你的情绪状态,等稍后你远离场景,情绪较为冷静时,就能够容许你详细审视你的笔记,看看其中是否有明显的偏差。在那些你可能涉入太深或涉入太浅的案例中,你更可能因为质疑而受益。当然,个人意见、印象、情绪等流水账似的记录应当如实在笔记中标示出来,以及/或者将其移入笔记的独立章节中(关于情绪在实地研究中的"使用与滥用"的详尽讨论,请参见:Kleinman and Copp,1993)。

(6)提　示

任何一天的观察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一个事件的描述也可能缺少某个人的行为或意图目的的适当描写。观察者对事件的认知可能失之简略。一个描述完整(well-discribed)的事件可能引导你去寻找更多同性质的事件。换句话说,某一天的记录提出一连串的观察问题,需要记载更进一步的信息。当你在撰写实地笔记定稿时,一并做好注释的工作,这是很合理的。之后,你可以审视这些注释,将之整理成为要询问特定对象才不显得唐突的问题的提示。事实上,对于这些在下一次出行中要做的或要寻找的内容的提示,你可以在当天的实地笔记的最后章节罗列出来。

3. 风　格

在此,实地笔记关注的最后方面就是关于风格层面要考虑哪些内容。这个议题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长度问题:笔记应该要多长? 多完整? 某一观察期的笔记应该要有多少页? 观察者在实地笔记的详细度与长度上差异极大。有些观察者看起来像是受挫的小说家,在一段长达三小时的观察期间写了 40 页或更多的单倍行距资料。其他观察者可能只写了仅仅数页。这一点并没有一定的规则。场景之间的差异可谓有天壤之别,而观察者不吐不快的口语强迫(verbal compulsions)也有天壤之别。各个观察者敏于觉察的现象类型因人而异,差距极大。不过,在最低限度下,每一小时长的观察至少应该写下两页单倍行距的素材。你也很可能会想要写更多篇幅。

基于先前对机密性的讨论,实地笔记基本上是相当私密的文件,一般只开放给小范围的人(如老师、指导者、团队成员),所以,无需过分担心文法是否正确,标点符号是否适当,语气是否合乎礼仪。而且,关于你对信息提供者、观察以及实地研究体验的情感,也没有理由要特别警惕。然而,如前所述,不要让你的情感与你的观察相混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有一些机制来区分它们。

综合考虑,以上说明提醒我们,实地笔记的客观性就是尽可能把信息有效、正确、诚实地记载下来,虽然你的实地笔记定稿完全不会成为公开的文件,但是实地笔记的部分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在你将来的报告中占有一席之地。记住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为你将做的主张和分析提供了证据性的偏向(the evidentiary bias)。明白这一点,能引导你接近实地笔记的正确写作方法,这个方法和你写个人日记的方法有所不同。写个人日记不需要提供背景知识。例如,假定你的实地笔记的部分内容是面向将来更广泛的受众,那么你的书写应该关注丰富的细节以及相对的完整性,至少当你记录实地情境中那些十分重要的事件时,你很有可能在你将来的报告中引用你的实地笔记。

我们描绘中的实地笔记听起来是私密而坦率的,因而读起来也会趣味盎然。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是如此。但是,其压倒性的部分是由平平凡凡、平淡无奇甚至是单调乏味的流水账描述所组成的。确实,如果实地笔记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研究者直接出版其实地笔记就够了。然而,这些笔记是细腻琐碎的,未经分析的,它们将作为后来分析的基础。因此,当你踏进实地现场时,千万别以为实地研究是历险,尤其不要以为撰写实地笔记是一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如同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一样,实地笔记的撰写也要求有耐心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同时,因为被观察的事件以及你已经捕获的事件跃然于纸上,甚至是因为你对所观察的内容浮现了洞见和想法,在撰写实地笔记时,也不时会有意气风发与欢乐的时光。

Ⅴ.撰写访谈文字稿和实地笔记的强迫心理

如果以上所有关于誊录访谈文字稿和撰写详细的实地笔记

的忠告,听起来单调沉闷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的话,请振作起来。你一旦养成了严格的习惯,即誊写访谈内容、做笔记、定期快速记录并完成笔记整理,就观察撰写笔记定稿,那么,这些工作自然会有其必要性和逻辑可言。你会开始感受到,除非信息提供者的谈话不但做了录音,并且还誊写下来或摘记了内容,或者除非你所观察到的事项出现在你的实地笔记定稿中,否则,你就有遗忘这些谈话或行动的危险。也就是说,你会体验到把每一件事情誊写下来的强迫心理(compulsion),免得将会永远遗忘。如果在资料记录工作上达到了这种责任感的层次后,你就已经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实地研究之中了。

前面这五章只着墨于做自然主义研究的第一阶段。从个人的立足点起步,进入实地,融洽相处以及特别是记录资料,这一切都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实践。现在,让我们来迎接这项挑战吧。

聚焦资料

第二编

研究者依据第一编描述的方式搜集资料时，也开展第二项主要的活动，即聚焦(focusing)这些资料。我们所说的"聚焦"是指研究者开始设想：

- 可能专注的主题。
- 针对这些主题所提的问题。
- 可以唤起兴趣的处理方法。

这三项分别在第6、7、8章讨论，每一项应用于资料时，都是开始把原始资料转换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种知觉形态(a form of consciousness)。我们说"开始"，是因为第三种活动——分析在第三编讨论——也是必要的。

不过，在分析之前，研究者需要了解社会科学的主题、问题和旨趣的本质，我们在下面三章讨论这些问题。

思考主题 第6章

Thinking Topics

> 为了赋予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以意义，我们通常忽视了它们的独特性，并把它们当成物体（一个亲戚、一个礼物）、行为（一次道歉、一次犯罪）或者事件（一次比赛、一次会议）的特别种类中的典型成员。毕竟，"如果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被认为是独特的、唯一的、与任何其他事物无关的，那么对世界的理解就会破碎成为完全的无意义"（Simpson，1961，p. 2）。的确，只有将事物放置在某个范畴之中，事物才有意义。例如，我们要找到诊断的位置（感冒、过敏反应），并在这个位置内对其进行理解，临床症状才有意义。（Zerubavel，1991，p. 5）

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为了理解我们所观察的事物，我们通常根据理论、先前的研究或固有的本土分类系统的预先设定，将所观察的事物分类成为有意义的某个范畴的实例。这本质性观察与分析指南的标题概念"社会情境"，构成了这个范畴的一个研究领域。但单独来看，它太过广泛和抽象，无助于我们就所观察的内容提出聚焦的问题。为了更聚焦的调查和理解社会情境，我们需要更精炼的关于社会情境的观念，这种观念和它们的社会组织规模单元有关，也和它们的实质层面有关。单元与层面结合起来，形成了分析的主题，最终使我们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解我们的观察的意义。

Ⅰ. 单元与层面联合成主题

所有的社会情境都起因于一个或多个"行动者"在特定的"时

间"和特定的"地点"从事一个或多个"活动"(行为)的交叉(intersection)。这四个并列的因素为我们的资料分类和概念化提供了出发点,但是,根据组织规模,也就是说,根据组织的重要性、时期或大小,来思考这些维度变化的程度,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此,这四个基本的维度就是:①行动者(人们、集体、团体)的数量,②从事或呈现出的各种活动或行为,③我们涉入或聚焦的时间,④情境所占据的空间或范围的具体大小。这四个维度中的一个或多个的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组织规模的单元。例如,在这四个维度都较低的层次上,分析者聚焦的单元可能是在几步之遥的具体空间中,两个从事一个焦点行为(focal behavior)(一次谈话)仅仅几秒钟的人。从更微观的层次来看,研究者可能聚焦于某个人不着痕迹的"言辞行动(speech acts)"。在社会组织规模较高的层次上,单元可能是数以千计的人们,数十年中,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互动。这种规模的典型单元包括都市邻里、小城与乡镇。

我们说社会情境的层面,是指它们的社会内涵或实质,不论它们的规模如何。接下来我们探讨研究者经常聚焦的三个层面:认知(cognitions)、情绪(emotions)与等级(hierarchy)。

前面说过,在聚焦资料时,综合考虑特定的单元和层面可提供导向性的主题。在我们更充分解释何谓单元之后,我们会说明它们如何与层面结合来形成主题。

在继续探讨之前,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即:我们将详细阐述的单元和层面根植于更广泛的用术语称之为"社会"的全盘统一体中,研究者可以根据构成社会的各种制度化的领域(如:家庭、经济、政体、宗教、教育、医学)对它们进行研究,关于社会阶层、种族以及种族划分、性别和年龄(这是在"阶层"或"不平等的形成"这类题目下讨论的典型内容)的不同议题和张力与这些制度的功能有关。我们在本章(以及其他每一章,关于这个议题)所要概述的是聚焦观点的工具包,这对制度化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关于组织和分层的任何议题,都可能产生影响。我们认为,强调这点是很重要的,以免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没有处理某些特定人士感兴趣的实质事物。我们对这种质疑的答案是,只要是由本章所提的聚焦概念来引导(并结合其他章节的指导),任何实质性社会事物都可以深入分析。

Ⅱ.单　元

虽然社会情境有一些常用的单元，但并非权威的、众人都认同的单元。因此，我们在这里所提的单元是一组我们可以在实地报告中看到的范畴，而非对社会科学这些单元的决定性描述。对作为研究者的你来说，其实际意义是在你即将聚焦你的分析时，在思考社会组织的规模问题上应该放心地调整或创新。

单元大致是依据不断增长的参与者的数量、活动、持续时间和空间，渐次地从微观到宏观排列起来的。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个单元移到另一个单元的时候，社会组织的规模也逐渐扩增。因此，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个引进的新单元都会包含之前所讨论过的单元，而非彼此分离。

A.实　践

社会情境的最小单元是社会的或文化的实践——谈话或者行动的经常性种类，当具备分析的意义时，观察者便把焦点集中在它们上面。因为它们重复发生，具有日常生活的特征，所以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将它们当作日常事务，认为不值得注意。这些实例包括早上起来穿衣服、开车去上班或上学、锻炼、做作业、做研究、祷告、摆桌子、吃饭等。有时候自己或别人将这些实践打断或者对此进行质疑，因为我们做错了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让别人觉得讨厌或侧目，因此我们被要求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说明（Scott and Lyman，1968）。这种说明行为以及用来证明某人有差异的行为是有理的，或者将其与文化信仰或个人的、集体的身份联系起来的类似实例（参看有关"中立的技巧〔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的讨论，Sykes and Matza，1957；以及有关"联盟行动〔aligning actions〕"的讨论，Stokes and Hewitt，1976），构成了实地研究者广泛研究的一系列实践。实例包括：对 25 名被判刑的杀人犯为其罪行所提供的说辞的评估（Ray and Simons，1987）；对学生关于为了证明"浪费"时间而不去学习（Bernstein，1978）、逃课（Kalab，1987）以及即使知道是错误的还要发生的学校作弊行为（McCabe，1992）等说辞进行的分析；追踪某家"天然食品公司"的员工如何从事被

称为“打折”的联盟行动,尽管是用反对的方式,但使得他们保护了他们集体的身份(Pestello,1991);引出62名美军将军关于他们成功的事业的说辞(Dowd,2000)。当然不是所有的说明行为都是回顾性的。它也可以是对参与者未来行为的提问而引发的,如伊丽莎白·墨斐在她的研究中发现,母亲们有时候“提前说明,因为她们可能最终认为她们喂养婴儿的方式不是最理想的”(Murphy,2004,p. 129)。这些说辞实践的研究很有趣,不仅因为它们呈现了具体的情境中实践的特征,而且一般都表明了说辞实践的跨情境特征和结构。

实地研究者可能聚焦的实践范围几乎是无限的,如:考试中考得好的学生是如何表达他们的高兴,而并不为那些考得差的学生遗憾或者为他们觉得丢脸(Albas and Albas,1988);在单身酒吧和夜总会里女性如何让男性“冷静”的行为(Snow,Robinson,and McCall,1991);在疗养院为老年人工作的范围(Akerstrom,2002);在乡下的嬉皮士群居村里的思想意识(Berger,1981);克利须那(Krishua)组织的皈依者(Rochford,1985)以及同性恋和前同性恋的男性基督徒(Wolkomir,2001);和平运动积极分子之间的一致性对话(Hunt and Benford,1994);工人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顺从和抵制实践,试图“辨别”(Burawoy,1979)或者试图控制工作的结构(Hodson,1991)。

B. 片　断

相对于实践而言,片断(episodes)被参与者视为是值得注意的、富于戏剧性的,因而分析者也会有同感。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它们不是完全按照期望或并不是经常或有规律地发生的。片断的具体实例有:离婚、急症重病、犯罪的受害者、犯罪、社会与自然灾害、群众闹事(如暴乱、恐慌)等。的确,有几个社会学专业的重要部分就是专门分析片断的,如越轨行为、犯罪、灾难、群众行为和社会运动。

片断将因其所牵涉的人数与活动的多寡以及时间和地域的跨度而异。群众行为的片断,无论是抗议还是庆祝,可能用各种方式呈现出来(McPhail,1991)。为了抗议某一个特别的政策或者庆祝一次体育竞赛或锦标赛的胜利,这些与集体行为相关联的群

众活动是个别事件。在其他的场合，事件在延长的时期内重复出现，1977 年德克萨斯大学的学生们在星期六晚上集合起来，全体庆祝他们的足球队意想不到的胜利以及在全国排名的上升，他们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为期五周的时间内反复进行(Snow, Zurcher, and Peters, 1981)。1990 年代在乔治亚州的一个农庄，虔诚的朝拜者反复地集会，以便观看所谓的圣母玛丽亚的幻影(Davis and Boles, 2003)；在洛杉矶的三个社区中，群众在为期六周的时间内举行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反对对伊拉克的入侵(Corrigall-Brown and Oselin, 2003)。还有其他的情形，集体行为的众多事件，例如暴动，有可能存在于多个城市，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由波浪式的或者循环式的集体行为组成(概念上的澄清请参看：Traugott, 1995)。集体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散对理解社会运动的动力学十分适当。

C. 相 遇

相遇(encounter)是两个或更多人在彼此身边出现，并试图维持相互关系的单一焦点(通常是口头的)所形成的微小社会体系。相遇与前面讨论过的单元(以及下面要讨论的某些概念)的相异之处在于，它们总是有界限的社会体系，是在场人士之间的关系维持。或许，原型的实例就是鸡尾酒会或学院的交流会，在这样的场合，参与者成群地相遇，每一次相遇持续的时间仅仅和人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一样长。一般来说，都不会延续太长时间。事实上，大部分的相遇都有相似的生命周期，尽管有些持续几个小时，但是大部分只存在几分钟。公共休息室里的一同出现(Cahill et al., 1985)、人行道上的闲聊(Anderson, 1990; Duneier and Molotch, 1999)、公共场合中小的帮助需求(Gardner, 1986, 1995)、通过乞讨恳求捐款(Lankenau, 1999; Snow and Anerson, 1993)、顾客和卖主或者销售人员之间的商业交易(Lee, 2002; Prus, 1989)，这些都是普通的对相遇的描述。关于后者，罗伯特·普鲁斯的《做买卖》(Prus, 1989)民族志详述了一系列的卖主实践，其中也涉及销售中的相遇，例如介绍产品、产生信任、中和抵制情绪、获得承诺等。或许最平淡的就是委员会会议、求职面试以及学校情境中和工作场所中的班级会议和学术会议。

D. 角色和社会类型

人类从事日常事务时普遍的取向就是,根据以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角色或社会类型,对参与者的相遇进行分类。虽然许多学者有时候对社会角色和社会类型的特征有些模棱两可,但事实就是,两者典型地相互作用,就好像一个对另一个特别的角色负有义务,或者归因于它们的同一性,即它们一起构成了某个特定的角色或社会类型。我们对每一种角色和类型进行简要的介绍。

1. 角 色

角色最明显的形态是由大量的与关系网或者矩阵中的特别位置相关的行为组成的。以足球队中卫的位置为例。我们识别和知道这个位置和中锋或者后卫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根据整个比赛中他/她的行为来判断的。母亲、父亲、学生或教授的角色也是如此划分的。没有一个单一的行为能构成一个教授的角色;相反,教授的角色包括依附的其他相关的角色,如学生、教辅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研究主体,它们被认为是教授的"角色布置(role set)"。那么,角色的功能作为一种相互影响的定位装置(orientational device),我们可以用来确定别人行为的位置、理解与我们互动或我们所观察的人的行为的意义,我们也可以用角色来组织我们自己与其他人相关的行为。

有大量的质性研究聚焦于不同的正式和非正式角色及其协商、制订或退出过程。类似的实例包括无数的对"创造性别(doing gender)"的研究(Copes and Hochstetler, 2003; De Welde, 2003; Leyser, 2003; Murphy, 2003; Wesely, 2003)。关于海军出纳员(Turner, 1947)、酒吧女服务员(Spradley and Mann, 1975)、大学生运动员(Adler and Adler, 1991)、女大学生联谊会的"侍者"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冲突(Zurcher, 1983)以及角色退出过程的研究,就像不再当牧师或不再当修女的案例(Ebaugh 1988)一样,这些都是实地研究所聚焦的或多或少正式的角色。对非正式的以及短暂的角色的实地研究包括灾难工作人员(Zurcher, 1983)、友好的纸牌游戏的参与者(Zurcher, 1983)、卡拉 OK 厅的老主顾变成定期的表演者的过程(Drew, 2001)。

2. 社会类型

社会类型与社会角色的概念相交叠，但是，和社会角色又有些不同，它为“编码(coding)”人群提供了另一个范畴。精确地说，社会类型是一种定位在个体的特殊行为与正式或非正式的角色行为之间的概念，因此，从概念上考虑了“比正式的……结构认知更细微的区别”(Klapp, 1958, p. 674)。著名的实例包括“失败者”、“恶霸”、“聪明的家伙”、“自作聪明的傻瓜”以及“逆来顺受的人”。社会类型在质性研究过程中被认为在分析上是有用的，这些质性研究包括对“皈依者”(Snow and Machalek, 1983)、传统的黑人社区中的“老头”(Anderson, 1990)以及格林威治村街上的书贩中的“公众人物”(Duneier, 1999)的研究。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因素被认为是有疑问的社会类型的指标。

E. 社会的和个人的关系

把通过相互依赖且互动的双方看成是“相互联系的”，这简单地形成了社会关系。这种成双对变化的方式有很多种：普遍情绪的特性、资源相互依赖的程度、信任的多寡、双方相对的权力大小、彼此熟识的程度、关系的定位、关系是短暂的还是持久的等。对社会关系的研究趋向于聚焦在那些亲密的关系上，如：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以及那些在正式组织或工作场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前者较著名的实例有：以利亚・安德森(Anderson, 1976)对男性黑人的研究(这些黑人在 Jelly 的著作中也曾出现)、米奇・丹尼尔(Duneier, 1992)对每天在“Slim's table”相见的五位黑人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威廉・F. 怀特(Whyte, 1993)对他所谓的“诺顿家族”的意大利街头团体的关系和活动的经典研究。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不仅可能在公共的以及准公共的场所很常见(Anderson, 1990, 1999; Duneier, 1999; L. Lofland, 1998; Morrill, Snow, and White, 2005)，而且，虽然这些关系可能十分短暂，转瞬即逝，但是证明了它们大部分是典型地与私人领域相关的热情的、亲密的个人关系在身体和情感上的制造者。脱衣舞夜总会的色情脱衣舞就是这样的例子：建立的是在公共/准公共场所中的充满感情但暂时被压缩的个人关系(Massey and Hope, 2005)。

F. 团体和派系

有些人在一段长时间内与他人进行频繁的互动,自认他们是一个社会实体(a social entity,“我们”),对决定成员资格有某种标准或理解,这些人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团体(a social group)。在官僚背景、帮派、私党和家庭中兴起的有组织的业余团体和非正式的休闲与工作团体是最主要的实例。由于对这些方面以及其他的团体形式方面的研究是很丰富的(如:Anderson,1976;Duneier,1992;Horowitz,1983;Suttles,1986;Whyte,1993),在此,出于说明性的目的,我们聚焦于派系(cliques)。

派系基本上根植于非正式的朋友或同事所组成的圈子或网络,其成员认为他们自己用某种方式相互联系。像杂草一样,派系倾向于在各种各样的组织背景下生长,但是,因为背景的不同特征的决定作用,所以有不同的派系。

梅尔维尔·道尔顿(Dalton,1959,pp. 57-65)在观察某些商业和工业实体的高级行政人员时,不仅发现了派系的存在,而且注意到了他们之间非正式的连结网,这些连结网依靠他们与围绕在组织之中的正式结构的关联而呈现不同的形式。他论证了三种基本的形式:“垂直派系”,通常在“单一部门中产生……在上司与他的某些部属之间”;“水平派系”,它“跨越不同的部门,多半包括正式地位平等的人”;以及“随机派系”,其成员可能来自任何部门。

在年龄结构的相对一端,是儿童和青少年中间盛行的派系。在阿德勒双氏对青春期前的文化和同一性的民族志研究中,他们在为期 8 年的时间内研究了他们所在的社区中的青少年,发现派系是“孩子们生活中的主导特征”(Adler and Adler,1998,p. 56)。尽管由于学校规模、人口统计学资料、年级以及教室组织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派系的组成和特征有些不同,但他们发现,“对于任何年龄水平的孩子,在每一个团体中,在每一个人数超过 80 人的学校里,不仅都存在派系”,而且,都被典型地分为四种主要的团体。

> 在最高层是最受欢迎的派系,由高傲的群体组成。接下

来是赶超崇拜者的团体，这些团体的人游荡在受欢迎的派系周围，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接下来的就是中间团体，由更小型的、独立的朋友圈构成。最底层的就是社会隔离分子，他们发现玩伴纯属偶然，大部分时间他们是自己度过的(1998，p. 75)。

这种派系结构倾向于在青少年和中学水平的学生身上繁殖，这不足为奇。奥古斯特・霍林谢德(August Hollingshead，1975)许多年前在对 Elmtown 的青年的实地研究中发现，这些人分成三个派系：精英分子、乖孩子和肮脏的家伙。派系在大学生中间也同样存在。例如，迈克尔・莫法特(Moffatt，1989)在对 1980 年代晚期和 1990 年代的 Rutger 大学的学生生活的民族志研究中发现，派系存在于寄宿学生中(pp. 95-103)。因此，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具有相同个性的个体集合存在，你就有很大的可能找到派系的形成或者某些其他的非正式团体，如帮派。非正式团体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使得人们更容易地适应他们的环境，特别是当没有什么组织或者组织不多时，这种情形在大规模的官僚机构，如中学、大学、工厂、监狱以及精神病院中常见。

G. 组　织

根据查尔斯・佩罗的描述，大型的组织就是"我们社会的风景中最重要的特征"，至少在美国和其他大规模的现代社会中是如此(Perrow，2002，p. 1)。因为组织被认为是刻意形成的集体，通过几乎明确筹划的方式，达成集体的正式目的，因此不赞成佩罗的论点是很困难的。毕竟，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很少不受正式组织的影响。例如，思考一下你早上的日常事务，你去上学或者上班，这两者都是正式的、组织好了的环境；你可能开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但是这都是大规模的公司或政府组织的有形延伸；中午，你通常可能照例去一些经常光顾的快餐店，这些快餐店一般是当地大型社团组织的经营范围，如麦当劳、汉堡王(Burger King)以及墨西哥速食店。基于这些考虑，在社会学中，对组织的研究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质性研究也在该领域贡献良多就不足为奇了。

对组织进行考察的一些主要层面包括它们形成的环境、它们

如何招揽并控制成员、成员适应组织的约束条件和控制方法、它们达成目的所采用的策略类型与理由,以及它们成长、转变或衰落的原因。基甸·昆达(Kunda,1992)对一家美国高技术公司的工程部门的民族志研究,把对这些论题的关注点中的前两个清楚明白地说出来了:管理控制和成员适应。昆达发现了通过将公司的文化强加给在公司工作的"工人"的管理行为和他们体验这种文化的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工人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公司忠心耿耿,相反地,他们对公司的策略和结构冷嘲热讽。有趣的是,昆达的发现和欧文·戈夫曼在一家显著不同的组织,即精神病院的发现很相似。戈夫曼在那里发现,同室者经常进行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的"后天性适应(secondary adjustments)",这种适应可以理解为成员试图发展或保持自我,而这种自我和精神病院试图强加在他身上的自我是相分离的。其他类型的成员适应在其他类型的组织背景中已经提到了。其中最著名的实例是唐纳德·罗伊(Roy,1959/60)的民族志研究,他所研究的是工厂的工人如何处理特别单调的工作。受雇于这种工作(其中包括整天压印皮革制品或塑料制品的某些部分),罗伊观察发现,他所在的工作小组几乎每个小时都要休息一会儿,这样就可以不时地打断这种单调,这些休息和整个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相一致。各种短暂的休息包括"桃子时间(团体分享一个桃子)"、"香蕉时间"、"窗户时间"、"午餐时间"、"取货时间(某人过来取最新的产品)"、偶尔的交谈、"吃鱼时间"以及"可乐时间"。

通过质性实地研究所考察的其他的组织动力学和议题包括妮可·毕加特(Biggart,1989)对直销组织的民族志研究,这种直销组织的例子如玫琳凯化妆品(Mary Kay Cosmetics)和夏克利(Shaklee),他们分别通过强调"皮肤保养"和"良好的健康"来模糊"社会中的经济"的策略(pp. 116-117);维基·史密斯(Smith,1990)对加利福尼亚银行中层管理人员所面临的机构重组的体验的观察研究;加里·艾伦·怀恩(Fine,1996)对饭店工作的组织和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卡尔文·莫里尔(Morrill,1995)对美国公司诉讼案中行政人员的冲突原因和管理的研究(如想详细了解民族志对组织社会学的贡献,请参看:Morrill and Fine,1997)。

H. 群落和居留地

实践、相遇、角色、团体和组织彼此复杂相连，组合在一个社会划定的领域内，发挥各种维持生活的功能，通常被称为群落(settlements)。非常大的群落，数千甚至数百万人的城市，远远超过自然主义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但较小群落的研究，村庄、市镇、贫民窟、邻里、街头，在自然主义实地研究的文献中比比皆是。例如，古典人类学的研究是对整个"较单纯"社会的描述性记录，这些社会是前现代的、相当小的，或者只是社会的某个特征，但是，却可以用来作为理解整体的钥匙，正如爱德华·伊文思-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1937)在对阿赞德人的魔法和语言的实地研究中就有这样的说明；玛格丽特·米德(Mead,1928)对萨摩亚人的性和性情的研究；拿破仑·查冈(Chagnon,1983)聚焦于委内瑞拉和巴西交界的雅诺马马热带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的暴力仪式；以及克里福德·格尔兹(Geertz,1973)对巴厘岛人中"斗鸡"的研究。因此，人类学许多研究的分析单元实际上是群落或者是活动和实践，而活动和实践被认为是群落的特征和组织的具体表现。有趣的是其中四部都聚焦于大城市中的意大利(或混杂意大利裔)社区：威廉·F. 怀特的《街角社会：一座意大利贫民窟的社会结构》(Whyte,1993)，是在波士顿北端做的研究；赫伯特·甘斯的《都市村民：意大利裔美国人生活中的团体与阶级》(Gans,1962)，是在波士顿西端做的研究；杰拉尔德·萨特斯的《贫民窟的社会秩序：城市贫民区的族裔与区域》(Suttles,1968)，是在芝加哥做的研究；以及乔纳森·雷德的《卡纳西：布鲁克林抵抗自由主义的犹太人与意大利人》(Rieder,1985)，是在纽约做的研究。

最近，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许多研究继续沿着传统的聚焦点，对群落的某种类型进行研究。典型的实例包括梅塞·苏利文(Sullivan,1989)对布鲁克林许多社区中的年轻人的街头犯罪和合法雇用的比较民族志研究；以利亚·安德森(Anderson,1990)根据菲律宾两个相邻地区的种族和阶层的不同居民之间的相遇所做的实地研究，以及其随后在同一个城市的市中心犹太人区所做的"街道编码(codes of streets)"的研究(1999)；南希·辛柏-休斯(Scheper-Hughes,1992)对一个巴西人社区日常生活中的暴力特

征的研究;迈克尔·贝尔(Bell,1994)对环伦敦西南部村庄里的乡村生活所做的民族志研究;玛丽·帕迪罗-麦考伊(Pattillo-McCoy,1999)对中层黑人社区的研究;以及凯瑟琳·纽曼(Newman,1999)对纽约市中心两个社区中的贫穷工人的研究。

与群落这个概念相交叠的是米奇·丹尼尔(Duneier,1999)所谓的"持续的居留地(a sustaining habitat)"。当他的"人行道"的实地研究告终时,激起他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部分没有房子的贫穷黑人都聚集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第六大街上或周围地区(pp. 123-143)。他的回答是这个地区变成了人们的持续的居留地,这是受到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行人的密度"、商业、"可获得廉价的或者免费的食物"、"大量的相对不受惩罚的可以睡觉的公共场所"、"这里有许多人,他们同情这些没有房子的人,又愿意给他们提供钱和食物"以及装有"高质量杂志"和其他适于销售的东西的垃圾桶(pp. 144-153)。丹尼尔的观察所带来的分析结果是,场所和大量活动与定位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维持这些活动的必要因素联合的功能。换句话说,不同的场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或两个街区、邻里或者更大型的社区,都有不同的"运送容量(carrying capacities)",因此,这些场所是用某种生活方式或亚文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或成对出现的。

正如许多自然主义的研究一样,群落或居留地的研究通常是由一位形单影只的研究者进行的(除以上引用的研究以外,还可以参看:Baumgartner, 1988; Ellis, 1986; Gans, 1967; Horowitz, 1983; Kornblum, 1974; McRoberts, 2003; Venkatesh, 2000)。只要单元不是太大,也就是说,不比一定范围的地区或小镇的单元还大,这已经证明是令人满意的安排了。不过,较大群落的研究,中型市镇或小城市,就需要用到研究团队,有时需要很大的团队。例如,罗伯特·林德与海伦·林德对印地安纳州蒙西市的先驱研究(Lynd and Lynd, 1929)即是由作者、两名调查者以及秘书群所做的,卡普罗、巴尔、查德维克和威廉姆森(Caplow, Bahr, Chadwick and Williamson, 1982)重做的研究更为复杂。阿瑟·维迪奇与约瑟夫·本斯曼对纽约北部的一个乡村社区所做的研究(Vidich and Bensman, 1968)则是由"康乃尔社会成长研究(Cornell Studies in Social Growth)"这个更大的计划所产生的,其

中包括一组庞大的研究团队。劳埃德·沃纳负有盛名的名为《北方城市》的研究著作,记录了在曼彻斯特的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市的研究,则是劳埃德·沃纳、许多其他主要研究者以及众多来自哈佛大学与赖德克里夫学院的学生,其中多数是大学生,这些人共同研究的成果(如想了解北方城市研究的摘要以及其他在 1960 年代以前所做的社区研究摘要,请参看:Stein,1964)。

I. 亚文化和生活方式

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组织的最后单元是,由社会科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概念化的亚文化(Fine and Kleinman,1979)和生活方式(Zablocki and Kanter,1976)。尽管它们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在此我们将它们放在一起,因为它们意味着行为的、标准化的以及认知因素的混合,它们一起使生活方式表现得有特色,为处于相似境地的个人进行定位,使他们和其他社会单元的团体或集合体的人之间有所区别。而且,不论研究者是否依据亚文化或生活方式进行思考,它们都构成了社会力量和变迁在遭遇个体时进行融合或拒斥的模式。这些在保罗·威利斯(Willis,1977)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时就曾论证过;塔尔马奇·赖特(Wright,1997)在他所观察的圣荷塞和芝加哥流浪者的激进主义分子及其运动中也有辩论;莱拉·鲁普和维塔·泰勒(Rupp and Taylor,2003)在对基韦斯特市男扮女装的男子同性恋的多层面研究中也进行了论证,正如帮派研究者再三发现的一样(Horowitz,1983;Sarchez-Jankowski,1991;Vigil,2002)。

当根据亚文化或生活方式进行思考时,对调适或融合模式的理解能引起对各种文化的、身份的以及经济因素的回应,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描写不同生活方式的基础时,本杰明·扎布洛基和卢莎贝斯·坎特(Zablocki and Kanter,1976)曾根据是否受到个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的控制来区分各种生活方式。他们将经济主控的生活方式依次分为三种类型:①财产主控的(property-dominated),如"上层阶级的精英等级";②职业主控的(occupation-dominated),如实际上使执业者完全投入到职业事务中;③贫穷主控的(poverty-dominated),如美国都市的贫民窟。或

许是因为接近比较容易,第三种类型可能是民族志研究最多的类型,这一点只要想想大量关于美国流浪者潮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自然主义实地研究(如:Dordick,1997;Liebow,1993;Rosenthal,1994;Snow and Anderson,1993;Wagner,1993;Wright,1997)就知道了。这些研究及其他的研究表明,当生活方式或亚文化从特定的经济环境中生长出来,它通常就会发展到去包围生活领域,而不仅仅是物质领域。

并非所有的亚文化和生活方式都被详细阐述了,也并非所有的亚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固定在其成员的经济环境中。相反地,它们可能固定在某个特别的活动中,如裸体(Douglas and Rasmussen,1977)、文身(Sanders,1989;Vail,2001)以及"闲逛"(Harrison and Morgan,2005);也可能固定在特别的性取向之中,如女性同性恋者和男性同性恋者(Krieger,1983);或者固定在反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如新反传统文化者(Epstein,1991);活命主义者(Mitchell,2002)以及少年恶魔(Lowney,1995)。

Ⅲ.层面与主题

在聚焦的某单元或所有单元中设法掌握整个社会学本质的研究者,并不多见。相反地,我们在前面说过,他们聚焦本质中的一个或多个"片段(piece)"。我们把这些"片段"称为"层面(aspects)",把单元与层面的结合称为主题。若要细数质性研究者写过的所有单元的所有层面——也就是详尽记录各主题的所有层面,将会写成好多本书。但既然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举例说明,而非言无不尽,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少数几个只跟某个单元的认知、情感或等级层面有关的研究实例中。

A.认知层面或意义

因为人类行动部分地是以事物所拥有的意义为基础的(Blumer,1969),任何单元最基本的层面之一就是认知的层面(嵌入其中或与之有关)。从广义上讲,意义是语言学的范畴,定义我们所指的事物,因而构成参与者对现实的观点,影响我们对那些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正是由于意义、定位以及行为之间这种无法

逃避的联系，自然主义的实地研究者才强调接近和理解被研究的意义系统的重要性（Denzin，1989b；Emerson，2001；Geertz，1973）。当然，通常也有许多常用的单词或短语与意义同义或与之交叠，如解释、情境定义、类型化、意识形态、信念、规范、框架、世界观、观点、刻板印象。虽然在这些概念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这些词语都把焦点集中在我们社会世界已构建的特征和组成它们的物体上。因此，为了简化和说明，我们在此使用意义作为一个总括概念（an umbrella concept），来思考认知维度或社会组织的各种单元的层面。

1. 作为意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概念）

意义因其应用的情境范围而异。围绕着生活的意义涵盖更广泛的层面，因为它们对于任何可能被研究的主题都是适当的。这一整套东西被不同地称为意识形态、世界观、人生观或者哲学。虽然这种意义在诸如实践或相遇等较小层次单元的分析中可能有关，但在团体或团体以上的层次，它们常被当做单元的层面。例如，在团体或组织的研究中，研究报告中有一个显著的部分经常专注于"意识形态"（如：Kunda，1992；Smith，1990；Snow，1993）。

分析团体与组织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经常聚焦的问题就是，参与者如何运用方案来定义或修护某些有疑问的主题或议题。本内特·伯格将此称为"意识形态的工作（ideological work）"。伯格于 1970 年代在对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乡村成员的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他们意识形态的信念和他们的行为之间的分离，如：他们抚养孩子的实践和他们公共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相矛盾。为了对村民的谈话从概念上采取补救措施，以便让他们在信念和行动上"保持某种表面上的一致性、连贯性以及连续性"，伯格（Berger，1981，p. 22）创造了"意识形态的工作"这个概念。为了考察 1970 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克利须那组织运动内部的变化和适应，伯克·洛奇福德（Rochford，1985，p. 192）同样发现，这个运动面临着"其所声称的信仰和成员的日常实践之间的"许多矛盾，这个组织试图通过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种形式来修整这个运动。伯格和洛奇福德的研究都表明，当信仰和成员的行为相矛盾的时候，先行起作用的是意识形

态的工作。但是,其他的研究也表明,当信仰和世界上的事件不调和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工作也是有必要的。例如,约翰·洛夫兰德(Lofland,1997)研究了一个意识形态是“拯救世界”的宗教团体,其信徒相信他们注定要促使数千人皈依,并努力达成其目标,但在事业的早期阶段他们就失败了。洛夫兰德就问:这个团体如何协调其目标与实际行为之间经年累月的差距?他的答案是引用它的意识形态,形成三个解释,说明其一再失败的原因:

- 首先,美国人的团体是韩国人所建立的团体的分支,这个母体开始促成大批人改宗皈依之前,也曾历经数年没有成功。他们会提醒自己,他们或许只是依循“韩国模式”。
- 其次,他们会运用他们的一般“换位原则(principle of restitution)”,这个原则认为上帝与撒旦轮流发挥其影响力。现在的失败是因为撒旦的影响力大行其道,这种影响稍后在促成改宗皈依的前景中,会被上帝的好影响拨乱反正。
- 第三,信徒相信上帝刻意不帮他们,是看他们自己能有什么进展。现在的失败是考验其力量。(1977,pp. 244-245)

2. 作为意义的规则

规则(或规范)构成了意义的另一个广泛的范畴。与其他意义的不同之处主要是,依附于它们之上的正面道德的偏好程度,以及它们用法律或法规表述的清晰程度。具体的单元可以依据可操作的规则(如果有的话)以及参与者用来引导其行为的规则而做分析。还有的时候,规则没有被编成法典或者是不正式的,但是却被广泛地理解,例如,以利亚·安德森在研究市中心年轻人中的暴力时就有此发现,根据安德森的观察,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其他行为,是由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操作所控制的,他把这些规则称为“街道的编码(code of the street)”。

> 规则规定了适当的动作,如果动作面临挑战时,规则又规定了回应的适当方法。它们控制了暴力的使用,因此提供

> 了基本原则,让那些倾向于进攻的人用一种被人认可的方式从暴力冲突中退出来。(Anderson,1999,p.33)

还有的时候,规则既没有被编成完整的法典,也没有被明确叙述,而是把确认参与者的行为规则的任务留给了分析者。例如,在林恩·洛夫兰德有关陌生人相遇的研究中,她勾勒出人们在这些相遇中维持隐私与社会距离时似乎在使用的六种原则或规则:

> - 第一原则:尽量减少表露。面部表情保持冷漠……
> - 第二原则:尽量减少肢体接触。彼此保持距离……
> - 第三原则:坐下来之前先看看:彼此隔开……
> - 第四原则:尽量减少目光接触。目光保持在自己身上……
> - 第五原则:有疑虑时,走人。保护自己……
> - 第六原则:有疑虑时,转移注意力。保持漠不关心……(Lofland,1985b,pp.153-155)

3. 作为意义的自我概念和身份

一个人将自己看成哪类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这个问题是与一个人的生活相关的众多重要的意义之一。的确,我们的自我概念和身份不仅从垂直和水平的角度反映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位置,而且,也是我们用来操纵和处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定位仪。这是欧文·戈夫曼(Goffman,1959)所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所有类型的社会背景中,这个主题在大量自然主义的实地研究中被反复强调,实例有:诺曼·邓辛(Denzin,1987a,1987b)在"酗酒者的自我(the alcoholic self)"的研究中,在对酗酒者匿名的背景下,在为期 5 年积极地让酗酒者改过的研究过程中,他逐渐理解了这一点;阿德勒双氏(Adler and Adler,1991)对一流的大学生运动员以他们受雇的大学为背景所进行的多年的"荣耀的自我(glorified self)"的研究;丽贝卡·阿拉亚利(Allahyari,2000)对帮助流浪者的两家慈善团体的志愿者的"道德的自我(moral selving)"的研究;以及凯思琳·布里(Blee,2002)以访谈为基础,对在右翼极端主义分子运动中的女性的"种

族主义者的自我(the racist self)"的考察。这些以及其他这类研究表明,当我们从参与者的立场出发时,自我和自我概念是大多数社会组织单元的适切层面。

身份的交叠概念也是如此。因为与他人的互动要视相应身份的建立而定,所以,身份和大部分的社会场景和背景相关是可论证的。在各种关于身份的视角中(如:素质上的、结构上的、法令解释者),在社会学范围内最有影响的观点聚焦在角色和身份之间的联系上。这个观点论证道,我们所使用的是我们自己和别人的名字,在很大部分取决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被感知的角色。它认为,身份的存在,仅仅"因为在一个构建的角色关系中,这个人是一个参与者",并且它们"受这个人所涉入的构建的角色关系的数量的限制"(Stryker,1980,p. 60)。因此,如果你像大部分人那样,你可能有多种身份,但是,不是所有的身份的重要性对你和对别人都是均等的。此外,任何特别身份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因你那时互动的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当你做事时或与你的同辈相遇时,你作为儿子或女儿的身份就没有你作为同辈的身份那么重要了。

考察涉及角色身份的不同议题,是许多质性研究的焦点,特别是在社会学中由象征互动视角所引发的议题。这种研究的许多部分聚焦于充当社会角色的在职者个体如何通过声称相反的或非传统的身份抵制与那些角色相关的身份。例如,欧文·戈夫曼所著的《收容所》(Goffman,1961a)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收容所的同室者对"受辱的自我(mortified self)"的适应或对同狱犯人角色的身份认同。其他的研究也依照这种调查路线,包括对流浪者中间的同一工作实践的考察(Snow and Anderson,1987)、患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身份建构(Sandstrom,1990)、慢性病护理机构的居民可选择的个人身份的建构(Paterniti,2000)、以色列军队在战斗期间的同性恋身份的管理(Kaplan and Ben-Ari,2000)以及不同背景下各种"污名(spoiled identities)"的转换(Oselin,2004;Ponticelli,1999)。

B. 情绪层面或感觉

把单元的认知层面与情绪层面分开来看,把意义与感觉分

开，当然扭曲了经验世界（Forgas，2000）。我们在下面的例子中会看到，认知是感觉不可或缺的成分，正如情绪是意义不可或缺的层面一样。但我们在这里把它们分开，有两个理由：其一，因为这种做法简化了我们的解释工作；其二，社会科学家最近对人类社会生活情绪的集中性的发现，与关于这个主题已出版的研究作品的相应增长是一致的（Stets，2003）。

1. 情绪与实践、片断及相遇

因为你对社会生活的情绪层面感兴趣，所以，开始观察的最佳位置是从分析的最微小单元着手，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真实的行为才能发生，真实的情绪才能展现。毕竟，记录实践的目的在于使互动常规化，避开尴尬的可能（参看本章Ⅱ. A 部分）。许多相遇的实质从情绪展示的管理（Hochschild，1983）延伸至愤怒的反责（Denzin，1984）以及嫉妒的长篇攻击性演说（Ellis and Weinstein，1986）。一些片断的内容包括各种情绪的展示，从惊慌失措的飞行（Johnson，1988）到心醉神迷的狂欢（Lofland，1985，Ch. 2）再到暴力的爆发（McPhail，1994）。

在实践的层面，坎达斯·克拉克（Clark，1987）对日常生活中同情的交换提供了一个按标准规定的、例行公事执行的口头协定的实例，有助于维持人与人之间同情的合理流动。这些协定包括：①运用真实的、严肃的场景和事件作为为同情辩护的理由；②以合理合法的间隔时间来声明同情；③当辩护的理由是真实的，并且间隔是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上时，真实地宣称同情；④用感激、顺从、尊重或者同情本身来作为报答同情的礼物（Clark，1987）。

在片断和相遇的层次上，杰克·卡兹（Katz，1999）进行了一次以实地为基础的考察，考察的对象是在洛杉矶街道上使汽车驾驶员“愤怒无比”的综合状况——一般被称为“路怒（road rage）”。这种情绪已经加温，但是又稍纵即逝，因此，对于这种在过路司机之间的片断以及相遇导致的结果，他论述道，

> 互动解释的一个明显过程（如：对讨厌的司机的“无言”的诋毁）、一次具体的变态经历（如：愤怒的肉体的或者有形

的经历)、一次集中的陈述(如:对愚蠢而可恶的司机的"无礼举止"),这些都是开车时变得愤怒无比的个别的必要条件和共同的充分条件。(1999,p.24)

在对实践、片断以及相遇的合并聚焦中,詹妮弗·洛伊斯(Lois,2003,pp.85-113)提供了以实地为基础的对负责搜索和营救的工作人员在危机遭遇中的情绪进行管理的策略的分析。她详细论述了在危机遭遇中包括以下情绪实践的情绪管理的四个阶段:①预备参与,②执行营救,③营救完成后释放感情,④情绪释放后重新定义感情。在每一个阶段,营救者想出处理他们所面临的特别挑战的方法。在危险的营救行动中,例如在执行营救的"边缘"时,营救者频繁地经历"肾上腺素分泌",会伴随着害怕和紧急的情绪,威胁着他们清晰的思考和理性的行动。在这种决定性的遭遇中,他们可以通过四个方面的学习来学会回应:①运用肾上腺素的分泌作为暗示,抵御潜在的失控行为;②把行动区分好优先次序,缩小它们的聚焦范围,并按照清晰的步骤次序完成营救;③在营救行动的关键阶段,对受害者作客观处理,并分离受害者。在许多方面,这些以及其他的实例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搜索和营救工人的"亚文化"的一部分。

2. 情绪与角色

许多角色造成的情绪问题或经验独一无二,或者构成特殊的组合。欧文·戈夫曼(Goffman,1961b)在他有创意的关于"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的论文中突出了这一点。他在论文中讨论了一些如外科医生一样的职业角色是如何要求其从业者依靠各种设备,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工作内涵保持距离,以免他们包含太多的情感因素而使工作失效。其他的质性研究者也观察到了与各种角色相关的情绪问题或挑战。例如,艾伦·史密斯与舍利儿·克雷蒙指出,医学院学生遇到人体时,他们"经常体验到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包括困窘、恶心与震撼"(Smith and Kleinman,1989,p.58),正式的训练帮不上什么忙。这两位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学生如何管理这些"不舒服的"与"不合适的感觉",他们的分析描绘出各种应对这些问题而被广泛运用的策略。在

对学习殡仪馆学的学生专业社会化的参与式观察研究中，斯宾塞·卡希尔(Cahill,1999)同样发现，不仅在工作与丧葬承办人的角色有关的学生中存在不同的反应，而且不同的反应是区分成功与不成功的学生的关键。这就表明，角色根据影响的种类以及执行工作所要求的情绪而可能发生变化。

对于某些其他的角色，关键不是一个人的真正感觉，而是角色责任感是否能用与其目标一致的方式控制或展示情感。这就是亚莉·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1983)所谓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蒂凡尼·奇恩(Chin,2000)在实地考察的方法中也有论述。在他的研究中，家长管理他们的情绪，以便对六年级的孩子获得在最好的私立学校上学的机会有帮助。当这种情绪工作在付费的背景下进行时，这种戏剧化的对情感的控制就构成了霍赫希尔德所谓的"情绪劳动"(Chin,1993)。简而言之，它包括根据组织的"情感规则"来管理情绪，正如霍赫希尔德所观察研究的三角翼飞机上的服务员反复地例行公事地表现一样。

3. 情绪与组织

霍赫希尔德的研究以及她在组织研究中所发展的概念框架，这两者的重要性是双重的：她强调，情绪的控制和展示可以是许多工作的重要维度，因此，将情绪和劳动连结起来；而且，因为付费工作的比例不断增长，这些工作根植于现代世界的各种组织中，所以，情绪和组织连结起来了。由于这种联系的建立，霍赫希尔德的工作，特别是情绪工作(emotional work)和情绪劳动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在不同种类的组织中研究情绪空间的质性研究学者所关注。因此，已进行的研究包括：关于治疗的话语如何构成了在以色列精神病院工作的全体职员的专业情感(Yanay and Shahar,1998)；关于商业冒险企业，如河道漂流公司，是如何帮助初次消费者制造他们所期望的情绪体验的(Holyfield,1999)；关于在某些援助团体内所产生的情绪是如何被用作保持对团体尽义务的源泉的(Wolkomir,2001)。最近的研究也发现，情绪对社会运动研究以及对发起反对活动的组织的研究，是非常适当的(Goodwin,Jasper,and Polletta,2001)。

在治疗性和冒险性的团体和组织的功能中以及社会运动组织中,情绪表现出了重要意义,这是不奇怪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表明,情绪对于更普遍地理解组织,包括大型的公司组织(Fineman,1993;Van Maanen and Kunda,1989),是很适当的。特别有说服力的是妮可·毕加特(Biggart,1989)对玫琳凯化妆品与夏克利这两家直销组织的研究,以及詹妮弗·皮尔斯(Pierce,1995a)在法律公司的背景下对性别的研究。在毕加特的研究中,她认为这两家都是"魅力"型资本主义企业,"敬畏"与"忠诚"的情绪使员工对他们的雇主缺乏判断力。毕加特"梳理"并罗列了这些情绪弥漫的企业与其他传统理性官僚体系之间的差异,并把它们视为一种独特的组织"类型"(参看该书第130页表格4关于相反特征的比较)。在皮尔斯的研究中,特别关注在当代的法律公司中工作上的情绪层面,以及根据性别和阶层被分层的方式、法律公司雇员之间的情绪工作的标准化期望。她论证道,以性别为基础的"情感的双重约束(emotional double-binds)",再生产了作为性别隔离的工作场所的法律公司的性别结构特征(1995a,p. 183)。

C. 等级层面或不平等

因为社会生活中等级(hierarchy)和分层(stratification)的普遍性以及通常有疑问的特征,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关注不平等成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丝毫不奇怪了。在聚焦于较微观层次的实地研究者当中是如此,在聚焦于经济与政治"体系"等宏观取向的分析者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个领域的大量文献中引述一些例子,以说明实地研究者在他们分析的各种单元中,特别是在相遇、关系以及团体中,如何合并关注社会生活的等级层面。

1. 相遇中的等级

在我们能够研究的单元之中,相遇的确是属于最微观的层次之一。但奇怪的是,它也是一个这样的位置,即能够让我们观察在行动者的生活中宏观的不平等体系的运作(例如,基于阶级、种族或性别)以及由个体行动者对该体系的创造与再生。例如,相遇的分析显示,分层安排可以通过不同的实践来交流和制订,而

有些实践可能是相当风格化的和仪式性的。正如以利亚·安德森在因阶级与种族两者而相分隔的个体相遇的"街头礼仪(street etiquette)"所包括的要素中所发现的,这种风格化的相遇实践包括:①在街头擦身而过,犹如编排好的芭蕾舞;②把狗当作同行友伴;③影响携带现金的仪式(如下文所示);④煞费苦心的眼神与面部表情。

> 许多人,尤其是在社区里面自认为经济上比别人优越的人,小心翼翼,不太东张西望,以免碰到令人不快的情境。他们在街上行走时,假装没看到其他行人,或者直直地看着其他行人,却不发一语,这种行为令许多黑人感到不快。(Anderson,1990,p.220)。

2. 角色和关系中的等级

地位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了解阶层的沃土,现代的工作场所则提供了观察的肥美之地。通常,研究焦点是工作场所内或情境内两个或更多角色之间的关系。例如,服务业劳工及其顾客之间的阶层关系的特征一直是实地研究的经常性主题,研究通常强调的是顾客的支配性。如前所述,在过去的 20 年里,许多的实地研究聚焦于商业情境下的雇主对雇员所要求的情绪劳动。大量的这类研究,包括亚莉·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1983)对航空公司的服务员以及集体代理人的成对研究,罗宾·莱达(Leidner,1993)对保险推销员和快餐连锁店员工的研究,都不惜笔墨地分析服务行业是如何要求员工对顾客从事恭敬的情绪劳动的。有趣的是,德鲁·约翰斯顿和诺里斯·约翰逊(Johnston and Johnson,1988)在对肯塔基州南大门的贝弗莉山地高级俱乐部火灾的研究中发现,在灾难片断中,服务员所持有的顺从和风度也是同样的模式。

> 服务员的角色延伸至用一种很不相同的方式为顾客服务——帮助他们退出建筑物,从危险中逃出来……应对这种灾难,大部分雇员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或经历;然而他们似乎接受了对顾客要尽的新的义务的承诺,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

> 分。顾客也似乎接受了员工的被延伸的角色,接受他们的指导。(1988,p.49)

一些研究考察工人/顾客角色关系,也分析服务员用来应对与顾客关系的行为层面的策略,这一点在格瑞塔·保尔(Paules,1991)对饭店服务员当中的"权利与反抗"的研究中有清楚的论证。相对地,对专业人士及其客户的研究则描述了一种情境,其中关系的"优势"反其道而行。例如,在对医学院的学生在实习期如何控制时间压力的研究中,威廉·约厄尔和杰弗里·克莱尔(Yoels and Clair,1994)描述了实习医生用来控制与病人互动的时间长度的各种策略,如,在走入病房前先查看记录或者在跟病人交谈时(有选择性地)阅读图表,避开眼神接触,病人如果试图讨论他们疾病的社会心理层面,就打断他们的谈话。除了给实习医生提供控制时间的策略以外,这种技巧也表达和加强了实习医生在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上的控制权。

3. 团体中的等级

团体成员通常论资排辈,彼此拥有不同的影响力。从集体来看,这些权力、影响力与中心地位的个人差异形成团体的等级或是地位不平等的体系。等级中的定位、等级本身或是同一个环境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等级之间,可能都有各种斗争;尽管如此,等级体系总是存在的,即使它是流动的、变化的。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对青春期前的同学之间的派系研究中,阿德勒双氏付出了很多努力说明派系结构的共同模式,包括两种主要的领导模式:

> 派系中最有权的、最关键的角色就是领导的角色。派系通常采用单一的领导模式,一个人作为团体中最有力的成员统治其他人。领导有权设定派系的边界,包含或排斥潜在的成员,同意提升或贬低别人,并确定集体的趋势和观点……派系不大采用的第二种模式,即采用两个领导者……作为朋友,一前一后操纵团体,或者更通常的做法是采用竞争机制独立操纵。(Adler and Adler,1998,p.77)

当然，实地研究者也观察到了身份等级，从威廉·怀特（Whyte，1993）1930 年代晚期在波士顿的“诺顿帮”街角团体的分层分析，到詹妮弗·洛伊斯（Lois，2003）在科罗拉多州的山地搜索和营救团体中的志愿者之间的身份等级的考察，研究者分析了在更广泛的成人团体中的身份动力学。

Ⅳ. 作为主题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层面

前面有关单元与层面合为主题的描述传递的主要意象（imagery）是将一个单元与一个层面结合起来。就开端而言，这个方法还可以，如果它能充分与手头资料及个人特定的实质关注点相结合，也能当做一项研究的引导意象（guiding image），而且成效不错。但这只是一种意象或原则。其他可能的意象或一般原则还包括联合或同时聚焦于：①在相同社会组织规模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互动单元的一个层面，如洛伊斯（Lois，2003）对搜索和营救人员与他们各种情感管理实践的亚文化研究、卡兹（Katz，1999）对各种片断和相遇中情绪的研究，以及约翰斯顿和约翰逊（Johnston and Johnson，1988）对灾难片断中服务员与顾客之间的等级角色关系的考察；②在不同的社会组织规模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互动单元的一个层面，如，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对奥斯丁和德克萨斯州的流浪者的街头生活的研究，以及丹尼尔（Duneier，1999）对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人行道上的摊贩的民族志研究；③单元的组织规模相同或相异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层面，如皮尔斯（Pierce，1995）对法律公司里性别如何在情绪和等级上起作用的考察，以及布里（Blee，2002）对种族仇恨团体中女性和性别关系的研究。这些实例和其他实例都列在了表 6.1 当中，构成了先前所讨论的研究的矩阵，它聚焦于源自一个或多个单元或层面的交叉的主题。因此，这表明，我们可以把社会现实视为“单元”与单元的“层面”，也把社会现实视为两个或更多单元与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发生的场所。

表 6.1 聚焦于基于单元和层面交叉的主题的研究矩阵

	层面		
单元	认知的	情绪的	等级的
实践	Snow and Anderson, 1993	Lois, 2003	Hodson, 1991
片断	Davis and Boles, 2003	Katz, 1999	Johnston and Johnson, 1988
相遇	L. Lofland, 1985b	Katz, 1999	E. Anderson, 1990 and 1999
角色/社会类型	Duneier, 1999	Cahill, 1999	Johnston and Johnson, 1988
关系	Blee, 2002	Hochschild, 1983	Yoels and Clair, 1994
团体	J. Lofland, 1977	Blee, 2002	Adler and Adler, 1998
组织	Kunda, 1992	Pierce, 1995a	Pierce, 1995a
群落和居留地	Duneier, 1999	Scheper-Hughes, 1992	Newman, 1999
亚文化和生活方式	Snow and Anderson, 1993	Lois, 2003	Wright, 1997

Ⅴ. 单元、层面与主题构成编码的思态

单元与层面的观念,以及它们的结合所产生的主题,应该被视做为你提供了一种模式,帮助你分析正在记录的资料。详细地说,形成主题的单元与层面构成你资料编码活动中使用的思态(mind-set),编码则是你开展分析的主要活动,我们在第 9 章会讨论。

把这种分析模式带入到你的资料中,是为了与机械地将特定的单元和层面运用到资料中去区分开来。我们特别主张使用前

者，而非后者。在你注意单元与层面时，对于你的编码与推演分析究竟要追究的是什么单元/层面/主题，你要保持弹性。本章应该已经提供一个在你进行资料编码时所要考虑的事物种类的一般取向，而非现成的有待编码的事物模板。但在另一方面，你应该可以随意使用上述任何特定的单元、层面或主题，如果它们有助于你将资料进行编码的话。我们在这一章没有提到的单元、层面与主题，你也应该保持开放。

构成主题的单元与层面提供了三条分析路线，当中要依照的第一条就是，你现在就要聚焦于资料。第二条聚焦的路线是提出有关这些主题的问题，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内容。

第7章 提 问

Asking Questions

获得对单元与层面的详细理解,即上一章探讨的主题,要视问题而定。尽管任何特定的主题都可能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社会分析者通常就他们所调查的社会主题提出八个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图 7.1 中都显示出来了。我们在这一章讨论它们的时候,请把图 7.1 中位于中间的六个问题(从 2 号到 7 号)当做如下两两形成的三组问题,从而有助于了解这八个问题:

- 问题 2 与问题 3,频率与幅度,询问我们观察某事物的频率以及它的强度或大小。
- 问题 4 与问题 5,结构与过程,询问某事物详细的组织方式(结构),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如何演变或运作(过程)。
- 问题 6 与问题 7,原因与结果,询问什么因素促成某事物存在或发展(原因),以及某事物所具有的效应(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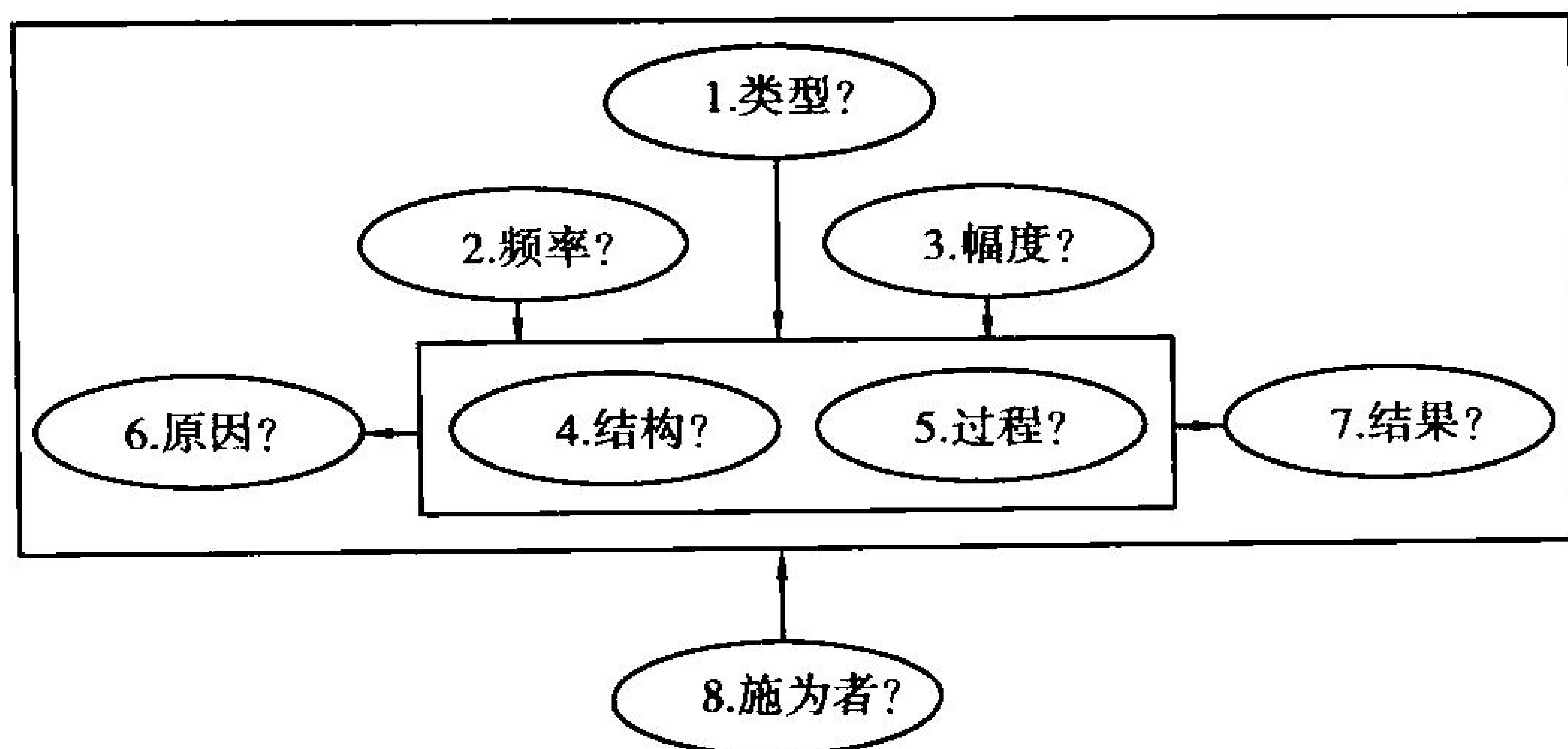


图 7.1 八个基本问题

这六个问题通常是由"某事物"是什么这个问题作为开头的，也就是说，问题 1，它是关于类型的问题，即描述类型的定义特征。中间六个问题通常暗示某种策略行为，因此，表明了第八个问题，人类施为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涵括前面七个问题，询问人们如何在场景和情境中及针对场景和情境制订行动策略。

我们将图 7.1 的要素当做具体事物，排列组合，借以突出问题通常是如何搭配的，以及它们彼此如何相异。因此：

- 问题 1、2、3（类型、频率和幅度）显示，在代表研究主题的方块之外，我们才能在从外向内观察时，把它们当作事物展示出来。
- 问题 4、5（结构与过程）显示在方块里面，象征该主题，指明结构与过程是研究对象的内在属性。（此外，"结构与过程"这个词组是社会科学中常见的搭配）
- 问题 6、7（原因与结果）在方块左右两端，象征该主题，以具体的方式表示原因在时间上先于研究主题，并以具体方式表示结果在时间上后于研究对象。（"原因与结果"这个词组也是社会科学语言常用的搭配）
- 问题 8 位于前七个问题的大方块之外，以表示它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是主动的人类施为者的问题。

回头参照图 7.1 以及这里给出的概要，我们希望可以帮你了解这八个我们现在要详细讨论的问题。

Ⅰ. 主题的类型是什么

在社会科学的分析当中，最具创造性、最重要却经常遭到忽视的部分，就是提出与回答问题的行为。"我面前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如此广泛的分类问题，典型地引出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范围更有限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实例?""先前已经辨认出的单元或层面是什么类型?"或者，更具体地说，"相遇、团体、组织、情绪或等级的特定类型什么?"

A. 单一类型

社会分析中许多重大的进展不过是单一实践、关系、意义、阶

段或其他单元、层面类型的巧妙描述。例如,仔细想想欧文·戈夫曼(Goffman,1961a)把"全控制度(total institution)"的概念独立出来的做法。在考虑所研究的特定组织(精神病院)所具备的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如何与其他在传统上与精神病院没有联系的组织,如修道院、寄宿学校、监狱等的特征相似之后,他才提出这种组织类型。在询问自己这所医院和其他类似组织的一般特征是什么之后,他发展出了"全控制度"的想法。

> 在我们西方社会,当评论不同的制度时,我们发现有些制度包容的程度比直线上的另一个制度所包容的要更广泛。它们的包容或全体特性(total character)以对社会交往造成的障碍为表现,从外围到出发点,通常建立了直接的有形装置,如锁好了的门、高墙、有倒钩的铁丝网、水、森林或者沼泽地。这些设施,我们称之为全控制度……现代社会基本的社会安排就是个体需要在不同的场所与不同的参与者一起在不同的权威范围下睡觉、玩乐和工作,而没有全面的、合理的计划。全控制度的核心特征可以描述为将生活的各个领域分离开来的障碍的衰弱。(Goffman,1961a,pp.4-6)

B. 多重类型和分类法

这个逻辑当然很容易就可以延伸构思出许多类型,而这些类型是某些很普遍的文化实体或类型所呈现的变异。特别是你观察的具体情境不止一个的时候,你遭遇到的单元彼此之间存在有趣的变异时,就有可能构成多重的"分类(typing)"。回顾第6章,我们在许多引述了多重类型的详细描述的著作中,看到了一个显著特征。这些类型包括:

- 为浪费时间、旷课和作弊进行辩护的学生类型(Bernstein,1978;Kalab,1987;McCabe,1992)(Ⅱ.A 部分)。
- 学校中派系的类型(Adler and Adler,1998)(Ⅱ.F.1 部分)。
- 医学院学生角色策略的类型(Smith and Kleinman,1989)(Ⅲ.B.2 部分)。
- 组织的类型(Biggart,1989)(Ⅲ.A.3 部分)。

通常，类型的鉴定导致分类法的发展，分类法基本上是在某个特别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对有意义的文化范畴或者现象的所有类型进行详细描述的罗列，例如学生，然后根据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如“有哪些种类或类型的学生?”，来列举这个范畴的成员。以上提出的对不同学生的研究，提供了回答问题的起点，这些问题可以表明学生是“浪费者”、有些学生是“队长”以及有些学生是“骗子”，但是，这些问题是互斥的类型，还是全面的类型，并不清楚，我们接下来求助于两种考虑。充分发展的分类法可以在戴维·斯诺及其同事在不同城市就各种实质性的议题对流浪者所进行的研究中找到。例如，为了描述和分析的目的，他们发展了分类法，分类的根据有：流浪者社会运动组织的资源流动(Cress and Snow, 1996, pp. 1094-1096)、流浪者社会运动组织追求的结果(2000, pp. 1066-1068)以及流浪者的物质生存策略。稍后的分类法，基于说明的目的会在

表7.1 流浪者物质生存策略的分类法

1. 制度化的援助
  - 1A. 制度化的劳动(为街道办事处工作)
  - 1B. 收入补偿
    - 1B.1. 公共补助
    - 1B.2. 来自家庭和朋友的补助
2. 雇佣劳动
  - 2A. 固定工作
  - 2B. 计日工
3. 地下劳动
  - 3A. 推销/叫卖/贩卖(非正式销售工作)
    - 3A.1. 卖废品和丢弃物
    - 3A.2. 推销非法用品和服务
      - 3A.2a. 推销毒品
      - 3A.2b. 卖淫
    - 3A.3. 卖血
  - 3B. 乞求公共捐赠
    - 3B.1. 讨钱
    - 3B.2. 公共表演
  - 3C. 打扫
    - 3C.1. 为食物而打扫
    - 3C.2. 为畅销货而打扫
    - 3C.3. 为钱而打扫
  - 3D. 偷盗

资料来源:Snow and Anderson 1993, Chapters 4 and 5.

表7.1中再现,对于"流浪者在街上生存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会从民族志的角度进行详细的阐述。

C. 类型化

有时候研究的主题似乎具有某些复杂但系统性的相互关联。在这种个案中,你经常可以通过说明几个相关变量而发现这种相互联系,这些变量的共连(cojoint)变异精确地涵盖了你已经分辨的模式(并指出你尚未充分思考的模式)。这种源自两个或更多变量间联合可能性的描绘过程有各种名称,或称为下层建构(substructing)(Miles and Huberman,1994,p. 184),或称为维度化(dimensionalizing)(Strauss and Corbin,1990,pp. 69-72)以及我们喜欢用的类型化(typologizing)。

例如,科斯顿·隆伯格(Gronbjerg,1993)考察了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各种经营环境,发现他们的环境差异所造成的复杂性可以缩减为两个基本的、二分的变量之间的联合。如图7.2所示,这些变量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环境被私有部门同类服务的供应者(当作是或否)影响的程度,以及公众依赖该非营利组织所提供服务的程度(当作是或否)。经过"下层建构"或"类型化",在非营利组织的环境中众多的变量可简化成图7.2中的四个基本模式——合作、调节、竞争与共生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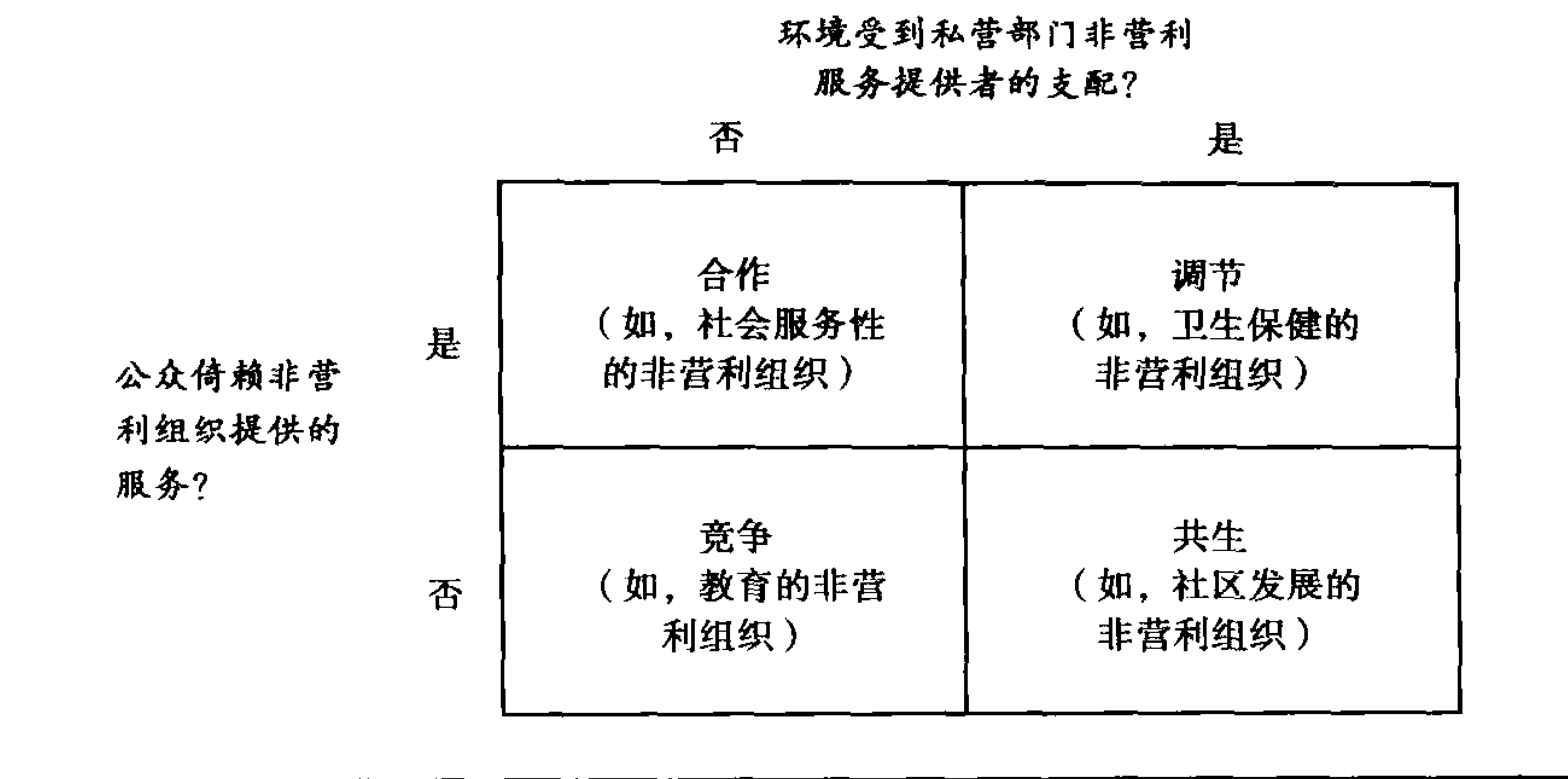


图7.2 类型化的范例:隆伯格论非营利组织的环境
改编自:Gronbjerg,1993,p. 20,Table 1.1

下层建构或类型化有助于分析变得更有系统,条理分明,而且它显示出逻辑的可能性,有时可以注意到现存但未被注意的模式,或是注意到逻辑上可能但在经验上并不存在的模式(因此提出为何它缺席的问题)。

不过,我们必须小心的是类型建构很容易徒劳无功。除非是在具备充分而广泛知识的环境中进行,并且对实际的场景很敏感,否则研究将事倍功半或一无所获。主观的方框构架并不能取代对实际环境的亲密感。

D. 分类和类型化的资源和规则

通常的做法是,在实地研究过程中,类型的鉴定、分类法的详述以及类型学的建构,仅仅是以我们所看见的或者信息提供者所讲述的为基础。但是,也并不总是这种情况,因为有些类型和类型学基本上源自现存的理论范畴或者概念,而有些理论则与民间范畴相混合。这样,至少有三套以各自资源为基础的普通的类型和类型学:民间得出的或民间的、理论的或抽象的、混合的。在上文所列举的分类当中,学生的解释、学校的派系以及医学院学生的角色策略本质上都是以民间为基础的,而生活方式的类型学是更抽象或更理论化的,组织的类型和生存策略的分类法从本质上将是混合的。某种分类并不一定优于另一种,相反地,它们各自的范畴和分析效用大部分是由你想要知道的内容以及你要问的问题来决定的。

无论类型、分类法或者类型学的基础是什么,如前所述,你应该遵守两个基本的程序规则或者指导方针:

- 首先,你应该选择分类的内容,这样,你才能将每一种案例放入唯一的范畴当中。这就叫做互斥原则(the rule of mutual exclusiveness)。
- 其次,你设计的范畴应该尽可能的(或者几乎全部的)对所有相关的案例进行分类。这就叫做完备原则(the rule of exhaustiveness)。

如果你的案例当中的许多案例与你的分类法或分类范畴的多个类型相匹配,那么,这很明显,你的范畴是概念错误的或者不

合适的。而且,如果许多案例不符合分类法或类型学,那么有理由相信,你的实证材料和你所发展的或者理解的概念之间出现了匹配错误。这种告诫和关注点并不意味着有些案例不服从分类法或分类范畴,但是,这种剩余的案例在数量上应该很少,根据你对它们所根植的情境或背景的民族志的理解,应该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Ⅱ.主题的频次是什么

计算某事发生的频次,并以简单的、描述性的数据,如百分比,以及重要趋势的测量标准,如均值(平均数)、中值(按照半数、半数以下、半数以上的分布来划分数量),以及众数(最频繁发生的次数)的形态,建构统计摘要,有时大有用处,而且相当重要。当然,对于计数、估计现象的具体值,以及汇总并分析其频次和统计上的相关性,有一些相当详尽的程序。但是,这些程序被编定的标题为"描述与推论统计"以及"调查研究",这些都在本书范围之外。然而,有许多一般性的方法文本,介绍了这些程序以及它们谈到的议题(Babbie,2003;Schutt,2004;Singleton and Straits,1999)。

虽然计数和统计分析是形式更复杂的议题,但是,我们要强调,对实地研究中的单元和层面以及跨单元与层面进行计数,是能够做并且应该做的。当然,这可以从相对简单的计数,如一个团体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内见面的次数,或者团体中人们行使职责的平均数,到某种程度上更复杂的计数活动,如:

- 以不同种类的身份谈话的流浪者的不同类型的数量和百分比(Snow and Anderson,1993,p.213-228)。
- 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从事不同种类的冲突管理行为的行政人员的频次(Morrill,1995,参看,表4.1,5.1以及6.1,分别在第107、158以及194页)。
- 不同种类的集体行为的次数(如,集体发声法和集体运动)以及他们以群体聚集的方式出现的频次(McPhail,1991,p.149-190)。

- 创收策略、平均支出以及靠福利和薪水生活的母亲的艰难策略，这些方面在频次和百分比上的变化(Edin and Lein,1997,参看表4-7 至4-9,分别在第 110、111 和 113 页)。
- 在不同的公共场合家长用来控制孩子的不同策略的频次和百分比(Horne,McIlwaine,Taylor, 2005)。

不论计数活动的本质是什么，不管它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一些实地研究者出于方法论上的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固执而想避开它。但是，这种做法在经验上和分析上可能都是不谨慎的，不过诉诸计数这种方法，有许多好的理由：

- 对大批的资料所呈现的不同旨趣的主题，获得频次上的感觉。
- 对在浮现的主题类型中，不同的事件或行为实际呈现的程度获得坚实的表征。
- 用并非草率的方式验证预感或假设。
- 保证你分析上的诚实，避免偏见(Miles and Huberman,1994, p. 252)。

Ⅲ. 主题的幅度是什么

频次的问题是指某事发生了多少次，幅度(magnitude)的问题则是指某个事件发生的强度、密度或大小。就像频次的判定一样，判定幅度是个量化的问题，其比较精细的形态包括非常复杂的测量程序，我们在这本书中不予处理。不过，前面提到的著作已提供了适当的说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的资料和分析中即将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就不应该回避思考和建立幅度的问题。

Ⅳ. 主题的结构是什么

结构概念，从社会科学的立场考虑，直接关注聚焦的单元、层面或主题被组织的方式。我们在以前的章节中所讨论的大部分或所有的焦点单元的存在，暗示着某些潜在的结构或者组织的存在，而且，我们的认知取向以及我们的情感都有潜在的结构。因此，结构虽然不总是直接可见的特征，但却是一个普遍深入的、我

们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特征。

在社会学当中,结构的概念表明它自己基本上处于社会结构的概念之中,这当然是一个,或许有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学科的基础概念。在生产某些秩序和常规措施的个体之间、团体之间、共同体之间或者国家之间,结构也被不同地称作互动和互相依赖的模式、相关的联系、联合网、社会关系网络。更简要地,结构也可以被认为是,用某种给予社会生活可预见性和秩序的方式,对人们、团体、共同体或国家彼此之间做出的安排。由于社会结构的普遍概念化,以及理解社会重要层面的核心重要性,因此,许多实地研究试图详细阐述潜在的或者与被研究的主题相关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功能,就不奇怪了。为了从已出版的实地研究中了解对结构的详细论述,你需要了解以下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实例:

- 威廉·怀特在《街角社会》(Whyte,1993)中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性流动"与"诈骗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
- 杰拉德·萨特尔在《贫民窟的社会秩序》(Suttle,1968)中对"有序的分割"和"制度的安排"的详细论述。
- 帕特丽夏·阿德勒在《一意孤行》(Adler,1993)中对"毒品世界关系的社会组织"的讨论。
- 加里·艾伦·怀恩在《厨房》(Fine,1996)中对"作为场所和空间的厨房"与"厨房生活的组织和审美学"的考察。

还有许多其他实地研究的实例部分聚焦于研究主题的潜在结构,但是,前面的案例应该足够让你理解这种研究特征的正确评价,理解结构与被观察的主题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你可能从事的大部分研究中,你理所当然地将会考虑询问关于相关结构的问题。

Ⅴ.主题的过程是什么

和结构一样,过程这个概念对理解你所感兴趣的大部分现象同样重要。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图7.1中将结构和过程结合在一起。在许多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分析的另一面,但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的优点出发,它们并不总是同样的分量。某些观点,如

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结构的首位性，而其他的观点，如符号互动论和社会结构论，强调过程。像结构一样，过程并不为自己提供简单的定义或者概念化，但是，它传达了发展、出现、前进或者进化的意义，因此，表明"一系列的行为、改变或者功能"导致了特别的成果。这种一般性的字典式的概念，包含的是四个相关的概念，对思考阶段、步骤、时期以及时段这些过程是有帮助的。

- 阶段(stage)是"过程、活动或发展中的时期或步骤"，或是"某些时期中的一段，其开始与结束通常是以'发展与成长'中某种重要的结构改变为标记"。
- 步骤(step)是"渐进、规律或井然有序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 时期(period)是"长短不定的时间，但具有独特或特定的性质"，或是"时间的分段，某事在这段时间中完成，并准备结束，将以同样的顺序继续下去。"
- 时段(phase)是"一种发展或周期中的阶段或间隔：某种变化常态发生的周期中特定的表现或阶段。"

就本书的目的而言，这四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把它们一一列出，赋予定义，是要强调在你描述它们的成分时，能够运用各种词汇，以便澄清过程这种观念。

理解过程这个概念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考虑过程的三个基本形态，研究者通常试图观察、分析这三种基本形态：周期(cycles)、螺旋(spirals)与顺序(sequences)。

A. 周　期

周期是"重复发生的事件顺序，其发生顺序为最后一件事发生在另一新顺序的第一件事之前"。自从人类觉醒以来，许多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是依据周期进行的，周期首先是以天文学和气候学的变化为基础，如日升日落以及季节变化，然后以日历为基础，既有自然发生的变化，又有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标志或时刻，如圣诞节以及相应的基督教世界里的"假期"。即使是我们面对不同团体和社会事务或问题的态度(如感情、取向)，也趋于按日历排好了似的，因为它们也以周期的方式盈亏圆缺(Bunis, Yancik,

and Snow,1996)。

除了以日历为准的标准周期之外,还有比较少被计划、少被认知以及少有预定的循环规律(revolving regularity)。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的存在展现了这种潮涨潮落。西德尼·塔罗(Tarrow,1998)创造了"抗议周期(cycles of protest)"或"竞争(contention)"这个概念,用来记录和质疑这种现象在分析上的周期特征。约翰·洛夫兰德(Lofland,1977)分析了某个小型"末世"宗教数年的历史,观察出该团体面对要人改宗皈依的问题,经历了四个集体希望与失望的周期。该团体致力于追求让数千人改宗皈依的目标,但事与愿违,只能让极少数人感兴趣,更谈不上皈依。这四个观察到的希望与失望周期在三年内各自展现出下列特质:

- 某个事件发生,或者某个计划的设计提供了一种集体希望,即许多人可以改宗皈依。
- 依此事件或计划组织行动。
- 根据该团体自己的评估,此一行动最后一败涂地。
- 这个挫败导致集体对达成目标感到绝望。
- 该团体回到原点,开始新的事件或计划。(Lofland,1977)

B. 螺　旋

有些过程并未显示出周期中所看到的相对稳定性。相反地,它们展现出螺旋模式,一种"持续展开并加速的增加或减少"。这种现象比较广为人知的形态之一,可以在彼此敌对的社会单元之间的紧张或冲突中看到。它在大的单元中特别清晰可见,如民族国家、部落、邻里以及被集体动员反对某个机构权威的个体的集合体。这种紧张和冲突也可以在正规的组织内部出现,如在前面提到的卡尔文·莫里尔(Morrill,1995)的研究中对公司内行政人员之间的冲突和冲突管理的证明和分析。对抗和冲突在参与者之间爆发时,不论是什么集体单元,通常根据扩大或缩小的螺旋形式进行分析。马克斯·黑里奇在1960年代早期对伯克利市的自由演讲运动的研究中提供了使冲突逐步上升的螺旋的图解说明,并适当地加上"冲突的螺旋(The Spiral of Conflict)"(Heirich,1971)的标题。

螺旋过程的概念也被发现，在分析上对理解个体有时候是如何结束某种特别的状态或情形很有用。埃德温·莱默特(Lemert, 1962)对一种能导致一个人被称为“妄想症患者”并住院治疗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为较小社会单元中的螺旋过程提供了典型的例证。戴维·斯诺和利昂·安德森在分析为什么有些个体成为了流浪者，以及怎样成为流浪者时，同样援引了螺旋过程的逻辑：

> 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城市，无论对街道占优势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猜测，在所有的城市中，它们都是结构和传记体的因素互动的产物，它采用向下的螺旋形式，一个因素引发或恶化另一个因素，直到游客来到这些街上。(Snow and Anderson, 1993, p. 171)

C. 顺 序

对过程最普遍或许也是最广泛的描述就是按照时间次序安排的一系列的步骤、事务或者因素，这就构成了所谓的顺序。顺序可以因许多方式而不同(Abbott, 1995, pp. 94-96)，包括它们是否是循环的。周期可以被认为是顺序的变量，因为它们可以重现，如在经济周期和抗议周期中。但螺旋有可能是循环的，也可能是不循环的。顺序的分析是跨越社会科学的多种方法而进行的，因此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Abbott, 1995)。在质性研究中，顺序分析至少有三种方式：回溯(tracing back)到一个普遍的起点、前推(tracing forward)至某个特殊的事件或尝试或验证重要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

1. 回 溯

或许最常见的起点就是一个结果。例如，某人侵占公款，用某一种药、改信异教、群众暴动、组织解散、社区采用限制增长的法律。这些事件均可视为结果，能够或者已经引发顺序分析，使得对导致某种结果出现的步骤或事件进行证明成为必要。这种分析典型地以研究者的发问开始，“这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或者“是怎样发生的?”，然后回溯到结果的各种情形的历史。归纳地讲，你的目标就是要细察相关的情形，以便从中一点点地收集过

程。在回溯的分析中,研究者试图辨别任何典型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中,行动者或行为进入到在某个特别的结果中达到极点的(或没有达到极点的)过程。

在先前提到的詹妮弗·洛伊斯对美国西部的搜索和营救团体的志愿者的社会化的参与式观察研究中,她提供了顺序分析模式的具体案例。她的焦点问题不是为什么一些个体加入了这个团体,而是他们是如何变成具有充分资格的或者核心成员的。她的分析表明,志愿者通过两个阶段的涉入过程,学会去服从与良知、资源和承诺有关的团体标准,首先,"从新成员的身份变为外围成员的身份",然后,"从外围成员变成核心成员"(Lois,2003,p. 132)。

2. 前　推

换一种方法,你也可以关心某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之后的事,如打完仗的退伍军人,获知即将死亡的人,适应婚姻生活的新婚夫妇,或是遭逢天灾面对复原问题的社区。布拉德利·费舍尔对养老院面对自己健康体力日薄西山的老人"事业沉降(career descent)"的三阶段分析,就是例子(Fisher,1987)。这三个阶段包括:抗拒工作人员的评估,这构成了认知异调阶段(cognitive dissonance phase);接受与自惭形秽,这构成了认知协调阶段(cognitive consonance phase);修正意见与调整,这构成了强化自我形象阶段(enhanced self-image phase)。

3. 转折点

第三个起点是考虑"转折点",它们是"短暂的、使过程重新定位的重要转变"(Abbot,2001,p. 258),因此,在被观察的现象过程中,它们影响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尽管转折点的概念对理解宏观的过程,如政治结盟、商业周期,甚至历史方向(Abbott,2001),是中肯的,但是,它也被质性实地研究者,特别是那些受符号互动论的层面影响的研究者所运用,从而获得对重要的个人传记或个人变化的概念化的处理。例如,对埃弗雷特·休斯(Hughes,1971)将转折点与职业生涯中要么道德的、要么职业的重要转变联系起来,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发现了这个概念对他的身份转换的分析

是很重要的，他原则上将其定义为“出现了迫使一个人识别出‘我不是过去的我了’的关键事件”（Strauss，1962，p. 67）。同样地，诺曼·邓辛运用“主显节（epiphany）”的语言，直接关注那些“给人们生活留下标记的互动时刻……创造转换的经历”让他们“决不再是一样的”（Denzin，1989b，p. 15）。这种转换的经历或转折点，是约翰·洛夫兰德和罗德尼·斯塔克的转化模式（Lofland and Stark，1965）的基本要素，它源于洛夫兰德对早期的美国皈依者，最终变成了统一教团所做的实地研究。在被研究的运动的脉络中，他们注意到，或者大约在他们与团体最初相遇的时候，“当旧路线的行动完成、失败或者被干扰时，或即将如此时，当他们面临一个机遇（或必要性）时，以及在面临做某种和他们的生活不同的事情可能要背上负担时”，“所有皈依前的人……就到了某个时刻”（Lofland and Stark 1965，p. 870）。举例说明，他们从许多信息提供者的生活中提供实例，包括李小姐，她的“学术生涯被长期的疾病中断，疾病的康复源于遇见了”运动的领袖（1965，p. 870）。

提出的问题不是关于转折点的存在，而是它们被确认的容易程度（参看，如斯诺及菲利普斯[Snow and Phillips，1980]关于洛夫兰德和斯塔克对这一概念的使用的评论，以及洛夫兰德[Lofland，1978]对这个概念关于转换的关注）。但是，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是相当通用的，如生命过程的研究（Gotlib and Wheaton，1997；Sampson and Laub，1993），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为评估和思考个体、团体、组织以及民族国家的变迁方向和社会过程提供了抓手。

不管你采用的是何种质性过程分析的形式，它必须是对周期、螺旋、顺序或顺序中的某个步骤的分析，它的描述能力和分析能力存在于细节当中，当个体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行动或协商日常生活或戏剧化的变化时，当集体事务展开时，或者当团体和组织发展变化时，它使你能够注意到并联系起来。当细节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时，其他的技巧不能使你近距离地观察和注意细节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方式。

Ⅵ. 主题的原因是什么

许多外行以及一些社会科学家都不恰当地认为确定某事的原因是相当容易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哲学家大卫·休谟(Hume,〔1739〕1978)用很长的时间对确定社会现象原因的证明的可能性进行了辩论。社会科学一般更倾心于社会原因的概念,许多实践者已经继续推进,"好像"有可能证明大部分社会现象的原因。的确,在社会科学中最常问到的问题是值得辩论的,如"Y 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所观察到的 Y 的变化是由所观察到的 X 的变化引起吗?"或者,更通俗的说法,"Y 的变动是由于 X 的变动引起的吗?"

在此,我们并不想就确定社会原因是否可能的问题陷入各种哲学和统计学的辩论当中,因为这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更为熟悉的领域。相反地,我们仅仅确定一些在社会科学文献中以某种形式出现的社会原因的模式,然后讨论这些模式当中的某些形式是否和质性实地研究相符合。但是,首先有必要讨论的就是原因解释的必要条件。

A. 原因解释的必要条件

为了用合理的自信程度说出"A 引起了 B",一般来说至少要有四个必要条件:

- 首先,必须要有"因变量"的变化(variation)。不管你要找原因的事件是什么,你必须找出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原因,存在与缺席的原因,或者其幅度变化的指标。就是说,你必须从因变量的变化开始。这就是我们在上述问题 3 所提的幅度的决定——某事的大小、强度或规模。
- 第二,必须有"自变量"的变化。你必须考虑因变量中可测的变化,并连带(conjointly)考虑你从其他方面暂时想到的原因所引发的可测的变化。这种被认定或假定的变量一般被称为自变量。
- 第三,变量应该按时间排序。假定的原因在时间上先于结果。

换句话说,你应该能够确定假定的自变量暂时先于因变量。

- 第四,你得处理假问题。你必须能证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共变不是因为通常被称为中介变量的第三个变量的影响。这是经典的"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的"问题。一些其他未知的因素,或其他已知的但未被测量的因素可能是原因或原因之一。

B. 原因解释所选择的模式

有了这四个条件作为确定原因层面的背景,接下来我们列出了许多方式,用社会学中的实证方式讨论和探索原因和原因的解释,既不假设它们是全面的,也不认为它们为大部分社会科学家所接受。对于原因的解释而言,这些模式,或许还有其他模式,都是对原因解释的或然性或确定性方法的变种,一般来说被认为是因果关系的两种基本模式(Sobel,1993)。在此按照从最或然的到最确定的顺序排列成一个连续体。

1. 实验模式(experimental model)

以因变量(Y)的出现或缺席所测量的不同点为基础,或者根据在严密控制的情境中,以与研究主题匹配的随机任务之中的自变量(X)出现的变化程度为基础,来测定因果关系(Campbell and Stanley,1963;Sobel,1993)。

2. 统计模式(statistical model)

因果关系的测定以主题的随机样本之间的统计相关和时间上的优先性为基础,强调避免或控制潜在的假联系(Blalock,1979;Sobel,1993)。

3. 背景模式(contextual model)

背景因素的说明通过比喻性地为现象的发展提供有营养的土壤,有助于研究者感兴趣的现象出现。这种特定的条件并不起决定作用,但是增加了现象存在或出现的可能性(Ragin,1987;Skocpol,1984)。

4. 情形相当的模式(case comparative model)

为解释特定的情形或结果发生或不发生的原因提供出现或缺席的结构证明。目的是确定感兴趣的现象的必要和充分条件(Ragin,1987,2000)。

5. 步骤/过程模式(step/process model)

原因过程的详述基于与经历或认识某一特定的状态或情形相关步骤的证明。有时候也被称为"附加价值(value-added)"模式,因为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缩小了选择的范围,因此增加了转入下一个步骤的可能性(Meyer and Conrad,1957;Smelser,1962)。

6. 负面情形模式(negative case model)

通过系统的搜索以获取负面的情形或实例的因果关系的详述,以及对原因解释的修正,直到它能够说明所有已知的情形(Becker 1998,pp. 194-212;Katz,2001)。

C. 阐明质性实地研究和因果解释之间的关系

质性实地研究有助于详细说明导致感兴趣现象的存在的原因或动力吗?在此讨论的实地研究能有助于理解那些用来解释说明所探索的变量的情况吗?答案是有条件的,因为这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和上文所讨论的哪种原因模式的应用。关于第一个条件,大部分质性实地研究并不适合于寻找因果问题的确定性答案,理由很简单,它们适合于证明并详述事情是"如何"做的或者"如何"发生的这样的问题,而不适合详述它们"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为什么"通常根植于"如何"当中,这一点是可论证的,但是只有相当少的民族志实地研究试图探索这种关系的特征。另外,不管是根据样本的代表性还是规模,很少有实地研究对与实验和统计模式相关的抽样条件感到满意。因此,实地研究很少追求与那两种模式相联系的原因解释。既然在社会科学中,它们是两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模式,那么,质性实地研究者经常认为它们没有什么价值则是毫不奇怪的。如果说有一点价值,那就是谈到原因说明时的分析效用。很明显,对大部分质性研究来说

是这种情况，因为质性研究追求的是问题而非因果问题或因果主题，对它们而言，测量和统计列举没有价值，如果有，也只有相关性的价值。正如欧文·戈夫曼在对精神病医院的实地研究的描述中所言：

> 虽然想要获得病人的社会生活中某些层面的文化细节，但我并未运用常见的测量与控制法。我认为为了几句陈述所投入的搜集统计资料所需的角色与时间，将使我难以搜集到有关病人生活的组织与结构的资料。(Goffman,1961a,p. x)

但是质性实地研究通常用表示因果联系的方式报告研究发现，正如以下的观察所描述的一样：

- 阶级意识，而非个别的工人从事集体行为而具有的特征，实际上在这种行动的过程中出现了(Fantasia,1988)。
- 公司行政人员之间的冲突管理模式的变化主要视不同组织的标准化秩序而定(Morrill,1995)。
- 从事街头暴力的倾向或在街头暴力中处理潜在的暴力对峙的方式，因相互作用的暴力是否来自"正派的"还是"街头的"派系而有所不同(Anderson,1999)。
- 有"种族主义者自我"以及隐藏的种族主义者信仰的人通常追随而非领先于种族主义者仇恨团体联盟(Blee,2002)。

这些观察清楚地暗示了一种因果关系，即使因果关系的语言还没被使用，因为在讨论中的事件、状态或情形的存在，至少部分地归因于先前存在的其他事件、状态或情形，这是可以论证的。因此，对于每一个实例来说，在聚焦的主题或因变量中(如，阶级意识、冲突管理模式、街头暴力以及种族主义者的信仰)、因果关系或自变量中(如，集体行为、不同组织的标准化秩序、派系类型、仇恨团体的社会化)以及默示的或已确定的时间上的优先权当中，都存在虚拟的或真实的变量。不管是否存在除了所强调的平等的或更有影响力的因素以外的因素或情形，所谓保持开放都是虚假的。但是，以上的观察和研究并不排除其他未详述的情形或变量起作用的可能性。相反地，它们仅仅声明了培育或导致所研究现象存在的某种情形、背景或一系列情形的重要性。换句话

说,这些研究证明并详述了一个或多个焦点现象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对于解释其存在并没有从理论上或经验上对一系列条件进行充分地论证。而且,他们这样做提供了与上文所证明的背景模式相一致的原因说明。为了进一步描述,可以考虑黛安·沃尔甘(Vaughan,2003)针对哥伦比亚号和挑战者号宇宙飞船事故的原因,向哥伦比亚事故调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关于两次事故发生的条件,她的基本论点用短语简而言之就是“历史原因(history as cause)”,是一系列相互影响的决定和已确定的事件,她写道,这种分析:

> 表明先前在白宫、议会、美国宇航局的领导所做的政治的、预算的以及政策的决定……影响了航天飞机项目的结构、文化以及安全系统……,而这些反过来又如何导致了……对两次事故有争议的决策。这个解释就是系统影响:宇航局的组织系统的一个层面所采取的行动对其他的层面如何产生影响。历史不仅是事件的背景或场景设置者(scene-setter)。历史也是原因。历史将哥伦比亚号和挑战者号事故置于运动之中。(Vaughan,2003,p.195)

再次强调,并不排除其他起作用的因素,而是项目结构、文化以及安全系统三者的汇合才提供了造成“有争议的决策”的背景条件,推动了事故的发生。这种解释更可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一些条件或背景被假定增加了某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并不能断言是否和何时该事件将会发生。在大多数统计分析的情况下,都保留了一些未被解释的差异。换句话说,所有可能解释研究现象的因素都是不完全的。因此,质性报告中使用的常常是相当谨慎的语言,正如这些说法:“情况似乎是……”或“看起来是……”。但是考虑到被观察现象之中的关系,例如一些与上面所列的后三个因果模式相关的著作那样,某些质性研究提供了较少的或然性、较多的决定性的陈述。

这三个更具决定性的模式的第一个是情形相当的方法(case comparative method),它被包括在由查尔斯·拉金(Ragin,1987,2000)所提出并详述的“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QCA)”的技术之中。基于布尔代数的逻辑,这种技

术方便地确认了当在相当少的案例中进行比较时,一个或多个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与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样本的个体变量进行一般化处理,并且提出关于变量影响的附加的和线性的假设不同,QCA 的逻辑是并发性的(conjunctrual),可以检验特定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合导致了某一特定结果的不同方式。

这增加了辨明多样化和确认导致某个结果的不同路径的前景。丹·克莱斯和戴维·斯诺(Cress and Snow,1996,2000)在美国 8 个城市的 15 个流浪者社会运动组织(SMOs)中针对流浪者社会运动的动员所做的比较民族志研究就阐明了 QCA 的应用。在一个针对 15 个流浪者社会运动组织进行组织生存能力的解释分析中(根据生存时间、集会频率以及组织集体运动的能力),他们发现生存能力的不同可以通过可靠的资源和捐助者(提供了 50% 或 50% 以上的资源)的数量和组合而得到最好的说明。基于通过使用 QCA 而获得的研究发现,克莱斯和斯诺总结道,"持续的、有效的拒绝穷人,要求强大的(能活下去的)组织能预见到必要资源的流动",从而免于"非选民为本的促进组织"的危害(1996,p. 1107)。因此,对这种研究以及其他未来的比较民族志来说,QCA 提供了一套根据事件或结果的多重的、并发的原因,对少数个案进行比较的程序。

质性研究者的第二个办法有时接近决定性方式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步骤/过程模式或价值附加模式的逻辑。如上所述,模型类似于一个线性排列的生产过程,每一个阶段形成了产品的属性,从而递进地缩小了可能结果的范围。每一个阶段或步骤因此被视为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但是将之放到一起则构成了充分条件。约翰·洛夫兰德和罗德尼·斯塔克(Lofland and Stark,1965)先前提到的转换模型就说明了这一点。该模型假定"总体转换(total conversion)",包括行为的和语言的承诺,是七个"充要条件"累积的结果(p. 874)。模型中的前三个因素被认为是"倾向因素(predisposing)",因为它们在与使个体易于转换的团体和功能有联系之前,就先行存在了。余下的四个因素被归为环境的偶发事件,因为它们导致一个团体而不是另一个团体的补充和转换。在这些情境性因素缺乏时,不论如何偏向于个体,转换

都将不会发生。相应地,转换被概念化为价值附加的过程,每一个新状况或偶发事件的出现都增加了转换发生的可能性。

在一些质性研究著作中应用的最好的、最具决定性的因果模型是负面情形分析(negative case analysis)或分析归纳法(analytical induction)。这种模型的目标是,通过仔细地考察个案以及搜索反面的个案,不断重新定义要解释的现象与解释性的或因果性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后确立二者之间决定性的关系。杰克·卡兹在对法律援助律师何时以及为什么会筋疲力尽的实地调查中运用了这种逻辑,并简洁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 当遭遇到一个"反面案例"时——证据与当前的解释互相矛盾,研究者必须通过修正解释或被解释的现象,从而将反面案例转换成确定性的案例。研究者必须要去搜寻反面案例并寻找修正解释的机会。堆砌一堆与理论相一致的、已经排好序的资料,在方法论上毫无价值。(Katz,2001,p.331)

这个最开始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Thomas and Znaniecki,1934)详细阐明的因果分析模型,在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早期为许多"越轨行为(deviance)"类型的研究所运用:林德史密斯关于鸦片类成瘾的研究(Lindesmith,1947)、贝克尔关于大麻使用的研究(Becker,1953)以及克莱西关于贪污的研究(Cressey,1953)。这些研究看来都从这种模型的好处中抽离出来,走向了对该程序的批判性讨论(Turner,1953),但是某种程度上又在卡兹对恐怖欢乐屋中的笑声的分析(Katz,1999)和迈克尔·弗莱厄蒂对时光流逝的体验的考察(Flaherty,1999)中得到了复兴和重新使用。

指出质性研究者过去常常用来思考和评估因果关联和联系的这些不同的模型,并不表明我们就赞同要运用这些模型,也不表明这些示例研究的发现已经无所批判地被接受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要说明这些模型在大多数质性实地研究著作中具有显著的特征。相反,正如前面所表明的,大多数质性的、民族志的实地研究都不直接追求确定因果关系或探索因果问题。然而如果超功利性地这样做的话,也并不意味着因果解释就处于质性研究的逻辑之外了。当然,以上的例子提供了对所观察的事件、实践和行为有时想当然的假设以及用模型来思考其因果关系的对应物。

Ⅶ. 主题的结果是什么

在这八个问题中,许多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陈述的是其中的三个:对所观察的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说明事件和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及确定事件和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已经详述了前面两个问题,现在讨论结果方面的问题。当然,结果的问题与原因是相互交织的,因为结果可以被视为原因的另一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将因变量看作自变量,并且设法检验其因变量结果。

A. 检测结果的前景议题

在考察一些探索主题结果的质性研究的例子之前,有必要先澄清几个议题。

1. 推论结果的需求

由于结果问题不过是原因问题"往前推",原因推测的四项标准要件(上述Ⅵ. A 部分)在这里也可以适用。也就是说,你应当在自变量中有可识别的变化等。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条件对于许多质性研究的目标来说并不是十分中肯的,并且通常也很难在大多数质性实地研究中做到令人满意。然而,正如我们所表明的,质性因果分析模型及其应用的示例也是存在的,所以探讨因果问题对质性研究者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评估研究主题的结果的例子也是有的。

2. 谁的结果或是什么的结果

当考虑到一系列特定行为、社会实践、社会安排或组织形式的结果时,很重要的是要澄清:这是关于谁的结果或者影响到了什么。对谁来说,或者对什么而言,以及用什么方式,这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与团体 B 相比,这项实践或动议是如何影响团体 A 的? 例如,与团体 A(低收入居民)相比,这项动议(低收入住房的毁坏)提高了 B 团体(开发商)的利益吗?

在你的实地研究和预先分析(第 9 章)的过程中考虑这些问题,会迫使你询问更多聚焦的、有洞察力的问题,这有可能使你的

分析更加敏锐。而且,这样做的话,你就不太可能就某个特定的实践或一系列行为的结果特征得出不成熟的结论。

提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可以追溯到迄今为止对所谓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理论视角的长时间评论。功能主义假定某个社会实践、系列行动或制度的持续存在归因于某个大型系统或整体的维持作用。虽然这个假定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但是也可能起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因为它并不关注所研究的实践或行动如何可能消极地影响了某些人、团体或系统。因此,对于分析性和政治性的目的来说,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所调查的现象所产生的结果的可能范围。

3. 意图(intentional)结果和非意图(unintentional)结果

你所研究的现象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警惕这种可能性也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它们可能是有目的的、策略性的组织或行动的结果,或者从目标导向(goal-directed)的角度来看,它们可能是未被计划的、没有策略性的或不被刻意追求的非意图结果。非意图结果的经典例子是罗伯特·默顿对在美国城市为弱势种族的天才提供可选择的社会流动路径时,存在腐败的政治机器的著名论证。政治机器因此通过在某些种族团体成员中扩散潜在的疏离感,促成了城市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Merton,1968,pp. 126-136)。进一步的非意图结果的例子,可以考虑“医源病(iatrogenesis)”的概念,其实质含义是医学起源的疾病或弊病。因此,正如一般的口头讽刺格言所说:“如果你想得病,就去医院吧”。路易斯·施耐德曾经提到,这个“医源性的原理影响十分深远”,超出了医学范围(Schneider,1975,pp. 4-14)。毫不奇怪的是,这个概念的应用已经具有了某些特征,尽管在各种民族志文本中使用的不是这个说法,例如克里福德·肖的《杰克·罗尔:一个少年犯罪者的故事》(Shaw,1930)、欧文·戈夫曼的《贫民窟》(Goffman,1961a)、斯特凡·蒂莫曼的《突然死亡与CPR神话》(Timmerman,1999)。

强调这些著作是想让你对某些社会实践和过程的非意图结果有所留心。实地研究者通常都更为紧密地关注意图结果和有关的策略行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非意图结果不仅值得

他们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深入探究，而且通过以前并不被我们考虑的方式来阐明之，非意图结果通常可以揭示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

B. 对结果所做的质性研究示例

记着前面所讨论的议题，我们来思考几个对结果所做的质性研究的例子。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当探究一个主题的结果时，之前的因变量通常就变成了自变量，克莱斯和斯诺在 8 个城市所做的流浪者社会运动组织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开始分析的时候，研究的目标是要解释 15 个流浪者 SMOs 的组织生存能力（1996），随后在检验 SMOs 动员活动结果的差异的影响因素时，组织的生存能力就变成了四个假定影响结果获得的自变量之一。其他的自变量包括破坏策略、政治调解和每个 SMO 的方案特征。通过使用 QCA 程序，并考虑到由该程序所断定的这些变量的相对影响，克莱斯和斯诺总结道：

> 我们的发现证明了组织生存能力和策划活动对流浪者 SMOs 达到预定目的的重要性。当这些条件与政治调解、影响成功的结果达成的策略类型一起出现并被知晓时，我们发现流浪者 SMOs 就可能产生最大的影响。（Cress and Snow, 2000, p. 1101）

另一个论述了主题结果的实地研究的例子是鲁斯・霍洛维兹（Horowitz, 1995）对十几岁的黑人母亲的 GED 和工作培训所做的为期一年的研究。霍洛维兹的实地观察显示了两个不同的项目人员团体用明显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与项目学生之间的互动。其中一个团体成员采用的是等级方式。这些被她称为"仲裁人（arbiters）"的成员拥有职业专家的角色，并将自己看作与行为受到他们控制的项目顾客明显不同的人。另一个团体成员，她称之为"协调员（mediators）"，基本上不将自己定位为专家，而是母亲和年长的妇女，因而强调她们与项目中年轻妈妈们当前和未来的相似之处。霍洛维兹认为，根据年轻妇女关于她们是谁以及她们想要成为谁的问题而提供的信息，这些不同的方式产生了显著不同的结果。仲裁人使得年轻的母亲们服从于依赖的和不体面的

经验,从而产生了阻碍她们独立与做个人决策的结果。另一方面,协调员与项目顾客之间的互动和讨论传达了一种尊重和共享的感觉,因此,给年轻的母亲们提供了一个角色模型,鼓励她们追求个人赋权。

正是在询问和探索因果问题的情形中,这两个研究表明,质性实地研究也能对理解特定主题——不论是某些行为、实践还是论证思路——的结果有所贡献。

Ⅷ. 施为者在哪里、是什么

我们已经讨论了分析者所问的有关社会主题的七个问题,不论这些问题是单元、层面,还是它们的结合。所有这些问题,除了聚焦于过程以外,都可视为单个总规则上的变异:大多数人类行为,不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都由超越于行为者自身的意识或控制的力量所决定。我们要在这里辨识这个观点,并与一个对社会生活分析的更具动因性的途径做比较,该途径也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

A. 消极论者对动因性概念

我们可以把前面七个问题所阐释的观点称为人与社会生活的消极论(passivist)观念。从这个有利点来看,人类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消极的机器人,程序化地回应内部编码和安排,或者磁性地应对外部力量的拉力和结构。正如赫伯特·布鲁默所言,在此途径中,人被视为大致上中立的媒介,社会力量通过这种媒介运作,社会形态与组织在这种媒介中组成(Blumer,1969)。类型、频率与幅度,结构与过程,以及原因与结果都有它们自己的现实,人在这种现实中是偶然的特质或社会组织单元及其层面运行时的密码。

用这个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算错,但是并不完整。社会结构与组织有它们自己的现实。但是也有另一种现实,为了对人类行为获得更为全面而平衡的理解,我们需要考虑一系列相应的问题。*这种可选择的现实被称为人类社会行为的动因性概念*(agentic conception)。它把人视为有创造力的、探索的生物,能够应对、处理、指明、躲避、规划、设计、努力、奋斗等,也就是说,这种

生物积极地影响并试图与他们的社会场景进行协商。从这个有利点来看，正如布鲁默（Blumer，1969）所强调的，社会行动者重视影响情境的结构和文化约束，在这些情境中，他们在发展其对于活动形式的观点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因而，焦点在于人们如何建构、协商和管理他们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

B. 动因性的问题

一旦你掌握了社会行动者的这种更为积极的意象，不论他们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你都将面临我们之前所表明的激励了许多质性实地研究的"如何"的问题（Ⅵ. C 部分）："事情是如何做完的？""人们如何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个体如何去从商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当询问这些"如何"的问题时，你实际上就聚焦在了行动者用来做任何力图完成的事情的策略上。因此，从动因性的立场来看，你通过询问"行动者正在使用或应用的策略是什么"这个问题来对你的问题和分析进行聚焦。

在询问和探索策略问题时，你实际上想要探究的是这三个问题：①情境、场景或任务是什么？②它是习惯、想当然、常规化的情境或任务？或者它是有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行动产生了问题、挫败或出轨？③在处理情境时所运用的策略是什么？毫无疑问，应当较早地辨明与问题情境相关的策略性谈话和行动，因为与常规化的行为相比，行动者更有可能意识到他们正在尝试做什么。所以对你来说，可能最好一开始就在有问题的情境中追溯策略问题。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总结的大量研究都示范了这种方法，下面就是例证：

- Ⅱ. A 部分，关于实践：当个体的行为产生了问题时，个体对其实践的解释（例如，Dowd，2000；Kalab，1987；McCabe，1992）。
- Ⅲ. A. 1 部分，关于意识形态和意义：当团体成员的思想信念或职业与其行为或实践相分离时，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ideological work）"（例如，Berger，1981；Lofland，1977；Rochford，1985）。
- Ⅲ. A. 3 部分，关于自我概念和身份：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为了修补或转换特定的角色或"污名（spoiled identities）"，从事识别工作（identity work）（例如，Paterniti，2000；Ponticelli，1999；

Sandstrom,1990)。

这些例证突显了相对微观情境中的策略性、动因性行为的特征,但这种策略行为在较大规模的情境与背景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前面的章节中也提到了一些研究示例:

- Ⅱ.B 部分,关于片断:在集体庆祝或抗议的片断中,情绪或委屈的集体性、策略性表达(例如,Corrigall-Brown and Oselin,2003;Davis and Boles,2003;and Snow,Zurcher,and Peters,1981)。
- Ⅱ.G 部分,关于组织:相当普遍的排名"次级调整(secondary adjustment)"和全控制度(精神病院)中的成员排列,以及工作组织(工厂)中卑微或无聊的体验(例如,Goffman,1961;Hodson,1991;Roy,1959/60)。
- Ⅲ.B.3 部分,情绪和组织:商业组织如何策略性地制造、模糊或分层企业的情绪层面(例如,Biggart,1989;Holyfield,1999;Pierce,1995a)。

我们总是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结构与组织也是建构而成的,正如伯格和卢克曼所称,人有客体化(objectivation)的特殊倾向(Berger and Luckman,1967,pp.60ff)。人类自身设计策略性的社会安排,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却忽视这个事实,因为"结构"本身呈现为一个"客体"(因此用客体化一词)。聚焦于施为者(agency)或策略,是一种将社会安排"去客体化(de-objectify)"的方法(而且,就像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解释的,将它们祛魅[demystify])。在去客体化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没有一种社会安排仅仅是"存在(is)"。在一定程度上,安排是不断被构造和重构的,通过聚焦于从商的成员或行动者如何做他们所做的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而社会安排就被分解到他们的策略组成中去了。通过追踪行动者的策略,通过让施为者回忆生动的描写和对所观察现象的分析,动因性的有利视角将生命注入到了社会之中。

论者聚焦资料的路线有三条,主题(第6章已描述)与问题(本章已描述)提供了其中两条。我们现在需要加上第三项考虑,那就是针对你选择要分析的某个特定主题与问题,唤起受众的兴趣。我们在下一章处理这第三项考虑。

第8章 唤起兴趣

Arousing Interest

探究有关某个社会科学主题（第6章）的问题（第7章），成为研究者聚焦资料的三条路径中的两条。第三种聚焦资料的方法处理的议题为：是什么使得实地研究报告引起社会科学读者的兴趣。研究报告的读者回应的热切程度各不相同，他们鼓吹某些主题重要至极，认定其他主题微不足道，或许认为多数主题不那么重要。这里也必须强调，读者本身对某个报告的有趣程度有多高也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对于一份报告来说，某些特质使之引人入胜，反之则乏人问津，这似乎有相当多的共识。关于有助于使质性研究报告引人注目的特质，几位学者提供了有深刻见解的洞察。本章着眼于他们的工作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讨论引人注目的社会科学实地研究的三个至关重要的特征。读者对报告提出的问题是这样说的：

- 报告是真实的吗？意思是报告中的观察或主张从经验上来说是引人注目的吗？程序上说是值得信赖的吗？
- 报告是新颖的吗？意思是它不只是重复已经做过的观察，或是回答已经有人发表的问题。
- 报告是重要的吗？这个问题是就我们在下文将要解释的某种或其他意思而言的。

在本章，我们要提出使社会科学的读者尽可能视你的报告为真实的、新颖的和重要的程序和策略。三者合起来看，每个问题的正面回答构成了全面的评价，即你的报告是有趣的、有用的，因为它发展了对社会世界某个方面或主题的经验主义的、概念上的

或理论上的理解。我们讨论真实性、新颖性与重要性,也就是说,通过收集资料、整理资料以及诠释资料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科学的框架(social science framing)。我们将首先详述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框架",然后讨论在不同学者网络之间通用的多种可选择的框架。鉴于我们对社会科学框架的背景剖析,我们将指出,虽然另一种框架的报告可能有人文主义或其他的优点,但它们毕竟不是我们在本章所说的"社会科学的"框架。

Ⅰ.社会科学框架

真实、新颖、重要性的概念相当抽象,其确切意义依据它们特定应用的背景所发挥的功能而定。这里的个案就是如此。我们所说的真实、新颖和重要性的含义,随实地研究的类型中对质性社会科学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而异。

A.真 实

真实的概念能迅速导致激烈的哲学辩论。如杰克·道格拉斯所言,有各种抽象的真实,如宗教的真实、美学的真实以及哲学的真实,还有"日常生活中巨大领域的真实"(Douglas,1976,p.5)。在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框架的范围内,我们所说的真实是马特尔·哈默斯理和其他人所谓的"微妙的现实主义者(subtle realist)"的传统,其中,可理解的概念"独立的、可知的现象(independent,knowable phenomena)"从"幼稚的现实主义(naïve realism)"中被保存下来,但是,并不认为所描述的现实是精确的或者陈述是完美的,即,并非与某一被考察的对象完全对应(Hammersly,1992,pp.50-52;Flaherty,2002;Hammersly and Atkinson,1995;Snow,2002)。从这个有利点出发,对真实的理解意味着"保证最接近经验主义世界"(Snow and Morrill,1993,p.10),这从程序上来说是"可信赖的"(Erlandson,Harris,Skipper,and Allen,1993)。

报告的经验主义精确度或真实是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策略来产生的,这在本书的前面章节,特别是在观察中努力避免错误和偏见(第5章Ⅱ.B部分)、估计频次和幅度(第7章Ⅱ.C部分)

以及对原因和结果进行论述（第 7 章Ⅵ、Ⅶ部分）等相关章节中，已经进行了描述。

最后，读者只拥有你的研究报告，他们会因此特别注意其特殊之处是否给他们信心，确定事实材料是正确的。我们同意罗杰·桑杰克（Sanjek，1990a）的说法，即实地报告的读者特别要寻找三种他称为“民族志效度的标准”的有效讨论与实践。因此，在方法论上小心翼翼的研究者已有好的建议，提供的讨论与实践要在他们的报告中落实这些标准，之前也要投入促成这些标准的活动。这里借用桑杰克的标题，将这些标准罗列如下：

1. **理论坦诚**（theoretical candor）

断定的事实与接受真实评估的事实是以某种实质的方式予以组织和分析的。如果研究者为他或她如何采用特定的分析形态来组织事实提供了真实的解释，那么读者对经验细节正确性的信心将大为增强。不可避免的是，在大量可得的事实中，只有某些事实实际上得到了报告，这种报告又是依据个人的分析或理论工具组织而成的。“坦诚地展示何时与为什么”，这种框架发展出来，可以“强化民族志效度”（Sanjek，1990a，p. 396）。

2. **民族志学者的路径**

“理论坦诚”的标准报告了一个人分析的资料来源。相对而言，民族志学者的路径说明是报告与研究者互动的人，以什么样的顺序互动，如何互动。在某些研究中，这是“连结民族志学者与信息提供者的路径描述”（Sanjek，1990a，p. 400）。更广泛地讲，民族志学者的路径不仅包括互动的对象，也包括信息收集的其他途径，以及在第 5 章Ⅱ. A 部分中所论述的资料范围。一份报告应该包括理论和实践思考的记录，引导研究者从这些特定的来源中收集资料。作者根据适当的资料收集路径，写出了坦白的、引人注目的案例，实地研究报告的真实性因而得到加强。

3. **实地笔记和访谈誊写本的证据**

民族志效度的第三个标准，是要报告①研究者处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以及②报告中呈现资料的做法。关于程序，即研究者

如何记录和使用资料的，应该在开展分析的过程中描述出来。当研究者针对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的保证过程的清晰描述时，实地研究的可信度是最强的。进而，足够多的经验资料的呈现也能让读者理解和判断研究报告的理论主张和实证论断。通过提供研究者对被研究的世界的参与的证据——克里福德·格尔兹（Geertz，1988）将这些证据列举为“我目睹了”或者“我在场”这些民族志研究中所记录的言语，实地笔记和访谈誊写本的证据又增加了可信度。

这三种讨论与做法当然不能确定研究者的报告是千真万确的，从而确保读者会认为其事实是正确的或在经验上是引人注目的。不过，这三者的确提供了一种思考态度（mind-set），用以接近资料，也可以提升你对经验真实（empirical trueness）的关注。经过完整的执行与报告，这些做法至少在完成真实性评估标准的道路上畅行无阻，也因此迈向了吸引受众兴趣的道路（这三个标准的其他层面的讨论也可以参看：Altheide and Johnson，1994；Coffey and Atkinson，1996；Erlandson，Harris，Skipper，and Allen，1993；Lincoln and Guba，1985）。

这三种做法所贯彻的主旨，就是研究者在对待报告中的资料时，要运用并展现方法论的关注与谨慎。如墨菲和丁沃尔所言，研究者在使读者能够评估其主张的真实性方面，有“双重责任（double responsibility）”：

> 首先，他们对严格的自我批评行为、研究的分析和解释有责任……其次，他们有责任给读者介绍充足的信息，以便让读者判断他们所提议的发现被充分地证实了。（Murphy and Dingwall，2003，p. 174）

对本章前述的关注点和其他议题的关注，为完成以上责任提供了方法。

B. 新　颖

探索对某一特殊场景、团体或主题的研究可能性时，经常听到学生叹息，“这是已经研究过了的，那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反应是基于合理的期望，而不把资源浪费在已经确认的累积事实

上，或是重复已经发展且众所周知的想法上。但是，人们通常不能认识到有各种新颖的维度，并且发展或强调新颖性有各种策略，我们以下详细论述其中的几种：

1. 与现有著作相关

一个明显且相当容易地判断你的研究起源的可能性的策略就是，运用图书馆资源，确定你的研究情境、团体或其他情境已经被人研究的程度。即使已经做过研究，你也不要沮丧，因为民族志研究者从事的研究，是麦克·布洛维（Burawoy，2003）所谓的"聚焦的修正主义者（foused revisit）"：回到以前的研究现场，进行新的研究。例如：布洛维起初到唐纳德·罗伊（Roy，1959/1960）所研究的工厂再次访问（Burawoy，1979）；德里克·弗里曼（Freeman，1983）到萨摩亚群岛重新评估玛格丽特·米德的经典研究（Mead，1928）；新闻记者玛丽安·波依伦（Boelen，1992）重访威廉·怀特在《街角社会》（Whyte，1993）中流芳百世的邻近地区。在每一个重访中都可以发现，对于以前研究过的情境，你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要说，你也可能这么做，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事物由于布洛维所说到的各种原因而发生了变迁（Adler，Adler，and Johnson，1992；Holmes）。

同样地，你可以查证你考虑要使用或发展的概念、分析与理论。就像场景与团体一样，你可以认为你的取向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构成一种新的形态。

除了直接的图书馆查证之外，有个查证现有著作的策略极为有效，那就是辨识并找出所做研究与你打算要做的研究类似的人士。通过面对面、电话、写信或电子邮件的交流方式，尽可能与这些人联络，这样做的确会使你的计划有趣，也比单单运用图书馆资源更多见多闻。

在已经得到公认（well-established）的分析背景下，追求新颖的方式有许多种。默瑞·戴维斯在他的洞察透彻的著作中讨论"这个有趣"的研究反应时（相对于"这个显而易见"与"这个荒谬"的回应），指出了塑造新颖性的几种形态：

- 看起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现象，实际上是……有条有理的

现象(反之亦然)。

- 看起来似乎是分门别类的异质现象,实际上是由单一的成分组成的(反之亦然)。
- 看起来似乎是稳定不变的现象,实际上是不稳定,而且变动不居的现象(反之亦然)。
- 看起来似乎是类似(雷同)的现象,实际上是对立的现象(反之亦然)。(Davis, 1971, pp. 313-325)

2. 第一次报告

当前的社会一直在修正现存的社会构成与实践,或者混合出新的事物。这些变化不仅刺激了读者的兴趣,而且提供了进行质性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确,正如杰克·卡兹(Katz,1997)在其对质性研究者典型地用来证明他们的研究证据的讨论当中所观察到的,多数早期的芝加哥学校的实地研究聚焦于对新的社会现实和新型社会问题的考察。这些新型社会构成的最近实例包括米切尔·阿波拉菲尔(Abolafia, 1996)所探索的"后保债券(junk bond)"市场,劳瑞·肯德尔(Kendall,1998)所研究的像"蓝天"多用户领域等在线聊天团体,以及利昂·安德森(Anderson,2003)所报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跳伞团体。

3. 异常的情境

异常情境或场景(此英文原文为"社会情境或场景",疑有误——译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被社会定义为陌生的,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定义为奇异的、猥亵的和暴力的,等等。这种异常的情境没有太多记录,次数也不多。此外,这些情境或场景的参与者通常被认为超出了大众的理解。因此,杰克·卡兹写道:

> 任何实践或群体,一方面,有些是特别卑贱、被轻视或者以惹是生非而著称的,另一方面,有些是精英、受到尊重或者具有超凡魅力的,对他们近距离的、前所未有的描述应该要公正地对待。(Katz,1997,p. 392)

我们或许可以指出,有些研究者能够同时运用第一次报告与异常情境的策略。例如,在 1970 年代早期,劳德·汉弗莱

(Humphreys,1975)是第一个持续观察同性恋在公共厕所相会的研究者——这份报告根据其经验主义的发现,以及如前所讨论的方法论程序的伦理,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4. 新的分析焦点和视角

实地研究不可能满意地考察到某个给定的社会世界的所有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如第 7 章所述,实地研究包括对某个情境或场景聚焦,并询问关于所选择的主题的问题。因此,通过聚焦于先前并非分析对象的主题、单元或主题的层面,研究先前被探索过的情境的新报告,可以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当作者提出一个新颖的概念或理论的焦点时,这份报告可能被认为是新颖的、值得关注的。做到这一点,至少有三种方式:通过理论的发现、扩展或者提炼。讨论的最广泛的就是理论发现或者来自实地研究的分类法以及微型概念的发展——相关例证有巴尼·格拉泽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以及凯西·卡麦兹和理查德·米切尔(Charmaz and Mitchell)所讨论的"扎根理论"(Charmaz,2001;Charmaz and Mitchell,2001)。但是,理论的新颖性也可以通过"理论扩展(theoretical extension)"来实现。在此作者所叙的新颖是指将先前存在的理论或概念表达在团体或情境中,而不是指其第一次发展或运用。实例包括,卡尔·莫里尔(Morrill,1995)对"互相攻击(reciprocal aggression)"这个概念的扩展,这个概念原来是由人类学家在研究园艺及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中的冲突管理时发展并使用的,但现在用于美国商业公司行政人员之间的冲突管理上。同样地,斯科特·亨特和罗伯特·本福特(Hunt and Benford,1994)扩展了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87)的"身份工作",这个概念最初集中在流浪者个体的身份结构上,后来被用在社会运动机构的组织身份工作上。

或者,一个原创性的贡献可以通过"理论提炼(theoretical refinement)"或者对现存的理论命题进行修改来获得,后者的具体做法是用新的实地资料对某一特殊的理论命题或概念进行紧密的调查。这可以和理论扩展一并做到,也可以独立做到。麦克·布洛维的"扩展的案例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Burawoy,

1998;Burawoy et al. ,1991)构成了通过扩展进行提炼的实例,对此,他的修正者以及他早期在赞比亚所做的重新细化的工作中都有论述。另一方面,不依靠扩展的提炼(refinement independent of extension)在斯宾塞·卡希尔(Cahill,1999)对丧葬学学生的专业社会化的民族志研究中也有论述,他通过对情绪资本概念的介绍,对次级社会化进行了理论提炼和研究(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对理论的发现、扩展及提炼的处理,请参看:Snow, Morrill, and Anderson,2003)。

C. 重要性

真实和新颖的议题是唤起社会科学读者的兴趣的重要成分。但是表述(真实)的精确和原创性的贡献是吸引读者注意基本的开端测试。无论一份报告需要有多少这样的品质,但是仅仅通过它们并不能引起特别的兴趣。它还需要具有重要性,这构成了研究报告的第三个重要的性质。

唤起兴趣的"重要性"维度比真实与新颖的维度还要广泛、模糊,也比较难以评价,而且对它的评价在社会科学读者中比较有争议。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指出许多框架实践(framing practice)趋向于促成"这是重要的"反应。根据我们的评价,这类框架实践有五种。它们在报告中用得越多,社会科学家评定其质性实地研究的重要性就越高。并非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均认为这五种在单独一个报告中都要用到,并且能同时强烈展现这五种框架实践的报告也不多见。即便如此,这五种框架实践仍然形成了一整套内容,可以说,具有了可取的框架特征,提供了一组有关重要性的评估标准。

1. 质问思态(questioning mind-set)

应用在社会科学框架中,得之不易且具持续不定特征的现代思态,就是"永无定论(there is no final word)"这个命题的广泛应用(Rauch,1993)。所有现实的再现,不论是什么现实,都只是说法,可能有误差,需要搜寻验证。的确,质问或怀疑的思态体现了对"现实"的日常常识态度和科学态度之间的基本区别。正如阿尔弗雷德·舒茨(Schutz,1962)所观察到的,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操纵的方法大部分是通过“悬置怀疑（suspension of doubt）”——我们的行为以看起来似乎是那么回事为基础。而另一方面，科学的态度引起“悬置信仰（suspension of belief）”——对所接受的知识和理所当然的假设进行开放的积极的质疑。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质问或怀疑论被不断应用，可能是现代市场经济、政治民主与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文理科学兴起并发展的主要文化成分。

在这所有的领域中，以不断怀疑的调查形式进行质问，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对立的绝对论（absolutism）思态也一直强调它自己的主张，试图在质问或怀疑的探究之外，支持某种现实的表达。从绝对论的观点来看，所断言的现实是有最后定论的，而且这些断言必须基于权威的声明或道德的必要而被接受，而这已被视为超出了质疑的范畴。科学的反对意见是，每一个断言和观点都必须接受审查。质问思态的中心主张因此是：“不要挡住探究之路。”

科学态度和绝对论态度的区别就在于授权（mandate），信奉科学思态的人必须自愿地、开放地使他们的观点和预见服从批判的考察。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非常必要的是展示自我批判的特质，证明他们质问自己和自己观点的意愿。尽管质问的思态作为一种精确的操作行为，让研究者在资料和分析中执行，是很难杜撰出来的，但是，我们已经讨论出了几个方法论的策略，为你呈现观点和对潜在经验上的不确定（empirical disconfirmation）进行理论概念化提供系统的方法。第 5 章 Ⅱ.B.2 部分曾描述了控制错误和偏见的方法的范围，特别是目的性抽样技巧、团队研究以及成员检核步骤，都呈现了获取新的、潜在的不确定资料的系统努力。通过在你的报告中描述这些程序，你可以明白地给读者提供严格的、质疑的思态。

这种批判的态度也适合于研究者如何对待他们所研究的现实。根据绝对论的处理方式，这些现实非真即伪，非善即恶，但判断与被判断的现实均非检验的主题。相对而言，质问的思态将人*们所研究的现实“放入括弧（bracket）”*，作为探究的主题。问题不仅是团体成员的主张在经验上的精确度如何，而且还有那些被研究的主张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

最后,质问思态也显示在对最终的研究主张的警告中。明智地承认普遍性和条件评估的局限,在此情况下,一个人的主张可能要保留(被一些方法论者称为"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s)")这种做法,对社会学的读者而言,比草率的主张更引人注目。最后,他们认为研究报告的可信度是很重要的,基本上取决于对严格的、自我批判的资料收集的证明、分析以及研究结果的阐释。

2. **命题框架**(propositional framing)

第二种有助于对重要性做积极评估的框架做法,在特性上比质问思态更倾向具体的操作。询问有关主题(第6章)问题的目的(第7章)是找到社会科学的答案,这种答案可以被认为是社会情境或场景的命题。这些命题构成了使资料有意义的论题,它们是你通过你的资料分析所获得的结论,也可能包括陈述一个假设、论述一个概念或类型学,或提供一般的诠释。

第7章解释的八个问题,提供了八个命题的基本形态,从而构成了这八个问题的答案。抽象地来说,它们是:

- 类型:X存在(或X-1、X-2、X-3、X-n存在)。
- 频次:在Z段时间内,Y单元中的X在地点1、2、3、n发生。
- 幅度:X具有Y的大小、力量或密度。
- 结构:X以1、2、3、n的方式结构而成。
- 过程:X展现的过程有1、2、3、n的阶段或周期。
- 原因:X由因素1、2、3、n造成。
- 结果:X有结果1、2、3、n。
- 施为者:在X中,人们使用1、2、3、n的策略与战术。

一篇文章长度的报告通常只讨论这八项命题的其中一项,或许兼及其他一项或两项。即使是书籍长度的报告,也可能只讨论一项,尽管书籍更可能讨论两项、三项或四项(但极少讨论全部)。

我们尝试更精准地描述与主题有关的问题的命题式答案,说*明它如何成为一般性差异的一种特殊应用*。从更广泛的著作领域来看,描述一个主题或区域的"主题写作(subject writing)"与提出论题或主张的"思想写作(idea writing)"通常是截然不同的。

> 有些人用想法(idea)一词,意指"论题(topic)"或"主题(subject)"之类的词语,这些词语指的是可能有兴趣的领域,如"经济"或"癌症的疗法"……这些词语或许可以说是"广泛的"或"狭窄的"主题,但它们还不是想法,因为它们没有提到有关经济学或一种癌症的疗法……经济学这个名词不是想法……"经济学是胡诌"则是一种想法。……没有想法的名词短语与存在想法的陈述之间的差异,在于述谓结构(predication):想法是句子,它们把动词与名词连结起来,形成一种思想。就某个主题说一些话,需要在它与某事之间做某种连结(Gage,1987,pp.48-49)。

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命题是思想写作,不是主题写作。命题是有关主题的断言——对事实观察的诠释框架。注意以上给出的八个命题,每个命题都通过对它们的建构而使得所收集的资料比它们纯粹的现象存在更有意义。它们变换成了想法。它们不再是单一的观察,而是被诠释为类型、频次、过程、结构、策略等。因此,命题是想法,为你的资料提供更广泛的含义或者意义脉络。社会科学的受众期待的不仅仅是未经整理的事实罗列。要使一份报告有趣,作者必须发展想法或命题,为他们的资料建立更广泛的含义、诠释或者意义的脉络。

3. 一般概念

再者,社会科学研究寻求的命题框架是一般性的,不是局部化的或历史上特有的。一般的命题所表达的不仅是地方性的意义和行动,而且有更广泛的、更一般的意义。一般的框架(generic framing)不是基本按照编年顺序或者用纯粹的描述性术语,来报告某个场景或情境中所观察到的逐年活动,而是试图详述以局部的或历史的特殊事件为例的抽象命题。换句话说,局部的、特殊的事件是向上的范畴,正如从先前章节所摘录的研究中提取的以下实例所论述的一样:

- 以特定的活动或场所中孩子们发展的受限制的伙伴关系为例的研究:《间隔的友情》(Adler and Adler,1998)。
- 公司的行政人员以说教的针锋相对的方式处理彼此间的委屈

为例的研究:《相互的冲突管理》(Morrill,1995)。

- 在由不同种族和阶层构成的团体中,人与人之间在公共相遇中的肢体语言和运动实践为例的研究:《街头礼仪》(Anderson,1990)。

在以上的每个研究中,分析者运用了丰富的质性研究资料"作为基础,以便形成超越资料收集的特定情境的概念"(Prus,1996,p.141)。其目的是把研究的特定素材转变成广泛相关的和基本的社会类型、过程或任何事物的例子(Prus,1987,1994;Zerubavel,1980)。在"向上范畴化(upward categorization)"的过程中,一般框架在模糊的及有时看来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根本的人类主题与关注点。研究的情境从它的历史独特细节中提取出来,放在广大读者感兴趣的各种事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框架是从一粒沙中看宇宙。

可以说,当社会科学家试图提升一般的概念化时,至少有四种"本行当的技巧(tricks of the trade)",有时候他们可以用这些技巧来刺激他们的想象。前两种(运用现存的社会科学概念和辨别新的形态)包括相对直接的发展分析的策略。另外两种"本行当的技巧"(隐喻的使用和反语的利用)包括想象力的文学转向。我们简要论述每一种技巧。

(1)运用现存的社会科学概念

一般概念化的一个明显可能性就是将已经存在的一般社会科学概念吸收到你的分析之中,并在过程中对它们进行提炼,如本章Ⅰ.B.4部分所讨论的一样。社会科学的文献对质性研究者来说是无价的资源,提供了广泛的理论和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科学家发现它们对分析团体和社会情境很有用。在以前已经研究过的情境中,某些理论的概念化或命题可能已经得到了发展或者已经运用到了情境的成员及其活动当中。虽然对先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不熟悉也同样可以发展你的分析,但是,如果这样做,你就会置身于不利的情形中,要冒险去发现已经被透彻理解的理论。另外,如果你的读者大部分是社会学读者,他们会希望你对摆在你面前的经验发现和理论分析所具有的知识和理解达到有意义的程度。承认他们的研究以及将他们的研究和你的研

究联系起来(用肯定的和批判的方式),对于论证你的理论以便建立一般的框架,使其能从历史的、局部的个体情形的特例中超脱出来,是很有用的。

在你努力发展或应用一般概念的时候,你也可以发现,考虑将其他情境中的概念扩展到你所研究的情境中的可能性是有用的(如本章Ⅰ.B.4 部分所讨论的)。

(2)识别新的形态

在一般的命题框架中,一个比较适当的,但还是很重要的、创造性的方法,就是在既定的社会单元或层面上,或是在前一章描述的八个问题的答案上,识别出新的变化。即使新的形态可以和这八个问题中任何一个关联起来,但实际上它们总是针对第一与第四个问题的答案:“它是什么类型?”和“它的结构是什么?”例如,欧文・戈夫曼的“全控制度”概念(第 7 章Ⅰ.A 部分讨论过),就是一种新的形态。至于与其他问题相关的“新形态(new form)”的答案,正如以下对前面讨论的实例所表明的一样:

- 问题 5:“主题的过程是什么?”对搜索和营救团体的志愿者从外围的成员变成有充分资格或核心的成员这些过程的确定(Lois,2003)。
- 问题 6:“主题的原因是什么?”种族主义者仇恨团体通常怀有“种族主义者自我”和种族主义者信仰(Blee,2002)。
- 问题 7:“主题的结果是什么?”福利项目的项目经理可以减少代理人的机会,助长其依赖关系,同时支持自足和独立的价值(Horowitz,1996)。
- 问题 8:“人类施为者是什么?”慢性病护理机构的居民构造(真实的和想象的)个人叙述,作为声称积极的个人身份和操纵其与机构护理人员互动的工具(Paterniti,2000)。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现代世界的翻腾不断产生各种新的、重要的变异。这种新颖性扩展为新社会类型、结构、过程等一般的命题。因此,想用这种方法表述经验的人应该沿着这条路线寻求发现。的确,新的一般命题所表述的新社会模式,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公共服务,我们在下面即将讨论。不过,要使用现存的社

会科学概念,创新性地识别新模式,要求熟悉现存的社会科学分析。没有关于先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你不可能知道某种社会化、家庭类型或者组织过程实际上是不是新的。

(3)使用隐喻

当你试图从对局部的、特例的分析转入更广泛的一般归类时,你也许发现利用一个或两个普遍的文学技巧是很有用的。第一种技巧就是创造性地使用隐喻(metaphor)。字典通常把隐喻一词定义为"一种物体或字词在字面上意指另一处使用的物体或想法所用的言语方式,借此间接地表明它们之间类似或类比之处(如船在海上犁耕[plows the sea],意指破浪前进)"。更广泛地说,隐喻是指"从其他某事某物的观点看某事某物"(Brown,1977,p. 78)。在社会科学的框架中,最简单的公式是"把 X 当做 Y",如莫瑞·梅尔斌在《暗夜疆界》(Melbin,1987)书中有创意的分析,就是把"疆界"的字面意义的特质用于"暗夜"的研究。梅尔斌主张"时间就像空间一样,可以由人占据并处理……都市地区夜晚的社会生活就像以前拓边者的社会生活。"(Melbin,1987,p. 3)。戈夫曼是20世纪最具创意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经常使用隐喻产生一般命题,例如,把:

- 社会生活中的挫败问题视为典型的骗局,其中每个人都是受骗者(marker)、操作者(operator)或安抚者(cooler)(Goffman,1962)。
- 陌生人之间的接触视为"表演者(performer)"与"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剧场情境(Goffman,1959)。
- 精神病人视为职业生涯(Goffman,1961a)。
- 心理治疗视为"修补业(tinkering trades)",或仅仅是有同样贪污倾向的服务业(Goffman,1961a)。

隐喻的重点不只是机械式地把一个领域诠释为另一个领域,而是"提供新的方法,了解我们已经知道(并且重构)的……新的认知领域"(Brown,1977,p. 78)。隐喻的方法作为引导,是建议来一场心智游戏,例如:天主教会是宗教界的通用汽车,心脏科医生是做精品生意的,希尔顿饭店是睡觉的工厂(Brown,1977)。因

此,隐喻推动了宽泛的一般概念化,因为它们使你从局部的特例转为更抽象的模式,使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表面不相似的现象中先前不被看见的相似点上。隐喻还通过梳理意料之外的洞察力,提供了使你的分析变得敏锐的方法。在使洞察力敏锐并因此激起读者兴趣的过程中,隐喻的使用类似于反语,反语是我们讨论发展一般性命题的最后一个技巧。

(4)使用反语

反语(irony)通常定义为:"事件的状态与预期或所预期的状态相反:是相反的结果,并且好像是对适当结果的嘲弄。"我们把它当做社会科学的框架,就是专注于社会主题中矛盾的、无意中的或是参与者没有认知到的原因、结果及其他层面。

反语通常用于功能或结果的问题(第 7 章Ⅶ部分)。在这种个案中,研究者超越认知到的、意图的(或显性的)功能,看到未认知到的、非意图的(或隐性的)功能。社会学反语的主要研究者罗伯特·默顿曾说过,"正因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研究重点从显性功能的层面转移到了隐性功能的层面,他们的贡献才显得独特而重大。"(Merton,1968,p. 120)。默顿本人为这种主张提供了许多强有力的例证(参看 Stinchcombe 的评估),但是,其他人也发现了这种应用反语的分析效用。的确,"功能主义者的观点"就以满纸反语而有名。历史上,功能主义者(以及其他使用功能主义者观点的人)曾经提出了"社会问题"各种反讽的、潜在的功能。如金斯利·戴维斯曾主张"卖淫增多可以减少正派妇女性行为的不规律"(Schneider 1975,p. 325)。赫伯特·甘斯(Gans,1972)将一系列为那些不是穷人的人所提供的功能或福利编入编年史。但是非功能主义者的质性研究者也利用反语来强调或突出他们的发现,例如,妮可·毕加特(Biggart,1989)对"魅力资本家(charismatic capitalists)"的研究,约翰·洛夫兰德(Lofland,1993)对作为"有教养的抗议者"的和平激进主义分子所贴的标签,以及卡尔文·莫里尔(Morrill,1995)发现,人类学家所发现的部落社会中同类的复仇仪式在社团会议室也可以实施。

正如以上的实例所示,在质性研究中,反语作为分析和文学工具的运用,凸显了典型的不被关注的联系,这种做法,强调了调

查和报告的重要性。

4. **成熟的处理**(developed treatment)

如果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内,各自独立研究并出版了基本上同一的报告,那么经验上与概念上发展得比较完整的报告,会被人认为比较重要。在科学史上,查尔斯·达尔文与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的著作之间的关系,就是经典的个案,其中后者自行提出了进化论。要不是他们之间有个英式的君子协定,要求各自的理论要同时公开,华莱士的发表或许会比达尔文还早。尽管如此,这个理论通常还是归功于达尔文,而非华莱士。这是因为达尔文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详尽地发展了该理论,并发表了数篇详细的报告,而华莱士却没有。华莱士的报告既真实又新颖,但他并未详细发展该理论,也没有把他的论述建立在太多资料上。相比之下,达尔文耗费数十年时间,发展了各种资料形态,并根据这些资料,说明了该理论。因此,达尔文的著作比华莱士大略论述的推测有更坚实的证据基础与概念优势。因此,被视为进化论发明者的是达尔文,而非华莱士。

社会科学的情况也一样。实际上,呈现所有其他重要的(以及真实的、新颖的)框架的出版物,的确并不少见。也就是说,以一般命题作为框架并引起共鸣(下文讨论)的质问思态的著作,也不难找到。但如果没有实证的与概念的发展,严肃的社会科学家会认为这些著作只是很有技巧地运用推测而已。这当然要求提出是什么构成了"成熟的"处理这样的问题?虽然质性实地研究对此皆无明确的标准或一致同意的看法,但我们还是发现许多社会科学家依据三个向度来评估其发展状况:①概念解说(elaboration)的程度,②概念解说与资料呈现之间的平衡(balance),③概念解说与资料呈现的相互贯通(interpenetration)。

(1)概念解说

概念解说这个维度是指形成报告主体的主要的概念性的或分析性的单元(divisions)及子单元(subdivisions)的数量。用扎根理论的语言来说,这个维度是指概念的密度(density)、特性(specificity)以及互连或整合(Strauss and Corbin, 1990, p. 109, 121,253-254)。主要的关注点是研究者提供证据给一个或多个经

过周密思考的命题，这些命题则用来组织并分析资料。这种详细思考的主要证据是具备某种合理复杂度的概念图，其复杂度则与我们下面即将描述的两个维度相匹配。

由于特定的研究及其资料千变万化，很难说明研究者应该详述的研究者的报告中，主要单元与子单元确切概念数量有多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一个一般的经验法则，该法则以我们对期刊文章的多年观察为基础。他们建议，成功的文章长度的报告应该通常有 2～5 个详述命题的主要成分，某些或所有成分内部也要有类似数量的子单元。文献中关于污名管理（stigma management）的两个实例（摘录在表 8.1 和 8.2 中）适合对此进行描述。两篇文章的基本命题是很相似的：在社会污名化的背景中，被研究的团体成员（南希 · 赫尔曼文章中的精神病患者，安德森、斯诺和克莱斯文章中的流浪者）采用污名管理策略，以减少污名对个人的影响，并影响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通过对各种污名管理策略的描述分析，这个命题得到了详细的解说。

表 8.1 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管理策略的概念解说

污名管理的类型	子类型	描述（根据文中的例子）
选择性的隐瞒		从其他备选中隐瞒疾病
治疗公开		将公开疾病作为处理个人情绪的一种方式
防止公开		公开阻止非故意地曝光
	放弃治疗者	表述为减少“个人责任”的医疗术语
	予以辅导	优先扮演为一个“辅导员”，而不是公开
	教育的	努力“教育”其他人而公开
	正常化	努力将人际关系正常化而公开
政治激进主义		参与激进主义的团体，挑战对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和传统的常态标准

资料来源：Nancy J. Herman. 1993. “Return to Sender: Reintegrative Stigma-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Ex-psychiatric Pati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295-330.

表 8.2　流浪者的污名管理策略的概念解说

污名管理的类型	子类型	描述(根据文中的例子)
团体内的策略		参加其他流浪者个体的策略
	物品使用	将酒类和毒品的使用作为减缓对污名化的紧张情绪的方式
	"闲逛"	毫无目的地与街头朋友消磨时光
	身份工作	宣称与流浪者身份相反的正面的个人身份
团体外的策略		与居民之间的互动策略
	路过	尽量与非流浪者擦肩而过
	遮蔽	通过将注意力聚焦于其他的特征,降低其他人对流浪者身份的关注
	个人的挑衅	好争斗的个体对身份冒犯的挑战
	集体行动	参与激进主义的团体,挑战对流浪者的刻板印象,拥护旨在降低无家可归状况的政策

资料来源:Leon Anderson, David A. Snow, and Daniel Cress. 1994. "Negotiating the Public Realm: Stigma Managem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the Homeless," pp. 121-143 in *The Community of the Streets*, edited by Spencer E. Cahill and Lyn Lofland. Greenwich, CT: JAI Press.

这些实例描述了文章长度的报告中有效的概念解说,提醒我们注意概念叙述不足与叙述过多的可能性。在文章长度的报告中,解说不足是指没有任何经过组织的命题,或是只使用一到几个本身没有被详述的概念。另一方面,在文章长度的报告中,解说过多则可见诸于包括数十个概念与特征的概念图,给人的印象是,研究者更有兴趣的是概念图式,而不是用图式来帮助我们了解的资料。

(2)平　衡

概念解说不足与过多导致成熟处理的第二个维度:概念图式与资料呈现之间的平衡程度。解说太多的概念图式排挤掉了呈现资料的机会,这可以说是分析过度(analytic excess)的错误。犯这种错误的作者太过沉溺于抽象分析的逻辑,以至于他或她未能报告太多分析所要涉及的丰富的与具体的现实。读者可能知道

作者的很多想法，但具体而言，情境如何却知道得很少。许多已经发生的事件描述太少，参与者也从未在文中提到。

相对而言，描述过度（description excess）的错误则是提供了太多与分析相关的资料。作者太过沉溺于情境中具体细节的安排，以致于他或她与分析性概念和观点失去了关联，而这些概念与观点本来可以有助于组织、解释或总结细节。这种报告就像是简单的历史或新闻描述。分析过度或描述过度的报告，不可能吸引社会科学读者的广泛兴趣，因为它们没有做到资料的综合和诠释，而这些才能使质性研究的文章引人注目。实地证据和分析的平衡使得读者既能把握作者的一般概念化，又能使它们的价值在研究的社会世界中成为有意义的一部分。

就像解说的维度一样，平衡并无精确的规则，只有大致的指导原则。我们的建议是，在文章长度的报告中，半数以上的篇幅应该包括质性资料的描述，包括片断、事故、事件、交换、评论、意外事件、对话、行动，等等。其余不到一半的部分应该是分析：主要的命题、抽象的范畴化与意义的讨论、应用、资料的涵义，等等。

(3)相互贯通

概念解说与平衡的维度的结合，达成成熟处理的第三个维度，也就是资料与分析的相互贯通。就一份报告的具体特质而言，相互贯通是指资料与分析作为文本，彼此持续而紧密的交替（alternation）。详细地说，分析并不是冗长的、不报告经验材料的过程，反之亦然。这种交替使得资料与分析的关系更为明显，并且表达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的方式。

这种交替的实例有南希·赫尔曼的研究，她在文章的部分章节中，分析了从前患过精神病的人如何试图使别人对他们的认识正常化。文章的这个部分首先花了很长的篇幅解释"正常化"这个概念（参考弗莱德·戴卫斯作为这个术语的原创者以及其他几个曾使用过这个概念的作者）。然后，赫尔曼转入对前精神病人为正常化所做出的努力的讨论，引出了她的一位信息提供者的可效仿的引述。她写道：

> 前精神病人的污名可以被认为是"丢脸的"，也就是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或对别人来说是不明显的，他们讨论这

些信息是由于一些预防性的原因,因为这曾致使他们"在别人眼中名声不好"。他们通常试图和正常人交谈以改变原来的印象……留下自己是正常人的印象,并解释精神病应少受到诬蔑。讨论到这方面的技巧,"老态龙钟"的拉里,一位59岁的前精神病人说道:

> 当我第三次(从医院里)出来时,我试图使自己看起来很健康。我告诉我的伙伴以及其他一些人关于我的疾病。这种坦诚使自己更容易走出来。但是,我要向他们展示的是我能做和他们一样的事情,有些事情我甚至可以做得更好。打台球、射标枪我可以打败他们,我从事两份工作——一份在加油站,另一份在商业中心。我试图告诉他们我是正常的……成功的关键在于外表上看起来是正常的,让他们相信你和他们一样正常……你真的可以改变他们对待你的态度。(Herman,1993,p. 317-318)

然后文章的这部分再回到分析上来,再使用描述性的引述,整个这部分包括三个信息提供者的引述,这些引述组合成五个分析段落,对研究中所观察到的正常化的概念进行提炼。

报告文本中呈现的方式是基于扎根式归纳(grounded induction)或理论创建(theory generation)的分析过程的,我们在下面两章要对此进行讨论。如此说来,阐释不只是报告的外表,它还是资料彻底以分析的方式呈现的逻辑结果。

低度的(或毫无)诠释,可能被视为资料与分析的脱节(data and analysis segregation)。例如,这种脱节可见诸于研究者只在第一部分与最后一部分给出概念图示解说的报告。中间的部分则包含低层次的、常识性的描述,作者并未将之与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的概念图示连结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分析似乎是与报告前后两端的资料凑和在一起,而非从资料中产生出来,或用来分析它们的。由于这两者处在整篇报告中并紧密地交互作用,资料与分析之间的关系因而并不清楚。事实上,未能在报告中将资料与分析相互贯通,显示出研究者实际上并未做任何分析。

解说、平衡与相互贯通这三种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s),构成了一种产生成熟处理的引导性约束的规范,实例有表8.1 和8.2

所实现的研究。这些实践促进了——即使不能绝对保证——研究的周全与透彻，促使读者认真看待该研究，也就是把研究者的报告当作重要的研究，也因此而唤起兴趣。

5. 与内容共鸣(resonating content)

对社会科学报告的兴趣满足取决于我们迄今所论述的框架实践的意义程度。但是，社会科学报告受欢迎的程度也受到更广泛的人类经验和基本的人类关注点共鸣程度的影响。在前述的框架实践中所总结的社会科学本质的视野内，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主题与概念主旨，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根本的、存在主义的关注点与问题(他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像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的一样，也展现出跟随流行时尚的倾向)。

社会科学家跟每个人一样，也有脆弱的人性特质，这意味着研究者所发展的特定内容或主旨、一般性命题，要根据他们所感受到的与某种共同的、深刻的人类主题的关系来进行评估。我们称之为“共鸣(resonance)”的维度，是指内容引起反响并引发存在的关注点的程度。用斯诺和本福特的论述(Snow and Benford, 1988, p. 207)来说，读者问，“(它有没有)扣人心弦？它有没有增进对(我们的)世界中的事件与经验的理解？”

然而，在给定的时间内，与广泛的受众引起共鸣的议题和主题有许多。研究者如何从中进行选择呢？这是一种道德的与伦理的选择，不是研究的或逻辑的选择，我们不能擅自主张你应该选择什么。相反地，在某些研究者做有关共鸣的决定时，我们只要求自己对他们应该考虑的一些因素提出一些建议。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内容能引起你的共鸣吗？你觉得(我们是说觉得，不是说相信或认知)你报告的内容是你深深地觉得重要并且想要说的事情吗？如果你与内容之间没有共鸣，你就不可能写出能引起你的受众共鸣的报告。但是如果你要坚定地回答上述问题，你至少要设定一个推进共鸣的个人基线。虽然这不可能保证能引起广泛的受众共鸣，但是你至少可以满意地相信你所做的。再者，广获共鸣的主题具有时髦风潮的本质，这可能意味着你的受众还没有出现，你是新近共鸣内容(resonating content)的先驱。

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内容目前引起共鸣的状况。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在学术的和大众的文化中,某些关注点比其他关注点要热门很多。虽然我们不想鼓励研究者愚蠢地跳入一些当前的共鸣潮流中,但是,合适的时候,留意和熟悉当代知识的、受欢迎的议题,并能从事热门议题的研究,当然是很有用的。

第三,尽管有许多引起共鸣的主题是时髦的、流行的,但是这并没有整体性和一致性。不同的议题对社会科学家的不同小群体有深深的共鸣。另外,虽然共鸣在一定程度上涨落,但是,也有许多的人类关注点能持久地引起共鸣,很少完全退出视野。例如,在面临不幸时,为了人的尊严,个人和团体的斗争一直维持了持久的共鸣,纵然在某些时候要比其他时候引起更广泛的共鸣。

由于①引起共鸣的主题数量大、种类多,②既有主题因时髦流行的方式而"热门"或"冷门",③几乎任何事物都至少能引起一些人共鸣的事实,社会科学家对于用共鸣来评估一份报告的重要性,总是踌躇再三(也摇摆不定)。由于这种犹豫不决,我们建议你要确保对其他四个框架实践(以及报告的真实性和新颖性)的充分关注。这样做,你才更有可能用引人注目的、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你的研究结果和报告。简而言之,共鸣是远远不能在你的掌控之中的。确保控制住你能控制的。那么,至少你对做出一个可靠的、值得共鸣、时机恰当的研究感觉充满了信心。

Ⅱ.社会科学的价值承诺

我们在前面已经详述了三个通常可以用来评估质性研究报告的一般标准。真实、新颖、重要这三个一般标准因而具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建议在运用这三个标准时,越是能满足每一个标准,在社会科学的受众中就越能激起兴趣。另外,我们主张,我们所描述的框架实践为更广阔的社会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社会学贡献。这些实践扎根于价值承诺中,我们相信我们所描述的方法在当代社会中特别重要。几个相互关联的价值巩固了这种方法。其中的两个价值是质问思态(questioning mind-set)和寻求一般性的理解(generic understanding),我们在本章已经讨论过了。另外两个批判的价值包括承诺对社会安排的祛魅(demystification)以

及致力于全面的、冷静的理解。在本章这部分,我们简要论述这些价值,思考它们怎样结合,以便提供一个理解社会生活、阐述社会议题的重要视角。然后我们把这种方法和近年来流行的、可选择的、向它提出了挑战的框架进行对比。

A. 祛 魅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普通的过着平常生活的人们忙于设计和实现他们的想法和活动,从而回应他们当下的需求。他们忙东忙西,没有什么时间或资源,搜集其处境中各种层面的信息,反思其意义,想象他们可做不同诠释的更宏大的背景,或是思考对处境而言可行的、可信的替代方案。此外,普通生活的联合、顺应、计策、抑制、委婉及其他必要的躲避,导致人们看不到他们处境中的许多层面,无法为他们看到的事物发展出合法的、通融的意义(Douglas,1976)。

再以其他的术语来说,人把社会现实客体化的趋势,从意识中推出了一种较为宽广的认识,即客体化的现实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与质问思态相一致,社会科学通过把任何"现存世界……,视为一个仔细观察的、没被接受的客体……(它只是)许多可能性的一种",刺激了这种认知的方式(Gusfield,1981,p. 192)。彼得·伯格将这种倾向贴上了质疑或支持及解构客观现实的标签,正如社会学意识中所谓的"揭露模式(debunking motif)"。它是一种:

> 内置的程序,以便寻找现实而非官方所给予的诠释,(一种)超出立即给出和公开赞成的诠释(的授权)……(为了)观察所进入场景的结构的机制……(因而社会分析)"向后观看(look behind)"社会结构的外观。(Berger,1979,pp. 9-10)

这么一来,质疑性的社会科学"呈现出一个政治性的世界,而非技术必然的世界。如果有选择的可能,如果新的、替代的行为模式有可能,那么可以想象,现有的情境隐藏了可以想象到的冲突与替代方案"(Gusfield,1981,p. 193)。倾向质问的社会科学因此是一种方法,以这样的方法"穿透非政治的面纱……它让我们察觉到:避免在替代方案之间做选择,参与政治与道德世界,(必

须)在没有明确利益和主导观点的状况下表明立场,都是有十足困难的"(Gusfield,1981,p. 195)。

社会科学的目标当然是道德目标,目标是扩展人群对他们的情境的认知,扩大他们对社会安排的认知。希望这种扩展可以开拓人性化社会变迁的道路。而且,这些目标和实践与其他研究途径所偏好的选择性祛魅迥然不同,这一点即将变得很明显。

B. 全面的、冷静的理解

我们现在已经描述的几个价值主题,暗示了价值承诺(value-committed)的观点:①时间框架(time frame),在这种框架中把社会科学视为一种活动;②社会框架(social frame),在这种框架中思考其针对性;③心智的情绪框架(emotional frame),在这种框架中做研究。

1)就时间而言,研究被视为在一段长时间内进行的持续和无止境修正的复杂活动。这与我们下文即将描述的框架有别,在下文要描述的框架中,特定的研究努力被视为小规模战斗中的战术或意大利表演中孤立的艺术家或主角。

2)就社会而言,一般意义的社会科学与特定的实地研究,是人类探究与认识重要的、长期的人群关注点与价值的独特而有规则的形态。即使研究的直接受众与评估者必须是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大多数的受众还是所有关心研究主题的人们。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是平行的。例如,癌症研究的直接受众一定是有能力的、评估癌症的研究者,但大多数的受众是每一个、任何一个关心癌症的人。

3)就情绪而言,研究者通常非常关心他们的研究及其可能引起的议题,但与从时间和社会所构建的研究方式相一致,他们也设法保持合理的冷静——也就是说,在研究和分析中保持平稳和明智的心态。某些主张深刻而持久的情感投入的人,可能把这种冷静形容为情绪疏远与漠不关心。这种立场与我们所建议的立场完全不同,我们的建议是,尝试掌握更宏大的图景,耐心地、仔细地检查并再检查所有资料与概念。当然,如果你屈从于我们先前所提到的极端远离或屈从于偏见(参看第4章Ⅰ.C部分),那么这就很难做到。因此,对社会世界和被研究的材料采用平衡

的、冷静的定位，才能有分析的效用。

Ⅲ. 其他框架

对于我们所呈现的社会科学框架，一直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法。一如我们所料，近年来对社会科学框架与价值的挑战在其本身内部就迥然不同，它们所拒斥的社会科学的价值承诺也有差异。即使如此，它们都趋向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为某个社会类别、一个倡导这种类别化的政治或宗教观点，或者某种类别与观点的结合而增进福祉。面对这些挑战，"社会科学是为什么以及为了谁"这个问题经由支持一种特定的群体而得到回答，而非我们列举的探究、知识、祛魅等诸如此类的宽泛价值。

如此为某个特定群体服务，适合探究的主题以及针对这些主题可以说的内容即受到限制，质问思态的应用也一样受限。在这些限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如果不是主要的框架——变成了通过研究，执行技术的或道德的评估，从而服务于特定的利益。激进主义党派，而非社会科学与一般观众，因此被视为唤起兴趣的目标。

把这种评估的框架当作抽象的主要模板，可用于各种特殊的论述。我们简要地探索四种主要的应用模式：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解放（liberation）、揭发丑闻（muckraking），以及表达声音（expressive voicing）。

A. 技术官僚/社会工程框架

就政治与社会而言，主流研究者与受众把研究视为在不久的将来改善或控制未来社会情境或境况所需要的信息，他们或许是使用评估性框架的最大群体。通常在这种模式中，权威对某个社会情境所持的目标、假定与观点，即被视为研究者的目标、假定与观点。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模式有时被称为技术官僚模式或社会工程模式，意思是研究者被专门化，调查专家由权威当局提出，研究者找到的答案为权威当局服务。相关的技术效果与效率的考虑占有中心的地位。"应用社会学"、"临床社会学"、"政策研究"和"评估研究"的标题，经常用以区分这种模式及其受众。再者，

有时候社会科学与社会工程之间的对比,可表述为某事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mething)与某事中的社会学(sociology in something)的差异,犹如"医学社会学"与"医学中的社会学"明确陈述的差异(也可以参看:Hammersley,1992,Chapter 7;Shils,1961)。

B. 解放框架

虽然政治本质与权威关系是不同的,但解放受众和研究者就像社会工程一样,着手努力改进另一些群体的目标、假定与观点。然而,在这种情形中,研究者采取弱势者或其他遭到不公待遇者的观点,并通过研究予以支持。主流改善者的目标是帮助当局,激进解放者相对的目标则是帮助他们选择的被压迫者。这种研究的明确目标包括使边缘团体的成员向压迫他们的社会安排提出个人的或集体的挑战。这种模式有一种变异,即凡是可能与被压迫者维持其优势地位有关的被压迫团体的事物,研究者被责令不要报道。其他有时被用来指称解放的受众所用的词语包括"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参与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也可以参看:Hammersley,1992,Chapter 6;Shils,1961)。从先前讨论的优势观点来看,这个框架的问题是使研究过分地偏向于距离/屈服连续统中的"屈服"那一端(参看第4章Ⅰ.C部分)。

C. 揭发丑闻框架

上述两种受众及其研究者对他们研究或服务的群体有正面的感觉,并设法以帮助他们的方式,建构他们的报告。一个替代性途径解放框架的反面是,确定一个特别值得谴责的群体,并以破坏该团体从事剥削行为的能力的方式,来构建一个研究。研究者并不隐匿可能用来反对一类成员的事实,而是设法清楚地揭发这些事实——通常为被压迫的团体服务。虽然许多实地研究者做过揭露丑闻的研究——例如,蒂姆·戴蒙德(Diamond,1992)对家庭护理的批评以及南希·辛柏-休斯(Scheper-Hughes,2000,2004)对全球人体器官交易的研究,但是,在这种实地研究中所发展的隐秘关系以及情境化的理解,限制了完全负面曝光的程度。因此,可能得到论证的是,解放的实地研究比揭露丑闻的实地研

究在分析上更有可能是不平衡的。但是,当后者的确存在时,它有可能偏向于连续统中"距离"的那一端,这样也是同等有偏见的、不平衡的。

D. 表达声音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关于与民族志的关联,请参看:Gubrium and Holstein,1997,Chapter 5;Spencer,2001;以及本书第 5 章 I 部分),某些实地研究者在质性研究报告批判传统的著者的声音,于是"声音"的主题被突显出来。这些批评认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民族志中,非个人的、报告性的写作展现了"空谷之音(voice from nowhere)",使得作者在研究和报告的过程中所拥有的特权很不明显。对于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民族志,我们提出三种基本的选择。首先,建议研究者在报告中使自己更可见。有些人主张,在报告中研究者应该"趋前立中(front and center)",特别是在暴露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的个人反应、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对生活与存在的一般观点时,尤应如此(如,Behar,1996;Lockford,2004;Rabinow,1977)。其次,也是比较平常的,就是要表达的声音应该是被研究者的声音,尽可能用直接的方式呈现,而不歪曲并混合研究者的观点和诠释。研究者运用参与、合作的方式,帮助所研究的人清晰明白地说出他们的故事和经历(如,Behar,1993;Kemmis and McTaggart,2000;Taylor and Rupp,2005)。第三个供选择的建议就是撰写"唤起回忆的自传式民族志(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聚焦于描述个人的,特别是情感的体验(如,Ellis,1995;1997;Reed-Danahay,1997;Ronai,1992)。

虽然对传统的民族志声音的批判对质性研究有积极的影响(如,第 5 章Ⅳ. C. 2 部分所提到的,越来越多地注意和记录实地中某人的情绪反应),但是,在此所建议的每一种补救措施都趋向于使研究者偏离分析的目标,而这些目标被认为是在社会科学框架内进行实地研究的理由。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经历趋向于超越被研究的活动,通常采用扩展的"忏悔的故事(confessional tales)"(Van Maanen,1988)的形式。在第二种情况下,对社会科学研究有分析责任的人员被抛开了,有利于报告理应"无声的"人相信并希望传达的状况。套用戴维 · 斯诺和卡尔文 · 莫里尔对

这种立场的批评(Snow and Morrill,1993),这种实地研究者是"速记员(stenographer)",或用克林顿·桑德斯(Sanders,1994)同样轻蔑的话来说,研究者是"民族志作者"。最后,第三种途径在以损害从事和学习更广泛的社会观察的情况下,限制了研究者主观的自我观察,相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写作,它具有与自传作者的书写更多的相似性。

依据某些价值观,前述的框架是值得赞赏的,但这四种框架的实践者也并未从事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所作所为,或赞同我们描述过的许多社会科学的价值。最重要的是,这些框架的每一种都没有维持开放的、无限的质问思态,并趋向于导致显著的不平衡或有偏见的报告。在追求支持某种特定类型的制度性解放或拥护某种不同的权威中,信念的悬置被窄化了(如,"主观体验的不可侵犯")。虽然在社会科学的受众与使用这些框架使研究变得特别重要的那些受众之间有交叠,但是,这些框架本身偏离了本章我们所构建的质性社会科学研究。

总之,关于唤起受众的兴趣,在本章我们都涉及了什么呢?我们认为它说出了两件事:第一,如果你要吸引社会科学家的注意,你要设法追求我们所详述的真实性、新颖性与重要性。不过,第二点是就像癌症研究者不仅针对彼此的研究做评定,也针对较广泛的受众一样,社会科学家也有更多、更广的价值与受众。因此,你要针对社会科学家以及更广泛的受众,型塑你的研究。

分析资料

第三编

收集资料(第一编)与聚焦资料(第二编)的工作在第三项分析资料的工作中结合起来。实地研究者在做这项工作时,要将心力集中在:

- 开展分析,由我们在第9章所描述的考虑做引导。
- 撰写分析报告,以第10章提供的建议做辅助。

第9章 开展分析

Developing Analysis

分析包括一种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材料变成了"发现(findings)"或"结果(results)"。在对质性分析的大部分概念性讨论中，对这种转变过程的涉及要么是直接的，要么是间接的。例如，哈里·沃尔科特声称，这个转变过程涉及，"以初步的水平"，对"资料块转换成宽泛的类别"进行整理，或者，更抽象的做法是，遵循"系统的步骤……从而确定与描述性材料相一致的关键特征和关系"(Wolcott,1994,pp. 23-24)。同样地，罗伯特·埃莫森说道，分析涉及"对被研究的材料的描述性特征进行或多或少的超越……以提供对被观察现象的解释，或者提出对那些事物的更详细的概念框架"(Emerson,2001,p. 282)。

这些概念以及其他概念陈述所暗示的是这一过程的四个定义的特征：

- 结果或发现源于分析过程，这个过程朝着归纳的方向而非演绎的方向倾斜。演绎的分析从理论上所获得的假设开始，然后通过收集与理论观点相一致的资料来验证(证实或证伪)这些假设，以此推进研究。而另一方面，归纳的分析以资料为基础，分析受资料本身所驱动。因此，当经验的或理论的观察归纳性地出现时，它们通常被说成是"扎根的(grounded)"，即源于扎根的而非先前的理论构造，但是，这种"扎根的"暗喻应该谨慎地使用。正如第8章(Ⅰ.B.4部分)所提到的，许多(或许是最多的)某些具有理论或概念重要性的质性实地研究结论，并不是那么新奇的发现，因为它们是对现有研究的"扩充"或"提炼"

(Snow, Morrill and Anderson, 2003)。对其他具有潜在适切性的研究,从理论上或经验上熟悉它们,对于发展扩充和提炼来说是明显的必要条件,但是,事实上,这些联系必须由研究者的经验观察而触发。

- 由于质性分析具有归纳的特征,那就应该遵循研究者是分析过程重要的作用者(agents)这个规则。不管研究是由单个的研究者进行还是由一个团队进行,主要的分析者还是研究者本人。如前所述,在此再次强调,这个过程既不能委托给某个分析者,也不能全权交给计算机或各种软件程序。
- 由于质性分析既具有归纳的特征,又具有受作用者驱使的特征,因此,它是研究者与资料高度互动的过程。正因为质性实地研究典型地要求研究者必须融入到情境之中,因此,对所积累的资料的分析要求研究者将她或他自己沉浸到资料中。
- 由于质性分析的归纳、受作用者驱使以及高度互动的特征,因此这个过程是劳动密集的和耗时的。"综合以上因素",保罗·阿特金森指出,这个过程是"不得不钻研的"(引自:Strauss and Corbin, 1990, p. 117)。换句话说,分析必须用一种持久的、有条理的方式进行,而不能用随意的、席不暇暖(seat-of-the-pants)的方式。

因为质性实地分析的这些特征,以及它对产出有趣的实地研究报告的重要性,你也许认为实地研究者对此应当如何做有广泛的理解。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你很少在实地研究者的报告中发现他们对如何分析、如何得出结论的详细论述。正如玛格丽特·莱科姆特和简·申舒尔所观察到的:

> 许多民族志工作者用有些神秘的方式描述他们的分析,表明主题和模式是从他们所反复阅读的实地笔记中形成的,有点像徒步旅行者在朦胧的海滩薄雾中出现。不幸的是,这些主题和模式是如何出现的,什么引起了它们的出现,尚不清楚。(LeCompte and Schensul, 1999, pp. 45-46)

对这种分析来说,还没有广泛的文本惯例,来提供一步一步做分析的程序。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已经出版了的指导——格

拉泽和施特劳斯的《扎根理论的发现》(Glaser and Strauss,1967),这本书的第 1 版以及斯普拉德利的《参与观察法》(Spradley,1980),都是早期的"指南"。但是,即使是这些书再加上本书的另外两版(1984,1995),以及施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and Huberman,1994)、沃尔科特(Wolcott,1994)、科菲和阿特金森(Coffey and Atkinson,1996)、莱科姆特和申舒尔(LeCompte and Schensul,1999)的著作,也都不能抑制这种广泛散布的观念,即有趣的质性实地研究分析是保罗·阿特金森嘲笑地称之为"浪漫灵感(romantic inspiration)(Atkinson,1990,p. 117)"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凭借这种现存的文本传统,提出用合理的、系统的、有条理的方法"致力于"分析的大量策略。我们认为,这些策略并不仅仅只是有益于思考,也不是被每个分析者所用,更不是随时都可以为每个分析者所用。但是,我们认为它们的使用的确对你的报告具有趣味性以及能很好地被接受有重要的帮助。

Ⅰ. 策略一:社会科学的框架

我们在前面几章描述的事项在此浮现出来并能促成分析。最特别的是,这种"提议(bring forward)"能够也应该采取的形态,是把你的目标定位为:为你的资料提供一个社会科学的框架。前面的章节曾详细说过,这个一般的研究途径聚焦于发展这样的分析:在经验上是吸引人的,从新的经验上和理论上阐明主题,并且也是重要的(第 8 章 Ⅰ 部分)。相对于这三者中的第三项——重要性,其目标是论述一般的命题(generic propositions),这个命题要在你的主要资料中总结出来并提供顺序。

正如前面几章描述过的,一般命题是一个针对主题(第 6 章描述过)的问题(第 7 章已讨论)所提供的答案。并且,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言,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为一般命题进行措辞,所以不要觉得你只需要考虑措辞即可。我们之前提过的其他措辞在这里也有用,例如形成假设、提出论题、论述概念、陈述问题以及提供一般的诠释。

A. 八种命题形式

为了强调我们在前面几章描述过的事项对分析的适切性,我们希望你回顾在第8章(Ⅰ.A部分)指涉到的八种不同的命题形式。第6章与第7章充满了这八种基本命题类型的例证摘要。浏览这些章节时,你也以命题的方式思考你的资料,能够帮你辨识你如何运用一或多个这些基本命题的形式来组织你的资料。

B. 对比命题式写作与其他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在前面一章,我们把一般命题的框架或"思想"写作与"对象"写作和"历史特殊"的写作(第8章Ⅰ.C、2/3部分)做了对比。关于这两种可选择的写作形式以及其他能够和分析的、命题的形式相对比的写作类型,都有一些变化。在此没有必要回顾这些不同的可选择的写作形式,除了一种:"平时的学期论文(ordinary term paper)"以外。我们提到它,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大学生写作的基本模式,而且因为它和我们所提倡的命题框架十分不同。大学生的学期论文具有复习摘要的特点,典型地是以百科全书或其他的参考书上的文章为模型,报告的许多信息也来源于此。相反地,实地研究报告的目标,至少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是分析性的,必须对有关社会生活和组织的不同问题给出以经验为基础的命题答案(进一步的阐述可参看:Cuba,1988;J. Lofland,1995)。因而这两种框架和写作形式没有什么共同点。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直截了当的:当开始分析资料并开展分析性的质性研究时,把平时学期论文的观念放在一旁,而是作为一个分析的质性实地研究者去思考和写作。

C. 单个实地研究中的命题数量

研究者在一项实地研究项目中应该发展多少命题,这当然是个问题。狡猾但正确的答案就是:视情况而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它要看:①研究者在实地中待了多久,搜集了多少资料;②我们所说的研究计划的阶段;③研究者计划完成的报告的数量与规模。

简短的计划,尤其是学生所做的计划,只产生一份报告,集中在一个主题上,算是相当合理的。然而,从质性实地研究分析的

归纳特征来看，即使是相当小规模的研究计划，也会以不成熟的形式，在研究过程的早期就产生许许多多可能的命题。这大量命题的可能性源于研究者的实地笔记或访谈逐字稿，它们是研究者在编码和做备忘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这点我们将会有简短的讨论。由此观之，有助于构建你的分析的单个命题或少数命题，是从许多其他可能的中心命题中筛选出来的。

搜集较多资料，并打算产生数篇报告或一本书的较长期的研究计划，倾向发展数个（但通常少于六个）主要命题，甚至以单个报告的模式，写成数本书，每一章只探讨一个命题。

Ⅱ. 策略二：焦虑的正常化和管理

正如本章开头段落所强调的，从你的资料中形成潜在的主要命题，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归纳活动，这种活动在你的持久地、有条理地与资料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是可能发生的。一方面，你从资料、主题或问题中获取答案或命题；另一方面，通过密集地沉浸于资料，让你的资料与你的学术训练和真实直觉互动，后者来自于你对主题与问题所积累的知识。起初，这些主题和问题充当你分析的向导而非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你从开放的（open-ended）、没有偏见（open-minded）的需求开始，用它自己的术语理解社会场景或情境。然而，这样做几乎可以确信的是，你可能会感到某种焦虑，或许甚至是挫折，因为你基本上面临着在你的材料中发现某些社会科学的意义或秩序的挑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件使人畏缩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仅因为我们在第 2 章（Ⅲ. E 部分）和第 4 章（Ⅰ. C 部分）所讨论的伦理和情感议题，而且因为这似乎是一个混乱的、急剧膨胀的、有待梳理和分析的材料主体。但是，别怕！面对开放性任务时产生的焦虑与棘手感，是很普遍的。而且，要处理这些相当正常的感觉与恐惧，有一些成功的考虑和策略。我们在此指出其中五种，并在本章其他部分探讨其他方法。

- 第一种管理焦虑的原则就是，承认和接受分析质性实地资料既不是机械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工作这个事实，因此有可能产生

焦虑。当你面临弄懂资料的挑战时,承认这种事实有助于将焦虑正常化,给你提供你跟大多数人一样的舒适感觉。

- 第二种应付和管理这种自然存在的焦虑的方法是,在资料收集阶段就早早地开始分析,也就是说,在你进入实地不久以后,而不是等到实地笔记已经充分发展和完成的时候,就开始分析性地思考和检测你的资料(参看第5章Ⅳ.C部分)。正如迈尔斯和休伯曼所强调的,资料分析——他们广泛地定义为包括资料收敛(data reduction)、资料展示以及得出结论和修正结论——“持续存在于任何质性取向项目的整个生命中”(Miles and Huberman,1994,p.10)。那么,质性分析不是你在离开实地后才认真地开始的东西,相反,它应该连续地存在于资料收集的过程之中。当然,随着实地研究项目的发展,它将消耗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但是,它与资料的收集有相当多的重叠。这种暂时的重叠应该能冲淡你的焦虑,因为这意味着你的分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结果在大踏步地往前走,在你真正离开实地之前,你应该对你的资料所包含的特征和分析的可能性有相当的了解。
- 第三种管理焦虑的方法是对你所收集的资料的分析工作要持续的、系统地进行,用前面所述的命题形式关注如何构建你的分析。
- 第四种要记住的减轻焦虑的方法是,所积累的信息要确保你能在最低限度内说出某些东西来,即使这些内容不是你所喜欢的分析,并且也是此刻你并不了解的东西。
- 第五种扩散你所体验的任何焦虑的方法是,与你的班级或研讨会或群体中其他从事类似的质性实地研究的同仁聚在一起。这种工作团体的形成,不管是正式组成还是非正式组成,都有可能像一个“支持团体(support group)”一样起作用,意即帮助你解决你所面临的与分析相关的问题或议题,因此减轻了你的焦虑程度,提高了你对研究项目的信心。

记住和运用这五种焦虑管理的方法,应该能够提高你的信心,你将要以归纳的方式,产生分析性的陈述,并且在你要研究的社会场景或情境中,针对一个或多个主题的一个或多个问题,提

供命题式答案。并且,这种用提升分析——不管是发现、扩充还是提炼——的方式来使研究者从研究资料中获得并非罕见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应该能为用持续的、系统的方式推进分析工作提供更进一步的刺激。就像在解决任何其他谜题时所感受到的满足一样,在“纯粹资料(merely data)”的混沌中找到一个或多个命题,可能是极为正面的学术体验。

Ⅲ. 策略三:编码

质性实地研究的分析基本上从“编码”与“备忘”的活动开始,它们构成了所谓的“从事分析(work at analysis)”的大部分内容。尽管编码和备忘典型地是相互结合的活动,但是我们在此分开讨论以方便论述,并且,我们从编码开始,因为它是初始的、更为基本的活动。

编码的本质是将你的资料分类成各种类别,用这些类别对资料进行组织,使资料从一个或多个框架或多组观点来看具有意义。它是通过“将资料与我们的相关观点相联系”(Coffey and Atkinson,1996,p. 27),不管那些观点是从背景中涌现出来的,还是对现存的理论框架的扩展或提炼(LeCompte and Schensul,1999,pp. 45-47),来“定义资料是关于什么的过程”(Charmaz,2001,p. 340)。

将有组织的观点应用到你的实地笔记或其他材料的项目或成块的资料中,或应用到有关资料的问题的答案中,这些被使用的字词,就构成了编码。它们被冠以不同的概念,如你资料中的“用来代表一组类似的术语、观点或现象的名称或符号”(LeCompte and Schensul,1999,p. 55);在你的研究中“为所搜集的信息……指定意义单元所使用的标签或标志”(Miles and Huberman,1994,p. 56);或者,更抽象地讲,编码就是我们用来对相关的主题、问题、答案或者任何东西的信息进行分类的标签。

不管是简单的概念还是抽象的概念,编码基本上通过两种互相交叠的整理和分类处理过程得以实现,即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和集中编码(focused coding)(Charmaz,2001;Strauss and Corbin,1990)。初始编码也可以称为“开放的”编码(Strauss and

Corbin,1990,pp. 61-74)。可以说,当你开始根据你相关的兴趣、承诺、文献和观点,对资料进行浓缩和组织,变成有意义的类型时,就像橡胶擦着路面。初始编码从逐行检查你的访谈逐字稿或实地笔记开始,并就每一个独立的条目和成块的信息(可以是一个事件、一种行为或者一个地点)进行提问,这些一般的开放性问题可以是如下的问题:

- 这是什么? 它代表什么(Strauss and Corbin,1990,p. 63)?
- 这件事的例子是什么(Cuba,1988,p. 35)?
- 什么事正在进行? 人们在做什么? 这个人在说什么? 这些行为或事件将什么视为理所当然? 这些结构和背景如何支持、维系、阻止或改变这些行为和陈述(Charmaz,2001,p. 142)?

回答这些问题的初始编码的例子在表9.1的左半部分提供出来了,这个例子摘录自凯西·卡麦兹对慢性病人的研究(Charmaz,1991)。初始编码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编码通常是相当多的、各式各样的。在此,卡麦兹建议了十一种不同的、有些是交叠的编码,以便对获取和分类四个句子所包含的内容。

另一方面,集中编码是“不够开放的,比逐行编码更具有定向性”,并且也被认为是“相当具有选择性和概念性的”(Charmaz,2001,p. 344)。它以三种方式建立在初始编码之上:通常在前者已经分析或聚集后开始;通过使用大量扩展的或更为分析性的有趣的初始编码对大块资料进行编织;以及通过使用这些扩展的材料作为询问更聚焦的、分析性的问题的基础。如下所示:

- 这个事例的主题、单元或层面是什么?
- 这个资料所显示的有关主题的问题是什么?
- 这个资料对有关主题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答案(也就是说,显示了什么命题)?

一旦你开始集中编码,那么,你就已经决定,你先前的一些编码对更彻底的资料归类,以及更进一步的分析详述是合适的。并且,在详述一些初始编码的过程中,你同时也在去除那些不够具

表 9.1 查曼兹对慢性病人研究中的实地笔记编码的实例

逐行编码	实地笔记	集中编码
改变症状，反复无常的日子 根据其他人解释自我意象 避免公开 预计被排斥 让其他人不知道 将症状视为相互关联的 让其他人不知道 预感不信任 控制其他人的观点 避免污名 评估公开的潜在损失和风险	如果你得了狼疮，我的意思是某一天它是我的肝脏；某一天它是我的关节；某一天它是我的脑袋，就像人们确实认为你是一个忧郁症患者，如果你对这些不适一直抱怨的话……可能你并不想说什么，因为人们开始有想法，你知道，“上帝，不要接近她，她完全就是——在抱怨这个。”我认为那就是为什么决不说什么，因为我感到我拥有的一切东西都这样那样与狼疮有关，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得了狼疮，甚至那些得了狼疮的人也并不打算相信十种症状都是一样的。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你知道，他们并不想靠近我，因为我的抱怨	避免公开 评估公开的潜在损失和风险

改编自：Charmaz, 2001, pp. 343, 344.

有描述性、对分析不够有用的编码。另外,这些详述的编码可能开始假设将在分析中占有突出地位的观点或命题的状况。表9.1的右半部分提供了卡麦兹研究中这两种被选择的集中编码的实例——“避免公开(avoiding disclosure)”以及“评估公开的潜在损失和风险”。

不管实地研究项目的规模和大小如何,研究者都可能设计出十几种甚至几百种编码,来组织在实地笔记中所记录的大量现实,使之根据某种框架成为彼此关联的类别或领域。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编码也是“有效的资料标签和资料检索的工具……使分析得以开展并提高速度”(Miles and Huberman,1994,p.65)。因此,没有编码方案,系统的质性资料分析就是几乎不可能的。

A. 两个实际的编码方法

分配编码的认知行为,是解析你的资料的第一步,但直到你进行第二步,也就是说实际将编码的资料跟你用同样的方式编码的资料放在同一个地方,这第一步才算完成。你有两个主要的方法:归档(filing)与创建电脑资料库(computerized databasing)。

1. 归　档

个人电脑在1980年代末期广为人用之前,编码经常采用特定的、物理的归档形式。研究者建立一组可以扩展的文件夹,标签上有编码的名称,并动手将资料条目本身或定位的笔记放在适当的文件夹里面。在复印变得容易且便宜之前,有些实地研究者把他们的实地笔记打在复写纸上,在笔记的复本空白处写上编码,用剪刀剪下来。然后他们把剪下的纸条放在相应的文件夹里。便宜且易得的复印出来之后,有些实地研究者只是把他们编了码的每页实地笔记复印下来。这种操作创造了一个或多个文件夹的抽屉,文件夹中则包含了编码过的资料。

2. 创建电脑资料库

我们在第5章提到过,不断增长的相关的电脑硬件和软件,使得研究者能够比过去更快更有效地进行相同的基本的编码和归

档。编码的逻辑是相同的，但是在一个或多个文件中进行即时归档，它有一个附加的优势，可以去除动手抄写、裁剪以及把资料置于不同文件夹等劳力密集的行为。另外，创建电脑资料库能够使你用比过去更为一致且快速的方式，来搜寻资料、检索、重新编码、重新归档和列举编码。由于电脑提供资料输入、分类以及合并的种种优势，我们认为所有的实地研究者至少都应该认真考虑，以便能探索包括印象深刻的可用来编码和归档的普通的文字处理程序（如，Word 和 WordPerfect）以及一些现在可用的质性资料分析软件（如，ATLAS，Ethnograph，HyperResearch，NUD * IST，Nvivo）对他们项目的分析效用。不仅有许多的软件程序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与别的软件相匹敌，而且现在对这些程序以及更一般的电脑辅助分析也有越来越多的描述和评估。我们推荐几种供你参考：

- Coffey, Amanda and Paul Atkinson, "*Complementary Strategies of Computer-Aided Analysis*". Chapter 7 in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1996)。
- Dohan, Daniel, and Martin Sanchez-Jankowski, "*Using Computers to Analyze Ethnographic Field Dat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8).
- Fielding, Nigel, and Raymond M. Lee, "*Computer Assisted Qualitative Research*" (1998) Nigel Fielding.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Chapter 31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Coffey, Delamont, Lofland, and Lofland(2001)).
- Weitsman, Eban A., "*Softwar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Chapter 30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2000).

尽管我们鼓励你采用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可用的软件程序来编码和组织你的资料，但是，正如在第 5 章（Ⅱ.C 部分）所言，我们再次提醒你，不要认为电脑数据库和质性软件程序是捷径或者是万能钥匙，能帮助你获得引人注目的和重要的分析。它们至多是加速和扩大了资料的组织、储存以及修护的可能性，但是，它们不能做资料分析的艰苦工作，因为这要求某种智力和创造技巧，而这是只有分析者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所有以上推荐的著作都承认和强调了这种特性。正如科菲和阿特金森在电脑辅助质

性资料分析(CAQDAS)的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电脑程序能执行自动的资料分析,它们都依靠研究者本人详细说明将要研究的议题是什么、什么观点是重要的以及哪种表述模式是最合适的”(Coffey and Atkinson,1996,p. 187)。

这些观察和评价所得出的结论给了我们直接的印象:试探性地和明确地使用电脑和一个软件程序来组织和存储你的资料,但是不要设想其中任何一种方法会用一种有趣的、引人注目的方式自动地编码或分析那些资料。

B. 编码文件的类型

除了文件夹和创建电脑资料库的议题以外,你还面临着发展许多基本的归档类型的决定,在这些类型中对你的资料进行编码和分类。基于我们的经历以及与其他实地研究者的讨论,我们建议发展和保持三套一般性档案:①本土的或情境特定的档案(folk or setting-specific files);②分析性的档案(analytic files);③方法论的或实地研究的档案(methodological or fieldwork files)。

1. 本土的/情境特定的档案

尽管你想要沿着先前章节所提到并详述的社会科学的框架来发展你的分析,但是,你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场景和行为,它们是复杂的独立存在,为了用它们自己世俗的方式来理解它们,要求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因此,你不能通过将当地的或场景特定的分类改变为更抽象的分析类别,你应该在最初建立多套可靠的编码档案,以便用情境中的人物的语言和分类方案来捕获情境的重要因素,这些人是带着日常偏见处于情境中并与情境协调的。换句话说,一开始就要建立本土的或情境特定的档案。这些档案十分重要,因为他们不仅包含为最终发展描述性的记录所需的材料,而且它们也组成了表述“你曾在那里(you were there)”以及直接观察和经历过你正试图分析性地要处理的内容的经验基础。

先前(第6章I部分)我们注意到,所有的社会情境都是由一个或多个参与者(个人、团体、组织,等等)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所或现场从事一个或多个活动或行为所组成的。因此,你可以

根据这些一般坐标打开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编码。更具体地讲，建立：

- 一套你所相遇的参与者的档案，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一个单独的档案。
- 一套他们正在参与的活动或事务的档案，每一个活动或事务都有一个单独的档案。
- 一套参与者以及他们的行为所处的场所或空间的档案。

时间怎么样呢？通常，你不需要为记录行动者出现、活动或事务发生或在一个特别的场所出现的人和事的时间而设立单独的档案，除非它们暂时是你分析的焦点，有如迈克尔·弗莱厄蒂(Flaherty，1999)对如何现象学地体验时间流逝的考察。但是，对每一份文件的观察，你必须系统地记录日期和时间——也就是说，例如，记录相遇的或被观察的行动者 X 的日期和时间或者某个特别事务发生的时间或某个特别活动被观察的时间。这样做可以使你更详细地、系统地考察过程中的问题和议题，随着分析的发展，那应该会成为一个主题性的焦点或问题。

再者，你应该要么在你的文件中表明行动者 X 所从事的活动以及相遇的场所/现场，要么将你对行动者 X 的观察进行预先登记(cross-file)，通过同时将之置于特别的活动或事务中，并按特定的现场或场所归档。这种预先登记或多重编码，再加上先前提到的时间记号(temporal notation)，将使你用一种有组织的、系统的方式，建立行动者、活动、场所和时间之间的联系。

最初，你应该为你所遇到的每一个行动者、每一个重要的与情境相关的活动或事务、行动者曾遇到的一系列场所和被观察的活动或事务，以及每一个先前提到的预先登记事项，而发展编码档案。这可能看似是一个使人畏缩的工作，但是，没有什么方法能预先知道哪些行动者、哪些活动或哪些场所可能会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出现，正如包含在档案中的许多条目或资料片断或对档案的最终分析所表明的一样。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行动者、活动或场所在描述上和分析上都同等地重要，但是，在编码之前就设想提前知道那些内容，这在描述上和分析上都是不成熟的。例如，在最终以出版“他们遭遇不幸”一文而告终的资料编码和分析中，

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建立了一套以"焦距设定(focal settings)"为标题的档案,其中包括了对25个不同的场所(如,非营利性街头代理机构、商业设施、公园、城市代理机构、街角)设立的单独档案,流浪者在不同的时间出入于这些场所。随着分析的发展,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对于流浪者的日常生活及日常事务而言,有些情境比其他情境更重要,在分析上更为显著,但是,这些模式的建立是以档案的"丰满(fatness)"为基础的,这源于编码的过程而非先验的预感或偏见。

如果你发展、保持并回顾根据上文所建议的已经编码和组织好了的资料,那么,在世俗的或街道层水平获得和保持对日常生活及其组织的处理是有很大帮助的。此外,这些民间的或情境特定的档案的发展有助于快速地定位基础的、描述性的信息,否则要被埋葬在按时间编排的笔记中或在分析的编码中贴上了模糊不清的标签。通过指向未被预料到的或与现存的理论的/分析的框架或编码并不完全适合的模式,这些民间的或情境特定的编码档案可能刺激或提炼分析的编码。

2. 分析性的档案

在建立分析性的档案中,你要有在第7章所详述的那类实地观察问题的片断、单元或部分,它们能够进一步地转换成在第8章(Ⅰ.C.2部分)清楚说明了并在本章(Ⅰ.A部分)又讨论了的命题格式。在此,你不再询问这是哪种民间活动或事件,或者其出现的地点,而是询问在本节一开始所表明的分析性的"聚焦"问题。当然,没有一种方法能询问这种问题,因为他们可能从一般的、更抽象的问题一直排列到更具体的、更集中的问题。

更一般的抽象的分析性问题实例包括:

- 这个事件或活动是哪种社会学的主题、单元或层面?
- 这是对某个特别的分析类型或分析过程种类的描述吗?
- 它与哪种正式的命题最有关联?

更具体的、更聚焦的问题实例包括:

- 它是否说了关于行动者自我或身份的某些事情?

- 这是一个策略行为吗？如果是，是哪一类？
- 这一系列行动或行动者的解释的结果是什么？

无论所问的问题是什么，关键是你正在根据社会学框架以及各种社会科学的概念、过程和命题，思考和把玩你的资料。因此，这些分析性档案的发展将很大部分地依赖于先前所讨论的集中编码以及你的“备忘录”实践，这一点我们将进行简短的讨论。

正如没有一种询问分析性问题的模式一样，也没有一套已经确立的指导方针，让你从事分析性的编码，并建立和发展分析性的档案。但是，从已出版的研究项目以及许多实地研究者的方法论报告，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总结出以下的指导方针：

- 采用临机的与实验的态度（emergent and experimental posture）：民间的或情境特定的档案编码是一项保存事实（fact-keeping）和内务处理（housekeeping）的工作，分析性编码则是更为突现的、冒险的、实验的（尽管编码者也准备用相当明显的术语将信息条目分类）。尤其是在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还不太关心一个编码最后的可行性，或者它最后是否有什么意义。其目标反而是在必要时，尽可能设计许多单独的编码和档案，而且要让我们在审查资料的过程中受到刺激或能感到振奋。处理这些临机的、冒险的分析性冲动的工作，则是在最后的分析阶段进行。
- 从事有规律的编码（regular coding）：访谈与观察的要件以及其他生活层面，都影响到实地研究者能够从事编码与归档的频次。如前所述，不论间隔多久，实地经验是，在研究过程一开始就要编码，尽可能有规律地、频繁地编码。迈尔斯和休伯曼甚至敦促：“下次到现场之前，一定要把之前的实地笔记编码。不论有多好的借口，总是应该这样做”（Miles and Huberman，1994，p. 65）。我们认为从生活的实用性来说这有点极端，但其指示的精髓还是应该遵循。
- 从事广泛而普遍的编码（extensive and pervasive coding）：由于编码是临机的、开放的以及耗时的活动，因此，人们经常会问有关编码应该进行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更具体地讲，大体上，应该产生多少个编码？在诸如实地笔记或访谈逐字稿的一页中

应该应用多少个编码?对这些问题没有神奇的或合适的答案,因为这取决于资料的丰富程度、编码的规律性以及实地编码员的创造能力和洞察力,因为他们处理资料并和资料相互作用。但是,大体上,建议你尽可能广泛地、普遍地进行编码。从实际的角度说,这意味着逐行、逐句地阅读。这样做并不能保证产生有创造力的分析性洞见,但是不这样做就减少了产生这种洞察力并最终发展出色的分析的可能。

- 从事单个条目的多重编码(multiple coding of single ltems):在此,多重编码的过程或随着本土档案的建立而开始的预先登记的过程得到了促进,即你应该对任何给定的条目、单元或大块的实地资料进行编码,编入看似合适的、尽可能多的档案或编码类别中(表9.1所示卡麦兹的编码就是例证)。
- 将本土编码和分析性编码视为交叠的任务(treat folk coding and analytic coding as overlapping tasks):关于本土的或情境特定的编码与分析性编码之间的短暂关系,实地研究者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所推荐的关系与先前所讨论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之间的关系很相似:把它看成相互交叠而非互相排斥的任务。虽然在编码过程的初始阶段,本土编码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检核资料时,富有创造性的、分析性的火花和洞察力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出现。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当你越深入编码的过程,分析性编码的发展和归档就越常见。因此,期望分析性编码随着时间而发展,然后随着更多的情境特定的、世俗的编码的发展而扩充,再开始减少,是有道理的。
- 类别饱和与子单元(category saturation and subdivision):有些编码事例发生的次数与规律促使我们建立档案,其中包含许多资料要点和信息条目,远远超过看起来需要或可以管理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者在两个方向中择一进行。一方面,你可以更为仔细地审视编码档案中的事例,看它们本身之间变化的方式如何可以让人做更细密的分析。也就是说,你可以详细说明编码本身来确认子单元。另一方面,这种仔细的审视可能导致无需深入检查的结论或做出并不够重要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评定此一类别为“饱和的”,不再为它做进一步编码。

3. 方法的/实地研究的档案

大部分的实地资料会被编码为本土的和分析性的档案,但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具有描述性、概念化或具有理论分析的相关性。相反地,其中一些资料可能直接影响了你的实地研究的步骤——也就是在本书第 2 章到第 4 章所讨论的关于资料收集的挑战、议题和感情。

如果你像第 5 章(Ⅳ.C.2 部分)所建议的,注意记录你的研究经历、印象和感情,那么上述情况就是一种特例。这是为了对这些材料进行编码、分类和分析,以便你建立成套的关于方法的或实地研究的档案。这些档案能起许多重要的作用。最明显地,它们将有助于你撰写报告的这一部分(例如,参看第 4 章末尾所提供的实地研究经历的特别记录)。另外,这些档案可能为你提供第 8 章所讨论的“真实性”的相关材料,并为提高你的终结报告的可信度提供另一个基础,这一点我们将在第 10 章进一步讨论。最后,这些档案可以包含一些为关于实地研究本身的过程层面的报告或论文提供基础的材料(Adams, 1998; Ellis, 1995; Horowitz, 1986; Rochford, 1994; Salzinger, 2004; Scheper-Hughes, 2004)。

C. 坚持写按时间编排的记录

把材料分割成本土的或情境特定的、分析性的以及实地研究的档案,有助于无限地组织你的资料,并发展某种分析。事实上,我们认为,没有这些档案的发展,开展引人注目的分析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这些档案也可以掩盖实地资料和笔记随着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它们所根植的背景。例如,在你审视实地材料中某个特定片断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可能是:那时发生的其他事情,或者这个人所说的其他内容,原先似乎无关紧要,现在却看起来很重要?也就是说,你要能够回顾更一般的脉络。为了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完整的、按时间编排的先前记录。因此,你应该照你原先收集这些材料的顺序,保存整套材料。

一套按时间编排的材料也有助于将不易在某个档案中找到的信息找出来。作为思考更大的模式和更大的分析单元的刺激,单单从头到尾阅读并回顾也有用处(如第 6 章的概述)。

Ⅳ.策略四:备忘录

在编码的过程中,无论是初始编码还是集中编码,写下你对不同的编码类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甚至是关于步骤以及实地经历的观点,这样的习惯养成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写出来的关于观点和经历的笔记就叫做备忘录(Charmaz,2001;Glaser,1978;Miles and Huberman,1994;Strauss and Corbin,1990)。写下这些备忘录构成了"在编码和关于你的完整分析的最初构想之间的中间步骤"(Charmaz,2001,p.347),因而这对理解资料来说是很重要的。正如卡麦兹所观察的,"许多不写备忘录的质性研究者迷失在堆成山的资料中,而且不能搞清楚这些资料的意思"(2001,p.347)。

尽管大部分关于备忘录的讨论强调其对发展"扎根理论"(Charmaz,2001;Glaser and Strauss,1967;Strauss and Corbin,1990)的分析性和理论性的效用,但是,我们认为,正如第8章(Ⅰ.B.4部分)所讨论的一样,它同样与理论的扩展和提炼有关。如前所述,备忘录也可以有助于阐明基本的编码,并修正和调整方法论的议题和步骤。关于这方面,迈尔斯和休伯曼指出:虽然"备忘录的意图主要是概念性的",但它有助于思考、阐明和改善"研究中的任何层面——个人的、方法论的和实质的"(Miles and Huberman,1994,p.72)。这种对备忘录的更广泛的观点和施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提出三种备忘录:编码备忘录、理论备忘录以及操作或方法论备忘录。

- 编码备忘录是一些笔记,详述并阐明潜在的编码和假设。写这种备忘录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编码是描述性的,或者从概念上讲是合适的,尽可能是明确的、不重复的。在许多方面,详述和阐明你的编码类似于定量研究者试图清晰地将他们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或原因变量进行操作化。
- 理论备忘录,按照巴尼·格拉泽的解释是,当你进行编码时,有关你的编码以及浮现出的关系的观点的"理论小结(theorizing write-ups)"。在你写下它们的这一刻,它们就耗尽了你的"瞬间构思能力(momentary ideation)",这是以资料检核和编码为基础

的，或许还伴有一些概念的详述（Glaser，1978，pp. 83-84）。但是，当你继续编码和分析资料时，你很有可能写出新的备忘录，而这些备忘录是以早先的备忘录为基础的，并可能导致对研究现象更清楚、更详细的概念性或理论性的理解。这样，理论备忘录不仅是贯穿整个编码过程的持续的步骤，而且甚至可能编码结束了，而你通过修正和提炼先前的理论备忘录而进一步发展你的分析时，这个理论备忘的过程还会继续。尽管刺激理论备忘的实地笔记片断或部分可以编入本土的和分析性的档案中，但是理论备忘录也很可能频繁地通过与分析性档案的集中编码串联而产生。

- 操作性/程序性备忘录，由你写给自己或团体成员看的笔记组成。正如第一编所探究的，这包括关于程序的挑战、议题以及与收集资料有关的策略的整个过程，包括应对紧急挑战和议题的计划。这些备忘录可以采用修正某个或多个程序的方向的形式，如保护更广泛的信息提供者；导致探究到底的行动，如探究评估可选择的资料点或资源的前景；或者反思你的实地研究程序和经历如何呈现了某个一般的方法论议题或实践，如获得入场、访谈类型或脱离接触。正如理论的备忘录很可能源于集中编码和分析性档案的交互作用一样，方法论档案也可能是操作性/程序性备忘录最初的灵感源泉。

无论所写的备忘的基本类型是什么，你都不需要考虑它的长度。格拉泽所说的理论备忘录的长度适用于所有的实地研究的备忘录：它们“可以是一个句子，一个段落，或者长达数页”，这种长度足以“耗尽（exhaust）”你此刻对议题或主题的思考（Glaser，1978，p. 84）。但是，你的确需要强迫自己撰写备忘录，并且意识到随着分析的发展，甚至是当你所涉及的主题范围缩小时（如编码变得更为集中），它将成为你的研究的一个更广泛的特征。建议这种强迫性的原因在于编码对于发展引人注目的分析的重要性。正如迈尔斯和休伯曼对此指出的，编码“是手头最有用的、最强有力的理解工具”（Miles and Huberman，1994，p. 72）。

我们刚才提供了对“编码”和“备忘”的总的看法，并表明它们是发展分析过程中关键的不断发展的步骤。然而，连同前面所

述,我们在此想要再提出两点告诫。第一点就是,如同前面的解释,我们认为编码和备忘并不是发展引人注目的分析的唯一步骤或方式。问题是,实地研究者很少详述他们是如何从他们的资料、主题和问题中获得他们的研究发现和结论的。结果是一种“黑箱”,或洛夫兰德所谓的“分析性中断(analytic interruptus)”(J Lofland,1970)的变型,在实地研究工作的资料收集与报告撰写阶段,这使得人们感觉质性分析通常是神秘的过程或浪漫灵感的结果。当然,这种倾向也有一些例外,特别是有关质性分析的电脑程序的使用。这方面的实例有托马斯·理查德和林恩·理查德所说的“资料—理论捆扎(data-theory boot-strapping)”的方法(Richard and Richard,1994),它与被称为 NUD * IST 的电脑质性分析程序有关。但是,即使在这里,对其操作的检查表明,它们一般更类似于编码和备忘。因此,虽然编码和备忘可能不是发展分析的关键操作,但是我们认为它们是分析过程的必要步骤。其次,我们要再次强调,虽然编码和备忘录的清晰度及其应用与开展分析的“扎根理论”路径密切相关,但是,它们具有更广泛的适切性和效用,也是我们先前所讨论的作为理论扩展和提炼的基础。

V. 策略五:画图

一般而言,图解是某事某物中各部分之间关系明确的视觉呈现,如典型的系谱树(genealogical family tree)。从社会科学的脉络来看,图解可定义为“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视觉上的呈现”(Strauss and Corbin,1990,p. 197),或者称之为“资料展示(data displays)”,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矩阵、曲线图、图表和网络”(Miles and Huberman,1994,p. 11,91)可见地、系统地呈现信息。不管如何概念化,图表或资料展示的显著特征是,它们精确地排列或呈现某个情境的两个或更多因素或层面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因素或层面在描述性和理论性方面与其操作和功能相关。

在思考图解时,有必要记住这个词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也就是说,图解既是一个目标或分析的产物,当画图时,又是分析过程中的一种活动。正如迈尔斯和休伯曼所强调的,展示(图表)的产生和运用与分析并不是相分离的,它是分析的一部分。设计一个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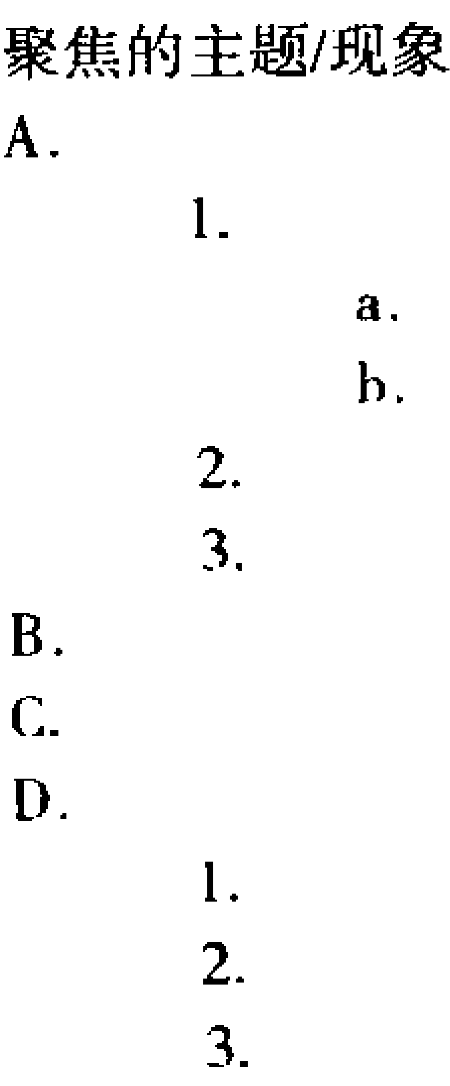
示，为质性资料决定矩阵的行和列，并决定哪些资料以何种形式进入单元格中，都是一种分析活动（Miles and Huberman，1994，p. 11）。

由于我们在本章是描述分析的开展，我们聚焦于在把图解当做一种活动，也因此当做一种分析的策略。我们发现许多实地研究者，包括我们自己，不仅把发展图表作为扩充正文的有用的补充，而且也作为可供选择的视觉呈现的形式。在此，我们简要介绍四种图解形式：分类法（taxonomies）、矩阵和类型学（matrices and typologies）、概念图表（concept charts）以及流程图表（flow charts），并为你提供迈尔斯和休伯曼的质性资料分析（Miles and Huberman，1994）的实例，以便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对图解的讨论，以及你想要考虑的图表或资料展示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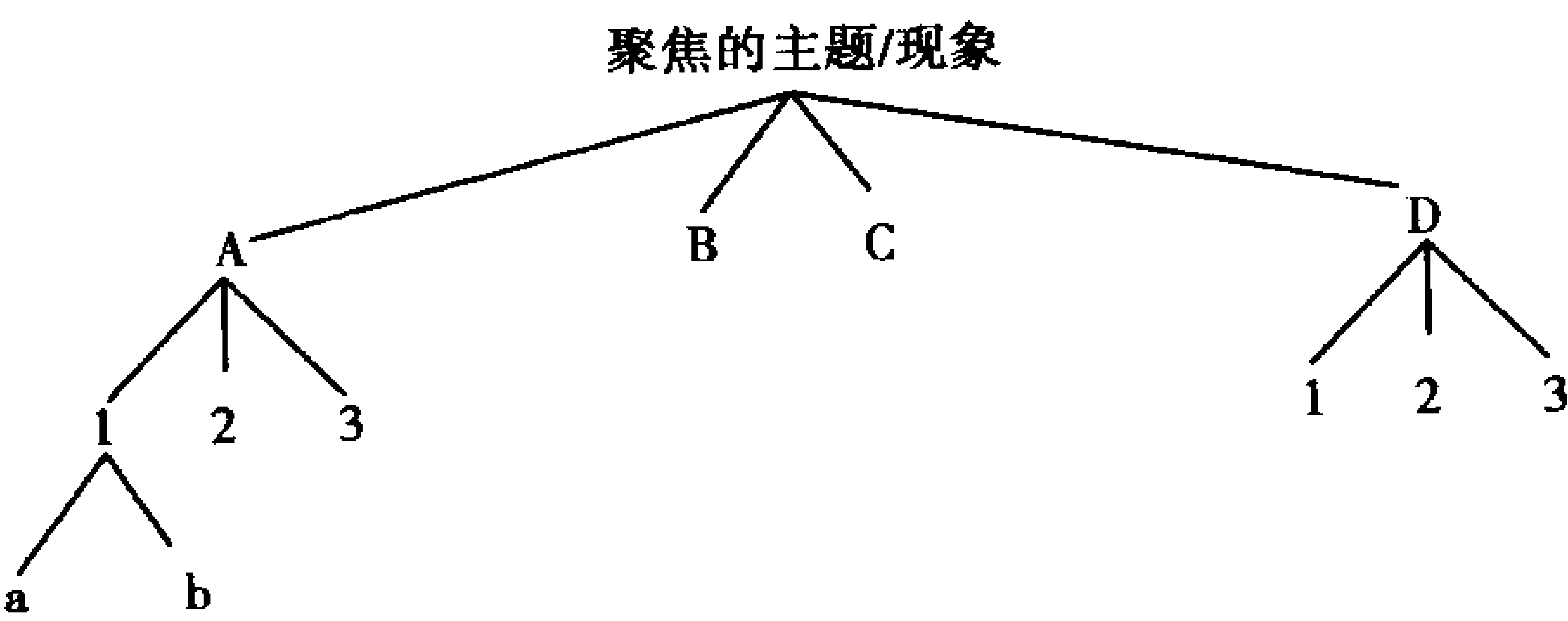
A. 分类法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质性实地研究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描述被观察现象或主题的特征及其展示的形式。要做到后者，就是要提供在第 7 章所提出的许多焦点问题的答案以及八个命题形式的涵义，例如：主题的类型是什么？在某个过程中，阶段、步骤或顺序是什么？交互引起主题 X 的一系列因素是什么？或者，完成某个特定任务或意识到某个特定结果的策略/战略是什么？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通常可以用书写的文本来表达，但是也可以用图表作为一种分类法进行详述。正如第 7 章（I. B 部分）所建议的，分类法从本质上讲就是用图表展示被研究的所有本土的或理论的类型。它显示了所有术语的全面排列大致是怎样的，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关联的，而这些术语是焦点范畴或主题的变体。为了进一步描述，我们提议你参考表 7.2，它用大纲的形式提供了流浪者在物质方面是如何在街头生存的这个问题的分类详述。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种核心类型的物质生存策略，每个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子类型。除了用大纲来图解式地呈现分类法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形式。这包括树形或网络形式以及方框图表，这些图表和大纲形式的图表一起体现在图 9.1 中。

1. 大纲图表



2. 树状/网络图表



3. 方框图表

<table>
<tr><td colspan="9">聚焦的主题/现象</td></tr>
<tr><td colspan="4">A</td><td rowspan="3">B</td><td rowspan="3">C</td><td colspan="3">D</td></tr>
<tr><td colspan="2">1</td><td rowspan="2">2</td><td rowspan="2">3</td><td rowspan="2">1</td><td rowspan="2">2</td><td rowspan="2">3</td></tr>
<tr><td>a</td><td>b</td></tr>
</table>

图 9.1 分类图释的形式

改编自:James P. Spradle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1980.

B. 矩阵和类型学

分类法除了图解某个焦点范畴或主题的不同形式或类型之间的关联以外，还通过产生分类法范围内所包括的项目，及其与其他情境性的焦点主题的关系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的问题，为矩阵制作和类型化提供跳板。矩阵和类型学用图表的形式构成了对这些问题所表达的答案。例如，回到物质生存策略的分类法中，考虑流浪者在不同的区域所用的不同技巧是有道理的。斯诺和安德森（Snow and Anderson，1993）也探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对物质生存策略和流浪者都进行了交叉分类，创造了一个矩阵，清楚地描述了他们所认为的内容：不同类型的流浪者个体所使用的生存策略的变化。

一般来说，矩阵是以两个或更多的与某个主题或主题兴趣相关的维度、变量或概念的交叉分类为基础的。例如，在迈尔斯和休伯曼对矩阵的讨论中，他们将其简单而机械地定义为"两份列表的'交叉'……构成列与行"（Miles and Huberman，1994，p. 93），并提供了许多实例，包括事件/年代、清单与结果矩阵。我们先前提供的许多图表进一步地描述了在矩阵制作的起源阶段的交叉排列或分类矩阵。如，表 5.1 阐明了不同种类的资料来源和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之间的关系，表 6.1 以组织单元和场景层面的交叉分类为基础，体现了不同的实地研究是如何典型地处理单元和层面的交互作用的。

类型学同样以两个或更多的观点、概念或变量的交叉分类为基础，每一种一般都具有两种价值，如"是"和"否"或者"在场"或"缺席"。在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中的原型的类型学（prototypical typology）就是一张 2 × 2 的表格，正如表 7.2 所描述的一样。由于其简单明了，通常乍一看就知道是简单易懂的分析工具，因此 2 × 2 的类型学也是如此。正如赖特·米尔斯不久前提醒我们的一样，这些类型学是"非常真实的生产工具。它们阐明了（你所研究的）类型的维度，它们也帮助你对其进行设想和构建"（Mills，1959，p. 213）。的确，米尔斯继续宣称：

> 我不相信不用任何交叉分类（如类型学）我就已经写出

了十几页一流的草稿——当然我并不总是或甚至通常并不展示图表。其中大部分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可以学到某些东西的。当它们起作用的时候,它们可以帮助你更清晰地思考,更明确地写作。它们能使你发现你正在思考的术语以及你正在研究的事实的范围以及完整的关系。

交叉分类对于一个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家来说,就像是一个勤勉的文法家图解一个句子一样。在许多方面,交叉分类正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法。(Mills,1959,p.213;Miles and Huberman, 1994,p.184)

C.概念图表

开展分析和描述的第三种视觉化策略是用图表说明关键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无论概念的特征是什么——以人为基础、理论的或者是两者的混合,它们是如何配合在一起或如何与聚焦的主题交互作用的,却并不总是很清楚。某种形式的概念图表可以帮助你阐明和理解这些关系。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探索这些概念性的联系,这一点不足为怪。在电脑数据库问世以前,实地研究者可能利用各种有形的空间,地板、墙壁、布告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来实际地传播他们各种概念化的观点和注释。例如卡罗尔·斯塔克在1980年代早期一场社会科学实地研究的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她为其经典著作《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个黑人社区的生存策略》(Stack,1974)做实地研究时,为了不让她好动的子女碰到她的笔记,促使她将笔记订在住处的墙上。虽然为了她的笔记的安全是这种做法最初的动机,她却发现这种做法本身相当有用,因为这样可以用不同的组合展示她的资料,让她很容易地排列再排列。现在,根据电脑各种可利用的资料输入、归档、储存以及修复等功能,这种有形的绘图以及制图操作可能看上去既滑稽又毫无必要。但是,我们要再次提醒警惕对这种历史悠久的操作的傲慢态度,因为许多实地研究者发现电脑对手头任务的处理太过封闭。如果把笔记展开在地板上或桌面上,或把观点钉在墙壁上,甚至写在空教室的许多黑板上(Agar,1991,p.192),有助于你利用那种功能属于“低级技术”的方式来理清概念之间的关系。

尽管认为大部分实地研究者做出某些概念图表是有道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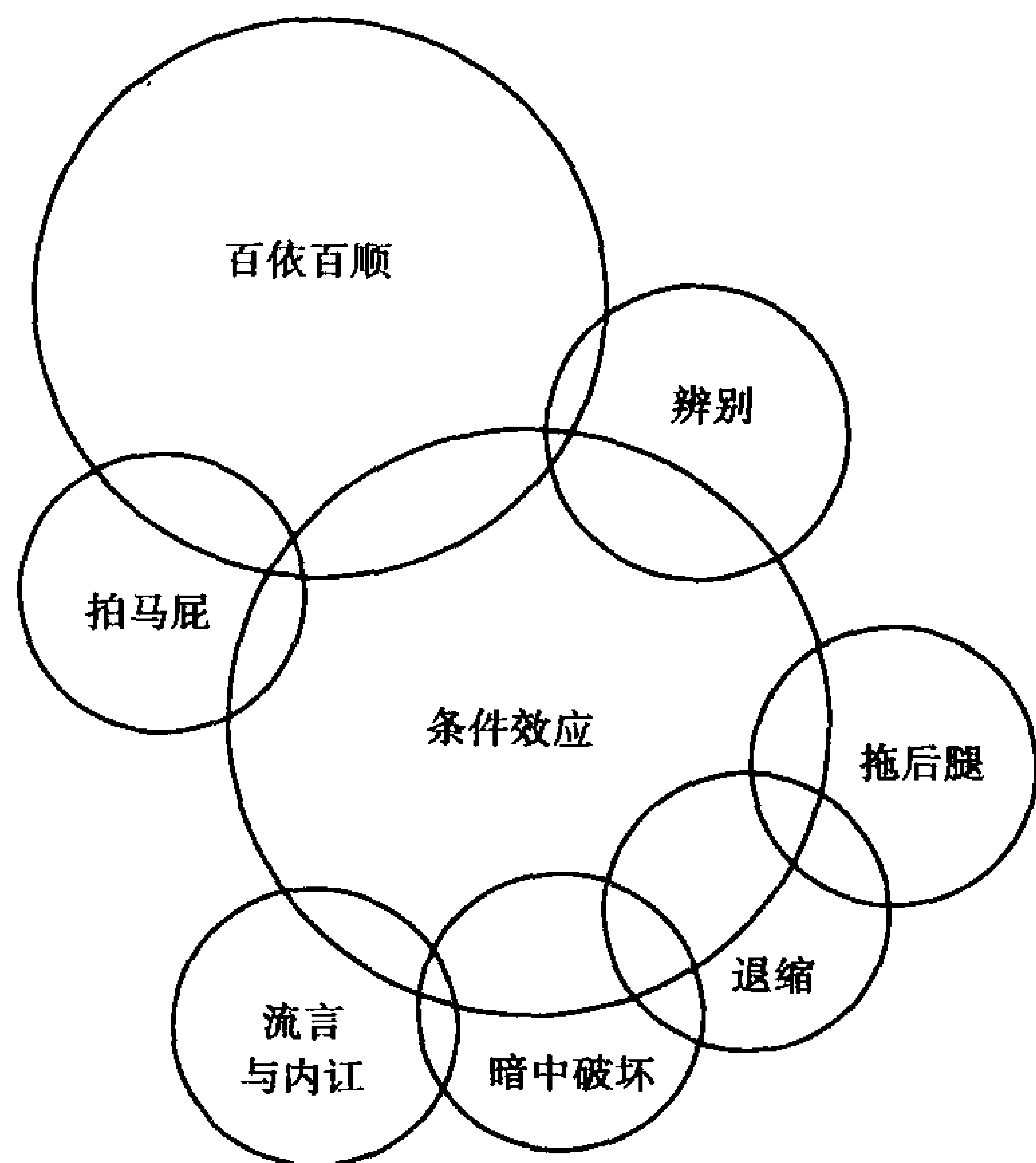


图 9.2 概念图表的例子:霍德森论工作场所的行为模式

资料来源:Hodson, "The Active Worker: Compliance and Autonomy at the Workplace," 1991, p.53, Figure 1, "Behavioral Modes in the Workplace."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age Publications, Inc. Copyright 1991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但是,这种有组织的图表出现在终结报告中相对来说还是罕见的。然而,有时候,材料的主旨或复杂性促使了它们的出现。例如表 7.1 就是这种情况,在该表中我们展示了所陈述的八个基本问题的关系。概念图表的另一个实例出现在图 9.2 中,展示了兰迪 · 霍德森(Hodson,1991)在对工作场所所做的民族志考察中工作行为的形式以及所确定的关系。

D. 流程图

流程图是我们强调的第四种图解策略,一般包括一些重要的概念或术语,具有与以上的每一个图表形式同样的基本特质,只不过它们通过时间或过程而非通过静态的实体,显示出要素的秩序。本书开端的图 1 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流程图,显示了三个重要的实地研究任务之间的时间关系。另外一个对流程图的描述的实例是图 9.3,用图表绘制了不同类型的流浪者的不同经历。例如,那些所谓的"最近错位者(recently dislocated)"(那些在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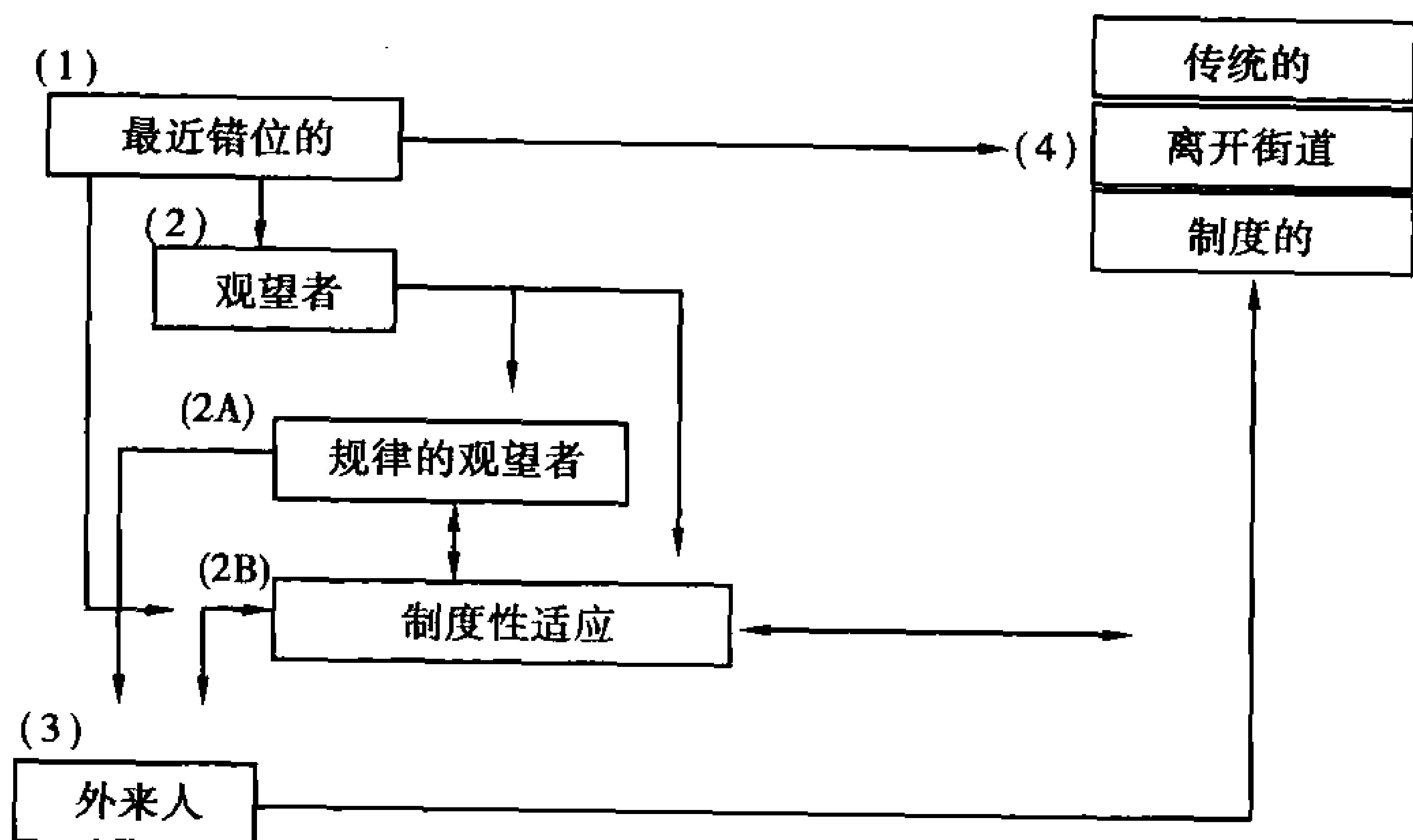


图9.3 流浪者生涯的图解

改编自:David A. Snow and Leon Anderson, Down on Their Luck, 1993.

流浪不到六个月的人)有时候很快就找到了离开街道的方法(路径1→4),但是也经常演变成为"观望者(straddlers)"(路径1→2),他们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地悬游在定居世界和更长期地以"外来人"为类型的街头流浪者这两种身份之间。

迈尔斯和休伯曼在他们对"资料展示"的详尽探讨中(Miles and Huberman,1994,p.93)将流程图视为网络,他们定义为"彼此相连的'节点'序列"。但是我们在此提醒各位,不要认为所有的网络图表都是时间或过程意义上的流程图。当然,网络图表也可以用来描述有方向的流动,但是用节点表征的资料点必须用某种方式暂时散开。

现在可以使用的绘图软件很多,使我们描述的图解(以及其他形式的图解)变得相当容易。因此,我们应该预期图解在分析过程与实地研究的报告中将占有更中心的地位。

Ⅵ.策略六:弹性思考

我们要强调的最后一个分析策略用短语"弹性思考(thinking flexibly)"最好理解。表达这一意义的其他字词或短语包括:思想弹性(mental elasticity)、思想开明(open-mindedness)、坚定的好奇心(unflinching curiosity)甚或是顽皮(playfulness)。当你开展分析

时，为了增加弹性思考的可能性，我们建议两套方针，一套是禁令性的（proscriptive），另一套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

依据禁令性的方针，我们当然要提出许多你应该避免和提防的事情，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在分析阶段，不要过早地锁定或忠于一个特别的理论命题或论点。记住，理论命题的功能就像画框，仅仅关注某些东西而忽视其他的东西，并只就画框内的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当然，随着分析的发展和注意力的逐步集中，一些命题会变得对你的分析更加重要。但是，即使是在这时候，也不要排除考虑其他视角的分析效用的可能性。
- 不要将你的分析过早地限制在单个的理论发展形式（如扎根理论、理论扩展或理论提炼——参看第 8 章 Ⅰ. B. 4 部分）或某个排除了其他模式的分析模式中。虽然一种模式超越另一种模式的适切性，取决于所询问的问题的种类以及所收集的资料的种类，但是在分析过程的早期阶段，关于分析模式，很少有任何做出最后决定的需要。最好通过广泛地编码以及对不同分析的可能性的思考来玩味资料。
- 不要让相当多的电脑化资料归档和存储的可能性以及类似的质性资料程序麻痹你，让你认为一旦你对输入电脑的笔记进行了编码和存储，艰苦的分析工作就做好了。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不同地方（第 5 章 Ⅱ. C 部分和本章 Ⅲ. A. 2 部分）所指出的，以及在先前列出的所有关于电脑辅助分析的研究中所强调的一样，设计用来归档、存储和检索质性资料的电脑以及各种软件程序，并不能代替艰苦的智力劳动，而开展分析则需要通过这些智力劳动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从其他学术旨趣的有利点来理解资料。电脑和相关的程序只能帮助分析，但是关于你的研究的恰当的概念化、理论联系以及“实际”意义，你还是得做出关键性的决定。

至于规范性的方针，我们查阅了许多的实例，它们是弹性思考的一部分，当你开展分析时，可以依照进行。这些是“可为的”而非“不可为的”。

- 重新表述(rephrasing):单单一个问题(或答案)的表达或措辞的方式,就能大大促进或阻滞你的思维。在你受阻的时候,尝试用新的词汇或新的词汇顺序。赖特·米尔斯说,这是"以顽皮的态度对待所定义的各种议题的短语和词汇"(Mills,1959,p. 212)。例如,与其说是"原因",不如使用相关的但相异的术语,如动因(facilitants);与其用"功能"这个动词,或许使用"提供(serves)"可能更能理解手头的事物。
- 改变图解(changing diagrams):如果你已经用上述某种图解形式做分析,但它不能以你的资料为基础理解你所预见的内容,可以试试用不同的呈现形式,比如,①不同的线条画法;②数学符号或同等的符号;③你能够据以建构三维空间模型的具体物品。
- 连续比较(constantly comparing):连续比较分析的条目能够刺激出想法。X 这件事件如何与前面事相似或相异? X 在这个情境如何与 X 在另一个情境相似或相异? 这种类型或范畴的不同成员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各种术语所谓的"连续比较法"(Glaser and Strauss,1967,Ch. 5)和"成分分析法"(Coffey and Atkinson, 1996, pp. 134-135; Spradley, 1980,pp. 130-139)。
- 与同伴分析者交谈(talking with fellow analysts):在前面关于焦虑处理的部分提过,你应该与其他对你的项目感兴趣的人接触,以便你可以与他们产生共鸣(当然,如果你从事的是团体实地研究,那么,你就拥有一个固定的共鸣人群)。除此以外,除了与友好的同伴分析者互相打气(morale boosting)之外,这种联系也可以刺激你的思考。与博学的和能给予帮助的人士谈话,有助于澄清你自己心里想要知道的内容。
- 定期的疏远(periodic distancing):我们在第 4 章曾指出,好的实地研究部分地取决于在亲密与疏远或者说在融入与分离之间,达到一个缓慢的但又是健康的紧张状态(Ⅰ.C 部分)。这种紧张状态对分析过程是很适当的,因为它有助于你靠近和远离,*以便你可以亲近地或疏远地评价事物,因而获得对全面图景的*观点和思考。换句话说,要沉入细节之中,但为了感知总体的设计、全面的结构,或如前所述的关于某个主题的问题的命题

性答案,又要自觉地平衡这种沉入。

在建议以上两种关于弹性思考的禁止性和规范性的方针中,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详尽的。事实上,我们猜测其他的质性研究者可能对以上所列的内容有很好的补充。但是以上所提供的建议应该足够帮助你意识到弹性思考的重要性,并且我们甚至希望,当你开展分析并撰写报告的时候,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把实地研究中的第三个主要工作,即分析资料,分成开展分析(本章讨论的)与撰写分析报告(下一章讨论)两个子工作。这种区分可以说是刻意的,因为分析者显然正在运用我们在本章描述过的六个策略中的一个或多个,做了大量的撰写工作。但从另一个意思来说,开展分析与撰写报告截然不同,需要分开讨论。开展分析是根据或针对研究者的资料,表述一个总体的研究途径,而撰写报告则与写作的社会心理学以及书面报告的特定设计关系更为密切。我们现在转而讨论这些问题以及与撰写报告相关的层面。

第10章 撰写报告

Writing Analysis

稍微反思一下，在研究的过程中，你已经走多远了。这时候你已经通过了某个或某些情境的入场，已经发展和保持了实地关系。你已经收集了实地资料，并对它们进行了组织和分析。对你所研究的情境和人物，你现在拥有大量的事实和理解。根据社会学的原则和概念，你已经构建了你的分析。所有这些工作将你带到了一个位置，即准备与更广泛的受众分享你的研究。如果你一贯地遵照这本书的指导，那么，你现在应该有了一件事情，或许几件事情，即你想要与别人进行交流。现在是开始写报告的时候了——无论是一篇研究的学期论文、一篇学位论文、一篇期刊上的文章，还是一本书。

在前一章，我们基本上关注的是帮助发展你的实地资料分析的各种程序和策略。而在本章，我们基本上关心的是写作本身的程序，以及将这种写作活动组织起来的方法，以便你可以写出清晰的、连贯的书面报告。

你的实地研究应该让你为此做好了准备。在你的逐字稿、实地笔记、编码和备忘录中，你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素材。但是，正如实地研究的许多过程一样，在此，你可能再次经历如何继续下去的惶恐和不确定的感觉。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提出的，面对开放的和复杂的研究任务觉得焦虑，你应该对此并不觉得吃惊——在撰写报告阶段这当然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所有的作者在这里或那里都经历了这种焦虑感。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页所解释的，写作没有必要成为一种你无法掌控的神秘活动。由于一些著作者的研究以及对著名社会学家的深思熟虑的观察，理解写作过

程并用推动出色写作的方式组织时间和活动，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并不是说写作是很容易的。在很多情况下，它还是艰苦的工作。但是，令人鼓舞的事实是，有许多的策略既能减少劳动的艰难，又能提高生产效率。

学习写作，就像学习参与其他的任务，需要：①基本规则的知识；②在程序和常规中实践。我们认为你已经具备了基本规则的操作性知识，如关于词汇、拼写、语法、句法、体裁惯例等这些在文法与文体手册上探讨的内容（Lunsford，2003；Turabian，1996）。我们在此将焦点放在精选的与写作有关的方法和程序上。

Ⅰ. 初步的考虑

虽然写作天才也和任何其他天才一样因人而异，但是，基本的写作能力在于对写作过程的理解，并使之为自己服务。这个过程包括两个相互缠绕的事物的一般顺序。第一点就是对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和社会过程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的基本理解。第二点就是需要对时间进行使用和安排。

A. 理解写作过程的社会心理维度

虽然先前的写作指导模式将写作视为简单的交流媒介，但是，现在的作者将写作看成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阐明观点，又交流思想。正如霍华德·贝克尔所言，“（当今）关于写作的最好的研究……分析了写作过程，并总结出了写作是一种思考形式的结论”（Becker，1986，p. ix）。同样地，在一本针对写作者如何进行有效的时间管理的名为《时间冥想》优秀指南中，伊维塔·泽鲁巴威尔（Zerubavel，1999，p. 48）观察到，

> 没有经验的作者在写作中最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把写作简单地视为将已经形成的观点复制到纸上，从事实中再也不能获得任何东西。事实上，写作实质上与发展观点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我们许多的思考实际上发生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

当前的写作指导范式进一步强调了写作/思考的过程不只限

于主观的认知活动,而应该在本质上是十足社会性的。写作过程这种社会的或协作的模式类似于像乔治·赫伯特·米德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所理解的交流发展,思考和交流同时出现在团体生活的背景中。对于米德来说,人类的交流与“社会自我”的社会心理发展密切相连。这种“社会自我”包括自我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动力的相互作用——即米德(Mead,1934)所谓的“主我(I)”和“客我(me)”。“主我”是自我相对自发的或冲动的力量,而“客我”则代表对社会期望的知晓和反应。对于米德来说,自我的发展包括两种自我在互动中相互“取代对方角色(take the role of the other)”的能力的发生力。一个小孩做到这一点的能力需要通过两个阶段的成长,从很基本的“玩耍”阶段到更复杂的“游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小孩能看清以更复杂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行为和交流,米德称之为“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认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可避免地相互缠绕,它们一起构成了管理自发的以及有创造性的“主我”与社会的、反应的“客我”之间辩证的、相互影响的能力。近年来,“社会作家(social compositionists)”,如肯尼斯·布鲁菲和彼得·艾尔保,都有效地将这种交流模式应用到写作指导中。不转入对“写作理论”的广泛讨论,我们可以说社会作家已经发展了多种多样的写作技巧,在追求有效的写作交流中,这些技巧利用了“主我”和“客我”之间的相互协作的影响。这种方法的力量在于它将写作理解为一个回归的社会过程,通过观点的表达、反馈以及修改的连续过程,使得作者发展和阐明自己的观点,促进他们的交流。

与先发展清晰的观点后再开始写作的这种长期存在的频繁的建议相反,社会作者认为开始写作是开始发展观点的一种方法。的确,在“写作前”或“自由写作”的早期阶段,他们主张反对自我检查,或者太过努力地推进反而不能进行清晰的写作(Elbow,1998,pp. 13-19)。他们认为,通过开始将字词表达在纸上,你可以为自己提供随时可以修改和提升的主要观点和结构。另外,他们也为从他人那里获取反馈并编辑你自己的写作而提出了建议和技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效写作的关键是在艾尔保(Elbow,1998)所谓的“凌乱写作(messy writing)”和“深刻编辑(incisive editing)”之间来回活动。

在本页的开头，我们提供了着手写作的建议，这些建议利用了社会作者所提倡的有创造性的社会心理协同作用。但是，首先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写作的时间规划这个很少讨论但又是很基本的议题上。

既然写作被看作是一个回归的社会过程，那么，很明显，写作的时间层面必须与涉及写作的社会心理活动同步。时间不仅必须按照不同的活动分配，而且活动顺序在时间上必须互相配合以使过程最优化。以下组织的讨论就是为了引导你完成顺序排列的任务。然而，你应该认识到这个过程包括一个螺旋形的而非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发现自己在本章所讨论的一些活动中来回了数次，而不是用一个一次性的直线顺序完成这些活动。那么，在背景中把握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利用松散的活动顺序。

B. 计划你的写作时间和地点

第一个与时间相关的任务就是为你的写作确定一个清晰的、现实的时间表。或许关于写作仅有的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它需要时间。许多人在写作上的失败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做好计划，使必要的时间没有得到利用，或没能贯彻他们的计划。很少有人发现写作（特别是学术写作！）是一个“拖欠活动（default activity）”，拖欠是他们当未受到别人的要求的约束时利用时间的自然方式。这意味着，伴随着非常真实的外部要求的压力，你必须计划你的写作时间并执行你的计划。不要制订你有可能不得不打破的写作时间计划。这不仅是无效的（你发现你没有按照你的书面计划将写作完成），而且让你养成了对写作时间放任自流的坏习惯。如果你不愿意使写作成为常规的优先考虑的事情，那么，你不可能发展你的写作技巧，获得任何持久的学术成就。

谚语“写作是 1% 的灵感加 99% 的汗水”体现了程序式地“表现在纸上（showing up at the page）”的重要性，但是也有许多你可以有效利用时间进行写作的事情。或许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有一个舒适的不让你分心的地方进行写作。在你的身旁有令你分心的事物是写作的大忌。突然的噪声、无规律的过路人、刺目的对比度大的灯光、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以及其他种种事情都会干扰注意力的集中。因此，要找一个隐蔽的愉快的写作场所。

这样的场所不仅仅保护你免于遭遇随时让你分心的事情。进入一个你所确认的“写作场所”也可以有助于你进入一个合适的思维框架中。相反地,你就进入到了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他活动所确定的场所中进行写作,并被促使加入这些活动中!那么,你的写作地点应该得到理想地配置,以便你在那里除了写作以外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们完全了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奢侈地拥有仅供写作的单独的一个房间或房间的某个部分。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称为自己所独有的一张桌子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做不到的。然而,我们督促你努力达到你的环境所允许的理想配置。如果你不得不贿赂或者哄骗小孩、配偶、室友或者父母才能保护一点点空间,那么就去做吧。如果成功地完成你的项目对你来说意义重大,那么,要求一些安静时间和空间或许是你达到目标的唯一重要的事情。

Ⅱ. 写作实践

将写作过程置于社会心理的观点中,并强调找到合适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后,我们现在转入对你的写作有帮助的各种实践中——也就是说,将文字写在纸上。

A. 开始写作

你所完成的研究、写下的实地笔记和访谈逐字稿、编码的资料、备忘录、图表以及反思性观察应该已经把一些主题带到了最显著的位置。资料不充足或对资料处理不充分的标志是,你对你研究的某个主题还无话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能需要回到实地中,或对资料进行更透彻的分析。然而,你应该注意到这个方面,免得让你的写作焦虑变成了对拖沓的实在太容易(all-too-easy)的解释。如果你遵循本书所建议的策略,你可能在开展分析的某个阶段已经有了一些命题或论题。在撰写报告之初,一个有帮助的策略就是从事霍华德·贝克尔所谓的“自由写作(free-writing)”:

> 尽快写下进入你的头脑当中的任何东西，不要参看任何大纲、笔记、资料、书本或任何其他的辅助工具。目的就是找到你想要说的东西，找到你先前所有关于这个主题或项目所引导你相信的东西。（Becker，1986，p. 54）

贝克尔继续写道：

> 如果你可以让自己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将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如果你顺着这个方向，写下进入你头脑当中的任何东西，那么你会发现不会有你所担心的令人困惑的各种选择。一旦将你的想法写在纸上，你可以看出某些主题的微小变化。你的确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并且一旦在你面前有不同的版本，你可以轻易地识别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或者如果有真正的差别（尽管很少），你现在也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
>
> 如果你这样写下去，你通常发现，到你完成草稿的时候，你头脑中会有什么。（Becker，1986，pp. 54-55）

在写作的早期阶段，尽你所能使写作流畅是非常重要的。顽皮地、自由地尝试不同的聚焦策略。一种有用的策略就是采用报告文学的而非分析性的思维框架。将写作的实质仅仅当成是“你想要就某事说点东西”，你就应该开始觉得写作一点都不可怕。它只是报道的工作，是一种例行的、平凡的活动——正如报纸记者熟知且日复一日实践的工作一样。

在具体的、相当实际的层次上，报告性的思维框架可能特别受到已经发展的（或正在发展的）图解的刺激，这个我们在第 9 章 V 部分描述过。这种一览无遗的展示提供了需要解释的字面上的事物。正如迈尔斯和休伯曼所建议的：“看这种图示，可以帮助你概述并开始看到主题、模式与聚类。你写下的分析性文字阐明、确认……（并且）协助理解这个图示，并且可以表明其他的……（分析路线）”（Miles and Huberman，1994，p. 101）。

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可能同时有很多不同的思维路线，致使你犹豫不决，不知从哪里入手。两个不同的选择有助于你打破这种写作障碍。首先，你可以确定任意一条思维路线并开始写

作(这是一种我们将在以下内容中做更多讨论的策略)。可替代的方式是,你可以用不确定的、不明朗的方式开始写作。虽然对于开始写作论文的最终稿来说,这并不是合适的方式,但是在让你能动笔写作这方面的确相当有用。我们再次引用贝克尔的话:

> 含糊的、空洞的句子……实际上是开始写作初稿的最好方式。有时候当你不想或不需要写作时,它们会给你留有余地,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让你开始动笔了。写下一个句子,并一直写下去,而不要担心你会误入歧途,因为你并没有真正地踏出第一步。你只是为了记忆,当你写下其他你必须说的内容时,再回过头来,用你想说的真实的句子来代替这些占位符。(Becker,1986,p.54)

简而言之,通过将文字记录在纸上来开始写作。不要为是否正确而烦恼(之后再多加考虑)。如果你忠于这种写作过程,你将有大量的时间修订以前的内容。

B. 就任何研究层面进行写作,但一定要写

在写作的早期阶段,你可能成为你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你的研究也许提供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和方向,使你很难将你的想法组织并聚焦在纸上。当然,一种组织的方式就是尝试性的略述你的观点。虽然这通常很有用,但是,将你的大纲仅作为启发式的工具——作为帮助写作的辅助手段,是很重要的。在写作中,思考以及(因此)探索的过程意味着抽象构思的大纲和已经写完的文章的大纲不可能是一样的。这也理应如此。一个分析者决不会真的站在主题之外或在主题之上,除非他或她已经完成了写作。当然,在写作过程中会要不同程度地修改你的意图和大纲。对于经过彻底思考,并且就要完成的写作计划和大纲来说,你可能只需要稍微修改即可。松散的大纲(即使是相当刻意的)可能看上去不像是已完成的报告。

当你的焦点与你的大纲不相符合的时候,建议你就你脑海中最重要的报告的层面进行写作,不管这个主题是否是你大纲中的下一个主题(或者甚至是主题的某个部分)。比较全面地说,从研究的任何部分开始着手(或者说向前迈进),只要这个部分符合你

有话要说这一关键需求。在转向其他部分的写作时,你无话可说的主题将在你的心里搅动,在你的意识里进进出出。这可能是你要谈的东西,很快会让你文思泉涌,当下次你要尝试这个主题时,就会左右逢源。巴曾和格拉夫也有相同的论点,并将它放在比较广泛的背景中,关注的是他们称作的研究的"自然凝聚(natural cohesion)"

> 不要犹豫在你所有的作品上随兴写下任何在你脑海里成熟的东西。在研究的任何一个部分,有时候所有的细节以自然凝聚的方式结合起来,尽管其中有小缝隙、小疑点。学会认识到那一时刻,配合你内在的一致感,用写作来抓住它。不要介意写出来的部分是否连贯。(Barzun and Graff,1992, p. 387)

反过来说,在你的研究中,你可能想讨论某些事物,但看不出来它如何与你现在运用的主要框架相匹配。这种关系的不确定性可能让你犹豫不决,不能坐下来奋笔疾书。请克服这种犹疑。把这件事写下来,不知该如何处理,总比继续在脑海里盘旋,或是停留在编码与备忘条目的层次要好得多。我们曾经强调,必须组织好你要写作的东西,思考命题,编写分类与整合备忘录,你也可能成为组织的俘虏。如果对适切性有疑虑,无论如何还是要先写下来。一旦写下一点东西后,你可能在稍后的日子里会发现它有完整的逻辑脉络,不论它是初步的还是更大的备忘录。重点是你现在已经写出来了,并准备把它放在新发现的脉络中。所以,不要担心进展如何,写出来就是了。稍后重新整理写好的素材,总比永无止境地煎熬,担心某些东西写在纸上是否真的适合,要容易得多。

对于研究要撰写哪个部分,保持弹性,可能导致你实际的报告是以非常不均衡的方式发展而成的。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需要担心。在你四处涂写的时候,报告主体即逐渐成长,逐渐成长的部分以具体的形态呈现,这个事实即提供了新的、可供探讨的对象!也就是说,你为你的报告新撰写的东西,本身就是你要讨论的新对象。

C. 承认厌恶,但还是要有规律地写作

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写作难如登天,逃避却易如反掌。写作的行为就是将思想体现在纸上,但通常我们早期的书面想法不足以表达我们想要说的内容。我们犹豫不定,无从下笔,宁可经历如影随形的失望。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开始写作,结果却发现陷入僵局或者得出我们并不希望的结论。基于种种理由,写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计划与结果均不确定。比这种不确定还重要的是因为它需要全神贯注,努力不懈,写作简直就是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

对于写作的问题,巴曾和格拉夫在他们所著的《现代研究者》中"论工作的学科"的附录中,甚至提出更极端与斩钉截铁的说法:

> 面对写作的需要,多数人(包括老练的作者)都会经历一种强烈而奇怪的冲动,想要拖延开始的时间。他们宁可做任何事,也不要面对白纸。他们开始为做其他的事情找到借口……这么说就够了:这种逃避的冲动无药可救。只要你活着,它将一再发生。(Barzun and Graff,1992,p.235)

但是在认识到写作不容易,并且是逃避的对象时,意识到许多写作的障碍也是其他认真的、需要技能的工作会遇到的困难,这是很重要的。写作就像高空运动与充满风险的工作,因为它需要自我约束的训练(regimens of self-discipline)。在运用这种规训(discipline)时,你认识到你的"逃避的渴望",但可以用巴曾和格拉夫所谓的"缓释剂(palliatives)"来克服,有些缓释剂有望"好到足以将这场奋斗转变成游戏"(Barzun and Graff,1992,p.386)。两种缓释剂需要在此一提,随后的讨论将提出其他种类的缓释剂。

第一,要写得好,我们必须有规律地动笔。一般而言,这意味着要把写作当做例行活动以及每天至少要固定花一段时间来做的事情。不要找借口。如巴曾和格拉夫所说,"缓释的原则是,必须用常态的力量克服一再发生的惰性:如果你能安排常态写作,从不错过你自己定的日期,不论你有没有写作的心情,那么这场仗你已经打赢一半了……写作者的问题与痛改前非的酒鬼是背

道而驰的。后者绝对不能碰一滴酒；前者则必须一直做他分内的工作。”(Barzun and Graff,1992,p. 386)

第二，这种自我约束的规律性就像巴曾和格拉夫所说的，要坐下来真正下笔，不论是否“文思泉涌”。新手与学生特别不容易“感到想要”写作(从一个观点来看，设想运动团队或专业的表演工作者只在他们“感到想要”的时候才行动起来)。有些人要的甚至不只是“感到想要”，他们要有灵感。我们建议这些人注意一下罗德尼·斯塔克这位多产的社会科学作者的话。

> 关于智力活动，或许最使人感到迷惘的就是写作是一种要靠灵感促成的艺术。有些写作无疑可以归类为艺术，但写作行为作为一种行业，就像修水管或汽车修理的行业一样。如果水管工与机械工要等待灵感才能操作，势必将一事无成。同样地，如果作者要依赖灵感，也将一事无成。准备写作就像准备做家务一样，就像你做平时经常做的事情一样。我从来不必问我自己是否想要写作，正如我从来不必问我是否要刷牙一样。这就是我做的事。(Stark,1994,p. 644)

斯塔克接着特别提醒某些学生，这些学生倾向于“拖到最后一分钟才把学期报告赶完。这是写作的烂方法。它把写作跟焦虑混合在一起。在你写作的时候，你应该能够全神贯注于你所说的话，而不要管逼近的期限。”(Stark,1994,p. 644)。

因此，在没有灵感与动机时写作，要求有相当的规训。但是不要忽略在这种写作过程中也会出现多种好处，并有助于使这个过程不被遗忘。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其中的几个，在后面的章节也会提到其他的好处，但在此综述似乎是有用的。第一，虽然你可能感到万事开头难，可是你一旦开始，“不想做”的感觉经常会随风而逝。你反而发现自己在知性地从事写作——有时是因为你已经将自己投入到了探索的过程之中。第二，写作而不管心情如何，可以增加你写作产出的分量。拥有并使用这些成果是值得的。第三，由于熟能生巧，你写得越多，越经常写，你就会写得越好。第四，你写得越多，你的写作速度就越可能加快。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基于各种原因，包括功力渐增，你写得越多，你感到的写作焦虑就会越少。

D. 探索中的信任与写作中的惊奇

如前所述,所有先前详细阐述的工作,包括记笔记、誊写逐字稿、编码、备忘、图解,等等,其目的就是提供资料,在你的头脑中进行处理,并神秘地与写作活动互相作用。在如此神秘的互动中,新的观点、联系、框架或者任何东西,都可以产生(Richardson,1990,2000)。

此时你要使用的确切字词,以及你要说的内容的精确的、详细的框架仍然是未知的。标准的做法是分析者再次检视材料。某些类似但稍有不同的术语,或许呈现出了可能的常用方式。呈现材料组成部分的确切数量与适当顺序,或许是不清楚的。某些不同的措辞方式与呈现的顺序或许也同样可信。所以许多分析者分类并咀嚼材料的时候,只是写下来而已,尽管事实是如何,确切地说,他们要说的是什么,还是一团迷雾。不管一切,开始下笔,分析者即落入未知之境。

这个时刻令人害怕,但也经常是令人欢呼的时刻,因为常有的状况是你写的东西令你惊奇!你当然在说你要说的话,但你如何说,你如何着手,你用的字词与概念,以及其他呈现为文字的新材料,可能对你来说都是新奇的。也就是说,写作的身体活动能让你敏锐的聚焦,并使你想要说的内容更加明确,甚至可以产生新的洞见,用你所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对你必须说出的事情分层或详述。

这种探索的循环开始的时候,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关注小差距而中断。特别要"抗拒起身去验证事实的诱惑。留下空白。同理,心里找不到的字句也可跳过。它在修正时更容易出现,时间和劲头的节省是不可计算的。"(Barzun and Graff,1992,pp. 387-388)

因此,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你要准备放开心胸,接受新奇、兴奋、令人快活的思维,(或许)还有沮丧。但写作时不要被突发的事情吓倒,写作中的这种发现将会让终结性书面报告更为有趣。

E. 不要追求完美或唯一正确的方法

分析者对其作品中至少一部分内容的品质不满意,并非罕见

之事。对某些人而言,这样会导致资料收集、编码、写备忘录、修正等工作的时间加长。分析者渴望尽善尽美,或者几近完美,让研究一拖再拖。

尽管在实地研究中,技艺的高标准可以预期,但没有完美研究这回事。只要你付出应有的勤奋,有条不紊地关注、分析,热忱与仔细的写作,就会有适当的感觉表明,研究必须结束了,即使它们显然不够完美。每位讲理的人都会认识到并同意这个事实:没有任何研究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任何宣称完美的研究可以因为这一理由而受到怀疑!甚至在报告调查研究的正式过程中,要有一部分说明一个研究做或不做某件事的特定方式。

有一种为追求完美而自毁(self-destructive)的形态需要特别的注意,就是霍华德·贝克尔(Becker,1986)所说的唯一正确的方法(one right way)的错误。有些实地研究者针对一个主题所提的问题,运用寻求命题式答案的表达方式(第 6 ~ 9 章),这种做法所体现的观念是只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可以做分析,意思是只有一个正确的命题,可用来组织我们的研究。对是否找到它感到不确定,令分析者动弹不得。或者是在成功地为组织资料提出命题之后,分析者相信一定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呈现组织格式。

贝克尔辩称并无唯一正确的方法,我们非常赞同。要分析资料,或是展示报告的风格,并没有单一的、唯一的和明显正确的方法,而且要找到它也是徒劳无功的(Fine,1988)。贝克尔以他对芝加哥学校教师的研究在报告资料时面对的组织问题为例,阐述了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想法的错误。他研究了①教师与(a)学生、(b)家长、(c)校长及(d)其他教师在②(a)贫民窟、(b)劳工阶级与(c)上层阶级中与学校的关系。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 12 格的双维度类型,他究竟应该用他所讨论的学校内的关系来组织他的报告,还是用他所讨论的关系中的学校来组织报告?贝克尔的答案是没有唯一正确的方法。每个方法各有其优缺点。还有,贝克尔说,不论是哪一种方法,“我都会报告相同的结果(尽管顺序不同),得到同样的结论(尽管它们的措辞与强调之处会有所不同)”(Becker,1986,p. 58)。这种逻辑在寻求唯一正确的方法之外,延伸到其他的形态。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也必须说,这个论点与成熟的中心命题

以及报告中的成分组织有关,而与第 8 章 I.A 部分讨论的"真实性"无关。讨论同类主题的一组报告在它们的经验基础上可能都是真实的,但仍然集中在不同的命题上,组织的方式也可能大不相同。从这些意思来看,并无唯一正确的方法。

F. 分割和征服

写作一份任何长度的报告的最大困难之一就在于有太多的东西要表达,不可能立刻完成。即使是写一份文章长度的报告,更别提一篇学位论文或一本书,也需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泽鲁巴威尔的观点与我们先前的意见一致,他把作者的任务比作运动员的耐力。他指出"像长跑运动员、越野自行车手和登山运动员一样","作者穿越在铺满严重疑问的漫长路途上,不知道他们是否最终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地"(Zerubavel,1999,p. 37)。为了有效地解决这种问题,泽鲁巴威尔提出了一个类似于许多这类运动员所使用的策略:

> 解决办法在于学会思考你的手稿,不仅将它作为单一的篇章,而且作为许多更小的,因此更易于处理的片断的汇集。
>
> 换句话说,你可以相当容易地处理强大的任务,如果你仅仅学会在头脑中将它们分割成许多不很模糊也因此不很吓人的小任务,每一个小任务你都可以轻易完成。因此你必须终止把完成整个论文、整本书或整篇学位论文当作你的唯一目标这种想法,相反地,你应该专注于完成你所分割的每一个不同的片断,一次完成一个(Zerubavel,1999,pp. 37-38)。

更小的任务或部分比完成整个手稿更容易适合分散的工作时间。当你把你的报告分割成更小的部分和更小的单位时,你可以更容易地逐日计划你的工作目标,并为这些小任务的完成而欣喜。一份大纲是做到这一点的无价之宝,它可以为完成你的手稿提供任务的顺序。但是,再次强调,小心不要让大纲具体化——它应该只是一个临时的结构,可能随着写作的推进而修改(关于大纲的实用的讨论,参看:Zerubavel,1999,pp. 39- 46)。

G. 利用标准的文学组织手段

分割和征服你的实地材料，以及组织报告并聚焦于分析的各个层面，为这些提供帮助的手段，包括多年来在文学方面所使用的各种文学手段和策略。随着近 20 年来“论写作的写作（writing about writing）”在社会科学中如爆炸般兴起，特别是随着民族志实地研究（如，Agar，1990；Atkinson，1990，1992；Becker，1986；Behar and Gordon，1995；Bechner and Ellis，2001；Brown，1992；Clifford and Marcus，1986；Ellis and Bochner，1996；Fine，1988；Geertz，1988；Krieger，1991；Reed-Danahay，1997，2001；Richardson，1990，1992，2000；Van Maanen，1988；Wolcott，1990，2001；M. Wolf，1992）的兴起，实地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写作不仅可以采用这些技巧——尽管通常是无意地，而且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文学效用。在第 8 章，我们介绍并简要地讨论了两种更为普遍深入的文学技巧：隐喻（Ⅰ.C.3（3）部分）和反语（Ⅰ.C.3（4）部分）。为了增加你对它们的理解，在此我们确定几种附加的文学手段，并希望你在组织和完成你的书面报告时，想想如何运用它们。

- 标题作为框架的手段（entitlement as a framing device）：有效的标题可以建立框架，它能集中注意力、设置期待并提示后文所述的内容，指导并推动读者的理解（Atkinson，1990，pp. 75-81）。大部分实地研究的标题采用三种形式：焦点主题的直接陈述，如凯文·汉森的《只是一名临时雇员》（Henson，1996）以及米切尔·丹尼尔的《人行道》（Duneier，1999）；主题的/类属的配对，如玛丽·帕迪罗·麦考伊的《黑人的尖桩栅栏：中产阶级黑人的特权与危险》（Pattillo-McCoy，1999）；苏德喜·温卡什的《美国人的研究：现代犹太人区的沉浮》（Venkatesh，2000）；或者类属的/主题的配对，如莱斯利·塞尔辛格的《性别的生产：在墨西哥全球工厂制造工人》（Salzinger，2003），以及皮埃雷特·洪达格留-索特罗的《性别的转换：墨西哥移民的经历》（Hondagneu-Sotelo，1994）。
- 生动的叙述（hypotyposis）：这个术语表示用引人注目的方式对情景或系列行为进行高度生动鲜明的描述（Atkinson，1990，

pp. 71-75)。这种段落通常是指有描述性的插图,这有助于发展情境及其行动者,以便表明作者事实上在场,甚至使读者看上去像是目击者。这种插图典型地被放进一本书、某些章节或论文和文章之中。

- 提喻法(synecdoche):提喻法是一种带修辞色彩的手段,用一个部分来代替整体,如用小木槌代表法律,用 DNA 代表生命,用试管代表实验,等等(Robinson, 1990, pp. 17-18)。它也可以通过对部分的考察来代表整体。尽管不是很清楚,但在许多实地研究中仍然是一种策略手段,正如伊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 1937)所描述的,聚焦于阿赞德人(Azande)的魔法和魔力是理解阿赞德人的关键,怀特(Whyte, 1993)对诺顿帮派的研究是了解贫民生活的有组织的特性的途径,格尔兹(Geertz, 1973)对巴厘岛人好斗的个性的研究是理解巴厘岛人社会的一部分。
- 叙述(narrative):用简单的概念来讲,叙述就是关于事件或个人或集体生活的故事——按照时间、因果关系或主题的顺序进行组织(Riessman, 1993, p. 17)。叙述可以从不同的有利点——如日常的、自传的、传记的、文化的或集体的角度接近并详述人类的经历(Richardson, 1990, pp. 22-26),但无论主题或参考点是什么,它们都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以当时的、因果的或论题的顺序存在于事件或生活当中,因此按照这些事件或生活所根植的顺序去描写它们,使其具有意义。研究报告可以合并多种方式。它们可以包括方法故事,这些故事描述的是引导资料收集过程的两难困境、深思熟虑和行动。轶事一样的小型叙述被频繁地用来描述抽象的分析概念。报告本身是试图讲述更广泛的故事的叙述类型。要知道叙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建构,叙述的其他特征也是如此(参看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著作:Cortazzi, 2001; Richardson, 1990; Riessman, 1993),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当你组织和写作报告时,你有多种选择可以考虑。另外,因为研究报告是叙述的,所以对于你来说,不仅思考你所想要讲述的故事,而且思考最能与你所收集的资料共鸣的那种故事,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虽然我们极力主张你要注意写作的叙述层面,但是我们也要提醒你在整个分析目标

的写作过程中注意保持认知的态度。其意义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或多个好的故事，而且是为了使你的分析目标与上一章所讨论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保持一致。

H. 发现你自己的写作风格

我们所强调和详述的各种写作实践，表明我们试图帮助你启动你的写作并坚持下去。尽管如此，这些操作可能无济于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至少对有些作者来说是如此。这是因为我们在上面列举的操作让某些人如鱼得水，但对某些人却派不上用场。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强调，最好的写作方式是发现并运用你自己的写作风格，注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事当然是常用的、富有成效的写作方式，但不要以为每一个都必定对你有用。

我们尤其要注意，上述写作方式暗含的潜在的作者形象是勤写者(steady plodder)——他们按部就班地每天写一点，系统而勤劳地构建他们的报告。他们慢慢磨出他们的报告，一步一步详细地写作和分析。

我们相信这种形象正确地描绘了大多数作者，我们也知道它并不适用于每个人。还有一种人，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大写手(grand sweeper)，这些人起先写的实际文字不多，但非常仔细地做分析，大纲形式很详细，笔记也井然有序。完成这种组织过程之后，他们就一口气把整个报告从头写到尾。他们不论在哪个时段把报告化成文字，写作都成为他们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唯一的主宰原则。记住，大写手的写作风格绝不能跟学生偷懒(goof-off)的模式混为一谈。后者指的是整个学期“偷懒”，然后在期限前熬夜写出 30 页的报告。大写手开始写作之前，已经进行了极为详细的、努力的分析工作，这与学生偷懒的模式大相径庭。分析的努力与按部就班的勤写者并无区别，勤写者是同时分析并写作。大写手只是把分析的任务与详细的写作分开来做。

在我们这本书的探讨中，显然我们偏好的是按部就班的勤写者，而非大写手。但我们还是要承认，大写手对某些人是更有效的选择，能够产生真实的、新颖的和重要的实地研究。除了我们的偏好之外，我们描述这种对比，以便说明更重要的论点，那就是不论你是否得到所有的好建议，你最后还是要发展你自己的写作

风格,而这种风格可能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

I. 重读与修正

使用以上描述的写作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积累大量重要的文字。你可能发现你所写出的东西中有些部分是很清晰的,抓住你所感兴趣的议题的方式也是令人满意的。而写作的其他部分你可能觉得不满意。在很多情况下,你所写的内容中的重要部分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或者与其上下文没有什么联系。你全部的写作也许缺少紧凑的引人注目的结构。认识到这种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你已经达到了写作的合适的水平。虽然首先你可能对先前写作的清晰度和缺乏焦点感到沮丧,但是理解到先前写作的这种特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并非难以接受,而是这个阶段出现的合适的行为。

但是写作的过程不应该在这里停止。这时候你有必要将你的经历和注意力从写作转移到对你所写出的草稿的编辑上来。当然,只有到你已经成为一名多产的作者,你才会有东西可以编辑。但是,如前所述,你的先前写作并不是你的终结报告这个事实,你要过后才会对草稿进行编辑,应该让你从"放任自流的写作"中解放出来。的确,好的作者应该在"主我"的创造性活力与"客我"的编辑性敏锐之间达到相互促进的平衡。

写作新手很少理解修改的价值,但对于有经验的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过程。作者对修改的作用很有自信,他们在写作和编辑的连续阶段中进行修改时,就能预见到研究工作的显著提高。经验丰富的作者逐渐依赖修改。的确,在学术性出版物的写作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的活动;大多数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在经历了官方的"修改和多次建议"的发展阶段后才能被出版出来。当然,至于其他的活动,编辑和修改的作用取决于你有效完成这些事情的能力。虽然我们不希望过度地做出规定,但是我们还是能从我们的集体经验以及对其他学术作者的观察中提供意见和建议。

实际上,编辑和修改出现在两种背景下。首先,作为作者,当你亲自阅读你的材料并对此做出回应时,就会有编辑工作的存在。其次,当你获得其他读者对你的写作草稿的反馈意见时,编

辑工作的存在就以这些反馈意见为基础。在本节我们聚焦第一种编辑,而下一节我们将讨论有效运用外部的反馈意见。

写出某些东西以后,最有用的成果之一是你的想法现在已经外部化(externalized)了,因此在形态上可以让你审视。写好的分析成为你可以直接看到的东西。有这种东西在你面前,你就能针对你的著作,采取同样的分析立场,就像你之前对你所研究的东西所采取的立场一样。你应该在两个层次上做分析:语句和分析单位。

"语句"层次上的修改意味着: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一句一句地重读和修改。"分析单位"层次上的修改是指对段落或更长篇幅的文章甚至整个报告的修改。不管分析单位的长度是多少,你应该对所有的措辞进行仔细的审查,包括被忽略的要点、没有证明的主张、逻辑方面的矛盾、分歧或跳跃、没有回答的可能的评论、没有写下的过渡部分,等等。

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这种把纸上文字标记起来,重新打字的工作是耗力的机械性工作。实际上,人们所说的"第一份"、"第二份"及额外编号的草稿是指完全重新打印,以便将累积的、经常潦草涂写的更改整合起来的次数这实在是太耗费劳动。

有了电脑以后,修改就成了快速持续的过程,分散的草稿的概念再也不能描述现实了。当然,并非所有的作者都赞成这种持续的编辑。有些作者,如泽鲁巴威尔(Zerubavel,1999,pp. 45-55,82-85)特别偏爱写草稿的时候往回看一点点,然后在草稿完成的基础上将整个文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修改。但是,不管修改存在于写作过程或者周期性波动的哪一处,记住两个考虑事项:首先,不论你写下的是什么,都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是可以修改的;其次,修改不论是在语句的层次上还是在分析的层次上,都可以提高终结报告的质量。因此,没有理由不花时间对你所写下的东西进行修改。你也许会遭遇可怕的障碍,但是,你也会对你所写下的内容有自负和依恋的感觉。简而言之,我们的建议就是在你写作的房间或空间门口检查你所写下的内容。

J. 寻找反馈

在记住写作是一个社会过程的观点的同时,社会作者也强调

反馈的潜在价值。获得反馈意见可以让你明白你的写作对别人而言是否可以理解、是否有意义,并且使你明白哪些地方需要如何改进。寻找反馈意见拓宽了你的编辑范围,使其包括新的观点和新鲜的见识。正如彼得·艾尔保(Elbow,1998,p.237)所言,"不管你在纸上写下的文章是如何有成果,或你修改是多么地仔细,也不管你对读者以及目的的估计是多么的机灵,或者你如何让自己的文字适合他们的口味,都到了你需要他们的反馈意见的时候了。"但是,并非任何时候的任何反馈意见都有用,你需要在合适的时候提出合适的反馈意见,避免在写作的太早期阶段就征求反馈意见。"当你仍然对研究没有把握,并且不能回答批评的时候"(Zerubavel,1999,p.78),要避免让它约束了你的写作能力。你需要时间将你的想法体现在纸上,并与它们进行搏斗。一旦你有了相对完整的草稿,一份完整但决不完美的作品,那么你现在就处在获取反馈意见的位置上了。

另一方面,在你觉得你已经有了你认为最好的草稿以后,你应该避免拖延反馈。虽然你可能尝试等到获得你所认为的最好的作品,以便避免对你的写作提出不必要的批评,但是这种策略有严重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认为你的草稿是最好的作品,那么你不太可能吸收并大量地利用你所获得的反馈意见。基于这个原因,泽鲁巴威尔建议,"重要的是在早期草稿与完美草稿之间寻找反馈意见,这时候你可以对建议持开放的态度,愿意并把它们整合到你的手稿中去"(Zerubavel,1999,p.78)。

在寻求丰富的反馈意见的过程中,你需要注意两个议题:从谁那里获取反馈意见,采取什么形式获取。关于第一个议题,贝克尔说道,"(不是)每个人都是早期草稿的好读者……有些人发现很早地处理草稿是很困难的,而坚持用适合于终结报告的标准进行批评。而有些读者有更好的编辑判断能力,你需要你所信任的、对你的作品所在的阶段能进行合适回应的一群人"(Becker,1986,p.18)。贝克尔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通常的情况是,读者给出了陈腐的、不合适的反馈意见,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被问到的内容没有获得充分的提示。通过让自己熟悉一些写作学者所提出的反馈技巧(你在大学写作课程上可能使用过那些学者的教科书)——如彼得·艾尔保(Elbow,1998,pp.240-277)关于"基

于判断标准的"和"基于读者的"的反馈意见和写作支持团体的讨论,你可以容易地减少这种问题。在修改过程中,对你的写作相当集中的反馈可能是无价之宝(进一步对征求、给出以及获得编辑上的反馈意见的优秀指导,请参看:Elbow and Belanoff,2002;Bruffee,1997)。

K. 约束你的自负以及相关的依恋

我们在上文谈到,你对写作内容的自负(ego)及其相关的依恋(attachments),可能是你调整你的分析以及写作终结报告的障碍。如果这种潜在的障碍作为很可能的妨碍逼近你的分析和写作时,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使用限制或减弱其影响的方式。

第一个要关注的事实就是,你努力收集和分析的所有材料不可能都是符合逻辑的、巧妙的,与你构建分析、组织报告的方式形成共鸣。在你自己编辑或回应别人对你草稿的反馈意见的过程中,不管你是否清楚这一点,你都要面对的朴素现实就是,你努力研究的所有东西,甚至在充分打磨的文稿中的内容,不可能在一篇报告中全部容纳下来。此时你必须承受"删除的痛苦(agony of omission)"。

但请放心,因为你有时可以用到几种辅助的调适机制。第一,你可以把相关的分析片段当做附录。第二,你可以将之插在某处(如章节末端),当做题外话,并明白标明这一点。第三,你可以在脚注中简要处理。第四,如果它很一般化,可以在序、跋或后记中出现。当然,也有完全舍弃的可能性。

第二种考虑就是心理学上的效用,在提交报告之前让自己暂时和你的报告保持一段距离。当然,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在报告正式向受众宣读之前就早早完成报告,并搁置一段合适的时间。然后,在宣读之前,充分地重读并予以修正。一段时间不看它,你投入的自我就有机会"放空(drain out)",你所发展的固有观点就可望放松或遗忘。对于我们致力的研究,我们都会产生一种"锁定的(locked in)"观点。这种观点可能很好,很有见解。但它也可能不是。暂时退一步来看一篇作品,放松你的心思,放松你心中的意向,你可以稍后回头用新的观点来回望它。然后你可以用比较好的心智框架,决定你的初稿是否真的"炙手可热(so

hot)”。即使重读时你判断它真的不错，只有几句需要修饰，它至少在这方面还有改善的空间。

“相当提前(well in advance)”这些字的意思显然是模糊不清的，它的确切意义将视环境而定。其变异之一就是，报告的长度以及随之变动的最后修正的工作量。对我们而言，即使是短篇报告，如十五页的学生论文，完成与修改之间至少也要隔几天时间。

一个类似让自我放空，让固定的研究途径松散的过程，也适用于一份报告中令人麻烦的部分——你难以组织或写作的部分。困难可能意味着这个段落基本上有问题。但它们也可能只是指你尚未发现最有说服力的、用以说明主题的事物，或者是还未发现组织它的最佳方式。与其长时间地焦虑，不如转向其他的部分，暂时忘掉有困难的部分。等你回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全新地开始解决先前的问题。

L. 就此罢休

最后，结束你的修改，放开你的手稿的这一天到来了。虽然重写在表面上看来是永无止境的，但是有时候手稿的截止日期到了，或者另一种修改的边际效用太小了，并不能保证修改的继续进行。即使你相信你能够继续改善你的写作，但并不总是这种情况。正如贝克尔所说的，“美术老师鼓励学生不要对一幅画过分着色，继续把颜料加在画布上，直到最初的想法淹没在一堆稀泥中。作者非常担心这种死法。”(Becker,1986,p.131)

虽然你可能觉得对你的手稿放手这种做法不安全，但是无限期的修改这种做法也达不到预定的目标。达到封笔的一个明显的策略就是确定一个完成的预定日期。这种自我强加的截止日期可以为坚持你的写作规则提供动机，这可能是“找一个结束点的最有效的方法，否则可能变成一种无止境的徒劳的煎熬”(Zerubavel, 1999,p.89)。如果你认真地坚持以上方法，那么你所产生的手稿在这时就可能达到了你所能够写出的最好的程度。是与更广泛的受众分享它的时候了。如果你寄出去以便获取对发表的评论意见，你当然会收到进一步修改的建议。但是之前你已经经历了修改过程，这时你有能力回答编辑上的建议。

Ⅲ. 结论性建议

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关注了在从事和写作实地研究时可能经历的大量积极和消极的经历。例如，在消极的经历中，我们提到了焦虑和恐惧。在积极的经历中，有兴奋的、有趣的人物或事情以及历险感。现在我们想要补充一些东西，以增加深刻的创造性经历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你可能将命题的构想或发现作为令人激动的新事物，此刻“眼罩”从你的眼睛上掉落，你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你的材料中以及社会现实中的新状态。

需要进一步的仔细的考察，才能判断你的发现是不是新颖的和有创造性的，但是你的成就决不会因前辈已经做过而减少。另一方面，进一步的检查可以断定你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某些新颖的、重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应该能够得到非常广泛的读者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为你的创造经历增加了重要的成就。

如前所述，经常提到的关于写作的创造性原理——“99% 的汗水加上 1% 的灵感”。人们所体验的创造性的见解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是，对于经常努力研究的人来说，智慧、灵感也是如此。原则就是：确保创造性的最好方法是锻炼大量的勤奋进取心。

即使没有创造性的闪现，我们仍然可以努力获取普通的，但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就，这些研究同样也是精彩的、详尽的、清晰的以及精心组织的。这种成就既不要求格外的创造性，也不要求特别敏锐的聪明才智。相反地，它所要求的是持续、系统的努力、活力以及进取心。这种系统的、活跃的、有进取心的研究分析者能够寻找到那些不够勤奋的同事所忽视的资料，他们能够在不够勤奋的同事所停止的分析点上继续进行分析。这种人的立场与那些消极依赖的人的立场完全相反。后者希望别人在每个阶段都指导他们；面对要求积极投入（get-up-and-go）的场景，他们只能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他们通常不能完成任何事情，这毫不奇怪。

我们以蕴含在方法论建议中的实地研究的视角、更一般化的学术所见以及风险，为我们在这本书中所确定的旅程下结论。

A. 实地研究取向是各部分构成的体系

根据我们的估计,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实地研究或自然主义:观点的十个层面,多多少少形成一致的体系,其中任何部分构成的组合似乎在逻辑上都是相互呼应的。用最广泛的话来说,“收集”阶段的要素似乎以合理的逻辑形式,与“聚焦”、“分析”阶段的要素前后一致。但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数个地方提到过的,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同意这十个层面之间有(或应有)逻辑上一致的关系。不同意的“学派”或主要模式至少有两种。第一种,也就是描述性的民族志作者,主张我们只需要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收集的阶段。聚焦与分析并不需要,报告的完成就是以一般叙述的方式完成的。第二种,也就是极端的扎根理论家则采取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聚焦与分析是特别相关的,但相信资料可以用任何方式在各处收集。这些形形色色的模式或许显示,我们说明的十种自然主义研究途径也许真的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相关,至少这种相关尚未明显到产生一致看法的地步。但即使这种相关不是内在的,把这些要素考虑为系统性的一个包,还是有重要的理由。它们共同形成限制性的规则与创造性的体验,这种体验从一种与情境或场景有经验性的和知识性的关联开始,一步步推进,以一般大众可以理解的、有用的方式进行表述。省略或跳过任何部分,就是削弱了这种产品——削弱资料的深度、焦点的精确性或者分析的敏锐度。

B. 学术所见的相似性

在做结论时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尽管有某些独特的性质,质性实地研究与分析在最重要的层面与其他研究和分析是一样的。素材的特殊性可能有所不同,如收集材料与分析的实质可能不同,但根本的过程与其他智力上的努力是同一的。这种本质的相似性包括系统的观察、考虑竞争性解释的意愿、仔细而周到的分析以及清晰的表述。所幸所有这些特质都是可以经由学习而得到的。就像所有的学习一样,它们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这意味着实地研究及其资料收集、聚焦以及分析的要素,你要走出去并实践它们。



Abbott, Andrew. 1995. "Sequence Analysis: New Methods for Old Idea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93-113.

——. 2001.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bolafia, Mitchel. 1996. *Making Markets: Opportunism and Restraint on Wall Stre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dams, Jacqueline. 1998. "The Wrongs of Reciprocity: Fieldwork among Chilean Working-Class Wome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7: 219-241.

Adler, Patricia A. 1993. *Wheeling and Dealing: An Ethnography of an Upper-Level Drug Dealing and Smuggling Community*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dler, Patricia A., and Peter Adler.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91. *Backboards & Blackboards: College Athletes and Role Engulf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eer Power: Preadolescent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2002. "Do University Lawyers and the Police Define Research Values?" Pp. 34-42 in *Walking the Tightrope: Ethical Issu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edited by Will C. van den Hoonaar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dler, Patricia, Peter Adler, and John M. Johnson (eds.). 1992. *Street Corner Society Revisited*. Newbury Park, CA: Sage. (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no. 1]).

Agar, Michael. 1973. *Ripping and Running*. New York: Seminar.

——. 1990. "Text and Fieldwork: Exploring the Excluded Midd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73-88.

——. 1991. "The Right Brain Strikes Back." Pp. 181-194 in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G. Fielding and R. M. Lee. Newbury Park, CA: Sage.

Åkerström, Malin. 2002. "Slaps, Pinches—But Not Violence: Boundary Work in Nursing Homes for the Elderly." *Symbolic Interaction* 25: 515-536.

Albas, Daniel, and Cheryl Albas. 1988. "Aces and Bombers: The Post-Exam Impress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Students" *Symbolic Interaction* 11: 289-302.

Allayhari, Rebecca A. 2000. *Visions of Charity: Volunteer Workers and Moral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en, Charlotte. 1997. "Spies Like Us: When Sociologists Deceive Their Subjects." *Lingua Franca* (November): 31-39.

Allon, Natalie. 1979. *Urban Life Styles*. Dubuque, IA: William C. Brown.

Altheide, David L., and John M. Johnson. 1994. "Criteria for Assessing Interpretative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85-499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97. *Code of Ethic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derson, Elijah. 1976. *A Place on the Cor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9. *Code of the Street: Decency, Violence, and the Moral Life of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erson, Leon. 2003. "'SOS' and 'Pieces of Eight': Edgework among the Elderly and the Maimed."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Meetings, Atlanta. GA.

Anderson, Leon, and Thomas C. Calhoun. 1992. "Facilitative Aspects of Field Research with Deviant Street Populations." *Sociological Inquiry* 62: 490-498.

Anderson, Leon, David Snow, and Daniel Cress. 1994. "Negotiating the Public Realm: Stigma Managem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the Homeless." Pp. 121-143 in *The Community of the Streets*, edited by Spencer E. Cahill and Lyn Lofland. Greenwich, CT: JAI Press.

Anspach, Renee R. 1993. *Deciding Who Lives: Fateful Choices in the Intensive-Care Nurse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rditti, Rita. 1999. *Searching for Life: The Grand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and the Disappeared Children of Argent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tkinson, Paul.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 1992. *Understanding Ethnographic Texts*.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95. *Medical Talk and Medical Work*. Thousand Oaks, CA: Sage.

Atkinson, Paul,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eds.). 2001.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Babbie, Earl R. 2003.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Baca Zinn, Maxine. 2001. "Insider Field Research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Pp. 159-166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edited by R. M. Emerson.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Banks, Anna, and Stephen P. Banks (eds.). 1998. *Fic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Banks, Marcus. 2001. *Visual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Barzun, Jacques, and Henry E. Graff. 1992. *The Modern Researcher*. (5th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aumgartner, M. P. 1988. *The Moral Order of a Subur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Howard S. 1953. "Becoming a Marijuana Us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9: 235-242.

——. 1986.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ford, James. 1983. "Talking of Apostasy: Telling Tales and 'Telling' Tales." Pp. 281-298 in *Accounting for Action*, edited by M. Muklay and N. Gilber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Behar, Ruth.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Press.

Behar, Ruth, and Deborah A. Gordon (eds.). 1995. *Women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ll, Michael Mayerfeld. 1994. *Childerly: Nature and Morality in a Country Vill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nford, Robert D. 1987. *Framing Activity, Meaning,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Berg, Bruce L.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5th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Berger, Bennett M. 1981. *The Survival of the Counterculture: Ideological Work and Everyday Life among Rural Communar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ger, Peter L. 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1979. "Sociology as a Form of Consciousness." Pp. 2-18 in *Social Interaction*, edited by H. Robboy, S. Greenblatt, and C. Clar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Berger, Peter. L., and Thomas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Bernard, H. Russell. 1994. *Research Methods for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Bernstein, Stan. 1978. "Getting It Done: Notes on Student Fritters." Pp. 17-23 in *Interaction in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J. Lofland. Beverly Hills, CA: Sage.

Best, Joel. 1994. "Lost in the Ozone Again: The Postmodernist Fad and Interactionist Foibles."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7), edited by N. K. Denzi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Biernacki, Patrick, and Dan Waldorf. 1981. "Snowball Sampling: Problems and Techniques of Chain Referral Sampling."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10: 141-163.

Biggart, Nicole W. 1989. *Charismatic Capitalism: Direct Selling Organizations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alock, Herbert. 1979. *Social Statistic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Blee, Kathleen M. 2002. *Inside Organized Racism: Women in the Hate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oor, Michael, Jane Frankland, Michelle Thomas, and Kate Robson. 2001. *Focus Groups in Soci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Blumer, Herbert.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Bochner, Arthur P., and Carolyn Ellis (eds.). 2001. *Ethnographically Speaking: Auto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Boelin, W. A. Marianne. 1992. "Street Corner Society Revisite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11-51.

Bogard, Cynthia J. 2003. *Seasons Such as These: How Homelessness Took Shape in America*.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Bok, Sissela. 1983.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Bosk, Charles L. 1979. *Forgive and Remember: Managing Medical Fail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The Fieldworker as Watcher and Witness." *Hastings Center Report* 15(no. 3): 10-14.

——. 1996. "The Fieldworker and the Surgeon." Pp. 119-138 in *In the Field: Readings on the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 edited by Carolyn D. Smith and William Kornblum. New York: Praeger.

Bourgois, Philippe. 1995.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juha, Marlo, and Lyle Hallowell. 1986. "Legal Intru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ieldwork." *Urban Life* 14: 454-478.

Bronfenbrenner, Urie. 1952.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 452-455.

Brown, Richard Harvey.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Toward a Logic of Discover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 1992. *Writing the Social Text: Poetic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Bruffee, Kenneth. 1997. *A Short Course in Writing: Composition, Collaborative Writing, and Constructive Reading*. (4th ed.). Boston, MA: Addison-Wesley Press.

Bulmer, Martin (ed.). 1982. *Social Research Ethics: An Examination of the Merits of Covert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Bunis, William J., Angela Yancik, and David A. Snow. 1996. "The Cultural Patterning of Sympathy Toward the Homeless and Other Victims of Misfortune." *Social Problems* 43: 301-317.

Buroway, Michael. 1972. *The Colour of Clas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4-33.

——. 2003. "Revisits: An Outline of A Theory of Reflexive Ethnograph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645-679.

Burawoy, Michael, Joseph A. Blum, Sheba George, Zsuzsa Gille, Teresa Gowan, Lynne Hancy, Maren Klawiter, Steve H. Lopez, Sean O. Riain, and Millie Thayer, 2000.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awoy, Michael, Alice Burton, Ann Arnett Ferguson, Kathryn J. Fox, Joshua Gamson, Nadine Gartrell, Leslie Hurst, Charles Kurzman, Leslie Salzinger, Josepha Schiffman, and Shiori Ui. 1991.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hill, Spencer E. (with William Distler, Cynthia Lachowetz, Andrea Meaney, Robyn Tarallo, and Tenna Willard). 1985. "Meanwhile Backstage: Public Bathrooms 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Urban Life* 14: 33-58.

Cahill, Spencer E. 1986. "Language Practices and Self Definition: The Case of Gender Identity Acquisi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7: 295-311.

——. 1989. "Fashioning Males and Females: Appearance Management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Gender." *Symbolic Interaction* 12: 281-298.

——. 1990. "Childhood and Public Life: Reaffirming Biographical Divisions." *Social Problems* 37: 390-402.

——. 1999. "Emotional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The Case of Mortuary Science Students (and M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2: 101-116.

——. 2002. Personal e-mail communication.

Campbell, Donald. T., and Julian C. Stanley. 1963.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Cancian, Francesca M. 1992. "Feminist Science: Methodologies that Challenge Inequality." *Gender and Society* 6: 623-642.

——. 1993. "Conflicts Between Activist Research and Academic Succes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st* 24: 92-106.

Caplow, Theodore, Howard M. Bahr, Bruce Chadwick, and Margaret Holmes Williamson. 1982. *Middletown Families: Fifty Year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arpenter, Cheryl, Barry Glassner, Bruce Johnson, and Julia Loughlin. 1988. *Kids, Drugs, and Crime*.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Cassell, Joan (ed.). 1987. *Children in the Field: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assell, Joan. 1988. "The Relationship of Observer to Observed When Studying Up." Pp. 89-108 in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Vol. 1), edited by R. G. Burges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Cassell, Joan, and Sue-Ellen Jacobs. 1987. *Handbook on Ethical Issues in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avan, Sherry. 1966. *Liquor License: An Ethnography of Bar Behaviors*. Chicago: Aldine.

Chagnon, Napoleon A. 1983. *Yanomamo: The Fierce People*. (3rd ed.). New York: CBS College Publishing.

Charmaz, Kathy. 1991. *Good Days, Bad Days: The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and Tim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94.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Positivism: Implications for Methods."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7), edited by N. K. Denzi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2001. "Grounded Theory" Pp. 335-252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M. Emerson.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2002.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and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Pp. 675-694 in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s*, edited by J. F. Gubrium and J. A. Holstein.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armaz, Kathy, and Richard G. Mitchell. 2001. "Grounded Theory in Ethnography." Pp. 160-74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in, Tiffani. 2000. "'Sixth Grade Madness': Parental Emotion Work in the Private High School Applic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9: 124-163.

Clark, Candace. 1987. "Sympathy Biography and Sympathy Marg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290-321.

Clark-Miller, Jason, and Jennifer Murdock. 2005. "Order on the Edge: Remedial Work in a Right-Wing Political Discussion Group." Pp. 201-224 in *Together Alon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Places*, edited by Calvin Morrill, David A. Snow, and Cindy H. Wh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gh, Patricia Ticineto. 1992.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offey, Amanda, and Paul Atkinson. 1996.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 Complementary Research Strateg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hn, Carol. 1987. "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2: 687-718.

Comaroff, John, and Jean Comaroff.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Cooley, Charles Horton. 1926. "The Roots of Social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59-79.

Copes, Heith, and Andy Hochstetler. 2003. "Situational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Among Male Street Thiev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279-304.

Correll, Shirley. 1995. "The Ethnography of an Electronic Bar: The Lesbian Café."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270-298.

Corrigall-Brown, Catherine, and Sharon Oselin. 2003. "Contested Patriotism: The Interactive Dynamics of War Protest Gatherings."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Corsaro, William A. 1985. *Friendship and Peer Culture in the Early Years.* Norwood, NJ: Ablex.

Cortazzi, Martin. 2001. "Narrative Analysis in Ethnography." Pp. 384-394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y, Patrick G. 2001. "Shared Risks and Research Dilemmas on a Peace Brigades International Team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0: 575-606.

Cress, Daniel and David A. Snow 1996. "Resources, Benefactors, and the Viability of Homeless SMO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089-1109.

Cress, Daniel and David A. Snow. 2000. "The Outcomes of Homeless Mobil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 Disruption, Political Mediation, and Fra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063-1104.

Cressey, Donald R. 1953. *Other People's Money: A Study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mbezzlement.* Glencoe, IL: Free Press.

Crist, John T. (ed.). 2001. "Ethnography Under the Gun: Fieldwork in Zones of Conflict, War, and Peace.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0: 516-648.

Cuba, Lee J. 1988. *A Short Guide to Writing About Social Science.* Dallas, TX: HarperCollins.

Dalton, Melville. 1959. *Men Who Manage: Fusions of Feeling and Theory in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Wiley.

Davis, Fred. 1960. Interview Guide for Problems of the Handicapped in Everyday Social Situations. Unpublished.

——. 1961. "Comment on 'Initial Interaction of Newcomers in Alcoholics Anonymous.'" *Social Problems* 8: 35.

——. 1973. "The Martian and the Convert: Ontological Polar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Urban Life* 2: 333-343.

Davis, Murray S. 1971. "That's Interesting!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Phenomenolog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Ⅰ: 309-344.

Davis, Phillip W., and Jacqueline Boles. 2003. "Pilgrim Apparition Work: Symbolization and Crowd Interaction When the Virgin Mary Appeared in Georg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371-402.

Dawson, Lorne, and Robert Prus. 1993a. "Interactionist Ethnography and Post-modernist Discourse: Affinities and Disjunctures in Approaching Human Lived Experience." Pp. 283-297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5),

edited by N. K. Denzi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3b. "Human Enterprise,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Ethnographic Other." Pp. 129-139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5), edited by N. K. Denzi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4. "Postmodernism and Linguistic Reality Versu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Obdurate Reality."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7), edited by N. K. Denzi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Denzin, Norman K. 1984.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Domestic, Family Viol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483-513.

——. 1987a. *The Alcoholic Self.*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87b. *The Recovering Alcoholic.*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89a. *The Research Act.*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89b.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92a.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 1992b. "Whose Cornerville Is It, Anywa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120-132.

——. 2002. "Confronting Ethnography's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Symposium on Crisis in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1: 482-490.

Denzin, Norman K.,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2000.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utscher, Irwin. 1966. "Words and Deeds: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Social Problems* 13: 235-254.

Deutscher, Irwin, Fred P. Pestello, and H. Frances Pestello. 1993. *Sentiments and Act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Devereux, Stephen, and John Hoddinott (eds.). 1993. *Fieldwork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DeWelde, Kristine. 2003. "Getting Physical: Subverting Gender through Self-Defen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247-278.

Diamond, Timothy. 1992. *Making Gray Go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lOrio, Judith A., and Michael R. Nusbaumer. 1993. "Securing Our Sanity: Anger Management Among Abortion Escor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411-438.

Dohan, Daniel, and Martin Sanchez-Jankowski. 1998. "Using Computers to Analyze Ethnographic Field Dat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477-498.

Dordick, Gwendolyn A. 1997. *Something Left to Lose: Personal Relations and Survival Among New York's Homel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Jack D. 1976. *Investigative Social Research: Individual and Team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Douglas, Jack, and Paul K. Rasmussen (with Carol Ann Glanagan). 1977. *The Nude Be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Dowd, James J. 2000. "Hard Work and Good Ambition: U. S. Army Generals and the Rhetoric of Modesty." *Symbolic Interaction* 23: 183-206.

Drew, Robert S. 2001. *Karaoke Nights: An Ethnographic Rhapsody.* Walnut, CA: AltaMira.

Duneier, Mitchell. 1992. *Slim's Table: Race, Respectability, and Masculi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9.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Duneier, Mitchell, and Harvey Molotch. 1999. "Interactional Vandalism,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Urban Interaction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1263-1295.

Dunn, Linda. 1991. "Research Alert! Qualitative Research May Be Hazardous to Your Healt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 388-92.

Duster, Troy, David Matza, and David Welman. 1979. "Field Work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American Sociologist* 14: 136-142.

Dynes, Russell R., and Kathleen Tierney (eds.). 1994. *Disasters,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Ebaugh, Helen R. F. 1988. *Becoming an Ex: The Process of Role Ex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der, Donna, Catherine Colleen Evans, and Stephen Parker. 1995. *School Talk: Gender and Adolescent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Edin, Kathryn, and Laura Lein. 1997. *Making Ends Meet: 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Elbow, Peter. 1973. *Writing without Teac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Writing with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bow, Peter, and Pat Belanoff. 2002. *Being a Writer.* New York: McGraw-Hill.

Eliasoph, Nina. 1998.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lis, Carolyn. 1986. *Fisher Folk: Two Communities on Chesapeake Ba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1995. *Final Negotiations: A Story of Love, Loss, and Chronic Illn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 Writing Emotionally about Our Lives." Pp. 115-142 i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W. G. Tierney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llis, Carolyn, and Arthur P. Bochner. 1992. "Telling and Performing Personal Stories: The Constraints of Choice in Abortion." Pp. 79-101 in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edited by C. Ellis and M. G. Flaher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2000.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 Pp. 733-768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Edited by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Ellis, Carolyn, and Michael G. Flaherty (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Ellis, Carolyn, and Eugene Weinstein. 1986. "Jealousy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337-357.

Emerson, Robert M. (ed.). 2001.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Emerson, Robert M., and Melvin Pollner. 2001. "Constructing Participant/Observation Relations." Pp. 239-259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2nd ed.). Edited by R. M. Emerson.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Emerson, Robert M., Rachel I. Fretz, and Linda L.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1.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Fieldnotes." Pp. 352-368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H. Lofl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Epstein, Barbara L. 1991. *Political Culture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rikson, Kai T. 1967. "A Comment on Disguised Observa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14: 366-373.

Erlandsom, David A., Edward L. Harris, Barbara L. Skipper, and Steve D. Allen. 1993. *Doing Naturalistic Inquiry: A Guide to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Evans-Pritchard, Edward E. 1937.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antasia, Rick. 1988. *Cultures of Solidarity: Consciousness,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rk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agin, Joe R., Anthony M. Orum, and Gideon Sjoberg (eds.). 1991. *A Case for the Case Stud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eldman, Martha S., Jeannine Bell, and Michele Tracy Berger. 2003. *Gaining Access: A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Guide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Fetterman, David M. 1998.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Fielding, Nigel C. 1993. "Mediating the Message: Affinity and Hostility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Pp. 146-180 in *Researching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laire M. Renzetti and Raymond M. Lee. Newbury Park, CA: Sage.

——. 2001.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53-467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e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elding, Nigel G., and Raymond M. Lee (eds.). 1998. *Computer Assisted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Sage.

Fine, Gary Alan. 1980. "Cracking Diamonds: The Observer Role in Little League Baseball Setting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ocial Competence." Pp. 117-132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83. *Shared Fantas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7. *With the Boy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nd Preadolescent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8. "The Ten Commandments of Writing." *American Sociologist* 19:152-157.

——. 1993. "Ten Lies of Ethnography: Moral Dilemmas In Field Resear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267-294.

——. 1996. *Kitchens: The Culture of Restaurant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1. *Gifted Tongues: High School Debate and Adolescent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ne, Gary Alan, and Barry Glassner. 197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Children: Promise and Problems." *Urban Life* 8: 153-174.

Fine, Gary Alan, and Sherryl Kleinman. 1979. "Rethinking Subcultures: An Interactionist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20.

Fine, Gary Alan, and Kent L. Sandstrom. 1988. *Knowing Childre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Minors*. Newbury Park, CA: Sage.

Fineman, Stephen (ed.). 1993. *Emotion in Organiz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Fisher, Bradley J. 1987. "Illness Career Descent in Institutions for the Elderly." *Qualitative Sociology* 10: 132-145.

Flaherty, Michael. 1999. *A Watched Pot: How We Experience Tim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2002. "The 'Crisis' in Representation: Reflections and Assessments" (Review Symposium on Crisis in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1: 508-516.

Forgas, Joseph P. (ed.). 2000. *Feeling and Thinking: The Role of Affect in Social Cogn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eeman, Derek. 1983.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Norman L. 1990. "Autobiographical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21: 60-66.

Fuller, Linda. 1988. "Fieldwork in Forbidden Terrain: The U. S. State and the Case of Cuba." *American Sociologist* 19: 99-120.

Gage, John T. 1987. *The Shape of Reason*. New York: Macmillan.

Gallagher, Patrick. 1967. "Games Malinowski Played." *New Republic* 17: 24-26.

Galliher, John F. 1980. "Social Scientists'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to Superordinates: Looking Up Meekly" *Social Problems* 27: 298-308. (Special issue on *Ethical Problems of Fieldwork*, edited by Joan Cassell and Murray Wax.)

Gallmeier Charles. 1991. "Leaving, Revisi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Neglected Issues in Field Research." Pp. 224-231 in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William B. Shaffir and Robert A. Stebbins. Thousand Oaks: Sage.

Gamson, Joshua. 1994. *Claiming Fa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5. "Stopping the Spin and Becoming a Prop: Fieldwork on Hollywood Ethics." Pp. 83-93 in *Studying Elites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edited by Rosanna Hertz and Jonathon B. Imb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Gamson, William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ns, Herbert.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67. *The Levittowners: Ways of Life and Politics in a New Sub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Pantheon.

——. 1972. "The Positive Functions of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275-289.

Gardner, Carol Brooks. 1986. "Public Aid." *Urban Life* 15: 37-69.

——. 1995. *Passing By: Gender and Public Harass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Gearing, Frederick O. 1970. *Face of the Fox*. Hawthorne, NY: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eorges, Robert A., and Michael O. Jones. 1980. *People Studying People: The Human Element in Field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lbert, Nigel. 2001. *Researching Social Life*. Newbury Park, CA: Sage.

Glaser, Barney.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arney, and Anselm Strauss.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 1968. *Time for Dying*. Chicago: Aldine.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1961a.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1961b. "Role Distance." Pp. 85-152 in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1962. "On Cooling the Mark Out: Some Aspects of Adaptation to Failure." Pp. 482-505 in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 edited by A. Ro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1983.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17

——. 1989. "On Fieldwork." (Transcribed and edited by Lyn H. Lof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8: 123-132.

Gold, Raymond. 1958. "Roles in Sociological Field Observation." *Social Forces* 36: 217-223.

Gold, Steven J. 1989. "Differential Adjustment Among New Immigrant Family Memb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7: 408-434.

Golde, Peggy (ed.). 1986. *Women in the Field: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 (2nd ed., expanded and updat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odwin, Jeff. 2001.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win, Jeff,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eds.). 2001.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rdon, David E. 1987. "Getting Close by Staying Distant: Fieldwork with Proselytizing Group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0: 267-287.

Gotlib, Ian, and Blair Wheaton (eds.). 1997. *Stress and Adversity Over the Life Course: Trajectories and Turning Poin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ld, Leroy C., Andrew L. Walker, Lansing E. Crane, and Charles W. Lidz. 1974. *Connections: Notes from the Heroin World.* New Haven, CT: University Press.

Gravel, Pierre Bettez, and Robert B. Marks Ridinger. 1988.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New York: Garland.

Greenbaum, Thomas L. 1998. *The Handbook for Focus Group Research* (revised and expanded ed.).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GrØnbjerg, Kirsten A. 1993. *Understanding Nonprofit Funding: Managing Revenues in Social Service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ubrium, Jaber F. 1975. *Living and Dying in Murray Manor.*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1986. *Oldtimers and Alzheimers: The Descriptive Organization of Senility.* Greenwich, CT: JAI Press.

Gubrium, Jaber F., and James A. Holstein.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rney, Joan Neff. 1985. "Not One of the Guys: The Female Researcher in a Male-Dominated Setting." *Qualitative Sociology* 8: 42-62.

Gusfield, Joseph. 1981. *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 Drinking-Driving and the Symbol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usterson, Hugh. 1996. *Nuclear Rites: A Weapons Laborator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mmersley, Martyn.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Hammersley, Martyn, and Paul Atkinson. 1995.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Harper, Douglas. 1982. *Good Compa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7. *Working Knowledge: Skill and Community in a Small Sho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0. "Re-Imagining Visual Methods." Pp. 717-732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2001. *Changing Works: Visions of a Lost Agri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3. "Framing Photographic Ethnography: A Case Study." *Ethnography* 4: 241-266.

Harrison, Tyler, and Susan Morgan. 2005. "'Hanging Out' Among Teenagers: Resistance, Gender,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93-110 in *Together Alon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Places*, edited by Calvin Morrill, David A. Snow, and Cindy H. Wh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ilman, Samuel C. 1980. "Jewish Sociologist: Native-as-Stranger" *American Sociologist* 15: 100-108.

Heirich, Max. 1971. *The Spiral of Conflict: Demonstrations at Berkeley* 1964-196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enson, Kevin D. 1996. *Just a Temp.*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erman, Nancy J. 1993. "Return to Sender: Reintegrative Stigma-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Ex-psychiatric Pati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295-330.

Heyl, Barbara. 2001. "Ethnographic Interviewing." Pp. 369-383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Hilbert, Richard A. 1980. "Covert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n Its Nature and Practice" *Urban Life* 9: 51-78.

Hochschfid, Arlie R. 1973. *The Unexpected Community: Portrait of An Old Age Sub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dson, Randy. 1991. "The Active Worker: Compliance and Autonomy at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 47-78.

Hoffman, Joan Eakin. 1980. "Problems of Acces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Elites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Pp. 45-56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llingshead, August B. 1975. *Elmtown's Youth and Elmtown Revisit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Holmes, Lowell. 1987. *Quest for the Real Samoa: The Mead/Freeman Controversy and Beyond.*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Holyfield, Lori. 1999. "Manufacturing Adventure: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Emo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8: 3-32.

Holyfield, Lori, and Gary Alan Fine. 1997. "Adventure as Character Work: The Collective Taming of Fear." *Symbolic*

Interaction 20: 343-363.

Holyfield, Lori and Lilian M. Jonas. 2003. "From River God to Research Grunt: Identity, Emotions, and the River Guide." *Symbolic Interaction* 26: 285-306.

Hondagneu-Sotelo, Pierrette. 1994. *Gendered Transitions: Mexican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1. *Domestica: Immigrant Workers Cleaning and Caring in the Shadows of Afflu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rne, Christine, Mary Kris McIlwaine, and Kristie A. Taylor. 2005. "Civility and Order: Adult Social Control of Children in Public Places." Pp. 181-200 in *Together Alon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Places*, edited by Calvin Morrill, David A. Snow, and Cindy Wh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rowitz, Irving Louis. 1965. "The Life and Death of Project Camelot." *Transaction* 3 (November-December): 3-7, 44-47.

Horowitz, Ruth. 1983. *Honor and the American Dream: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a Chicano Commun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86. "Remaining an Outsider: Membership as a Threat to Research Rapport." *Urban Life* 14: 409-430.

——. 1995. *Teen Mothers: Citizens or Depend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Getting In." Pp. 41-50 in *In the Field: Readings in the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 edited by C. D. Smith and W. Kornblum. New York: Praeger.

Howell, Nancy (ed.). 1990. *Surviving Fieldwork: A Report of the Advisory Panel on Health and Safety in Fieldwork*.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Hughes, Everett C. 1971 (1950). "Cycles, Turning Points, and Careers." Pp. 124-131 in *The Sociological Eye*, edited by E. C. Hughes. Chicago, IL: Aldine.

Hume, David. 1978 (1739).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Cambridge,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mphreys, Laud. 1975.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enlarged ed.). Chicago: Aldine.

Hunt, Scott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4. "Identity Talk in the Peace and Justice Mov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488-517.

Irwin, John. 1970. *The Fel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ill.

——. 1980. *Prisons in Turmoil*. Boston: Little, Brown.

——. 1985. *The Jail: Managing the Underclass in America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ackson, Jean E. 1990. "'Deja Entendu': The Liminal Qualities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no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8-43.

James, William. 1932. *The Meaning of Truth*. New York: Longman.

Jimerson, Jason B. 1996. "Good Times and Good Games: How Pickup Basketball Players Use Wealth-Maximizing Nor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5: 353-371.

——. 1999. "'Who Has the Next?' The Symbolic, Rational, and Methodical Use of Norms in Pickup Basketball."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2: 136-156.

Johnson, John M. 1975. *Doing Fiel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Johnson, John M., and David L. Altheide. 1993. "The Ethnographic Ethic." Pp. 95-107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4), edited by N. K. Denzi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Johnson, Norris R. 1988. "Fire in a Crowded Theater: A Descrip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Pan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6: 7-26.

Johnston, Drue M. and Norris R. Johnson. 1988. "Role Extension in Disaster: Employee Behavior at the Beverly Hills Supper Club Fire." *Sociological Focus* 22:39-51.

Jonas, Lilian M. 1999. "Making and Facing Danger: Constructing Strong Character on the River." *Symbolic Interaction* 22: 247-268.

Junker, Buford H. 1960. *Field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alab, Kathleen. 1987. "Student Vocabularies of Motive: Accounts for Absence." *Symbolic Interaction* 10: 71-83.

Kanter, Rosabeth Moss.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Kaplan, Danny, and Eyal Ben-Ari. 2000. "Brothers and Others in Arms: Managing Gay Identity in Combat Units of the Israeli Arm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9: 396-432.

Kaplan, Ilene M. 1991. "Gone Fishing, Be Back Later: Ending and Resuming Research Among Fisherman." Pp. 232-237 in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William B. Shaffir and Robert A. Stebbins. Thousand Oaks: Sage.

Karp, David A. 1973. "Hiding in Pornographic Bookstor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Nature of Urban Anonymity." *Urban Life* 1: 427-452.

——. 1996. *Speaking of Sad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The Burden of Sympathy: How Families Cope with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tovich, Michael A., and William A. Reese II. 1987. "The Regular: Full-Time Identities and Memberships in an Urban B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6: 308-343.

Katz, Jack. 1982. *Poor People's Lawyers in Transi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97. "Ethnography's Warran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5: 391-423.

——. 1999. *How Emotion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1. "Analytic Induction Revisited." Pp. 331-334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M. Emerson.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Kelle, Udo (ed.). 1995.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Kemmis, Stephen, and Robin McTaggart. 2000.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p. 567-606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edited by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Kendall, Diane. 2002. *The Power of Good Deeds: Privileged Women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the Upper Cla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Kendall, Lori. 1998. "Meaning and Identity in 'Cyberspace': The Performance of Gender, Class, and Race Online." *Symbolic Interaction* 21: 129-153.

——. 2002. *Hanging Out in the Virtual Pub: Masculinities and Relationships Onl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lapp, Orrin. 1958. "Social Typ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 673-681.

Klatch, Rebecca E. 1987. *Women of the New Righ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A Generation Divided: The New Left, The New Right, and the 196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leinman, Sherryl. 1984. *Equals Before God: Seminarians as Humanistic Professiona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Opposing Ambition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an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leinman, Sherryl, and Martha A. Copp. 1993. *Emotions and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Kleinman, Sherryl, Barbara Stenross, and Martha McMahon. 1994. "Privileging Fieldwork over Interviewing: Consequences for Identity and Practice." *Symbolic Interaction* 17: 37-50.

Kornblum, William. 1974. *Blue Collar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tarba, Joseph A. 1980. "Discovering Amorphous Social Experience: The Case of Chronic Pain." Pp. 57-67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83. *Chronic Pain: Its Social Dimensions*. Beverly Hills, CA: Sage.

Krieger, Susan.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a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elf: Personal Essays on an Art For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Krueger, Richard A., and Mary Anne Casey. 2000.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Kuklick, Henrika. 1991. *The Savage With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1885-19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nda, Gideon. 1992. *Engineering Culture: Control and Commitment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al, Jayati. 1996. "Situating Locations: The Politics of Self, Identity, and 'Other' in Living and Writing the Text." Pp. 185-214 in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edited by Diane L. Wolf. Boulder, CO: Westview.

Lamont, Michele. 1992. *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0. *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 Moral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 Class, and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nkenau, Stephen E. 1999. "Stronger than Dirt: Public Humiliation and Status Enhancement among Panhandl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8: 288-318.

Lareau, Annette, and Jeffrey Shultz (eds.). 1996. *Journeys Through Ethnography: Realistic Accounts of Fieldwor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LeCompte, Margaret D., and Jean J. Schensul. 1999. *Analyzing & Interpreting Ethnographic Data*.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Lee, Jennifer. 2002. *Civility in the City: Blacks, Jews, and Koreans in Urba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idner, Robin. 1993. *Fast Food, Fast Talk: Service Work and the Routinization of Everyd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mert, Edwin M. 1962. "Paranoia and the Dynamics of Exclusion." *Sociometry* 25: 2-20.

Leo, Richard A. 1995. "Trial and Tribulations: Courts, Ethnography, and the Need for an Evidentiary Privilege for Academic Researcher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6: 113-134.

Levine, Felice J. 1993. "ASA Files Amicus Brief Protecting Confidential Research Information." *Footnotes* 21 (no. 5): 2.

Leyser, Ophra. 2003. "Doing Masculinity in a Mental Hospit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336-359.

Lichterman, Paul. 1996.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Community: American Activists Reinventing Commit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ebow, Elliot. 1967.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 1993. *Tell Them Who I Am: The Lives of Homeless Women.* New York: Free Press.

Lincoln, Yvonne S., and Egon G. Guba.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indesmith, Alfred R. 1947. *Opiate Addiction.* Bloomington, IN: Principia Press.

Lockford, Lesa. 2004. *Performing Femininity: Rewriting Gender Identit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Lofland, John. 1970. "Interactionist Imagery and Analytic Interruptus." Pp. 35-45 in *Human Nature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Papers in Honor of Herbert Blumer*, edited by Tamotsu Shibutani.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1971.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1977. *Doomsday Cult: A Study of Conversion, Proselyt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th* (enlarged ed.). New York: Irvington.

——. 1978. "Becoming a World-Saver Revisited." Pp. 10-23 in *Conversion Careers*, edited by J. Richards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1985. *Protest: Studie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1993. *Polite Protesters: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of the 1980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Analytic Ethnography: Features, Failures, Futur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25-40.

Lofland, John, and Michael Fink. 1985. "Symbolic Sit-Ins." Pp. 299-319 in *Protest: Studie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Lofland, John, and Lyn H. Lofland.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Lofland, John, and Rodney Stark. 1965. "Becoming a World-Saver: A Theory of Conver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862-874.

Lofland, Lyn H. (ed.). 1980. "Reminiscences of Classic Chicago: The Blumer-Hughes Talk." *Urban Life* 9: 251-281.

——. 1982. "Loss and Human Connection: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Bond." Pp. 219-242 in *Personality, Roles and Social Behavior*, edited by W. Ickes and E. Knowle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1985a. "The Social Shaping of Emotion: The Case of Grief." *Symbolic Interaction* 8: 171-190.

——. 1985b. *A World of Strangers: Order and Ac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in 1973.

——. 1998. *The Public Realm: Exploring the City's Quintessential Social Territory.*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Lois, Jennifer. 2003. *Heroic Efforts: The Emotional Culture of Search and Rescue Volunteer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opata, Helena Z. 1980. "Interviewing American Women." Pp. 68-81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oseke, Donileen R. 1992. *The Battered Woman and Shelters: The Construction of Wife Abus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owney, Kathleen S. 1995. "Teenage Satanism as Oppositional Youth Cultu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453-484.

Lunsford, Andrea. 2003. *The St. Martin's Handbook.* (5th ed.).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Press.

Lynd, Robert S., and Helen Merrell Lynd. 1929. *Middletown: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Lyng, Stephen. 1998. "Dangerous Methods: Risk Taking and the Research Process." Pp. 221-251 in *Ethnography at the Edge: Crime, Deviance, and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Jeff Ferrell and Mark S. Ham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Lyng, Stephen, and David A. Snow. 1986. "Vocabularies of Motive and High-Risk Behavior: The Case of Skydiving." Pp. 157-179 in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Vol. 3, edited by Edward J. Lawler. Greenwich, CT: JAI Press.

Mahmood, Cynthia. 1996. *Fighting for Faith and Nation: Dialogues with Sikh Militant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Maines, David R., William Shaffir, and Allan Turowetz. 1980. "Leaving the Field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Reflections on the Entrance-Exit Hypothesis." Pp. 261-281 in *Fieldwork Experiences: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W. Shaf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linowski, Bronislaw.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Mandell, Nancy. 1986. "Peer Interaction in Day Care Setting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Cognition." Pp. 55-79 in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Child Development* (Vol. 1), edited by P. A. Adler and P. Adler.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88. "The Least-Adult Role in Studying Childre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6: 433-467.

Mann, Chris, and Fiona Stewart. 2001.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Researching Online.*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nning, Peter K. 1977. *Police Wor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002. "The Sky Is Not Falling" (Symposium on Crisis in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1: 490-498.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M. J. Fis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golis, Eric. 1990. "Visual Ethnography: Tools for Mapping the AIDS Epidem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370-391.

Massey, Joseph E., and Trina Hope. 2005. "A Personal Dance: Emotional Labor, Fleeting Relationships, Local Social Power and Exchange in a Strip Bar." Pp. 66-90 in *Together Alon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Places*, edited by Calvin Morrill, David A. Snow, and Cindy H. Wh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McCabe, Donald L. 1992. "The Influence of Situational Ethics on Cheat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Sociological Inquiry* 62: 365-373.

McCall, George J., and J. L. Simmons (eds.). 1969.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Text and Read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McPhail, Clark. 1969. "Student Walkout: An Examination of Elementary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Problems* 16: 441-455.

——. 1991.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 1994. "The Dark Side of Purpos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Riot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5: 1-32.

McRoberts, Omar M. 2003. *Streets of Glory: Church and Community in a Black Urban Neighborho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ad, George Herbert.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38.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ad, Margaret. 1928.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Melbin, Murray. 1987. *Night As Frontier: Colonizing the World After Dark.* New York: Free Press.

Merton, Robert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2.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9-47.

Meyer, J. R., and A. H. Conrad. 1957. "Economic Theory, Statistical Inferences, and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7: 532.

Miles, Matthew B., and A. Michael Huberman.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ller, S. M. 1952. "The Participant Observer and 'Over-rappor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 97-99.

Milligan, Melinda J., and April Brayfield. 2004. "Museums and Childhood: Negotiating Organizational Lessons." *Childhood: A Global Journal of Child Research* 11: 45-71.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Richard G., Jr. 1983. *Mountain Experience: The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of Adven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 *Secrecy and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 2002. *Dancing at Armaged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ffatt, Michael. 1989. *Coming of Age in New Jersey: College and American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Monaghan, Peter. 1993a. "Sociologist Jailed Because He 'Wouldn't Snitch' Ponders the Way Research Ought to Be Don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September 1, Pp. A8-A9.

——. 1993b. "Free After 6 Months: Sociologist Who Refused To Testify is Released."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3, p. A14.

——. 1994. "Bitter Warfare in Anthropolog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26, Pp. Al0, A18-19.

Monti, Daniel J. 1992. "On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Going Native." *Qualitative Sociology* 15: 325-332.

Morales, Edmundo. 1989. *Cocaine: White Gold Rush in Peru*.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Morgan, David L. 1997. *Focus Groups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rill, Calvin. 1995. *The Executive Way: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orpor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rrill, Calvin, David B. Buller, Mary Klein Buller, and Linda L. Larkey, 1999. "Toward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Identifying and Managing Formal Gatekeepers." *Qualitative Sociology* 22: 51-72.

Morrill, Calvin, and Gary Alan Fine. 1997: "Ethnographic Contributions to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5: 424-451.

Morrill, Calvin, David A. Snow, and Cindy White (eds.). 2005. *Together Alon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Pla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orse, Janice M. (ed.). 1994. *Critical Issu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yser, George. 1988. "Non-Standardized Interviewing in Elite Research." Pp. 109-136 in *Research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Vol. 1), edited by R. G. Burges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Munch, Allison. 2005. "'Everyone Gets to Participate': Floating Community in an Amateur Softball League." Pp. 111-133 in *Together Alon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Places*, edited by Calvin Morrill, David A. Snow, and Cindy Wh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urphy, Alexandra G. 2003. "The Dialectical Gaze: Exploring the Subject-Object Tension in the Performances of Women Who Str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305-335.

Murphy, Elizabeth. 2004. "Anticipatory Accounts." *Symbolic Interaction* 27: 129-154.

Murphy, Elizabeth, and Robert Dingwall. 2001. "The Ethics of Ethnography." Pp. 339-351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2003.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Health Policy Research*.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Myers, Dowell. 1992. *Analysis with Local Census Data: Portraits of Change*. Boston: Academic Press.

Naples, Nancy A., with Emily Clark. 1996. "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Empowerment: Going Public as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Pp. 160-183 in *Feminism and Social Change: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Heidi Gottfri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Nash, Jeffrey, and Anedith J. Nash. 1994. "The Skyway System and Urban Space: Vitality in Enclosed Public Places." Pp. 167-181 in *The Community of the Streets*, edited by S. E. Cahill and L. H. Lofland. Greenwich, CT: JAI Press.

Newman, Katherine. 1999. *No Shame in My Game: The Working Poor in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and Knopf.

Nippert-Eng, Christena. 1996. *Home and Work: Negotiating Boundaries through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ordstrom, Carolyn, and Antonius C. G. Robben (eds.). 1995. *Fieldwork Under Fir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Violence and Surviv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akley, Ann.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Pp. 243-261 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edited by H. Rober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Olesen, Virginia. 2000. "Feminism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t and into the Millenium." Pp. 215-55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edited by N. K. Denzin and Y.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Ortiz, Steve. 1994. "Shopping for Sociability in the Mall." Pp. 183-199 in *The Community of the Streets*, edited by Spencer E. Cahill and Lyn H. Loflard. Greenwich, CT: JAI Press.

Oselin, Sharon S. 2004. "Leaving the Streets: Transformation of Prostitute Identity Through Rehabilit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Ostrander, Susan A. 1984. *Women of the Upper Cla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Surely You're Not in This Just to Be Helpful': Access, Rapport, and Interviews in Three Studies of Eli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1-27.

——. 1995. *Money For Change: Social Movement Philanthropy at Haymarket People's Fun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Ouellet, Lawrence J. 1996. *Pedal to the Metal: The Work Lives of Trucker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aterniti, Deborah A. 2000. "The Micropolitics of Identity in Adverse Circumstance: A Study of Identity Making in a Total Instit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9: 93-119.

Pattillo-McCoy, Mary 1999. *Black Picket Fences: Privilege and Peril Among the Black Middle Cl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tton, Michael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aules, Greta F. 1991. *Dishing It Out: Power and Resistance Among Waitresses in a New Jersey Restaura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errow, Charles. 2002. *Organizing America: Wealth,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estello, Fred E. 1991. "Discount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 26-46.

Pieke, Frank N. 1996.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form and the* 1989 *People's Movement in Beijing*. London: Kegan Paul.

Pierce, Jennifer L. 1995a. *Gender Trials: Emotional Lives in Contemporary Law Firm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5b.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a Complex Organization: Lawyers, Ethnographic Authority, and Lethal Weapons." Pp. 94-110 in *Studying Elites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edited by Rosanna Hertz and Jonathon B. Imb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ink, Sarah. 2001. *Doing Visual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latt, Jennifer. 1988. "What Can Case Studies Do?" Pp. 1-23 in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Vol. 1), edited by R. G. Burges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Plummer, Ken. 2001. *Documents of Life 2: An Invitation to Critical Human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oland, Blake D. 2002. "Transcription Quality" Pp. 629-650 in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s*, edited by J. F. Gubrium and J. A. Holstei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ollner, Melvin, and Robert M. Emerson. 1983. "The Dynamics of Inclusion and Distance in Fieldwork Relations." Pp. 235-252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edited by R. M. Emerson. Boston: Little, Brown.

Ponticelli, Christy M. 1999. "Crafting Stories of Sexual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2: 157-172.

Powdermaker, Hortense. 1966. *Stranger and Friend: 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 New York: W. W. Norton.

Prus, Robert. 1987. "Generic Social Processes: Maximizing Conceptual Development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6: 250-293.

——. 1989. *Making Sales: Influences as Interpersonal Accomplishment*.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94. "Generic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tudy of Human Lived Experiences: Achieving Transcontextuality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Pp. 436-458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N. J. Herman and L. T. Reynolds.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 1996.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Lived Experience*. Albany, NY: SUNY Press.

Punch, Maurice. 1986.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Rabinow, Paul.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gin, Charles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0.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gin, Charles C., and Howard S. Becker (eds.). 1992.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inwater, Lee, and D. J. Pittman. 1967. "Ethical Problems in Studying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and Deviant Community." *Social Problems* 14: 357-366.

Rauch, Jonathan. 1993. *Kindly Inquisitors: The New Attacks on Free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y, Melvin C., and Ronald L. Simons. 1987. "Convicted Murderers' Accounts of Their Crimes: A Study of Homicide in Small Communities." *Symbolic Interaction* 10: 57-70.

Reed-Danahay, Deborah E. (ed.). 1997.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Autobiography, Intimacy, and Ethnography." Pp. 407-425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Neglected Voices and Excessive Demands in Feminist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16: 69-76.

Richards, Thomas J., and Lyn Richards. 1994.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45-462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aurel. 1985. *The New Other Woman: Contemporary Single Women in Affairs with Married Men*. New York: Free Press.

——.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92. "The Consequences of Poetic Representation: Writing the Other, Rewriting the Self." In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edited by C. Ellis and M. G. Flaher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2000.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Pp. 923-949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2nd ed.), edited by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id, Lori L., Carolyn J. Karlin, and Michael D. Bonham-Crecilius. 2005. "Inclusion and Intrusio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Gay, Lesbian, and Straight Bars." Pp. 134-158 *Together Alon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Places*,

edited by Calvin Morrill, David A. Snow, and Cindy H. Wh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ecken, Henry W. 1969. "The Unidentified Interviewer." Pp. 39-44 in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Text and Reader*, edited by G. McCall and J. L. Simmon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Rieder, Jonathan. 1985. *Canarsie: The Jews and Italians of Brooklyn Against Liber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emer, Jeffrey W. 1977. "Varieties of Opportunistic Research." *Urban Life* 5: 467-477.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Robins, Douglas M., Clinton R. Sanders, and Spencer E. Cahill. 1991. "Dogs and Their People: Pet-Facilitated Interaction in a Public Sett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 3-25.

Rochford, E. Burke, Jr. 1985. *Hare Krishna 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94. "Field Work in Membership in the Hare Krishna." Pp. 56-67 in *Constructions of Deviance: Social Power, Context and Interaction*, edited by Patricia A. Adler and Peter Adler. Belmont, CA: Wadsworth.

——. 1992. "On the Politics of Member Validations: Taking the Findings back to Hare Krishna."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roblems* 3: 99-116.

Rodriguez, Noelie M., and Alan L. Ryave. 2002. *Systematic Self-Observation: A Method for Researching the Hidden and Elusive Features of Everyday Social Life*. Thousand Oaks, CA: Sage.

Romero, Mary. 1992. *Maid in the U. S. A*. New York: Routledge.

Ronai, Carol Rambo. 1992. "The Reflexive Self Through Narrative: A Night in the Life of an Erotic Dancer/Researcher." Pp. 102-124 in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edited by Carolyn Ellis and Michael G. Flaherty. Newbury Park, CA: Sage.

Ronai, Carol, and Carolyn Ellis. 1989. "Turn-Ons for Money: Interactional Strategies of the Table Danc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8: 271-298.

Rosaldo, Renato.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Rosenthal, Rob. 1994. *Homeless in Paradise: A Map of the Terrai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Roth, Julius. 1966. "Hired Hand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st* 1: 190-196.

——. 1970. "Comments on 'Secret Observation.'" Pp. 278-280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Firsthand Involvement with the Social World*, edited by W. J. Filstead. Chicago: Markham.

Roy, Donald E. 1959/60. "'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Human Organization* 18: 158-168.

Rubenstein, Steven. 2002. *Alejandro Tsakimp: A Shuar Healer in the Margins of Histo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Rupp, Leila J., and Verta Taylor. 2003. *Drag Queens at the* 801 *Cabar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lzinger, Leslie. 2003. *Genders in Production: Making Workers in Mexico's Global Fac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4. "Revealing the Unmarked: Finding Masculinity in a Global Factory." *Ethnography* 5: 5-27.

Sampson, Robert J., and John H. Laub. 1993.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nchez-Jankowski, Martin. 1991. *Islands in the Street: Gangs in American Urba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nders, Clinton R. 1989. *Customizing the Body: The Art and Culture of Tattoo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Stranger Than Fiction: Insights in Pitfalls in Post-Modern Ethnography." 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17), edited by N. K. Denzi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9. *Understanding Dogs: Living and Working with Canine Compan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andstrom, Kent. 1990. "Confronting Deadly Disease: The Drama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Gay Men with Ai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271-294.

Sanjek, Roger (ed.). 1990.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a. "On Ethnographic Validity." Pp. 385-418 in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R. Sanjek.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b. "A Vocabulary for Fieldnotes." Pp. 92-121 in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R. Sanjek.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carce, Rik. 1990. *Ecowarriors: Understanding the Radic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Chicago: Noble Press.

——. 1994. "(No) Trial (But) Tribulations: When Courts and Ethnography Confli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123-149.

Schatzman, Leonard, and Anselm Strauss. 1973. *Field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Schensul, Jean J., Margaret D. LeCompte, Robert T. Trotter II, Ellen K. Cromley, and Merrill Singer. 1999. *Mapping*

Social Networks, Spatial Data, and Hidden Population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Scheper-Hughes, Nancy. 1992.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0. "Global Trafficking in Organs." *Cultural Anthropology* 41: 191-224.

——. 2004. "Parts Unknown: Undercover Ethnography of the Organ-Trafficking World." *Ethnography* 5: 29-73.

Schneider, Louis. 1975. *The Sociological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New York: McGraw-Hill.

Schutt, Russell. 2004. *Investigating the Social World: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4th e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Schutz, Alfred. 1962. "Common-Sense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 Pp. 3-47 in *Collected Papers of Alfred Schutz*, (Vol. 1).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2)

Schwalbe, Michael. 1996a. *Unlocking the Iron Cage: The Men's Movement, Gender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b. "The Mirror in Men's Fac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5: 58-82.

Schwartz, Dona. 1989. "Visual Ethnography: Using Photograph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12: 119-154.

Schwartz, M. S., and C. G. Schwartz. 1955. "Problem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343-353.

Scott, Marvin B., and Stanford M. Lyman. 1968. "Accou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46-62.

Seale, Clive.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idman, Irving E. 1998.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haffir, William B., and Robert A. Stebbins (eds.). 1991.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Shaw, Clifford. 1930. *The Jack-Roller: 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ils, Edward. 1961. "The Calling of Sociology." Pp. 1405-1448 in *Theories of Society: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 edited by T. Parsons, E. Shils, K. D. Naegele, and J. R. Pitts. New York: Free Press.

Silverman, David. 2001.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Methods for Analyzing Talk, Text, and Interac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Simpson, George G. 1961. *Principles of Animal Tax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ngleton, Jr., Royce A., and Bruce C. Straits. 1999.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joberg, Gideon (ed.). 1967a. *Ethics, Politics and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MA: Schenkman.

——. 1967b. "Project Camelot: Selected Reactions and Personal Reflections." Pp. 141-162 in *Ethics, Politics, and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Gideon Sjoberg. Cambridge, MA: Schenken.

Sjoberg, Gideon, and Roger Nett. 1997 [1968]. *A Methodology for Social Research*.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Skeggs, Beverly. 2001. "Feminist Ethnography." Pp. 426-442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Skocpol, Theda (ed.). 1984.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elser, Neil.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Smith, Allen C., and Sherryl Kleinman. 1989. "Managing Emotions in Medical School: Students' Contacts with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2: 56-69.

Smith, Carolyn D., and William Kornblum (eds.). 1996. *In the Field: Readings on the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 New York: Praeger.

Smith, Vicki. 1990. *Managing in the Corporate Interest: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an American Ban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1. *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Worker, Risk, and Opportunity in the New Economy*. Ithaca, NY: ILR Press.

Snow, David A. 1980. "The Disengagement Process: A Neglected Problem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3: 100-122.

——. 1993. *Shakabuku: A Study of the Nichiren Shoshu Buddhist Movement in America*, 1960-1975.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Co.

——. 2002. "On the Presumed Crisis in 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bservations from a Sociological and Interactionist Standpoi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1: 498-507.

Snow, David A., and Leon Anderson. 1987. "Identity Work Among the Homeless: The Verbal Construction and Avowal

of Personal Ident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1336-1371.

——. 1993. *Down on Their Luck: A Study of Homeless Street Peop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now, David A., Leon Anderson, and Susan Baker. 1989. "Criminality and Homeless Men: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Social Problems* 36: 532-549.

Snow, David A., Susan Baker, Michael Martin, and Leon Anderson. 1986. "The Myth of Pervasive Mental Illness Among the Homeless." *Social Problems* 33: 407-423.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Pp. 197-217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 Research Annual*, edited by B. Klandermans, H. Kriesi, and S.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Snow, David A., Robert D. Benford, and Leon Anderson. 1986. "Fieldwork Roles and Informational Yield: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Settings and Roles." *Urban Life* 14: 377-408.

Snow, David A., and Richard Machalek. 1983. "The Convert as a Social Type." Pp. 229-289 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Randall Collins. San Francisco: Jossey-Boss.

Snow, David A., and Calvin Morrill. 1993. "Reflections on Anthropology's Ethnographic Crisis of Faith."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2: 8-11.

Snow, David A., Calvin Morrill, and Leon Anderson. 2003. "Linking Ethnography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Ethnography* 2:181-200.

Snow, David A., and Cynthia L. Phillips. 1980. "The Lofland-Stark Conversion Model: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Social Problems* 27: 430-447.

Snow, David A., Cherylon Robinson, and Patricia McCall. 1991. "Cooling Out Men in Singles Bars and Nightclubs: Observations on Survival Strategies of Women in Public Plac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423-449.

Snow, David A., and Danny Trom. 2002. "The Case Stud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Pp. 146-172 in *Method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edited by S. Staggenborg and B.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now, David A., Louis A. Zurcher, and Robert Peters. 1981. "Victory Celebrations as Theater: A Dramaturgical Approach to Crowd Behavior." *Symbolic Interaction* 4: 21-41.

Snow, David A., Louis A. Zurcher, and Gideon Sjoberg. 1982. "Interviewing by Comment: An Adjunct to the Direct Question." *Qualitative Sociology* 5: 285-311.

Sobel, Michael E. 1993. "Causal Inferenc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38 in *A Handbook for Statistical Modelling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ited by G. Arminger, C. C. Clogg, and M. E. Sobel. New York: Plenum Press.

Spector, Malcolm. 1980. "Learning to Study Public Figures." Pp. 98-110 in *Field Work Experience: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pencer, Jonathan. 2001. "Ethnography After Postmodernism." Pp. 443-452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e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pradley, James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Spradley, James P., and Brenda J. Mann. 1975. *The Cocktail Waitress: Women's Work in a Man's World*. New York: Wiley.

Stacey, Judith. 1988.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no. 1): 21-27.

Stack, Carol B. 1974.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Staggenborg, Suzanne. 1988. "'Hired Hand Research'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st* 19: 260-269.

Stark, Rodney. 1994. *Sociology*. (5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Stebbins, Robert A. 1991. "Do We Ever Leave the Field? Notes on Secondary Fieldwork Involvements." Pp. 248-255 in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William B. Shaffir and Robert A. Stebbins. Thousand Oaks: Sage.

Stein, Maurice. 1964. *The Eclipse of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Stets, Jan E. 2003. "Emotions and Sentiments." Pp. 309-335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Jon Delamater.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Stevens, Mitchell L. 2001. *Kingdom of Children: Culture and Controversy in the Homeschooling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evenson, Christopher L. 1999. "The Influence of Nonverbal Symbols on the Meaning of Motive Talk: A Case Study from Masters Swimm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8: 364-388.

Stinchcombe, Arthur L. 1975. "Merton's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Pp. 11-33 in *The Idea of Social Structure*, edited by L. Cos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tocking, George Jr. (ed.). 1989. *Romantic Motives: Essays on Anthropological Sensibil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ecker, Randy, and Edna Bonacich (eds.). 1992. Participatory Research, Part 1.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pecial issue of *American Sociologist* 23 [no. 4].)

——. (eds.). 1993. Participatory Research, Part Ⅱ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pecial issue of *American Sociologist* 24 [no. 1].)

Stokes, Randall, and John O. Hewitt. 1976. "Aligning Ac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839-849.

Strauss, Anselm L. 1962.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Pp. 63-85 in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edited by Arnold M. Ros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nselm, and Juliet Corbin.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auss, Anselm, Leonard Schatzman, Rue Bucher, Danuta Erlich, and Melvin Sabshin. 1964. *Psychiatric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Stryker, Sheldon. 1980. *Symbolic Interaction: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Menlo Park, CA: Benjamin/Cummings.

Sullivan, Mercer L. 1989. *"Getting Paid" Youth Crime and Work in the Inner C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uttles, Gerald D. 1968.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Slum: Ethni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Inner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ykes, Gresham M., and David Matza. 1957.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A Theory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 664-670.

Tarrow, Sidney. 1998.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shakkori, Abbas, and Charles Teddlie. 2003.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ylor, Steven J. 1987. "Observing Abus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ersonal Morality in Field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10: 288-302.

——. 1991. "Leaving the Field: Research, Relationships, and Responsibilities." Pp. 238-247 in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William B. Shaffir and Robert A. Stebbi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ylor, Verta. 1996. *Rock-a-by Baby: Feminism, Self-Help,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New York: Routledge.

——. 1998. "Feminist Methodology in Social Movements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21: 357-379.

Taylor, Verta, and Leil J. Rupp. 2005.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Drag Queen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otest." Forthcoming in *Rhyming Hope and History: Activism and Social Movement Scholarship*, edited by David Croteau, William Hoynes, and Charlotte Ry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homas, Robert J. 1994. *What Machines Can't Do: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5. "Interviewing Important People in Big Companies." Pp. 1-17 in *Studying Elites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edited by Rosanna Hertz and Jonathon B. Imb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Thomas, W. I., and Florian Znaniecki. 1927.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Knopf.

Thorne, Barrie. 1979. "Political Activist as Participant Observer: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in a Study of the Draft Resistance Movement of the 1960s." *Symbolic Interaction* 2: 73-88.

——. 1993. *Gender Play: Girls and Boys in Schoo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2001. "Learning from Kids." Pp. 224-238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2nd ed.), edited by R. M. Emerson.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Timmermans, Stefan. 1999. *Sudden Death and the Myth of CP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Titscher, Stefan, Michael Meyer, Ruth Wodak, and Eva Vetter. 2000. *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Search of Mean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Traugott, Mark (ed.). 1995. *Repertoires &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Tunnell, Kenneth D. 1998. "Honesty, Secrecy, and Decep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Crime: Confessions 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Backstage." Pp. 206-220 in *Ethnography at the Edge: Crime, Deviance and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J. Ferrell and M. S. Hamm.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Turabian, Kate L. (revised by John Grossman and Alice Bennett). 1996.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6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rner, Ralph H. 1947. "The Navy Disbursing Officer as a Bureaucra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 342-348.

——. 1953. "The Quest for Universals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605-611.

Turner, Ralph, and Lewis Killian.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Vail, D. Angus. 2001. "Researching From Afar: Distance, Ethnography, and Testing the Edg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0: 704-725.

van den Hoonard, Will C. (ed.). 2002. *Walking the Tightrope: Ethical Issu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Van Maanen, John.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 Maanen, John, and John G. Kunda. 1989. "'Real Feelings':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1:43-103.

Van Zandt, David E. 1991. *Living in the Children of G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aughan, Diane. 1990. *Uncoupling: 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1986)

——. 1996. *The Challenger Launch Decision: Risky Technology, Culture, and Deviance at NAS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3. "History as Cause: Columbia and Challenger." Pp. 195-20 in *Report Volume* 1. 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enkatesh, Sudhir Alladi. 2000. *American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odern Ghet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idich, Arthur J. 1955.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he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354-360.

Vidich, Arthur J., and Joseph Bensman. 1968. *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 in a Rural Community*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idich, Arthur J., and Stanford M. Lyman. 2000. "Qualitative Methods: Their History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p. 23-59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edited by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Vigil, James D. 2002. *A Rainbow of Gangs: Street Cultures in the Mega-Ci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Wacquant, Loïc. 1998a. "Inside the Zone: The Social Art of the Hustler in the Black American Ghetto."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5: 1-36.

——. 1998b. "The Prizefighter's Three Bodies." *Ethnos* 63: 325-352.

Wagner, David. 1993. *Checkerboard Square: Culture and Resistance in a Homeless Community*. Boulder, CO: Westview.

Walker, Andrew, and Rosalind Kimball Moulton. 1989. "Photo Albums: Images of Time and Reflections of Self." *Qualitative Sociology* 12: 183-214.

Warren, Carol A. B. 1977. "Fieldwork in the Gay World: Issues in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3: 93-107.

——. 2001. "Gender and Fieldwork Relations." Pp. 203-223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2nd ed.), edited by Robert M. Emerson.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Warren, Carol A. B., and Jennifer K. Hackney. 2000. *Gender Issues in Ethnograph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Warren, Carol A. B., and William G. Staples. 1989. "Fieldwork in Forbidden Terrain: The State, Privatization and Human Subjects Regu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st* 20: 263-277.

Warwick, D. E. 1975. "Social Scientists Ought to Stop Lying." *Psychology Today*, February: 38, 40, 105-106.

——. 1982. "Tearoom Trade: Means and Ends in Social Research." Pp. 35-58 in *Social Research Ethics*, edited by M. Bulmer. London: Macmillan.

Wax, Murray, and Joan Cassell. 1981. "From Regulation to Reflection: Ethics in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st* 16: 224-229.

Wax, Rosalie H. 1971. *Doing Fieldwork: Warnings and Adv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9. "Gender and Age in Fieldwork and Fieldwork Education: No Good Thing Is Done by Any Man Alone." *Social Problems* 26: 509-522.

Webb, Eugene, Donald T. Campbell, Richard D. Schwartz, Lee Sechrest, and Janet B. Grove. 1981. *Nonreactive Measur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Weick, Karl. 1985. "Systematic Observational Methods." Pp. 567-634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3rd ed.), edited by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Weitzman, Eben A. 2000. "Softwar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803-820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edited by N. K. Denzin and Y.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Wesely, Jennifer K. 2003. "Exotic Dancing and the Negotiation of Identity: The Multiple Uses of Body Techn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643-669.

Whyte, William F. 1993.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4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3)

Williams, Christine L. 1995. *Still a Man's World: Men Who Do Women's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liams, Terry. 1989. *The Cocaine Kids: The Inside Story of a Teenage Drug Ring*. New York: Addison-Wesley

Williams, Terry, Eloise Dunlap, Bruce Johnson, and Ansley Hamild. 1992. "Personal Safety in Dangerous Plac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343-374.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olcott, Harry E. 1990. "Making a Study 'More Ethnograph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44-72.

——.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2001.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Seco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Wolf, Margaret.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Diane L. 1992. *Factory Daughters: Gender, Household Dynamics, and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Jav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6. "Situating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Pp. 1-55 in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edited by D. L. Wolf.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Wolkomir, Michelle. 2001. "Emotion Work, Commitment, and the Authentication of the Self. : The Case of Gay and Ex-Gay Christian Support Group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0: 305-334.

Workman, John E. Jr. 1992.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in 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tudy." *Qualitative Sociology* 15: 419-425.

Wright, Sam. 1978. *Crowds and Riots: A Study in Social Organiz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Wright, Talmadge. 1997. *Out of Place: Homeless Mobilizations, Subcities, and Contested Landscap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Yanay, Niza and Golan Shahar. 1998. "Professional Feelings as Emotional Lab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7: 346-373.

Yin, Robert K.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Yoels, William C., and J. M. Clair. 1994. "Never Enough Time: How Medical Students Manage a Scarce Resour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185-213.

Zablocki, Benjamin, and Rosabeth Moss Kanter. 1976.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ifestyl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269-298.

Zavella, Patricia. 1996. "Feminist Insider Dilemmas: Constructing Ethnic Identity with Chicana Informants." Pp. 138-159 in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edited by D. L. Wolf.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Zelditch, Morris, Jr. 1962.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Field Studies." *Amert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7: 566-576.

Zerubavel, Evitar. 1980. "If Simmel Were a Fieldworker: On Formal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Analytical Field Research." *Symbolic Interaction* 3: 25-33.

——. 1991. *The Fine Line: Making Distinctions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9. *The Clockwork Muse: A Practical Guide to Writing Theses, Dissertation, and Boo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Zimmerman, Don H., and D. Lawrence Wieder. 1977. "The Diary-Interview Method." *Urban Life* 5: 479-498.

Znaniecki, Florian. 1934. *The Method of Sociology*.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Zurcher, Louis A. 1983. *Social Roles: Conformity, Conflict, and Creativi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专有名称汉英对照表

人名汉英对照表

阿德勒	Adler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
阿尔弗雷德·舒茨	Alfred Schutz
阿加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阿瑟·维迪奇	Arthur Vidich
阿特金森	Atkinson
阿赞德	Azande
埃德温·莱默特	Edwin Lemert
埃弗雷特·休斯	Everett Hughes
埃利奥特·里鲍	Elliot Liebow
埃莫森	Emerson
艾尔帕索	E1 Paso
艾莉森·芒齐	Allison Munch
艾伦·史密斯	Allen Smith
艾米莉·克拉克	Emily Clark
爱德华·伊文思-普理查德	Edward Evans-Pritchard
爱普立尔·布雷菲尔德	April Brayfield
安德森	Anderson
安格斯·维尔	Angus Vail
安塞尔姆·施特劳斯	Anselm Strauss
奥古斯特·霍林谢德	August Hollingshead
巴尼·格拉泽	Barney Glaser
巴尔	Bahr
巴克尔	Baker
巴瑞·索恩	Barrie Thorne
巴曾	Barzun
芭芭拉·舍尔曼·海尔	Barbara Sherman Heyl
保罗·阿特金森	Paul Atkinson
保罗·威利斯	Paul Willis
鲍尔纳	Pollner
贝克尔	Becker
本福特	Benford
本杰明·扎布洛基	Benjamin Zablocki

本内特・伯格	Bennett Berger
本斯曼	Bensman
彼得・阿德勒	Peter Adler
彼得・艾尔保	Peter Elbow
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彼得・福尔科	Peter Falk
珀尔纳	Pollner
伯格	Berger
伯克・洛奇福德	Burke Rochford
布福德・容克	Buford Junker
布拉德利・费舍尔	Bradley J. Fisher
布里	Blee
布鲁默	Blumer
布鲁斯・伯格	Bruce Berg
查德维克	Chadwick
查尔斯・博斯克	Charles Bosk
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查尔斯・拉金	Charles Ragin
查尔斯・佩罗	Charles Perrow
卡麦兹	Charmaz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戴维・范・赞特	David Van Zandt
戴维・斯诺	David Snow
黛安・沃尔夫	Diane Wolf
黛安・沃尔甘	Diane Vaughan
丹・克莱斯	Dan Cress
丹尼尔	Duneier
道格拉斯・哈勃	Douglas Harper
德里克・弗里曼	Derek Freeman
德鲁・约翰斯顿	Drue Johnston
邓辛	Denzin
蒂凡尼・奇恩	Tiffani Chin
蒂姆・戴蒙德	Tim Diamond
丁沃尔	Dingwall
杜鲁门・卡波特	Truman Capote
多翰・桑杰兹-简科夫斯基	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
弗莱德・戴维斯	Fred Davis
弗雷兹	Fretz

弗雷德里克·O. 吉尔林	Frederick O. Gearing
弗洛里安·兹那涅奇	Florian Znaniecki
格拉夫	Graff
格拉泽	Glaser
格温·多迪克	Gwen Dordick
格温多林·多迪克	Gwendolyn Dordick
休伯曼	Huberman
哈里·沃尔科特	Harry Wolcott
海伦·林德	Helen Lynd
赫伯特·布鲁默	Herbert Blumer
赫伯特·甘斯	Herbert Gans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赫丘勒·白罗	Hercule Poirot
怀特	White
怀恩	Fine
霍华德·贝克尔	Howard Becker
霍洛维兹	Horowitz
基甸·昆达	Gideon Kunda
格尔兹	Geertz
吉迪翁·斯约伯格	Gideon Sjoberg
加里·艾伦·怀恩	Gary Alan Fine
加里·怀恩	Gary Fine
加里·拉尔森	Gary Larson
杰弗里·克莱尔	Jeffrey Clair
杰弗瑞·里默	Jeffrey Riemer
杰克·道格拉斯	Jack Douglas
杰克·卡兹	Jack Katz
杰拉德·萨特尔	Gerald Suttle
金斯利·戴维斯	Kingsley Davis
卡尔·莫里尔	Cal Morrill
卡尔文·莫里尔	Calvin Morrill
卡罗尔·斯塔克	Carol Stack
卡罗尔·沃伦	Carol Warren
卡罗琳·艾利斯	Carolyn Ellis
卡普罗	Caplow
卡兹	Katz
凯瑟琳·纽曼	Katherine Newman
凯思琳·布里	Kathleen Blee

凯文・汉森	Kevin Henson
凯西・卡曼兹	Kathy Charmaz
凯西・布里	Kathy Blee
坎达斯・克拉克	Candace Clark
柯利尔	Correll
科宾	Corbin
科菲	Coffey
科斯顿・隆伯格	Kirsten Gronbjerg
克莱西	Cressey
克林顿・桑德斯	Clinton Sanders
克里福德・肖	Clifford Shaw
克里福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克里斯・麦肯怀恩	Kris McIlwaine
克里斯蒂・泰勒	Kristie Taylor
克里斯汀・霍恩	Christine Horne
克雷蒙	Kleinman
肯尼斯・布鲁菲	Kenneth Bruffee
莱科姆特	LeCompte
莱拉・鲁普	Leila Rupp
莱斯利・塞尔辛格	Leslie Salzinger
赖德克里夫	Radcliffe
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兰迪・霍德森	Randy Hodson
劳埃德・沃纳	W. Lloyd Warner
劳德・汉弗莱	Laud Humphreys
劳瑞・肯德尔	Lori Kendall
勒若伊・高尔德	Leroy Gould
利昂・安德森	Leon Anderson
里克・斯盖尔斯	Rik Scarce
理查德・列奥	Richard Leo
理查德・米切尔	Richard Mitchell
理查德・希尔伯特	Richard Hilbert
丽贝卡・阿拉亚利	Rebecca Allahyari
丽塔・阿迪梯	Rita Arditti
林德史密斯	Lindesmith
林恩・理查德	Lyn Richard
林恩・洛夫兰德	Lyn Lonand
琳达・邓恩	Linda Dunn

卢克曼	Luckman
卢莎贝斯・坎特	Rosabeth Kanter
鲁斯・霍洛维兹	Ruth Horowitz
路易斯・施耐德	Louis Schneider
路易斯・祖尔科	Louis Zurcher
罗宾・莱达	Robin Leidner
罗伯特・埃里克森	Robert Ellickson
罗伯特・埃莫森	Robert Emerson
罗伯特・本福特	Robert Benfort
罗伯特・林德	Robert Lynd
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n
罗伯特・帕克	Robert Park
罗伯特・普鲁斯	Robert Prus
罗伯特・斯德宾	Robert Stebbin
罗布・本福德	Rob Benford
罗德尼・斯塔克	Rodney Stark
罗杰・桑杰克	Roger Sanjek
罗莎莉・瓦克斯	Rosalie Wax
洛伊斯	Lois
洛伊克・瓦克奎恩特	Loic Wacquant
洛夫兰德	Lofland
诺顿	Norton
马丁	Martin
马克斯・黑里奇	Max Heirich
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马特尔・哈默斯理	Martyn Hammersly
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玛丽・帕迪罗-麦考伊	Mary Pattillo-McCoy
玛丽・若麦若	Mary Romero
玛丽安・波依伦	Marianne Boelen
玛莎・寇普	Martha Copp
寇普	Copp
迈尔斯	Miles
迈克尔・贝尔	Michael Bell
迈克尔・弗莱厄蒂	Michael Flaherty
迈克尔・莫法特	Michael Moffatt
迈克尔・施沃伯	Michael Schwalbe
麦克・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梅尔维尔・道尔顿	Melville Dalton
梅林达・米莉苷	Melinda Milligan
梅塞・苏利文	Mercer Sullivan
米尔斯	Mills
米奇・丹尼尔	Mitch Duneier
米切尔・阿波拉菲尔	Mitchel Abolafia
米切尔・丹尼尔	Mitchell Duneier
莫里尔	Morrill
莫瑞・梅尔斌	Murray Melbin
墨菲	Murphy
默里・戴维斯	Murray Davis
莫里斯・泽尔迪奇	Morris Zelditch
拿破仑	Napoleon
拿破仑・查冈	Napoleon Chagnon
内那托・罗萨多	Renato Rosaldo
弗雷德里克・O. 吉尔林	Frederick O. Gearing
内杰尔・菲尔丁	Nigel Fielding
南希・赫尔曼	Nancy Herman
南希・曼德尔	Nancy Mandell
南希・纳普尔	Nancy Naples
南希・辛柏-休斯	Nancy Scheper-Hughes
妮可・毕加特	Nicole Biggart
诺里斯・约翰逊	Norris Johnson
诺曼・邓辛	Norman Denzin
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帕特里克・盖勒弗	Patrick Gallagher
帕特丽夏・阿德勒	Patricia Adler
皮埃雷特・洪达格留-索铁罗	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
齐默曼	Zimmerman
乔纳森・雷德	Jonathan Rieder
乔治・赫伯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乔治・奥维尔	George Orwell
格瑞塔・保尔	Greta Paules
桑科兹・简科夫斯基	Sanchez-Jankowski
舍利尔・克雷蒙	Sherryl Kleinman
申舒尔	Schensul
施特劳斯	Strauss
斯宾塞・卡希尔	Spencer Cahill

斯科特·亨特	Scott Hunter
斯诺	Snow
斯普拉德利	Spradley
斯特凡·蒂莫曼	Stefan Timmerman
苏德喜·温卡什	Sudhir Venkatesh
苏珊·奥斯特朗德	Susan Ostrander
塔尔马奇·赖特	Talmadge Wright
唐纳德·罗伊	Donald Roy
特里·威廉	Terry William
托德	Todd
托马斯	W. I. Thomas
托马斯·理查德	Thomas Richard
托马斯·卡尔豪恩	Thomas Calhoun
威廉·F. 怀特	William F. Whyte
威廉·格姆森	Willian Gamson
威廉·科萨罗	William Corsaro
威廉·沙弗	William Shaffir
威廉·约厄尔	William Yoels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维德	Wiede
维迪奇	Vidich
维尔	Vail
维基·史密斯	Vicki Smith
维塔·泰勒	Verta Taylor
沃尔科特	Wolcott
乌列·布朗芬布伦纳	Urie Bronfenbrener
西德尼·塔罗	Sidney Tarrow
夏兹曼	Schatzman
肖	Shaw
辛西娅·博嘉德	Cynthia Bogard
休伯曼	Huberman
休斯	Hughes
亚伯·古柏利姆	Jaber Gubrium
亚莉·霍赫希尔德	Arlie Hochschild
伊丽莎白·墨斐	Elizabeth Murphy
伊万斯-普理查德	Evans-Pritchard
伊维塔·泽鲁巴威尔	Eviatar Zerubavel

以利亚·安德森	Elijah Anderson
约翰·洛夫兰德	John Lofland
约翰·欧文	John Irwin
约翰·沃克曼	John Workman
约翰斯顿	Johnston
约翰逊	Johnson
约瑟夫·本斯曼	Joseph Bensman
约瑟夫·科塔巴	Joseph Kotarba
泽鲁巴威尔	Zerubavel
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詹妮弗·李	Jennifer Lee
詹妮弗·洛伊斯	Jennifer Lois
詹妮弗·皮尔斯	Jennifer Pierce
詹森·吉莫森	Jason Jimerson
朱迪思·斯泰西	Judith Stacey
朱丽叶斯·罗斯	Julius Roth
兹纳涅茨基	Znaniecki
扎维拉	Zavella

作品名称汉英对照表

暗夜疆界	Night as Frontier
保护我们的心智:堕胎陪护中的愤怒管理	Securing Our Sanity: Anger Management Among Abortion Escorts
北方城市	Yankee City
参与观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茶室贸易	Tearoom Trade
城市生存能力:一个都市社会的种族、阶层与变迁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从踏板到金属:卡车司机的生活工作	Pedal to the Metal: The Work Lives of Truckers
厨房	Kitchens
大众社会里的小镇:一个乡村社区里的阶层、权力和宗教信仰	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Class, Power and Religion in a Rural Community
当代民族志杂志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都市村民:意大利裔美国人生活中的团体与阶级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福克斯的表情	Face of the Fox

黑人的尖桩栅栏:中产阶级黑人的特权与危险	Black Picket Fences: Privilege and Peril Among the Black Middle Class
混乱的监狱	Prisons in Turmoil
火焰下的实地研究:暴力与生存的当代研究	Fieldwork Under Fir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Violence and Survival
监狱	The Jail
街道的密码:市中心的庄重、暴力和道德生活	Code of the street: Decency, Violence and the Moral Life of the Inner City
街角社会:一座意大利贫民窟的社会结构	Street Corner Sociey: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街角社会	Street Corner Society
杰克·罗尔:一个少年犯罪者的故事	The Jack-Roller
经历实地研究	Experiencing Fieldwork
卡纳西:布鲁克林抵抗自由主义的犹太人与意大利人	Canarsie:The Jews and Italians of Brooklyn Against Liberalism
劳燕分飞:亲密关系的转折点	Uncoupling: 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没有上锁的铁笼:人类运动、性别政治和美国文化	Unlocking the Iron Cage:The Men's Movement, Gender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美国女佣	Maid in the U. S. A.
美国人的研究:现代犹太人区的沉浮	American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odern Ghetto
贫民窟	Asylums
贫民窟的社会秩序:城市贫民区的族裔与区域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Slum:Ethni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Inner City
平凡与非凡:中国改革与 1989 年北京动乱的人类学研究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Reform and the 1989 People's Movement in Beijing
人行道	Sidewalk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善解狗儿们:与犬科伙伴一起生活和工作	Understanding dogs: Living and working with Canine Companions
善行的力量:上流社会的特权妇女和社会再生产	The Power of Good Deeds: Privileged Women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the Upper Class

生态战士:理解激进的环境运动	Ecowarriors: Understanding the Radic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时间冥想	The Clockwork Muse
视觉社会学	Visual Sociology
视觉研究	Visual Studies
收容所	Asylums
谈政治	Talking Politics
谈悲伤	Speaking of Sadness
他们遭遇不幸:对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的研究	Down on Their Luck: A Study of Homeless Street People
天才的语言	Gifted Tongues
同伴的力量:青春期前的文化和身份	Peer Power: Preadolescent Culture and Identity
同情的负担:家庭如何应对精神疾病	The Burden of Sympathy: How Families Cope with Mental Illness
突然死亡与 CPR 神话	Sudden Death and the Myth of CPR
团结的文化:自觉、行动与当代美国劳工	Cultures of Solidarity: Consciousness,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rkers
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个黑人社区的生存策略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性别的生产:在墨西哥全球工厂制造工人	Genders in Production: Making Workers in Mexico's Global Factories
现代研究者	Modern Researcher
性别的转换:墨西哥移民的经历	Gendered Transitions: Mexican Experiences of Immigrants
一部严格意义的日记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一意孤行	Wheeling and Dealing
英雄的努力:搜寻和营救志愿者的情感文化	Heroic Efforts: The Emotional Culture of Search and Rescue Volunteers
在有组织的种族主义内部:仇恨运动中的妇女	Inside Organized Racism: Women in the Hate Movement
扎根理论的发现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只是一名临时雇员	Just a Temp
执行的方法:公司中的冲突管理	The Executive Way: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orporations
重罪犯	the Felon
做买卖	Making Sales

万卷方法总书目

万卷方法是我国第一套系统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型丛书,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近两百余名学者参与了丛书的写作和翻译工作。至今已出版图书51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是2007年以来出版的新书。

2009年版

1 **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指南**
赛德曼著　周海涛译
书号:978-7-5624-4679-8

2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第2版校订新译本)**
殷著　周海涛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278-4

3 **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
孙振东著　定价:38
书号:978-7-5624-4649-1

4 **参与观察法**
乔金森著　张小山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616-3

5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和分析方法**
洛夫兰德等著　林小英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690-3

6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卡麦兹著　边国英译　陈向明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747-4

7 **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第2版)**
袁政　编著　定价:33

8 **AMOS与研究方法**
荣泰生著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806-8

9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格雷著　许梦云译　高丙中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698-0

10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普拉尼等著　郑显兰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720-7

11 **如何做质性研究**
希尔弗曼著　卢晖临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697-2

2008年版

12 **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第8版)**
赫文著　李涤非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465-7

13 **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Version 9)**
汉密尔顿著　郭志刚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483-1

14 **实用抽样方法**
亨利著　沈崇麟译　定价:22
书号:978-7-5624-4487-9

15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著　定价:40
书号:978-7-5624-4446-6

16 **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
陈向明主编　定价:30
书号:978-7-5624-4462-6

17 **社会研究方法**
仇立平著　定价:39
书号:978-7-5624-4456-5

18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第2版)**
米尔斯,休伯曼著　卢晖临译　定价:78
书号:978-7-5624-4426-8

19 **实用数据再分析法(第2版)**
利普西著　刘军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296-7

20 **质性研究的伦理**
丁三东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304-9

21 **叙事研究:阅读、倾听与理解**
利布里奇著　王红艳译:定价:27
书号:978-7-5624-4303-2

22 **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第2版)**
麦瑞尔姆著　于泽元译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349-0

23 **爱上统计学(第2版)**
萨尔金德著　史玲玲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196-0

24 **复杂调查设计与分析的实用方法(第2版)**
雷同能著　王天夫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290-5

25 **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APA格式)(第5版)**
美国心理协会著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130-4

2007年版

26 **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
欧兰德森著 李涤非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259-2

27 **多层次模型分析导论(第2版)**
Ita kreft 著 郭志刚译 定价:35
书号:978-7-5624-4060-4

28 **评估:方法与技术(第7版)**
罗希著 邱泽奇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3994-3

29 **焦点团体:应用研究实践指南(第3版)**
克鲁杰著 林小英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990-5

30 **质的研究的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第2版)**
马克斯威尔著 朱光明译,陈向明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71-4

31 **组织诊断:方法、模型和过程(第3版)**
哈里森著 张小山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055-1

32 **民族志:步步深入(第2版)**
费特曼著 龚建华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96-7

33 **分组比较的统计分析(第2版)**
廖福挺著 高勇译 沈崇麟校 定价:35
书号:978-7-5624-3942-4

34 **抽样调查设计导论(第2版)**
扎加,布莱尔著 沈崇麟译 定价:39
书号:978-7-5624-3943-1

35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3851-9

36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48
书号:978-7-5624-3286-9

37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38
书号:978-7-5624-3948-6

38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3944-8

39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第2版)**
克雷斯威尔著 崔延强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644-7

40 **社会网络分析法(第2版)**
约翰·斯科特著 刘军译 定价:28
书号:978-7-5624-2147-4

41 **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
李钢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50-2

2007年以前版

42 **论教育科学:基于文化哲学的批判与建构**
申仁洪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41-6

43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
黄欣荣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25-0

44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
陈向明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89-4

45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筛选与监控(第2版)**
拉弗拉卡斯著 沈崇麟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441-7

46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沃恩著 沈崇麟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669-X

47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第6版)**
米勒著 风笑天译 定价:68
书号:978-7-5624-3295-1

48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第2版)**
德维利斯著 李红等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280-5

49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3版)**
殷著 周海涛译 定价:15
书号:978-7-5624-3266-1

50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第2版)**
邓金著 周勇译:定价:15
书号:7-5624-3185-X

51 **调查研究方法(第3版)**
福勒著 孙振东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289-9